

天安门之子

余杰 著

目录

包遵信序

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自序）

上卷 血脉的回响

肩住黑暗的闸门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

——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上的演讲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

——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谁在“移山”？

——在美国彼诺伊特大学“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受丁子霖托，余杰代拟）

法国人民，请睁开你们的眼睛（余杰草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恢复

蒋彦永：我要不停地说真话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为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

——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香港还有为“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有感于新当选议员梁国雄自创的宣誓仪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邓小平的“再偶像化”及其政治遗产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莫把大学当监狱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余杰草拟）

——关于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卷 无边的邪恶

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开放式征集签名信（余杰草拟）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词（余杰草拟）

“船坚炮利”不会“富国强民”

——从中国近代化的歧路看江胡交班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

——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毛泽东是农民的救星，还是农民的灾星？

——与李昌平先生商榷

谁识老毛真面目？

——读《王中酉集》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惟剩颂毛魔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与钱理群先生商榷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读姚仁杰自传《心路》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评柯云路《芙蓉国》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

——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向西藏忏悔

——读班旦加措《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犯人的证词》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付出水面

——读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夹边沟的罪恶与死亡

——读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自由之魂：从雷震到林昭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为了女儿、妻子与母亲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妻子的绝食日记

孔泉的“同情心”与李思怡之死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从孙中山和赵紫阳的葬礼谈起

第三卷 溃败的中国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中共官僚“信”什么？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谰纬党”？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那些参与“金盾工程”的“海龟”们

官逼民死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捍卫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

——兼论我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附录 余杰—萧然通信录

- (一)、李敖·学术·常识
- (二)、民粹主义·爱国·俄罗斯知识分子
- (三)、传媒·忏悔·文人的虚妄
- (四)、自由主义·萨伊德与奈保尔·“三农”问题
- (五)、巴金·说真话·被妖魔化的美国
- (六)、昆德拉与哈维尔·行动抉择·媚俗

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余杰《天安门之子》序

包遵信

我不知道这已是余杰的第几本文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将这本文集取名为《天安门之子》，这却是意味深长的。

“天安门”在中国原是人们向往、憧憬的神圣的地方。可是，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神圣”已徒有其名，“天安门”倒成了极度敏感极度忌讳的词儿，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余杰却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向世人大声宣布：我就是天安门的儿子！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令人气旺！

从天安门枪声中觉醒的新一代

作者将这本文集题为《天安门之子》的意义如果仅止于此，那它只是表现了作者少年气盛的道德勇气；这当然也很可贵。我认为作者勇敢行为的可贵之处，还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那就是它标示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和成长。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渊源和文化遗产，当然来自老的一代，但又不完全局限于老的一代。与老的一代相比，他们又有着独有的时代特征、知识优势和理论优势。

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发生时，余杰还只有十六岁，一位在上学的初中生。但他把自己和天安门联在一起，却非一时的冲动，而是对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体认和把握，发现自己和“六四”之间联系着一条浸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自己也许像一头生活在肮脏猪圈里的猪，对被长期囚禁和即将被宰杀的命运会一无所知。正是“六四”罪恶的枪声，使自己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中共用谎言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崩塌了。”

余杰这段叙述自己感情的变化和性格的形成，我认为值得我们回味的。学术界曾有人就晚清以来或就“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发展划分为若干代或若干段，它们大都以历史上几次抗议外国势力侵略的运动为每一代的分解点，例如甲午战争之于戊戌变法，巴黎和会之于“五四”，日本入侵之于“一·二九”……当然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一共同的缺憾：它们都无法解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除了皈依官方意识形态，其他一切主义、思想通通都失语了；他们没有了个人选择，没有了独立人格，当然也没有了思想与人格的尊严。这也就是直到时下人们都还耳熟能详的思想改造的成就。

那时的知识分子都以“听党的话”，“服从组织”为时尚，任何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思想与言论，都会被认为是“异端”、“异己”，甚或被当作“反动”、“反革命”。思想或学术的争论有时表面上很热闹，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只有主义的真假之争，绝无这主义与那主义之争，即或一些与主义无关的问题，也都要让它们与主义挂上钩，把争的实质归结为：谁更符合主义；离开了“主义”的包装，争论的问题连存在的理由都没有。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大旗下，才有一些勇敢的朋友终于挣脱了“主义”的“保护”，冲到思想

解放的大道上猛跑了一阵，可是这样的蹦跶连热身的目的也没达到，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当年思想解放是冲向毛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无异于宣布毛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绝对不能动摇，思想解放也有它的临界点，越出了一步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是自由化？多少年来用它整人的讲不清楚，被整的人也讲不清楚，其实就是任何不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新思想新文化，请注意我在这儿用的是“官方意识训形态”，而不是人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理论，你可以不相信它，但不能不尊重它，中国当权者总把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那是在有意混淆，给自己贴金，我们也不要上这个当了。新思想新文化既然已经涌现，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枉然。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了多少次？奇怪的是，自由化非但没有灭迹，而是越反越多，越反越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屠杀在文化上的深层意义，就是统治者想借助于武装到牙齿的大兵来剿灭“自由化”。回想当年在数十万大军进城之前，长安街上的高楼大厦突然都悬挂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景象猛一看莫名其妙，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笑。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可以引申为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武器的批判可以成就更多的批判的武器。中国统治者自称信奉马克思，却怎么也体会不出这另一层含义。正是“六四”的坦克与机枪，使更多的人警醒，从而涌现出一代思想新人，余杰就是这样的思想新人。他的出现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崭新一代的形象。这就是我从余杰讲述“六四”当年自己感受，公然宣布自己是“天安门之子”的深层文化的意义。

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所谓“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这儿的“新”并非指他们在学说上理论上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新观念”，而是指他们已经摆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人对事总有自己的甄别与选择，思考问题总有自己的角度与标准。即使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有距离也不回避，更不会刻意去迎合，展露了自己的个性。简而言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现代知识分子又有谁不具备这种精神，把它作为“天安门一代”“新”的特点，是否太一般化了？非也。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五四”启蒙的洗礼，就已初步确立了自我独立的精神自由，可是余后经过几代（三代？四代？），这种自我独立的精神只有非但没有能逐步巩固、逐步完满，反倒越来越纤弱，越来越抽缩，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几乎完全消逝了。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那三十年里，我们奉行“舆论一律”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都只能发表当权者允许的声音，不但人文社会学科要为当权统治政策服务，就连自然科学也难逃这样的厄运。臭名昭著的皮毛之喻，恰是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与当权统治者关系的经典表述。试想在那样的条件下，又谈何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但是，历史的惰性不仅在于它要将精神的枷锁套在人们的脖子上，让人更费解的还是有人要将枷锁当作项链向人们炫耀。最近，一位老左派又操起老行当，用大批判的语言批判“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对它表示鄙夷，却也不要忽略了有的话多少透露了历史真实情况。譬如它说：“共公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样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这话就很有意思。只是它没有讲清楚，所谓“这样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究竟是历史的描述还是理论的概括？要是讲历史，那与我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年倒是吻合的。蔡仲德先生以“实现自我”与“失落自我”来作为冯友兰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前与以后的区分，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有这段历史，但作为理论概括则是不完全的。要有独立的精神，这可是知识分子的通性啊！不然我们又怎么理解当年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张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有学者据此推断陈寅恪为自由主义，这

或有可商之处。但这确实是从古之士到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难怪这位左派先生不信知识分子有独立精神哩。追求独立精神不但历史上有很多志士仁人，就是当下也是为数可观的啊！余杰就是其中年轻的一位，比他年长的那就更多了。只是和那些年长的人相比，余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瓜葛可能更少一点。

我把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局限于他们挣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特色，这是否低估了他们的成就？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理论的创新？当然有的，譬如历史学领域，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我以为就是“创新”。时下它已经常见诸媒体，可见它已被社会（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了。吴思有了这样的成就，于中国史学可谓功不可没。与此有着鲜明对比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提出了“超稳定”假说，在清污中却被指责为结构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滥觞。这主义那主义，只要马克思主义没说过就是非法的。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史学界朋友著文说，“超稳定”的提法，早在二十年代托派就说过，言下之义托派讲过了，即使正确也不能再提，谁提谁就有重蹈托派之嫌，帽子大得吓人。我因为给这本书写了篇序，差一点也被指定为“自由化”分子，只是我不怎么怕鬼，才逃过了这一劫。比起金、刘二位，吴思先生还是幸运的。尽管他的《潜规则》也遭到禁杀，这禁杀除了表明统治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丝毫没有进步，却什么作用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成就可能还有，只是我近年来过于陋寂，知道的太少。好在这于我高扬崛起的一代没有直接关系，也就便于我藏拙了。

有一点必须声明：所谓崛起的一代主要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六十年出生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活跃在社会各阶层；和上一代人相比，和某些人相比，他们最大特点是人前与人后一样，会上与会下一样。官方的意识形态就象是一堵墙矗立在那儿，承认它但不畏惧它。

“新一代”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偏狭

“天安门之子”一代人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有着他们不可忽视的优势。他们普遍有较好的外语能力，不单有新进的专业知识，还有相关国际问题的知识。余杰的这本文集就有这样的优点，既有国内骇人听闻的惨案，又有从“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国际上都关注的问题。凸现了作者思想的敏锐与视野的开阔。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总爱标榜“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为已任”，其实中世纪所谓“天下”就是君王统治的实际版图，士人心目中的“天下”，坐实了大都是“当今皇上”。十几年前有人曾把“天下”解释为“全世界”，并说明中国的“天下主义”要比当今的“世界主义”更深刻，的确让人兴奋了一阵子，可惜那只是一种郢书燕说，表明作者既昧于历史，又疏于体认历史上文人的心态，难怪未见有人附和。到了近代，最为堂皇而又能激荡思潮的则是民族主义。这也可以理解。民族要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本来就是近代的题中应有之意。令人奇怪的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已经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几十年，又没有遇到外敌入侵的威胁，却突然高扬起爱国主义实即民族主义的大旗，顿时世人为之愕然。

近日读到一位自称为“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权威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于八十年代末，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国内知识界是[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质疑。照他这种说法，（一）中国民族主义是九十年代这几位可爱先生鼓捣出来的；（二）他们所以要这么鼓捣是因为国内知识分子贬低自己的历史文化；（三）他们一直没有亮出民族主义的旗帜，这旗帜也是后来西方知识分子攻击他们强加给他们的……摆出一副无辜的架式，让人感到何其不幸也。其实，作为一种价值选择，任何人都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是否信奉民族主义，大可不必包果上这么

厚的华装，显出全身心的无奈。但对于历史事实则无论如何不可这样信口胡诌。在我记忆中，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身边无资料可查，只能凭记忆），当时曾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名义召开了一个爱国主义学术讨论会，我被通知也曾躬逢其盛，虽然这是件很荣光的事，我却一直犯嘀咕，茫然了无头绪。直到临开会，得知上海华东师大陈旭麓教授也来参加这个会。陈先生与我是忘年交，现在他已故世多年。我们相见当然推心置腹地畅谈了，于是我向他请教：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国主义？陈先生先是一楞，差不多有十几秒罢，才从牙缝挤出了几个字：大概是上面又有什么需要罢？这等于没说。没有上面的需要，就不可能以两院研究生院的名义召开这样一个讨论会，在我印象中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问题是我们虽然懂“上面”指的谁，却并不了解“上面”为什么要宣传爱国主义？不久又一件事似乎解答了我们的疑问：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了。不论怎么说这终究还是一部学术著作。令人费解的是，这么一部学术专著，却由中央某机构下发文件，让所有党员干部都去读它，然后又责令出版社加印了普及本，由各部门、各单位公款购置，发给每人一套（上下两册）。这些进乎反常的做法，就因为当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的一席话，说他读了一遍胡著，认为对宣传爱国主义大有好处。可以用它批判“洋奴买办”思想。事情到这儿总算真相大白了：原来当年铺天盖地的爱国主义旗帜，并非有什么外敌入侵（这一点时下民族主义者倒是说对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原来和外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执政党内大佬要用它来攻击他的政敌发动的攻势。所以勃兴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是执政当局来对抗、扼制、平衡对外开放的另外一手。它与其说是民情渲泻的理论升华，还不如说是执政者惯以民意作为旗号的一种策略。时下弥漫于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多种多样，它们各有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论正当性，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则无不以此为其滥觞。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一直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列，成为官方号召全民高举的一面旗帜。

总而言之，我认为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学理，还是作为一种价值选择，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是信还是不信，但要割断它同权力的联系，就不是单凭主观愿望能够办到的事了。即使有勇气捏造它的编年史也是枉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犹如一口陷井，我们只能在其中充分地宣泄情绪，却无法获得理性的体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转向现代，一个无可回避的任务，就是跳出爱国主义的陷阱，超越民族主义的偏狭，确立“世界公民意识”。“世界公民意识”是旅美华裔学者许倬云先生提出的。他说“中国学者应该有世界公民意识。”许先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由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以为有着深刻的意义。当下就不失为一种疗治民族主义，帮助我们从伟大的爱国主义泥潭自拔的一法。究竟什么是“世界公民意识”？这当然还须要作深入的研究。从余杰这本文集中我们多少可以概括出几点，那就是“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现在不是有句话常常见诸媒体吗？“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以什么姿态走向世界？我想有了“世界眼光”、“世界胸怀”和“世界知识”，我们走到那儿都是一个合格的文明的现代人。否则到哪儿都会遭人家不待见。

自由主义——一条崎岖艰险的路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余杰的这本题为《天安门之子》却无法在大陆而只能在香港出版。由此也可以推想，时下中国言禁处于何种程度。

对于这个问题却也是人言言殊，有着不同看法：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大都认为：现在言禁报禁都没有松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的依然是专制主义。只是时代发展了，科学技术普及了。思想文化统治的手段变化都不大，所以不少地方显得不那么奏效。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有的说：现在可好了，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画。只要你不玩政治，玩什么都可以。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比较起来，我倒更倾向于那位青年的看法，只是他以此断言我们已获得‘言论自由’，则是不确实的。‘言论自由’并非简单的说话自由，它主要还是指议论国政，特别与当局看法不一致时也可以畅言无忌。抛开了这一点，尽说些风花雪月，乃至‘今天天气哈哈’，哪个时代都不会遭禁的，时下更是当权者著力提倡的。所以才会使某些年轻人感觉是‘什么都可以说’，他们从老一代人的连风花雪月也不让说，不让写的六十年代。这种言禁依旧却又隙露迭现，生动地反映了统治者统治手腕的僵硬，根本无法抗拒生活的蓬勃生机。为了改变时下的尴尬与无奈，最后就是靠‘钱’的魔力推行对知识分子的怀柔策略。

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干的事太多。你可以做买卖当老板，可以躲到书房里搞纯学问，可以种花养鱼，可以玩文物字画，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可以追星玩票……总之，你玩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玩政治。

这和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正好相反（那可也是共产党的教育啊！）你干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忘记政治。我们并且被告知，当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学生，欺骗学生，就是用“不可关心政治”来麻痹学生的。曾几何时，怎么变成了共产党的国策？不但青年学生，连整个知识界都要奉为圭臬。

知识分子被要求关进书房，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五花八门的补贴、课题费、奖金，过去的要求是“听话”，现在的要求是不乱说话，尤其不要说领导不爱听、不敢听的话。在当权者这样的怀柔政策下，知识分子普遍流行的犬儒主义、市侩主义。一旦你不安于现状，要求有所变革，那就给你警告、待岗、停职、威慑、拘押直至监禁，同时通知所有媒体和出版社，停止你一切作品问世。

当权者费了这么大的劲，无非是想继续推行过去几十年一贯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但毕竟时代前进了，科学技术普及了，单一个网络就是当权者控制不了的。任何信息与知识，你禁杀不了，也封锁不了。一些思潮争相亮相，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思想界的封闭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以致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涌现了三大思潮：民族主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前面已经讲了它在新时代的勃起与权力的关系，尽管官方用了另一面更为堂皇的旗帜——爱国主义，除此之外，在学理上、民族精神的确立上，却乏善可陈。

有时我从官方高举的爱国主义大旗呼啸中，倒怀疑他们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例如中国人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八年抗战据说死难同胞就有三千万。可是直到今天，我们却不易找到一部抗战的历史著作。现在世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可是我当学生时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听说最近一位旅美学者用自己十几年调查的成果写了一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专著，在美学术界普遍得到好评，可是至今日连中文译本都没有，作者也不被国人所知。真不知道如此反常，这国如何爱法？

当初，爱国主义的大旗是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热评中推出的，说起来惭愧，胡著我一直未曾拜读，只记得它问世不久，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近代中国应以现代化为目标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当然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胡著贯彻的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线，爱国当然是其主调。记得在此前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还说，要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难不成从反帝反封建直到共产主义，都离不开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岂不是赤裸裸地为极权统治效命的工具吗？

新左派：他们究竟有哪些人，具体有些什么高见，我不完全清楚。我只知道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也算是“海归派”（当然不少人只是理论回来了，人并未回来）。他们唯一特点，是将过去人们都耳熟能详的毛泽东一些土政策，用了许多洋派理论重新做了包装，给我的感觉他们是一帮食洋不化，游谈无根的学者。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是比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义还要早的，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打击的对手，以致主流意识形态与它在历史上的的是是非非，到现在还扯不清。有的不是扯不清，只不过被歪曲、美化了。最明显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国际形态还是国内环境，都为中国宪政民主化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当时自由主义还有它的大本营，他们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也曾提出非常好的方案，可是在实际进行中却并没有全心全意为它的兑现信守自由主义原则。我觉得类似的历史恐怕要重新总结，不能满足于自己现在已是“参政党”，甚而错把“参政”当“执政”，再把错误当做光荣继续到处宣扬了。

自从七年前李慎之先生重揭自由主义大旗，有几句话语重心长，我们应该铭记不忘：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国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一百来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合，其意义与作用已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制国家。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再中国的传播，如果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算起，也有将近一个世纪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辉煌，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新勃起，那是由于“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李慎之语）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它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它今天就和民族主义、新左派有了一个共同成长的平台，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它仍然处在被主流意识形态到处打击，同时，又被‘新左派’与民族主义两面夹攻的状态下。当余杰说自己是“天安门之子”，也就等于给自己选择了荆棘丛生的路。

我预祝余杰在这条路走好！

二零零五，四月初

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天安门之子》自序

“警察读者”们，在我的新作《天安门之子》在香港开放出版社问世前夕，我写下了这封给你们公开信。你们确实是我的“忠实读者”，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对我进行传唤的时候，强迫我“自愿”答应让你们从我的手提电脑中拷贝走文章和资料——当然包括这本正在编辑中的书稿。因此，你们比所有的读者都“先睹为快”了。

我理解你们对阅读我的书稿的热切盼望。早在二零零四年七月访问美国归来的时候，我刚刚走下飞机舷梯，几名便衣就紧紧跟随在身后，并不时地用对讲机通话。我感谢你们特殊的迎接方式。当我正在排队办理入境手续时，便衣们都走进了海关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一大群穿着海关制服的人员走到跟前，表示要检查行李。于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中，几个箱子全被翻得底朝天。当海关职员发现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时，如获至宝般地询问说：“这是不是法轮功的宣传资料？”这样的职业素质让人啼笑皆非。

最后，海关职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手提电脑和照相机上：“这是你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吗？”

我回答说：“这是我已经使用了一年多的旧电脑，你们看，表面还有磨损的痕迹呢。”

“那么，你拿发票出来，如果没有发票，你就得先把电脑留在我们这里，明天找到发票之后再取；否则，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你新买的，你要依法纳税。”

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到达机场的有好几个航班，数千名旅客川流不息地从身边走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随意地挎着装有手提电脑的挎包，海关人员却熟视无睹——我是惟一享受到了这种殊荣的例外。

“那么，我缴税好了。”我知道你们想将我的电脑留下，然后窃取电脑中的材料和文章。你们会拿着放大镜去检查每一个字，将所有“大逆不道”的“反动文章”搜集起来，作为有朝一日的“罪证”。我决定不会让这台手提电脑离开身边，便选择了缴纳这笔高达三千元的不该缴纳的税款。你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六点，五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敲开我的家门，一名警察向我出示了一页“传唤证”。我要走近去仔细阅读，谁知此警察拿着传唤证恐慌地往后退了两步——难道以为我会抢夺并销毁了它不成？一瞥之间，我看到了传唤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落款则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保卫大队”。

两名牛高马大的警察扭着我的双臂将我带入楼下的警车，并将我夹在后排的中央。前后还有数辆警车“保驾护航”。我对这样的大动干戈感到困惑——我又不是詹姆斯·邦德，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你们根本不必出动如此众多的人马。

来到附近派出所的一个房间之后，长达十四小时的审讯开始了。我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还有幸享受到了免费的麦当劳牛肉汉堡。整整一个通宵，几批警察轮番上阵，红脸白脸黑脸相继出现。最有意思的是，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时有警察进门来，拿着一张小纸条放在主审警官的桌子上，仿佛案件又有了什么重大的进展。这是故意表演给我看的“心理战术”。

一名中年警察扮演“孔子”的角色。他自称在高校工作过，便以导师的面貌出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前程远大，不要继续误入歧途了。你的问题主要还是交友不慎，与刘晓波等社会渣滓来往。你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一定要悬崖勒马。”接着，“孔子”先生为我设计了几条灿烂的人生道路：“你可以做学术研究嘛，再进入学院也不难啊，以你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可以当上教授的。不然，你还可以写畅销的小说和影视剧本，一集就可以挣十万元，有名又有利。你写这些内容，我们不会干涉你的创作自由。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你

也该为自己多考虑考虑。”这位慈祥的人生导师，如果脱去警服的话，说不定可以参加当年曲啸、李燕杰的讲师团呢。“孔子”先生苦口婆心地劝诫我说：“我知道，我也许会成为你文章中的反面人物。但不管你怎么看待我，我是为你好才说这些话的。尽管你现在可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但你以后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之后，总有一天会发现我的一番好心。”俨然是对我推心置腹了。

“孔子”的劝说没有奏效，“关公”立即上场了。这名年轻的便衣警察，一进门来便歪着脖子打量我，一看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善于打架斗狠的角色。他将我审视一番后，猛然冲到面前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你是文化流氓，我们是政治流氓，我们还怕你不成？”看来，他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呢。“关公”毕竟心直口快，三五句之后便说出了老实话：“你不要跟我们将法律，我们共产党从来都不遵守法律。老实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流氓，我们的政权是以无数人血流成河的代价换来的，难道会白白地让给你们不成？我们从来就不怕知识分子发牢骚，当年毛主席一句话，就让千百万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了。”这位大概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关公”先生，谈起中共党史来却比那些党史专家更加真切。紧接着，他鼓着眼睛说：“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是捍卫共产党江山的！今天，我们对付你们还有许多新办法。你信不信，我立即把你投入刑事犯的牢房，让他们把你打得半死。我们可以让你人间蒸发，随便制造一个车祸就解决问题了，我们比苏联的克格勃还要厉害，我们有庞大的资源可以利用来对付你们这些人。你不怕是吧，你还有家庭，你还有亲人，我们可以让你家破人亡！”说到最后，他咬牙切齿地，几乎变成了“狼图腾”——谁说今天的中国缺少“狼性”呢？

“警察读者”们早已将我在海外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从网上下载并打印好，让我一页页地在上边签字并盖手印。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我的所有文章都是使用真名发表的，我对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负责，难道我会不敢承认这些文章都是我写的吗？“孔子”先生说，你在文章中直接点名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名字，侮辱了最高领导人，已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的心中感到很好笑：这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的专制政权，其安全程度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书生的几篇文章就能将其“危害”了？可见，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自信了。“孔子”先生还说，你写的文章对我们党充满了仇恨，你这样的做法在西方也是混不下去的，即使在你欣赏的所谓“民主国家”的美国，也不会允许你这样骂政府，小布什早就叫联邦调查局收拾你了。按照“孔子”先生的说法，我们的党对我还真够仁慈的了。而“关公”先生则威胁说：“你电脑里的东西都是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将你炸得粉身碎骨，不如交给我们处理，你就安全了。”当警方的电脑专家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所有的资料之后，“关公”先生立即变了一副和颜悦色的嘴脸，我惊诧于此人变脸之快，即便是川剧中的“变脸”绝活也比不上。此时，“关公”先生像铁哥们一样地对我说：“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有什么难处找到我，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

传唤的存在，本来就是一桩恶法——当事人被剥夺了与律师会面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沉默权。而整个对我进行传唤的过程并不完全合法：无论是身穿制服的警察，还是便衣人员，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向我出示警官证；当我被释放的时候，也没有留给我一份传唤证的副本。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警察们还逼迫我签字表示“自愿”交出电脑由他们拷贝其中的文件；最后，拘禁我的时间达十四个小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二个小时。

当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我获得自由回到家中的时候，才知道妻子也被警察叫去审讯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是妻子打电话将我被带走的消息告诉了几位朋友。一名气势汹汹的女警拍着桌子对妻子说：“你大肆炒作此事，只能对你丈夫的案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法盲执法，尤可悲也。当妻子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起了瓦文萨的妻子达奴塔当年的一段访谈。一九八二年十月，波兰还处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之下，达奴塔带着两个女儿去探望被拘禁的丈夫，在此过程中遭到了特务们粗暴的对待。秘密警察博宾斯基上尉猛然将她推进房间，

她把女儿安娜撞倒了。

“闭上你的嘴，你这泼妇！”上尉凶狠地训斥说。

“闭上你自己的嘴吧！你认为你是在对谁讲话！难道我什么权利都没有吗？”达奴塔毫不畏惧。

“你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只是奉命拘留你。”对方回答说。

达奴塔写道：“上尉的举止就像一头野兽，那时我甚至认为他会对我拳打脚踢。他曾被气得大发脾气、狂蹦乱跳。上尉说他现在要写一份正式报告，将我如何骂了他；我回答说，我要对警察的野蛮行为提出正式泣诉。我在离开时对他说，不管他的军服多么威严，他仍只是一头下流的猪。”最后，达奴塔轻蔑地对这个穷凶极恶的秘密警察说：“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还能统治多少年？你们现在还统治着我们，可你们认为你们能支持很长时间吗？”

警察先生们，达奴塔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和妻子想对你们说的话。当然，我们不会骂你们是猪。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仇恨你们。在被审问期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祷告，求神赐予我智慧和勇气，也求神赦免你们的罪行，因为你们说做的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一名便衣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循循善诱说：“既然你写过一本名叫《拒绝谎言》的书，标榜自己是说真话的人，那么你就应当向我们讲老实话。”谎言帝国的侍卫们劝导老百姓都要讲真话，这一幕场景比《变形记》和《等待戈多》还要荒谬。这名便衣警察故意漫不经心地问到我与丁子霖老师的交往，我遂反问他：“中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了我不能与丁子霖老师交往吗？你们杀死了人家的孩子，却不允许父母哭泣和悼念，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为人父母的人，假如你的孩子被杀害了，你将如何？”此人不敢正面回答，只是支支吾吾地说：“那，那不一样吧。”警察先生们，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虽然你们仍然拥有制造谎言的能力，但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这些虚伪的诺言了。你们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运动，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苹果烂了，如何保鲜？”虽然你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持你们的权威了。你们能够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就只剩下暴力的，而暴力终究有失效的那一天。

警察先生们，你们企图用恐惧来压垮我，但我真切地感到，真正恐惧不安的是你们自己。我对你们只有蔑视而没有仇视，正如波兰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你并不敌视警察，对他们只是怜悯。你很清楚他们中间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很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孩子都会感到羞愧。你明白，国家会对他们进行大赦（还有谁能记住往日的刽子手和告密者？）”是的，警察先生们，我把你们看作读者，而不看作敌人。我没有敌人。我的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什么，也不是要制造敌人和掀起仇恨，而是要捍卫我和同胞们共同的自由与尊严——当然，也包括你们警察的自由与尊严在内。我愿意先从自己做起，像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开始去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在追求真理的斗争中，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们可以监禁我的身体，却不能监禁我的灵魂；你们可以羞辱我的人格，却不能剥夺我的尊严。

警察先生们，你们是我的“第一读者”，但我的文字对你们可能完全“无效”，就好像炽热的泪水滴在冰冷的石头上一样。这种情形正彰显了文字的有限性和我自己的有限性，启蒙的事业并不是大叫一声“芝麻开门”就能够完成的；这种情形也使我认识到人与人的心灵之间存在着何等巨大的差异——我愿意做心灵疏通的工作，致力于消除这种巨大的差异。在此过程中，我不会用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即使仅仅是在内心深处。我深深地知道，如果用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这个世界确实有可能沦为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对此，米奇尼克有过一段深刻的论述：“我不喜欢共产主义者能够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你是一只猪，我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猪。全世界都是猪圈，正如安德烈依·奥泽曾经指出的，

除了猪圈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对这种东西的反应是，这不真实。存在着我们必须捍卫的某些原则，而不是去考虑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多年之前，教宗宣称我们在要求正义之前必须表现仁慈，我认真对待他所说的。”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改变生活在猪圈中的处境——既不把自己当作猪，也不把你们当作猪。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你们会为自己昔日所做的一切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但我个人早已原谅了你们——即使你们坚持不忏悔。我的宽恕并不是对你们的忏悔的奖励，它是我的精神需求，与你们怎么做无关。

《天安门之子》一书，是我从近两年来的两百多篇评论文章中精选出来、汇集而成的文集。比起两年前《拒绝谎言》中的文章来，其深度和广度都有长足进步。作为一名迟到的“天安门之子”，我的思考和写作将与我的生命同步，无论何种威胁利诱都不能让它中止。

“警察读者”们，我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不是控诉，乃是呼唤——呼唤你们丢失的良知早日复归，呼唤你们扭曲的精神早日复位。我将这封公开信作为《天安门之子》一书的自序，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封信也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我将努力去掉自己心灵深处的愤怒与怨毒，而填充进仁爱与宽恕。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宽恕你们确实是我的幸福。曾经五次入狱、两次遭到警察暴力殴打的米奇尼克在《波兰真相》一文中这样说过：“我祝愿我的好朋友们，尤其是那些遭到追捕以及正在战斗的朋友们，请赐予他们足够的力量，穿越那在失望和希望之间伸展的虚无的黑暗，请赐予他们更多的耐心，使得他们能够学会最高深的艺术——宽恕。”惟有上帝才能赐予我们力量、耐心、宽恕和爱那“不可爱的人”（包括你们在内）的能力。我，愿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激自己已经经历的一切，承担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盼望自己即将经历的一切。

余杰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家中

上卷 血脉的回响

肩住黑暗的闸门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尊敬的万人杰夫人，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言说。虽然我在万人杰先生生前没有与他见过面，但我相信，我与万人杰先生有着一个相同的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自由中国”。实现这个梦想有赖于我们每一个同胞的努力。

一九八九年的六月，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生活在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偏远而宁静的小镇上。那时候我正在上初中三年级，面临紧张的中考。北京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也波及到了这个遥远的小镇，我的一位最尊敬的老师在中学校门贴了一张为大学生们募捐的信。当时，每天晚上十点钟，我上完了晚自习，走过一段长长的泥泞山路回到家中之后，就躲在被窝里，打开小收音机如饥似渴地倾听美国之音、英国 BBC 和法国广播公司等著名电台的节目。通过缕缕的电波，我仿佛来到了汹涌着民主大潮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仿佛与那些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哥哥姐姐们一起呼吸、一起呐喊、一起静坐、一起哭泣。六月四日，我在电波中听到了枪声、听到了惨叫，我在电波中闻到了汗水的苦涩、闻到了屠杀的血腥。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晚上，我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那天晚上，我在泪水中看清楚了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究竟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究竟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从此之后，没有人能够再次欺骗我、再次愚弄我，那座用谎言来建构的宫殿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有一种声音在启示我，有一眼泉水在召唤我。我的生命从此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既是我母亲的孩子，我也是“六·四”的孩子。我与“六·四”之间联结着一条浸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六·四”，我也许像一头生活在肮脏的猪圈里的猪，对自己被长期囚禁和即将被宰杀的命运一无所知。那天晚上，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定要考北大，因为那里有我的兄弟。

由此，我想起了俄罗斯思想家、大文豪和民主先驱赫尔岑少年时代的一个故事。当时，沙皇当局在克里姆林宫广场当众处死了五位十二月党人的领袖。虽然那时的赫尔岑还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少年，但他与当时最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最深切的耻辱、痛苦和愤怒。残酷的死刑执行完之后，沙皇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祈祷会，对成功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而进行庆祝。三十年之后，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回想》中写道：“我参加了祷告仪式，我当时只有十四岁，隐没在人群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盛殿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

我在这里引述赫尔岑的故事，并无意将自己与赫尔岑相提并论。我想说的是，我与赫尔岑一样在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次精神的炼狱、一次灵魂的洗礼。对我来说，天安门的坦克和鲜血是最为直接的启蒙。我发誓要说真话、要拒绝谎言、要摆脱奴役、要捍卫自由、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从此以后，我所有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沿着这条道路展开。我要感谢“六·四”的先辈们，是他们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而不是又一个为权力阶层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文人才子——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这样才高八斗、指鹿为马的文人才子，中国最缺少的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小孩。

“六·四”之后的十四年间，在意识形态的高压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普遍接受了“被召安”的命运。他们像森林中的变色龙，也像舞台上的小丑，他们说谎当作职业，他们把表演当作本能，因此也就逐渐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尊敬。北京大学法学

院院长朱苏力教授说，中国不需要西方的现代法律，中国有丰富的本土资源，中国有温情的乡规民约；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副院长潘维教授说，中国不需要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有卓越的文官制度，中国有崇高的“以德治国”；经济学家胡鞍钢说，今年突然发生萨斯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益无害；经济学家刘伟说，北京日益严重塞车的状况，正表明北京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作家二月河把雍正皇帝塑造成为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公然鼓吹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作家余秋雨在为十六大“献礼”的电视片中煽情地宣告“潮涌东方”，向统治者狂抛媚眼。

与这些流氓化、优孟化、太监化的所谓“精英人士”迥然不同，在中国大陆还是有那么多的勇士挺身而出，他们揭穿谎言、说出真相、批判独裁、呼唤自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失去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职位，他们遭到由官方控制的媒体的封杀和拒斥，他们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在监狱中忍受非人的折磨。在他们当中，有“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有怒发冲冠为被毁容的民女武芳伸张正义的记者卢跃刚，有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天网”创办人黄琦，有不久前去世的、写下过旷世奇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李慎之先生，有杰出的“人权律师”张思之先生，还有始终不渝地揭露专制政权暴行的作家刘晓波、廖亦武、王力雄……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几千年来，中国人深陷于暴政和邪恶的沼泽之中，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从梁启超到鲁迅，从遇罗克到林昭，一部分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享有过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一百多年来，几代觉醒的中国人开始为民主和人权前赴后继地奋斗，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师长、我的兄弟姐妹。

就在我动身前往美国访问的前几天，“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分别被判处十年和八年的重刑。他们都是跟我同龄的优秀学子。徐伟在法庭上大声抗议在安全局看守所遭受的虐待，警察用皮鞋猛踢他的阴部和太阳穴，他用头猛撞审判席以示抗议，结果被警察架出法庭；张宏海在法庭上出示脖子上被警察用烟头烫出的片片伤痕，他的哥哥张宏图在旁听席上失声痛哭。这四位青年仅仅是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一起思考和写作，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当年，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周恩来组织“觉悟社”，他们比今天“新青年学会”诸君更加激进。但是，八十多年前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能够享有他们基本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八十多年之后的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却被诬蔑以“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受到残酷的惩罚。八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国力有所提高，中国的经济有所增长，但中国的人权状况却更加惨不忍睹。

在杨子立的妻子路坤和张宏海的哥哥张宏图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身上残存的高贵、自尊、勇敢和毅力。路坤是一位网络编辑，张宏图是一位环境设计师，本来他们是单纯的专业人士，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弟弟究竟在思考什么，但他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弟弟是善良、正直的好人。亲人的苦难让他们看清了中国的现实，亲人带给他们的不是耻辱而是骄傲。在为亲人的案件而奔走的过程中，他们本人也就成为了“民主的后援力量”。路坤和张宏图勇敢地站了出来，为他们的亲人，也为更多被侮辱和被戕害的同胞。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没有感到孤独；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今天，与其说我到这里来领奖是因为我做过些什么，不如说我是替那些更加勇敢和坚强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他们比我更有资格获得今天的奖励，我所做的一切，跟他们相比如同沧海一粟。今天，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在这七月的阳光下，请允许我向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为了捍卫尊严而受到凌辱的优秀同胞致以深深的敬意。

有人说，人权就是生存权；我说，那不叫人权，那叫“猪权”。我不接受猪的命运。在一个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人权自然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敬重已故的万人杰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为华人的新闻自由所作出的努力。他不奢望吃到鲜

美的果实，却没有一刻停止过辛勤的耕种。他早已离开了我们，却依旧生活在我们中间。

十四年前，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川西平原仰望满天星空；十四年后，接近而立之年的我写出了十多本著作，共三百多万字。这些文字仅仅是后“极权主义时代”中国的一个小小的注脚。我们不幸生长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我们有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使命；我们有幸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在中国，我们享有的每一寸阳光都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让沉默者呐喊，让麻木者觉醒，让懦弱者勇敢，让独裁者忏悔，我愿意用生命来拥抱这一事业，我期望与更多的朋友携起手来风雨兼程。

谢谢大家。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夜在北京家中写就
二零零三年七月七日在美国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颁奖典礼上宣读

UnRegistered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

——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一九七七年，在军政权统治下的阿根廷，数以千计的平民被秘密逮捕、拷问和失踪。很多人被麻醉以后装上飞机扔进大海，还有人被处决之后秘密焚烧掩埋在无名墓穴中。

那是一个恐怖的年代，一个法西斯打手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年代。在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母亲们站了出来。一九七七年四月，一个母亲小组集体来到警察局和政府办公室寻找他们被绑架的孩子。之后她们决定每周集会一次，地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广场、内政部总部外面。正如其中一位母亲解释的那样：“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必须走出自家小圈子，为所有的失踪者而斗争，只有出于寻找所有失踪者的目的，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这群母亲的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渐以“中央广场的母亲们”而闻名。她们扎上白色的头巾作标志，其中一位母亲说：“我们制作特别的头巾，并在上面绣上我们孩子的名字。后来，我们在上面绣上‘生命再现’，因为我们寻找的目标不再只是一个孩子，而是所有的失踪者。”母亲们的要求是：“他们欢蹦乱跳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也应该欢蹦乱跳地回来。”

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令人揪心的愿望。但是，母亲们每周一次无声的抗议，从首都传到其他城市，并演变成一种反对军政权违反人权和国家恐怖的世界性标志。七年之后，内外交困的阿根廷军政府终于垮台。在母亲们的努力下，“失踪者全国委员会”得以成立。一年后，委员会形成调查报告，共有五万页的证言材料。这些材料汇集成一本名为《永不重复》的文集，包括九千个失踪者的案例，该书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著作。用这样一种方式，母亲们终于实现了与孩子们的重逢；有了这样一群母亲，阿根廷人民才重新获得了自由与尊严。

在地球的另一边，在一片号称“中央之国”的土地上，有另一群白发苍苍的母亲，她们依然在为永远失去的孩子奔走呼号。她们甚至继续被剥夺公开悼念死去的孩子的权利。就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再次导演了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的闹剧。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中共当局虽然被迫释放了母亲们，却继续她们对实行“监视居住”。在这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天朝大国，记忆被活埋，正义被扭曲，良知被扼杀，“天安门母亲”面临着比“中央广场母亲”更残酷的命运和更漫长的期待。这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和几千万共产党员的政权，居然害怕被一群手无寸铁的母亲们所颠覆。

在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一群天真的孩子，头发凌乱的孩子，忍受着饥饿的折磨的孩子，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眸子再也看不到黎明的阳光，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手再也牵不到母亲的手，绝对没有想到“鱼水情深”的“人民子弟兵”会向他们开枪。那天晚上，母亲亲手编织的白毛衣上，突然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弹孔，殷红的鲜血汩汩流出。那天晚上，如同恐龙般咆哮着的坦克扑了上来，同伴的身体一瞬间便消失在滚烫的履带之下。那天晚上，孩子们的尸体连同装着课本和情书的书包一起被扔进了火葬场。那天晚上，曾经象征着中国美好未来的民主女神塑像，也被碾压成了粉末。那天晚上，梦破碎了，理想破碎了，希望破碎了，孩子们的身体破碎了，母亲们的心破碎了，中国破碎了。

孩子们的死亡在一刹那间降临，母亲们的痛苦却绵延了十五年，而且还将持续下去。母亲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分娩的痛苦，她们还得经历一场比分娩更为痛苦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十五年过去了，广场的鲜血早已被清洗得一干二净。刽子手们戴上白手套装模作样地向人民挥手，而人民在屈辱中选择了苟活。那些街头汹涌的人潮灰飞烟灭了，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沉默了，那些因“六·四”而获得绿卡在大洋彼岸享受自由生活的十万同胞也逐渐心安理得了。这时，只有一群弱小的母亲绝不屈服，用她们的爱，用她们记忆，用她们

的眼泪，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那场屠杀实实在在地发生过，那些生命真真切切地存在过。这些伟大的母亲让我们尊敬，也让我们羞愧。这些伟大的母亲感召着我们勇敢地抬起头、张开嘴，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说出可怕的真相。

在阿根廷，“中央广场的母亲”们用七年的时间赢得了公义的降临；在中国，“天安门母亲”们用十五年的时间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安慰。在阿根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唤醒记忆、捍卫历史、追索真相、控诉罪恶；在中国，直到今天，“六·四”惨案依然是一个不可谈论的禁忌，“天安门母亲”们依然是一群“不可接触的人”。在阿根廷，人权组织设立了名为“记忆之墙”的网页，访问者在网页上贴上死难者的姓名和照片。成千上万的照片，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震撼着人们的心扉；这些数字化的网络面孔，让人们认识到痛苦和损伤的真相。在中国，官方投入巨资建设负责网络监控的“金盾工程”，只要出现“六·四”字样的文章便被这套精密的软件自动删除。接收几件从香港寄来的印有“天安门”字样的T恤衫，居然成为母亲们“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证。

在阿根廷，遇害者的家属们设立了名为“阿根廷虐待者和谋杀者长廊”的网页，那些罪恶的参与者和执行者的照片被公布出来。失踪者的儿女们调查前虐待者和行刑队员的下落，去这些凶手的住所举行示威活动，并向当地居民散发传单，上面写着：“警告——凶手就住在你的隔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屠杀造成的后遗症却是道德真空和良知麻木。这个民族已经丧失了判断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金钱与权力成为唯一的信仰，为了“成功”可以不计一切手段。凶手们不仅没有任何忏悔之心，而且依然在变本加厉地作恶。凶手们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依然在恬不知耻地宣扬“杀人有理”的屠夫逻辑。于是，刽子手们都天然地获得了杀人执照，这是一种铁与血的中国式的伦理。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一个月以前，在美国彼洛特学院举办的“六·四”讨论会上，一名来自上海的、二十出头女留学生站起来反问与会学者说：“这是一个过于陈旧的话题，我自己就从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六·四’的资料，看了之后就忘记了，不觉得有什么意思。”在这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孩身上，我发现屠杀仍然在进行中，在肉体的屠杀之后，紧接着的是精神和心灵的屠杀。在精神和心灵的意义，这个女孩已经被杀死。

英国学者鲍曼在对大屠杀前后的民众心理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指出：“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鲁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鲁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跟随者，也不需要大声叫好的听众，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有轮到我——激励之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在对母亲们普遍的冷漠和蔑视之中，在自作聪明的“幸灾乐祸”中，我们又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十五年。悲剧远远没有结束，在“天安门母亲”的身后，又出现了杨子立的母亲、黄静的母亲、孙志刚的母亲和李思怡的母亲们。她们的眼泪汇集成一条比长江黄河还要长的河流。

一个折磨母亲的民族，不值得世界给予尊重；一个羞辱母亲的政权，不值得公民给予信赖。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请让我们一起为十五年前死去的青年祈祷，为丁子霖女士和蒋彦永医生祈祷，为天安门母亲祈祷，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多灾多难的母亲们祈祷。

我们的母亲正迈着沉重的步伐向我们走来，让我们前去拥抱她们；我们的母亲早已哭瞎了眼睛，让我们亲吻她们布满皱纹的脸颊。我们将永远与母亲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充满罪恶、暴力和血腥的现实世界升华为洋溢着爱、同情和怜悯的天堂。

——二零零四年六月六日，芝加哥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

——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关心中国问题的美国朋友：

感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我提供这样一次机会，与诸位一起分享中国民众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民主的追求，对我来说这将是一段值得记忆的人生经历。西方汉学家曾经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发现历史”；而我两次访问美国最切身的感受则是：“在美国发现自由”。自由是美国社会诸多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从里根、克林顿、布什诸位总统到最近刚刚访华的副总统切尼，他们到中国几所著名大学演讲的时候都反复强调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切尼副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自由是普天下每一个人的希望，并非专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地区。”让人遗憾的是，在演讲稿正式发表的时候，受到官方严格控制的通讯社和报纸悄悄删去了这些句子。这是一个胆怯而虚伪的政权的必然反应。然而，我个人坚信：自由不是单单属于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自由是整个人类的价值观。美国人热爱自由，中国人也热爱自由。真正仇恨自由的只有本·拉登、萨达姆、金正日以及当年在天安门向学生和民众开枪的凶手们。为了获得自由，无数的中国公民愿意斗争、愿意付出、愿意献身，就像当年乘坐五月花号远渡重洋来到美洲的人们一样，就像林肯和马丁·路德·金一样。因为自由从来不会从天而降。

天安门屠杀十五年之后，北京当局一方面加快推行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继续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在国际舞台上，北京展开诸多卓有成效的宣传和公关活动，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一头微笑的、彬彬有礼的“不咬人的老虎”。许多西方人也开始认为北京正在努力朝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共正在领导中国发生积极的变化，他们不再把中共看作如同当年苏联那样到处是“古拉格群岛”的邪恶帝国。然而，事实是，中共依然是一只“不断咬人的老虎”：这个政权持续迫害基督教和天主教家庭教会、法轮功修炼者、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和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武力威胁初步实现民主制度的台湾，压制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几亿农民和几千万失业工人成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被抛弃者。这些情况难以被一般的美国人所知晓。近年来，到美国留学和访问的中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在美国充当了中共政权辩护者的角色。更多的人则是出于恐惧，即使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也不敢诉说中国的真相。另一方面，敢于说出真相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被禁止出国。因此，我非常珍惜访问美国的机会，在大学里、在媒体上、在一切场合，向美国人民讲述更多的关于中国的真相。

二零零四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网络大国，中国的青年一代正在利用网络获得更多的、多元化的信息。网络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新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六年前我历经千辛万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火与冰》。此前，我的文字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许多大学中悄悄流传，因为网络还只是被少数人使用。而现在，我可以立即将一篇写好的评论通过伊妹儿发给许多网站和论坛，几分钟后这篇文章就被大量的读者所阅读。比我更加年轻的作者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能熟练地运用网络这一传播渠道。他们比我更为幸运，他们不再经历漫长的“抽屉文学”的阶段。刘晓波先生曾经对我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要给海外的报刊写一篇文章，需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西方驻京记者的公寓，使用他们的传真机发出去；而现在，他只需要在家中用几个手指轻轻一点，一封伊妹儿就成功发送出去了。但是，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放弃对网络的控制，在思科和雅虎等美国公司的技术帮助下，中国政府对许多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意见

的公民进行严密监控和残酷迫害。据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调查，迄今为止中国有四十多名作家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而被捕入狱。许多人在狱中遭到虐待。

今天，我想向诸位介绍“新青年读书会”这个匪夷所思的冤案。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四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靳海科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几年以前，以这四名还在大学念书的青年学生为主体，组织了一个不到十人的读书沙龙，他们给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传授法律知识，骑着自行车到乡村进行社会调查，创办个人网站讨论政治改革的问题。三年前，四名青年被安全机关秘密逮捕，在北京市安全局的看守所中被长达几十个小时地罚站、被用燃烧的烟头烫脖子。如果不承认莫须有的罪行，他们甚至得不到基本的食物。

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这四名青年被剥夺了与亲人见面的机会。就在我访问美国前夕，这四位青年终于获得了与亲属见面的机会。我在北京也与他们的亲属见了面。靳海科的父亲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农民，长年艰辛的劳动，使他像中国大部分的农民一样，皱纹满面，弯腰驼背。他几乎不识字，考上大学的儿子是一家人最大的希望。为了让儿子完成学业，这个贫穷的家庭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然而，这位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儿子居然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而被判处十年漫长的徒刑。他不知道儿子做了些什么，只知道儿子是一个孝顺的、聪明的、善良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遭受沉重打击之后陷入一片茫然的老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他。这位父亲虽然无法理解在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他坚信：儿子没有错，错的是“国家”！

“新青年四君子”的悲惨的故事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有过详细的报道。这一案件一方面说明，天安门屠杀之后，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反抗官方的愚民教育和宣传，重新接过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当局非常害怕青年知识分子的组织活动，他们要打击敢于挑战这个谎言帝国的一切说真话的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需要中国人民自己来走。某些中共官员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认为中国人不能拥有更多的信息，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就是吃饭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可耻的“自我种族歧视”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中国越来越没有市场。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为自由而战斗的勇士，他们当中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有律师、记者、作家和商人。网络逐渐成为独立知识分子追求言论自由的最好平台。在新闻不自由的中国，人们在网络上寻求有限的说真话的权利和可能。

最近两年，中国先后出现了二十多次有重大影响的网络签名活动，例如：联署签名慰问“九·一一”之后的美国人民（在中国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幸灾乐祸的声音中，这封签名信尽管受到了恶毒的攻击，却挽回了中国的声誉，让世人认识到中国还有部分人具有正常的同情心和爱的能力）、建议迁移毛泽东尸体（这是在官方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唯一的反对的声音，是对毛泽东罪恶的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呼吁政府释放被捕的网络作家（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被捕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刘荻因此而被释放）等。相当一部分中国公民，已经学会在网络上就国际和国内事务广泛发表意见。这些签名信件，最多的时候有近万人参与。在这些有明确的价值立场的表达和政治诉求的签名抗议活动中，参与者既有著名学者、作家，也有律师和记者，更多的是普通网民。公众人物和普通公民一切平等地发出他们的声音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

许多在体制内拥有相当资源和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网络上尖锐批评国内的政治生态。例如：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今年春天发表公开信要求为天安门学生运动正名，在网络上引起巨大震撼，成为知识分子良知苏醒的标志事件；北京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贺卫方，在一次由民营书店举办的学术沙龙中，公开表达对中共“三个代表”学说的蔑视和对镇压法轮功的不同意见，他的讲话迅速出现在网络上；北京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熊国标，今年三月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名为《讨伐中宣部》的文章，痛斥这一违宪机构的为所

欲为（《纽约时报》在“新闻自由日”作了长篇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当权力部门整肃率先报道萨斯和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之时，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的原则；四川成都大学讲师王怡，也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为网络作家杜导斌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被捕而呼吁，并严厉谴责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参与发起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网络签名活动，并建议以此为契机清除毛泽东独裁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撰写长文揭露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经营的黑幕，获得十万出租车司机的敬意，报纸被停止发行之时，他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更大的轰动。这些并非单一的案例表明：一个愿意为自由而战斗的网络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一种有力量的网络舆论也正在形成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动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建立密切的联系。就我个人来说，与蒋彦永、贺卫方、焦国标、展江、王光泽、王克勤等人有各式各样的联系。更重要的迹象是，许多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敢于突破中共当局设定的“不可接触的人”的无形的界限，他们与刘晓波、包遵信、“天安门母亲”群体等都有来往。去年，与“新青年读书会”案件差不多同时审理的，有资深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的案件。何德普的妻子贾兰英与杨子立的妻子路坤曾经一起接受西方记者的访问，她们表示各自的遭遇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何德普被捕之后，他的同事和朋友中，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他呼吁，也没有人愿意向贾兰英提供帮助；但是，在杨子立被捕之后，他的许多同学和同事都敢于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或者向路坤提供各种帮助，其中还有许多人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何德普五十岁，杨子立三十岁，这两代人已经有了不同的价值座标。杨子立这一代人不再把进入体制之内看作人生唯一的选择，相反他们为自己体制外的生存感到自信和自豪。

中国的网络知识共同体可以被看作中国人走向自由重要努力。中国像一个巨大的城堡，一个鲁迅所说的黑暗的“铁屋子”，如今网络为这个城堡和“铁屋子”打开了一个缝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门缝挤得更大。我承认，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皇权文化传统、并长期受专制意识形态毒害的国家，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也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艰难。但是，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作家、一名信仰上帝的基督徒，我坚信中国绝对不是一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中国人不应当永远过一种没有自由的奴隶的生活。中国的民主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实现民主化，将意味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获得普遍的认同，将意味着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社会制度的彻底终结。我也相信，未来的民主的中国将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中国将与美国一起为世界的和平与幸福作出巨大的贡献。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谢谢大家。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初稿、二十六日改成
华盛顿

谁在“移山”？

——在美国彼诺伊特大学“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于天安门惨案的话题，其实不应当用英文在美国的土地上讨论，而应当用中文在中国的土地上讨论。然而，让我感到耻辱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只能选择前者，而依旧没有实施后者的权利。

在天安门惨案刚刚发生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说出真相”的时刻的降临抱有乐观的估计，他们认为一两年之后、至多三五年之后，中国人民将能够言说这场惨案、凶手将受到惩罚、受害者将得到抚慰和赔偿。谁也没有料到，漫长的十五年过去了，天安门惨案在中国依然是不可言说的“禁忌”。虽然当年决定让军队开始屠杀的中共八个元老大都已经死去（仅存薄一波一人），但新一任的中共领导层并无意触动此问题，他们非常害怕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因为“六·四”进行“平反”而启动民众对民主的诉求。由于中共巧妙的“记忆遗忘术”、由于中共对恐惧的张扬，使得大部分国人根本不敢触及天安门惨案的话题，即使少部分人触及，他们的声音也没有相应的传播管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同时，北京当局对传媒的控制比其他任何都更加严密。

于是，像《移山》这样的电影似乎“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讲述历史的权利。这是由“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李禄讲述的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故事，经过艺术化处理的一个少年青涩的成长成为故事的主线，而“六·四”的枪声和血泊则成为故事的背景。这也是一个专门讲述给西方人听的故事，它集中了所有能吸引西方人的好奇心的元素——例如那个毛泽东时代里的孩子们拿着一张女人的月经纸玩耍的镜头。我注意到放映厅里年轻的美国男女大学生们发出的刺耳的却并无恶意的笑声。这些随心所欲地在性用品商店里购买各种物品的美国大学生们，像在观赏宇航员登上月球的画面一样。对于我来说，无意去探讨这部影片对“六·四”的事实取舍和剪裁是否得当，却对影片使用的“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成语很感兴趣。这个故事曾经被毛泽东作了现代性的阐释，而成为著名的“老三篇”之一。这部影片的结尾是一群艰难地搬动石头的孩子，其寓意显然与毛泽东截然相反：改变中共的暴政、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乃是一个像愚公移山一样漫长而艰巨的历程。

我同意影片对“愚公移山”这个古老故事的创造性的改写。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谁在“移山”？换言之：历史究竟应当由谁来讲述？什么样的历史最能接近真实的历史？什么人还在承担着历史的痛苦与压力？什么人的命运更值得人们去关注和同情？

这些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学生领袖与普通学生之间的区别。据我所知，被杀害的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当中，并没有一个“知名人士”。学生领袖之一的柴玲在哭泣中无意说出了这样的逻辑：我们是重要的学生领袖，我们不能死去，但是我们需要普通人的鲜血唤起大众。这种冷血的逻辑与毛泽东惊人地相似。于是，一个个的学生领袖们来到了自由女神的脚下，他们终于“自由”了。然而，那些普通的学生和市民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所知道的一位被杀害的来自四川新津县的大学生，由于他的被杀害，整个家庭崩溃了——双亲中一个悲伤而死，一个精神失常。在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里，这个家庭没有获得起码的同情，反倒成为“不可接触的人”。在我看来，这样的家庭的悲惨命运更值得关注，他们才是真正的“移山者”。

另一个层面是出国者和留守者的区别。因为“六·四”而出国或者得到了“绿卡”的中国人多达十万人，但十五年后依然坚持参与民主和自由运动的只有数百人。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下一阶段的生活方式的权力，但如果选择放弃对“六·四”的关注，就不应当

继续利用“六·四”的经历来炫耀自己的“勇敢”，甚至为自己谋取利益。更加可耻的是，某些昔日的学生领袖居然秘密回国与中共合作做生意。在《移山》中让我最难以接受的一个情节是：主人公李禄与一个清纯的女孩举行了非常罗曼蒂克的“广场婚礼”，然而在镇压之后他一个人逃走，女孩不知下落。在影片中，他却像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一样无动于衷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要想知道女孩的下落，其实并不困难。这个细节让我愤怒：一个不爱自己的妻子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祖国呢？戴晴称这样的人为“伶俐童”，我则对之曰“自私汉”。

而留在国内的许多人真正承受了一切“六·四”的后遗症。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著名知识分子包遵信先生。他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他也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此后被捕入狱坐牢数年，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开除公职。“六·四”之后十五年，包遵信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还被禁止在国内的任何报刊上发表文章。因为“敏感”的身份，很少有人敢于与他来往。这对这位著名学者和学术活动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生活。他的妻子退休之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以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家庭。今年年初，包遵信突然患脑出血住院，家中无力支付动手术的费用，还是刘晓波等朋友发起募捐为之筹集了几万元的医疗费用。我想，包遵信的经历比李禄的经历更值得我们关注，“失败者”比“成功者”更值得我们尊敬。

谁是矢志不渝的“移山者”？我想，不是李禄、柴玲和吾尔开希们，而是像丁子霖教授这样的普通的“天安门母亲”们。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丁子霖再次被捕，五天之后被释放。这是她若干此被捕经历中的最近的一次。而她和其他两位天安门遇难者家属的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们恒久地要求悼念自己死去的亲人以及揭示“六·四”的真相的权利。遗憾的是，身处海外的昔日的学生领袖们很少对此事发言。或许因为太忙，或许因为有太多的书需要去念和太多的钱需要去赚。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母亲的背叛也就是对天安门理想的背叛。

与真相至今依然暗昧不明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饱经杀戮的危地马拉，先后建立起了“历史澄清真相委员会”和“教区间恢复历史记忆项目”。危地马拉城的大教堂主教胡安·格拉迪说过：“它是痛苦的真相，充满着这个国家深刻而血腥的记忆。它是自由和人性化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拥有讲述他们的生活遭遇。它是具有挑战性的真相，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从中认识到个人和集体的责任，并采取我们的行动，保证这些罪孽永远不再发生。”为了这样的理想，这位大主教献出了他的生命，他死于危地马拉安全部门的暗杀。真相的揭示，有时候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伶俐童”和“自私汉”们会有这样的诉求吗？我们自己会有这样的勇气吗？

十五年来，我们对天安门真相的讲述太少太少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法轮功修炼者们做得好。他们整理出了几乎涵盖每一个受害者以及每一个施暴者的名单，并在网络上公布。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每一个天安门惨剧的亲历者，甚至每一个被迫开枪的士兵，都应当站出来讲述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也没有未来的和平与和解。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七日在彼洛伊特大学的发言
四月二十日在威斯康星大学整理完成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

(受丁子霖托，余杰代拟)

尊敬的希拉克总统：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作为一名在天安门大屠杀中死难的十七岁少年的母亲，我密切地关注着您访问中国的消息。近年来，我注意到您对中国问题发表的许多意见，许多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对您的这些意见有着不同的看法。此次您访问中国，我希望在官方安排的活动之外，您能够创造与普通中国民众接触的机会，深入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呼声。

然而，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据凤凰卫视消息，您在越南河内出席欧亚高峰会议时，专门谈到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您表示，对华武器禁运已有十五年之久，对今天的中国已经毫无意义，是对这个大国的不信任，是没有效和无必要的做法，这也是法国希望解除禁运的理由。您还认为，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赞同这个思路并正在着手解决有关问题，希望明年可以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

您的这个观点已经不是第一次表露了。然而，我与许多“六·四”难属都反对您的这个观点。正如您在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对华武器禁运源于十五年以前，源于十五年前发生在天安门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共军队在中国的首都使用坦克和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而这些学生和市民并没有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企图，他们仅仅是要求中共进行有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遏制腐败现象而已。当时，我的儿子蒋捷连只是一个单纯而热情的中学生，他却无辜地死在了那场大屠杀之中。

在今年“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因揭露萨克斯真相而备受全球尊重的蒋彦永医生发表了一份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信件，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蒋彦永医生当时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亲自参与了对伤员的抢救工作，也亲眼目睹了许多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的尸体。他在这封信中指出：“我看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蒋彦永医生因为这封信被囚禁了长达六十天的时间。

尊敬的希拉克总统，您是否知道，您所要求解除武器禁运的政权，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人民使用“开花弹”的政权。这种“开花弹”，即使在敌对的两国交战的时候，也被国际公约所禁止使用。但是，残忍的中共政权却用它来对付自己的人民。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说，您的做法就是“助纣为虐”。您反对“中国威胁论”，确实，今天的中共政权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疯狂地“输出革命”，他们不会威胁西方人平和安乐的生活，但是，您是否知道今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天安门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但北京当局一党专政的制度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在持续恶化之中：迄今为止，“六·四”难属依然是一个“地下群体”，他们甚至没有公开悼念自己死去的亲人的权利；迄今为止，反对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中共前总书记、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依然被剥夺基本的人身自由；迄今为止，中共政权不断对上访和维权的农民、工人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打压，残酷对待法轮功修炼者，逼迫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网络作家判处重刑。虽然“六·四”惨案的元凶邓小平早已去世（我也注意到了您对邓所表达的“敬意”，这一“敬意”成为您首先访问四川成都的理由），“六·四”屠杀的直接受益者江泽民也退休了，中共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但该政权仍然坚持着强悍的“屠杀有理”的屠夫逻辑，拒绝承认“六·四”屠杀的罪行。

然而，在中法文化年的诸多活动中，却没有一个与人权相关的项目。法国是欧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是法国的立国之本，著名历史学家朱米斯·米什莱认为，法国的《人权宣言》代表了十八世纪人类在追求平等、公正以及人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该宣言是第一部真正富有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的宪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您的许多言论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权宣言》，背离了法国的民主精神和人权思想。在此，我想提醒您：需要购买法国的先进武器的，仅仅是那些希望维持其“稳定”统治的特权阶层，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根本不需要这些武器，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与法国人民一样的民主、自由、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我不知道您是否阅读过在法国畅销一时的《马燕日记》？法国民众为马燕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而感到震惊。其实，在中国，像马燕那样没有钱上学的孩子成千上万，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完全就是一个谎言。为什么中国政府有钱去购买昂贵的武器，却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让孩子们完成其义务教育呢？睿智如您，能否就此询问中国的领导人？如果他们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再考虑买武器给他们吧。

尊敬的希拉克总统，贩卖尖端武器给中共政权，并不是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您和您的政府也不可能指望从中国人民那里获得任何的“感激”。恰恰相反，这样的做法将极大地伤害法兰西共和国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声誉和形象——中国民众将怀疑地问道：做出这样见利忘义的事情的法国，是雨果、左拉和加缪的法国吗？虽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可以在对华武器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但这种沾满鲜血的贸易对十三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犯罪。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罪行。在不久的将来，您如何面对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和中国人民？为了避免将来受到良心的折磨，请您三思而后行。

尊敬的希拉克总统，您是父亲，您的妻子是母亲，您们还有孙儿孙女。您和您的妻子爱您们的子女和孙儿孙女，我也爱我的儿子，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爱和同情心是超越政治和经济的，爱和同情心是人类维系其崇高品格的关键因素。一个用政治和经济利益来伤害人类的爱和同情心的领袖，只能是被民众所唾弃、被历史所蔑视的卑琐的政客。而一个始终珍惜人类的爱和同情心的、视道义立场高于现实利益的领袖，则可能成为被民众所敬仰、被历史所推崇的伟大的政治家。今天，您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一个被剥夺为死去的儿子哭泣的权利的母亲。今天，我以这样一个母亲的名义，推心置腹地写下这封信，我不期望得到您的回答，但我相信所有有良心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对这封信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

——二零零四年十月九日

法国人民，请睁开你们的眼睛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余杰草拟)

二零零四二月二十一日，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逊在欧美首脑会议举行前夕明确表示，在欧盟有意撤销对华武器禁运令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应该撤销，我也认为布什政府为此向欧洲寻衅是错误的，实际上美国一定无法取胜。”法国国防部长米谢勒·阿利奥-马里十六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表示，欧盟应加快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步伐。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是对这个大国的不信任，是没有效用和无必要的做法，这也是法国希望解除禁运的理由。就在同一个星期里，法国总统希拉克再次重申这一立场。

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某些政客们堂而皇之地宣称：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表示“信任”，是对中国人民表示“友好”。但是，大部分中国人民的看法恰恰相反：贩卖尖端武器给中共政权，并不是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欧盟各国政府也不可能指望从中国人民那里获得任何的“感激”。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需要的是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在现阶段中国人民不需要任何的先进武器。中国国内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近期中国频繁发生大规模矿难，一次事故的死亡人数即达数百人。中国官方被迫承认，其煤矿行业在安全设置设施方面存在着高达五百亿人民币的缺口，数百万矿工们根本就是在用生命来换取能源。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也公开表示，中国目前教育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仅在西部的宁夏，一个县就有超过两万以上的适龄儿童因为家里无法负担高昂的学费而失学。《九年义务教育法》成为一纸空文，文盲半文盲的数量不降反升。在此情形之下，为何要耗费巨资购买武器呢？显然，需要先进武器的只是暴虐地统治中国人民的少数独裁者。这些统治者使用先进武器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威胁已经建立民主制度、享有自由生活的台湾人民，二是恐吓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被他们所“绑架”的十三亿人民。在十五年前，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使用了战争中也禁止使用的“开花弹”。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绝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中国官方大张旗鼓地宣扬其政治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多次表示，“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政治原则问题，欧盟的对华武器禁运政策是冷战的产物，与中国和欧盟之间良好关系的发展不相称。”“中方认为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是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此政策并不是针对所有国家，因此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军售禁令维持不变显然是一种政治歧视。”这位发言人不敢说出西方世界实施对华武器禁运政策的根源：一九八九年，中共当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对要求民主和自由的人民实施了血腥的屠杀。如今，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共当局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月以前，当年因为反对镇压学生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中共当局拒绝为其恢复名誉，仍然继续羞辱这位死去的前领导人，在官方发布的消息中，声称其“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从赵紫阳逝世到举办小型追悼会期间，全国有数以千计的人士失去自由或受到警察的骚扰。直到今天，数以千计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的家属，仍然不能公开纪念他们死去的亲人，他们自己也被官方定义为“不可接触的贱民”。这一切都说明，中共依然是一九八九年时候的中共，凶手们拒不为当年的屠杀认罪。而在此时此刻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也就意味着欧盟各国承认当年中共在天安门的屠杀是合法的行动。这时对暴政的鼓励，也是对自由的背叛。

美国坚持对华实施武器禁运，并对欧盟施加压力，因此美国在许多中国民众和知识分

子心目中成为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在今天的欧洲，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美思潮，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在全球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然而，一般的欧洲民众并不知道，由于在类似于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诸多问题上只顾利益、不顾价值的做法，已经使得欧洲在中国人心中失去了作为自由故乡的光环。在游说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中最卖力的是法国希拉克政府，但是在中国民间喜欢希拉克及法国政府的人并不多。对独裁政权实行绥靖政策的政客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名誉，对独裁政权实行绥靖政策的国家也不会享有和平的美梦。法国人民应当汲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那是鲜血换来的教训——民主与专制两种制度永远不可能和平共处，与狼交朋友，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被狼咬。

天安门母亲的眼泪与中法贸易的数字相比，在天平上眼泪的重量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忽视乃至蔑视天安门母亲的眼泪，后果则不堪设想。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被屠杀的孩子都与其他的孩子息息相关。在被誉为世界上最时尚的都市的巴黎的天空下，在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的普罗旺斯的天空下，奔跑着金发碧眼的孩子们，他们是法国的未来。然而，在已经不再遥远的东方的中国，有那么多的孩子却在血泊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死不瞑目。容忍和支持东方的屠夫，与杀害法国自己的孩子并不根本的区别。那位优雅的法国女国防部长，我们猜想您也是女儿、妻子和母亲，您会尝试着去理解那些失去父亲、丈夫和儿子的女人们的痛苦吗？

有良知的法国人民，有光荣的民主传统的法国人民，请你们睁开眼睛，利用你们已经享有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反对政客们助纣为虐的可耻行为。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你们将是值得尊敬的朋友。

丁子霖、刘晓波、余杰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这么多人，一九九零年的中国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却空空如也。

——廖亦武《古拉格情歌》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蒋彦永医生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几天之后，这封长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在“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这封信件的发表预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开始复苏。

十五年来，在权力的压制和金钱的腐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逐渐消亡，许多博学鸿儒企图以对“六·四”的淡忘来换取苟活的权利，并为此寻找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在“为学术而学术”的高谈阔论中，在对陈寅恪这样的“文化遗民”的顶礼膜拜中，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疯狂叫嚣中，“六·四”不知不觉地缺席了。“过于聪明的中国文人们”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潜规则”：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谈论这个话题会给自己带来若干的“麻烦”，会影响自己职称的评定、职务的升迁和生意的扩大。王蒙式的“人生哲学”蔓延得比任何病菌还要快。于是，对“六·四”的谈论逐渐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官方的“遗忘政策”在知识阶层的配合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我到南方一所大学讲课的时候，一位美丽的大一女生站起来问我：“您能给我们讲讲‘六·四’是怎么回事吗？是不是人民纪念周恩来总理？”这个问题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艰于呼吸视听”。面对这个十七八岁的天真的女孩（“六四”惨案发生的那年，她大概只有四五岁），我的大脑中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的这个问题。我不能指责她的“无知”和“弱智”，因为她不过是官方“遗忘政策”的受害者之一。此后几天的时间里，我一直难过得无法入睡——“六·四”我们已经失败了，难道对“六·四”的记忆的捍卫和对“六·四”的遗忘的抗争，我们也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吗？

对于我的生命来说，生活在“后‘六·四’时代”的中国，就是生活在无边无际的耻辱之中，只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耻辱当作耻辱而已（甚至还有人把耻辱当作了光荣）。正如曾经因为朗诵诗歌《大屠杀》而被捕入狱的诗人廖亦武在诗歌中所说，这个人潮汹涌的庞大的帝国，其实“空空如也”。蒋彦永医生意识到了这种耻辱，他不愿与之为伍，于是他发表了这样一封信件。我还注意到，这样的一封迟到的信件是由一位普通医生写的，而不是由像巴金这样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像季羡林这样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以及号称“九十岁以后要说话”的身居高位的费孝通等人写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让人深思。

这封信件的意义，与去年萨斯中的那封信同样重要。在去年的那场萨斯灾难中，蒋彦永医生挺身而出揭露被官僚们层层遮掩的疫情真相。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蒋医生的那封信，如果萨斯疫情继续在黑幕后泛滥，还会有多少同胞被病毒夺去生命。所以，《时代》周刊文章的标题“一名医生挽救了一个国家”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

萨斯疫情平息之后，我一直想去拜访蒋彦永医生，却没有打听到他的电话。去年冬天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线的那边是亲切的声音：“您是余杰先生吗？您不认识我，我却读过您的很多文章，我是蒋彦永医生。”蒋老师提到，他在网络上看到我的很多文章，非常赞赏我的观点，想与我见面。我便说：“那么，这几天您哪天有空，我来看望您吧。”他却说：“还是我来看您，我可以叫车。”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丝毫没有长辈的派头，

待人非常亲切随和。

果然，一个周末的下午，蒋老师来到我家。他瘦高的身材，外面是一身黑色的呢子大衣，里面是西服领带，穿着打扮一丝不苟。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也腰身笔直，他既有旧式教育的背景，又长期在军队系统工作，自然不像年轻一代那样随随便便。他告诉我，我夏天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也到美国去看望女儿，从中文报纸和网络看到了我在美国的许多言论，惊讶于我这么年轻又这么有勇气。我不好意思地说：“跟您相比，我做得差远了，您在萨斯中的发言让我们都很敬重。”蒋老师却谦虚地说：“那不过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基本的事情而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生命是最重要的。”是的，救护生命、尊重生命，既是一名医生的天职，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泽博士所倡导的“敬畏生命的论理学”的要求。

史怀泽曾经指出：“敬畏生命，也就是体认生命的尊严与可贵，并珍视生命，在生命之前将抱谦恭与畏敬之意。我们必须将‘生的意志’当作是神圣的东西，予以肯定、尊重，并且应当深惧对生命的破坏与压迫。”而蒋彦永医生无疑是这种“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的积极实践者之一。揭露卫生部部长的谎言正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而要求为“六·四”死难者平凡也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屠杀生命的罪行不可能逃避历史的审判。在那次短暂的谈话中，蒋医生谈到了他与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一次对话，在这封公开信中他也详细地描写了这段对话：“一九九八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三零一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一九九八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那天，蒋老师相当郑重地对我说，在明年“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他要公开表达自己对“六·四”的看法，他赞同已故的吴祖光先生的观点：“人活着，就要说话、说真话。”我非常赞赏蒋医生的这一决定，并认为：新一届的领导人必须面对“六·四”问题。不解决“六·四”问题，所谓的“胡温新政”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不解决“六·四”问题，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不可能真正开启。在更加宽广的历史和全球视野中，如果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像韩国为“光州事件”平反和台湾为“二·二八事件”平反那样对待“六·四”，“六·四”就不会成为仇恨和苦毒的包袱，而将成为民族和解与国民重生的起点。

后来，蒋医生又邀请我去他家作客。虽然蒋医生享有“副兵团级”的高级干部的待遇，但他的家中朴实无华，陈设甚至比不上时下北京的一些“小资”们的家。可以看出，蒋医生是一位安贫乐道、无欲则刚的知识分子。在蒋医生家中，我还见到了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六·四”以后十五年来，“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了“不可接触”的人。稍稍有点“身份”和“地位”的人，一般都不敢与他们来往，甚至原来的朋友和同事也逐渐疏远了他们。然而，蒋医生却不怕“惹火上身”，他坦然地与丁子霖夫妇等“敏感人士”来往。的确，所谓的“敏感人士”只是官方偷偷摸摸的“定义”，民间的力量完全应当站出来对抗这些见不得光的“标签”。为什么不能与“六四”难属群体交朋友呢？这是我们的公民权利。蒋医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是仁者，亦是勇者。

在这封公开性的最后，蒋彦永写道：“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十七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作为“六·四”的亲历者，蒋彦永先生

亲眼目睹了许多年轻生命的消亡，当士兵们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时候，他却在手术台上抢救奄奄一息的伤者；作为七十多年中国现代历史的参与者，蒋彦永医生从屠杀和谎言中破茧而出，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鼓舞知识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榜样。

当代中国有两位让人肃然起敬的医生，他们是李志绥和蒋彦永。前者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揭露了独裁者的暴虐、虚伪和淫乱以及极权主义的恐惧、邪恶和黑暗；后者则以两封信件昭示了后极权主义时代中国的真相以及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捍卫生命的价值与尊严的勇气。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司马迁式的“良史”。国人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如同破冰船一样，破开厚厚的坚冰，为我们传递春天的信息。

最后，让我以诗人廖伟棠《读廖亦武狱中诗集〈古拉格情歌〉》中的诗句结束这篇文章：

这么多人，从一九九零年的中国
涌向二零零二年的中国，我被虚无撞伤。
烈士或商人，古拉格或北京：
将有另一些人重新执笔，书写灵魂。
疗伤是不必的，从伤中取墨却是必然。

——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

蒋彦永：我要不停地说真话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多次与蒋彦永医生会面。他住在一个军队大院内，前去探访不太容易。在他所写的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传播开来之后，中共高层颇为恼怒，虽不敢明目张胆地迫害之，却采取种种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原来大院的门卫是普通士兵，近期却换上了一名中校级的军官率领若干士兵“严防死守”，对去蒋医生家的来客严加盘问、登记造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会面多选择在某医院附近。一般都是蒋医生到某医院参加会诊的时候，抽间隙时间出来与我匆匆交谈一会儿。有一次，为了避免中共耳目的监控，蒋医生没有向院方要车，而是自己乘坐一辆出租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我的家中。在几次谈话中，蒋医生反复鼓励我坚持说真话、努力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天安门惨案，不要放弃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

为“六·四”正名的信件通过李锐送到最高层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蒋彦永就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但当时他的名声还仅仅限于专业领域，尚且“人微言轻”，加之互联网还不发达，中共对此信息进行严密的封锁，因此那封信件没有在公共领域引发广泛的关注和震撼。

而在今年三月，蒋彦永再次写了一封为“六·四”正名的信件，这封信却成为海内外争相传诵的正义檄文，其价值也许在五年前李慎之所写的名文《风雨苍黄五十年》之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蒋彦永在去年萨斯肆虐期间站出来揭穿中共的谎言，被《时代周刊》誉为“一位医生的一句真话拯救了一个国家”，也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成为这个本已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最受尊敬的英雄，也成为这个道德沦丧的国度里最具道义力量的良心。蒋医生对我说：“我在萨斯事件中积累了巨大的资源，我要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必须为那些天安门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说几句话、做一点事。”在去年年底我们的第一次会见中，他就明确地作出了这样的表白。因此，以蒋彦永今天的身份来谈论“六·四”，颇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应。

其次，这封信件在互联网上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流传。二零零四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网络大国，上网人数达到了八千万以上。蒋彦永的信件是如何流传到网络上的，尚不得而知，但蒋本人非常看重网络的力量。在萨斯事件中，他就深切感受到了网络已经成为“自由的先声”；而这封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也正是通过网络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传播。目前，中共依然对传统媒体实行严密的控制，当年最早报道萨斯信息的《南方都市报》就遭到了疯狂的报复，多名重要领导人被以经济罪名判处重刑。今年以来，在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出版物等）上根本看不到与这封信件以及“六·四”事件有关的任何信息，但这封信却在各个阶层的中国民众中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网络的功劳。中共投入巨资企图实现对网络的有效控制，但网络的本质乃是信息的自由传播，中共以农业文明的思路对待网络文明，显然只能是刻舟求剑而无法奏效。

第三，这封信件通过李锐真正送达中共最高层。蒋医生告诉我，原中组部副部长、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李锐，通过中组部的渠道将这封信送抵最高层。这封信件的题头明确指出是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

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借助李锐的力量，它至少是送达了以上大部分人手。另外，蒋医生还通过自己的渠道把这封信件送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吴仪在萨斯之后兼任卫生部部长，主管卫生工作。当然，不出大家所料，迄今为止这些权高位重的人仍然没有对此信作出任何的回应，但他们都无法继续实行“鸵鸟政策”、否认这封信的存在，也无法摆脱历史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在今年人大的闭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不得不面对美联社记者的追问。即使温的回答了无新意、根本不敢对“六·四”说一句表示同情的言语，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再一次让中共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被正义的法庭审判的命运。

直言江泽民违反宪法违反党章

蒋彦永医生的信件发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共军方立即派出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解放军总医院的领导“登门拜访”，客客气气地与蒋医生“谈心”。蒋医生向我讲述了这次有趣的谈话。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医生，却以嶙峋的风骨让那些肩上披满将星的高级将领们为之折腰。

这几名高官显贵在寒暄之后便询问起信件的内容来，他们用一种迂回的口吻询问说，信件中所提及的若干信息是如何获得的。蒋医生正色答曰：“我信件中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最多是有措辞的不准确。比如，我写到的‘开花弹’，在武器专家那里也许有更加准确的专业术语，但这并不足以推翻我观察到的真相。在我动手术的若干伤者中，就有子弹进入的伤口小、出去的伤口大的例子；也有子弹打入身体后，体内留下数十个子弹碎片的例子。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可以称之为‘开花弹’。”他义正词严地说，当时许多医生都发现了这一事实，后来他到铁道医院、协和医院等医院会诊一些疑难病例的时候，这些医院的多名医生都表示有无数的证据证明这一铁的事实。

这几名高级将领无法否认蒋的说法，便继续追问他与杨尚昆的谈话有没有第三者可以证实。为了回应蒋的信件，官方早已动员杨家的亲属站出来“辟谣”。对此，蒋彦永回答说：“当时只有我和杨尚昆两人谈话，没有任何旁人。杨已去世，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次谈话的真实性。”对方赶紧询问说：“您有什么证据呢？”蒋回答说：“现在我不必给你们看，到时候我自然会拿出来。”

谈话进行不久，蒋彦永逐渐将主动权转移到自己的手中，把对方变成了被询问者。蒋对他们说：“今天你们来看我，正好我要以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军人的身份，向你们反映我对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一些意见。”对方立即紧张起来，但蒋继续侃侃而谈：“我看了‘两会’的电视报道，江泽民为什么要走在第一个投票？他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他这样做完全不遵守基本的规则，这是在赤裸裸地炫耀他的权力。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和普通军人，看到这样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违反党章的场景，感到非常愤怒。江泽民先生也是一名党员和军人，请你们向他转达我个人对他的批评意见。”

对方沉吟了半天，才勉强解释说：“这是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江泽民同志表示尊重，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尊敬老人的传统美德。”

蒋彦永立即反问道：“既然是这样，下午的电视报道中江泽民走到前面，但在晚上的新闻中为什么又把这一段给删掉了？为什么不让人民知道胡温尊老爱幼的美德呢？”

几名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在下级面前作威作福的高级将领，无法回答蒋彦永如此直接和尖锐的问题，估计从来没有哪个“部下”敢于以这样的口吻同他们说话。解放军总医院的院长技术平庸却官运亨通，在蒋彦永已经是医院中倍受尊敬的名医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行政干部，他哪里敢在德高望重的蒋医生面前摆官架子？而总政、总后的负责人也不敢冒犯这位七旬老者的凛然正气，只好哼哼哈哈地敷衍过去。他们哪里敢向垂帘听政的江泽民

“转达”蒋医生的质问和谴责呢？

秉承燕京校训，说真话不怕坐牢

在四月二日燕京大学校友会的间隙里，蒋医生抽空出来与我交谈了半个多小时。谈起在燕京和协和的经历来，老人充满感情地说：“我一九四九年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一九五二年入协和医学院，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担任医生的工作至今已四十二年。我深感燕京的三年和协和的五年严格的教育，对我终身影响最深。燕京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牢记我心中。”多年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里把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妖魔化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殊不知正是这些教会学校培养出了当代中国若干学识渊博、人品高洁的优秀知识分子。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李慎之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而从数百万医生中脱颖而出坚持说真话的蒋彦永先生也是毕业于燕京大学，这绝非巧合。蒋医生告诉我说：“五十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作为燕京人，要按校训去做人。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在当代中国，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蒋医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都已经七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在‘文革’中曾经被打得头破血流，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再说我是‘蒋彦永’，他们要动我也得掂量掂量。他们要是把我关起来，总不能一直关下去吧？总要开庭审判吧？他们怎么审判我呢？给我安一个什么罪名呢？我懂法律，我要利用法庭传播我的观点。还有，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如果真的遇到那样的情况，这位‘中国第一大律师’也会自告奋勇给我当辩护律师。”

蒋医生的这段话让我非常感动，这才是一种充沛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浩然正气。我们的民族丧失这种浩然正气已经很久很久了。数千年皇权文化的侵蚀，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对流氓文化的张扬，以及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金钱与权利对社会伦理底线的摧毁，使得“说真话”这一正常社会的正常生活准则，在中国却成为遥不可及的“道德高线”。部分知识分子对“说真话”的呼吁，居然被攻击为“泛道德主义”。道德、良知、真话、信任，成了被尽情嘲讽的名词；而权谋、欺骗、残忍、狡诈，却成了竞争与生存不可缺少的法宝。蒋医生逆流而上，不以个人名利为旨归，不以个人安危为要务，在常人最不敢触及的“六·四”话题上发出了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强音。蒋医生与老中青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官方“锁定”的若干“政治异见分子”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李锐、丁子霖、章诒和、刘晓波、胡佳以及我本人都是他的“道义之交”。前政治局秘书、中央委员鲍彤因“六·四”屠杀而彻底觉悟，成为中共独裁体制的坚定的批判者。蒋彦永和鲍彤是中学同学，在鲍彤出狱之后，蒋彦永利用自己在卫生系统的关系，帮助鲍彤看病、检查身体。在世态炎凉的今天，这种温馨的友情的背后，彰显出了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在蒋彦永的医疗生涯里，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无论他是贵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还是一名普通士兵。从关心每一个普通病人到为天安门母亲呼吁，蒋医生真正实行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校训。我想，中国未来的希望，不在于突然之间出现一个“中国的摩西”或“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在于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像蒋彦永一样说真话、像蒋彦永一样生活。与其被救，不如自救。这才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罪孽深重的民族的真正的救赎之路和重生之路。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历史，没有尽头的大海
将埋在国家的档案库里
直到某一天，为了某种需要
清理或销毁
我将被销毁在戏台下
没有观众，没有证人
甚至没有家属

——廖亦武《出庭》

即使我一直遵照鲁迅的嘱咐“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估量今天中国的当权者们，但我仍然没有料到他们会非法扣押一身正气的蒋彦永医生。当权者的这一作法愚昧、邪恶而残忍——他们企图以此来恐吓更多的希望像蒋医生那样说真话的公民，没有想到却弄巧成拙地让自己的丑陋曝光于全世界的目光之下。他们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和耻辱柱。

今年六月一日，蒋彦永夫妇乘坐解放军总医院的专车在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的途中失踪。由于蒋彦永夫妇失踪的时候正值所谓的“政治敏感期”——“六·四”十五周年之际，舆论认为这跟蒋彦永今年二月致信中央领导人呼吁为“六·四”事件正名有关。但是，“六·四”纪念日过后，甚至在“天安门母亲”的象征人物丁子霖教授于八日被解除监视居住之后，蒋彦永夫妇的去向仍然不明。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蒋瑞对媒体说，她担心父亲可能被当局指控犯有煽动颠覆罪。十五日晚，蒋彦永的妻子华仲尉返回寓所，但她不知道蒋彦永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自由。据悉，蒋彦永因为拒绝承认“（间接）泄露为‘六·四’正名信给海外传媒，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的所谓“错误”，所以仍未获释。黑要让白低头、邪恶要让正义屈服、杀人者要让受害者感谢，这就是中共自己的“逆向思维”。

在全球所剩无几的共产主义政权之中，北京政权确实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它害怕真相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它仇恨说真话的人到了变态的程度。此次中共粗暴地剥夺蒋彦永医生的自由，使我想起了当年苏共对待诗人和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做法。据最近解密的苏共档案透露，五十年代初期，在斯大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手上掌握着公民们生杀予夺大权的巨头们轻松地讨论对异议知识分子的整肃。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建议，将“不听话”的帕斯捷尔纳克送进集中营，然后“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此时，嗜血的暴君斯大林说了一句大家都没有想到的话：“帕斯捷尔纳克是天上的人，我们是地下的人，我们就不要去动他了吧。”在斯大林的精神世界里，尽管权力和杀戮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但他始终还存在着对上天敬畏，这与俄罗斯源远流长的东正教传统有关，也与斯大林少年时代的神学院生涯有关。一九五八年，帕氏的巨著《日瓦格医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当局认为这是对国家政权进行“挑衅”。受到苏共控制的苏联作家协会下令开除帕氏会籍，全国上下的媒体都对帕氏展开了批判。帕氏被迫拒领诺奖并避居乡下，但他始终没有失去自由，依然能继续自己的创作。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也没有把魔爪直接伸向帕斯捷尔纳克。

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之于俄罗斯乃是“天上的人”，那么蒋彦永医生之于中国同样也是“天上的人”。可以这样说，没有了帕斯捷尔纳克，俄罗斯文学中便缺少了一股高贵的血液；而没有了蒋彦永，中国人民也许就将深陷于萨斯病毒之中而无法自拔，中国知识分子也许仍然继续他们对天安门屠杀可耻的沉默。对于“天上的人”的不同态度，彰显出了中共与苏共

之间的重要区别：苏共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们，实施的是一种“暴君”的统治，“暴”则“暴”矣，但至少存留了些许“君”的秩序和准则；而中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独裁者们，实施的却是一种“流氓”的统治，不仅残暴，而且极端下流无耻，根本不遵守任何游戏规则和伦理底线。在红色恐怖的斯大林时代，苏共政权对帕斯捷尔纳克等知识分子尚能“吞舟是漏”；而在某些善良人士单相思的所谓“胡温新政”的时代，中共政权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拘禁作为民族的救星并享有世界声誉的蒋彦永先生。这种以“痞子”为荣的心态，恐怕连斯大林也会感到无法理解。

在蒋彦永先生失去自由的这些日子里，我每天都想起两个多月之前他来我家作客时的情景。那天，同时来我家的还有章诒和女士、音乐家王西麟、北大退休教授姚仁杰和学者任不寐。牵连着这几位不同领域杰出人士的神秘的精神线索，是共同的对“六·四”的关注、对专制的痛恨和对自由的热爱。那天，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天安门母亲们展开，蒋医生的言谈中充满了浩然正气。他的激情使他显得额外年轻，而完全不像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我相信，蒋医生永远不会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在走向真理的路途中，蒋医生比我们走得都远。作为年轻一代人，我们只能奋力跟上。

蒋医生被剥夺自由的事实，让中共当局宣扬的“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成为笑柄。这一无赖行为再次验证了这样的事实：中共已经全然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和道义资源。丁子霖女士在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中指出：“一位敢于说真话的医生居然被无端地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还需要由别人来告诉你们吗？我今天之所以不得不写这封信，是因为实在再无法容忍下去了。做什么事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激起天怒人怨。我想，这一点同样是无需由别人来告诉你们的。”而刘晓波《抗议对民族良知蒋彦永的迫害》中则直接指出了中共这样做将导致的后果：“一个掩饰灾难和罪恶的政权，只能在延续灾难和制造新罪恶中越陷越深，整个国家的未来也将被置于随时可能再现人权大灾难的恐惧之中。”在此意义上，蒋彦永医生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如果蒋彦永医生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那么我愿意陪他一起坐牢——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失去自由也许是唯一的荣誉。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

为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

——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达赖喇嘛驻华盛顿的特使嘉日洛珠坚赞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当时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的嘉日洛珠坚赞前去看望达赖喇嘛，询问流亡政府方面应当对此作出何种回应。当他走进达赖喇嘛陈设朴素的房间时，发现这位圣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多年来，嘉日洛珠坚赞与达赖喇嘛如影随形，却第一次看见他如此悲伤。达赖喇嘛流着眼泪对他说：“他们怎么能够用这样残暴的手段对付和平示威的学生？那些鲜活的生命多么宝贵啊！”

嘉日洛珠坚赞站在一旁，心事重重。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全世界都在声讨中共的暴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确实也应当对中共表示谴责。但是，当时西藏流亡政府刚刚与中共政权开始接触，如果立即发表这样的声明，那么好不容易展开的谈判也许又将中止，西藏问题的解决也将再次被搁浅。

达赖喇嘛注意到了嘉日洛珠坚赞脸上犹豫不决的神态，便对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最好不要去谴责中国，我们要保证谈判的进展，我们要考虑西藏自己的利益。”

嘉日洛珠坚赞惊诧于达赖喇嘛穿透人的肺腑的智慧，便点点头默许了达赖喇嘛的话。他以为达赖喇嘛会采纳自己的意见，没有想到达赖喇嘛立即严肃地对他说：“很遗憾，我不会听从你的建议，我们必须谴责共产党的镇压行为。我们争取西藏民族的自由，但绝对不能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是弱者，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我们要与那些被杀害的生命站在一起，要为他们的灵魂而祈祷。如果我不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屠杀行为，我就不配做藏人的精神领袖，我自己就违背了佛法的庄严。”

这个小小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由此，我才理解了达赖喇嘛为什么能在一九八九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由此，我才理解了达赖喇嘛为什么在东西方各国都享有不亚于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崇高声誉。达赖喇嘛对人类有大同情、大悲悯、大关爱，他不仅致力于藏民族的自由事业，也为世界上每一个受难者的命运而祈祷，其中当然包括那些在“六·四”屠杀中死去的学生和市民们。中国的学生和市民被杀害，在达赖喇嘛的心中与藏人被杀害一样，是绝对不能熟视无睹的。对于天安门事件，达赖喇嘛的悲痛不亚于那些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的亲属，他与“天安门母亲”一起流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赖喇嘛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真诚的朋友。作为一个汉族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把我深深的敬意献给达赖喇嘛，一如献给赵紫阳先生、丁子霖女士和蒋彦永医生。这些伟大的心灵的存在，是我对人类的信念所在。我一想到这个地球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些伟大的心灵，我的心中便被温暖所充满。

作为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争取西藏的自由，争取西藏人民按照自己的信仰来生活的权利；作为一名世界级的宗教领袖，他的足迹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像农夫播种一样将爱、宽容与和平的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中。达赖喇嘛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主义者，而是一个着眼于人类的和平以及精神世界的升华的伟人。从呼风唤雨的大国元首，到声名显赫的好莱坞巨星，无数人都愿意向达赖喇嘛寻求生命的智慧。达赖喇嘛曾经说过：“因为我们对爱有共同的渴求，于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可能将遇见的任何人，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论这张初识面孔是多么的陌生，或者衣着和行为是多么的不同，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显著的分别。执着于外在的差异是很蠢的，因为我们的天性本来是相同的。”尽管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苦难深重，但达赖始终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来等待问题

的解决。对于罪孽深重的中共统治者，他也没有任何的仇恨与愤怒。正如嘉日洛珠坚赞经常对汉人朋友所说的那样：“达赖喇嘛不是问题，对你们来说，他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对我们来说，他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们是一个杀戮深重的民族，我们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民族，让我们记住达赖喇嘛的忠告吧：“归根结底，人类是一体的，而这个小小的星球正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如果要保护这个家园，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感受到宇宙性利他主义的鲜活意识。唯此感受才能去除我们以自我中心为动机，而使人们互相欺骗和利用对方。如果你有一颗诚恳和开放的心灵，你自然而然地不必对别人感到害怕和恐惧。”达赖喇嘛是藏人的良师益友，也是所有中国人的良师益友。

——二零零四年六月，华盛顿

UnRegistered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二零零三年四月九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就在三四天之前，我还在凤凰台看到了关于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专题片《霞光漫天》。我喜欢这个别具匠心的、镶嵌了吴祖光和新凤霞名字的“霞光漫天”的片名，我更为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吴祖光在客厅里挂着“生正逢时”的条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逢抗战的硝烟及国民党政权的迫害，下半叶在共产党中国则接二连三的遭遇了“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等政治运动，虽然命运多舛，却无怨无悔。他不是抱怨“生不逢时”，而是坚信“生正逢时”，因为在面对极权、邪恶和暴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退缩和回避过，即便被贬为“牛鬼蛇神”，他也无愧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许多老人因为饱经风霜而变得世故圆滑，而吴祖光则一直保持了一颗烂漫的童心。没有想到，老人在影片中的音容笑貌犹在，突然之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下面，他谈到了邓小平和“六·四”大屠杀：“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屠杀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老的讲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直到今天，言说“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禁忌，吴老是少数无视乃至蔑视这一禁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双目炯炯，无所畏惧，仿佛是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古代的英雄豪杰，也像一把向黑暗发起猛烈冲刺的锐不可挡的刀。在一九四九年来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吴祖光几乎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抄家、凌辱、流放、殴打、囚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了。他依然没有学会像曹禺那样见风使舵，也没有学会像王蒙那样越活越“聪明”。八十年代以来，他被迫退党、被取消政协委员的职务乃至遭到监视，这些打击没有让他那刚烈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发生丝毫的改变。新凤霞一直都很担忧丈夫的安全，有时很不放心，甚至去偷听丈夫的电话。每逢吴祖光在电话中向朋友痛斥中共的专制和腐败时，新凤霞就会在一边苦苦相劝。许多朋友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过夫妻俩人的争执。面对因为自己的牵连而遭到残酷迫害导致瘫痪在轮椅上的妻子，吴祖光感到深深愧疚而不得不收敛起一点锋芒来。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身心皆碎，迅速衰老。另一方面，他无所顾忌，更是放胆直言——“凤霞都已经去了，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吴祖光不仅有烈士的侠骨，还有佛陀的柔肠。正如鲁迅所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吴祖光的身上不仅有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更有对亲人和同胞“将心比心”的爱和同情。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的知识分子，让人敬畏和尊重；而在兼有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之后，他才让人亲近和友爱。与鲁迅一样，吴祖光就是这样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民族脊梁。

晚年的吴祖光为了两个打工妹的不幸遭遇而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最后纠缠到一桩漫长的官司之中。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与他在政治运动中受难一样，是生命中璀璨的亮点。打工妹遭到北京国贸中心的保安的非法脱衣搜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新鲜。打工妹向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地位，在某些“城里人”眼中、尤其是经营国贸饭店的某高干子弟眼中，打工妹根本就是“贱民”。但是，吴祖光却为“贱民”的命运而奋笔疾书，以至被告上法庭。对于某些精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在这被“白白浪费”的三年里，能够创作多少的文学作品、能够撰写多少的学术论文啊！而吴祖光的心中却有另一杆秤砣，那就是：以普天之下所有弱者、所有被侮辱者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与卢跃刚有着惊人的相似，卢跃刚为了替苦弱的民女武芳讨回公道，简直把陕西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不是在滔滔不绝、居高临下地谈论对抽象的生命个体的关怀和怜悯，而是在切实地、承担着风险和责任地为“每一个”受难者的遭际而奔走呼号。他们不是空谈符号化、理论化的“正义”和“人道”，而是在对“每一个”沉默者和流泪者的关爱中展示人性的光辉。

可惜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吴祖光和卢跃刚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相反，像王蒙、余秋雨、厉以宁、张艺谋那样的“过于聪明者”层出不穷。吴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南去的飞机上，一路黯然伤神。一九九九年冬天，我曾经将一本《火与冰》送给吴老，吴老勉励我说：“你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真话要一直坚持说下去。”言犹在耳边，人却已经仙去。记得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是的，但愿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里，有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吴祖光先生的道路知难而进。我想，当吴祖光不再需要被“普及”的时候，也就是“真话中国”取代了“假话中国”的时候。那一天，吴祖光先生那遥远的愿望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将代吴祖光先生往“毛贼”干尸上吐一口唾沫。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一日

香港还有为“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有感于新当选议员梁国雄自创的宣誓仪式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下午二时半，香港立法会开始新一届议员的宣誓仪式。与以往程式化的宣誓仪式不同，此次宣誓仪式出现了变数：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采取一种富于“自己特色”的方式宣誓，如同在一池平静的春水中扔进一块石头，激起千层涟漪。

梁国雄穿着写有“平反六四 还政于民”标语黑的色T恤，左手绑上黑纱（他在会后向记者解释指黑纱代表了对“六·四”死难者的悼念），宣誓前他在座位上高举左手，高喊“平反六四、还政于民、释放政治犯”口号。接著他走向议事堂中央，大声宣布：“我会效忠中国人民及香港市民，反对官商勾结，捍卫民主公义，争取人权自由。”

宣布完毕后，梁国雄按照立法会规定的誓辞宣读誓言，他特别在誓辞段落的某些地方停顿，以求达到改变字句原意的效果：“本人梁国雄谨以致诚，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他所要效忠的不是党国而是人民。在宣誓完毕后，梁国雄再次高喊：“Long Live democracy, Long Live the people, Power to the People; 人民万岁、民主万岁、权力归人民、反对小圈子选选、普选特首、普选立法会”等口号。之后他返回座位，并没有如其他议员一样签署誓辞。立法会秘书长冯载祥表示，法律没有规定议员必须要签署誓辞，签字只是议员一向的习惯。

正式成为立法会议员后，“长毛”的衣著成了他在立会内第一项挑战。对于“长毛”坚持要穿T恤出席立法会，立法会主席范泰泰傍晚在记者会上解释T恤是消闲衣服，议员去年已有共识，要穿著有领衣服出席会议。“长毛”以自己的口味不同，只穿平民所穿来反馭范太。最后范太表示不再和梁继续争辩，并表示若梁要改变惯例，必须在星期五内委会上，得到其他议员支持。

我看不到香港的电视新闻，只在互联网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和照片。二零零三年夏天，我在访问香港时，大律师何俊仁议员曾带我参观立法会。庄严肃穆的立法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以想像，在一群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议员们中间，出现一个身着T恤的“草根议员”，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我看来，英国统治香港留下的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就是立法会——如果没有立法会的存在，香港恐怕早已“全盘大陆化”了。立法会是香港作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的最后的堡垒。尽管香港立法会存在着若干缺陷——比如不是所有议员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但它的存在始终是一根卡在企图“北人治港”的北京政权喉咙上的骨头。

此次梁国雄的当选，亦充分说明了香港的民心所向——香港社会历来等级森严，精英、中产阶级和普通市民，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梁是在香港无权无势，既非商界巨子，亦非拥有欧美名校学历的大律师。他崛起于民间的政治运动，却能在选举中赢得民心民意，以高票当选立法会议员，由街头进入议会，由野而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对专制的厌恶与痛恨——谁说香港人是“经济动物”，丝毫不关心政治呢？当政治成为一种显在的威胁，直接伤害到香港民众日常生活的时候，谁还能超然地表示“政治与我无关”呢？显然，梁国雄的当选就是香港人“关心政治”的方式。

梁国雄的宣誓仪式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地方是他对“六·四”的魂牵梦绕。不久前，大陆掀起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狂潮，官方谈及邓小平的生平的时候，却对其主导的天安门大屠杀轻轻一笔带过。在北大新落成的“校史馆”中，对一九八九年的学运历史也采取回避的立场，那么多被屠杀的北大学子一个也不能进入校史馆。“六·四”惨案之后十五年来，中

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政权对知识界的收买和招安已经基本完成。最近，一位当年曾积极参与八九民运的著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十五年后的中国会变得这样好；一九八九年即使我们成功了，也不一定会把中国变得像今天这么好。”这是许多已经如厉以宁教授那样拥有“别墅和汽车”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当然，丁子霖女士和广大“六·四”难属的苦难是不会被他们放在心头的。在美国，数十万获得“六四血卡”的留学生及其家属，也渐渐开始将天安门的鲜血抛在脑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国雄的“六四情结”尤其可贵——他自己并没有亲属和朋友在天安门屠杀之中遇难，他对“六·四”的刻骨之痛，不是因为政治，乃是因为良知。哪怕香港只有一个梁国雄，我也要向香港致以十分的敬意——更何况在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动中，香港的纪念活动的声势是最为浩大的。

“六·四”事件绝不仅仅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后那些天的屠杀事件——它是中共政权本质的一次“痉挛式”的发作。“六·四”屠杀承接了毛泽东时代的血腥罪恶，亦开启了此后十五年来该政权“理直气壮”地为非作歹的序幕。因为已经有“六·四”事件摆在前面，为恶者们继续作恶的时候便完全“得心应手”了——我们既然可以在首都当着全世界的眼睛向学生和市民开枪，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出来呢？你们完全可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想像我们的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国公民都生活在“后六·四时代”的巨大耻辱和伤痛之中。

消除邪恶的惟一办法就是公开地坚持正义，战胜黑暗的惟一办法就是勇敢地呼唤光明。不久以前，就在同一个立法会里，某香港女强人在谈及“六·四”的时候，貌似公允地表示，事情也要分两面看，也有那么多的解放军被杀害了。我不知道这名妇人怎么吐得出如此毒蛇蝎的语言来。她妄自为人母，要是她的子女丧生在解放军的坦克和机枪之下，她还会如此忠心耿耿地为一个依靠暴力来维持政权辩护吗？军队不能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真理啊，可就是有那么多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名流们不接受这样的真理，他们居然为屠杀寻找各种各样“合法”又“合理”的理由！

在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之时，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城楼上毛泽东画像又换了一幅新的。血迹早已洗去，哭声早已嘶哑。对昔日的屠杀一无所知的大学生们，又聚集到这里虔诚地观看升旗仪式。与此同时，长发飘飘的梁国雄却在立法会大厅里为“六·四”呼喊，这呼喊是对死难者们的纪念，是对难属们的安慰，是对凶手们的谴责，也是对蒋彦永医生呼吁的回应。不在恐惧中灭亡，就在恐惧中爆发。让我们战胜内心的恐惧，与勇敢的梁国雄一起来呼喊吧。

——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邓小平的“再偶像化”及其政治遗产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早在此前一个多月，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种媒体就奉命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报道。与去年十一月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盛大活动相比，今年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依然沿袭中共特有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动员模式。但是，大部分民众对之反映冷淡，他们更关心与此同时的奥运会比赛。

在相隔不到一年间，中共政权的对毛、邓两位前领袖的“重塑金身”，其背后隐含着中共高层江泽民集团和胡温集团激烈的权力斗争。在我看来，江泽民集团和胡温集团之间，并不存在某些海外观察家所猜想的“开明”与“保守”的区别，他们看重的都是赤裸裸的权力，他们都已蜕变为利益集团而非原教旨主义的马列信仰集团。因此，无论是纪念毛的活动，还是纪念邓的活动，江与胡温都高调参与，竭力将毛、邓的残存的权威转化为能够为自己所用的权力和精神资源。他们其实并不在意毛、邓两人的真正的治国思路，更不会辨析毛、邓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而是将毛、邓煮成一锅粥，当作菩萨一样供奉起来。在四中全会之前的斗争当中，双方都清楚地知道：如果能够表现得既爱毛也爱邓，就能将毛派和邓派都收拢到自己的麾下。

黄金图书与邓小平的“再偶像化”

此次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不仅胡锦涛亲自出席四川广安“邓小平纪念馆”的开馆仪式，而且官方在北京召开了六千人参加的纪念大会，从胡温到江朱等巨头全部出席，胡在会上发表了对邓高度评价的“盖棺定论”式的讲话。

我相信，邓本人肯定不会喜欢这样一种“再偶像化”的纪念方式。邓与毛之间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行事低调，他一直不赞成制造个人崇拜的局面。邓在一九七八年之后执掌中国最高权力长达十六年之久，在实权上从不放松，“垂帘听政”之日即达一半以上，但不曾营造毛时代那种个人崇拜。邓之家人的描述大致是准确的：“他既不需要走上神坛，也不需要走下神坛，他从来就没有走上过神坛。”

因此，近期对邓的“再偶像化”，既不符合邓本人的个性和意愿，更是有悖于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中国依然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中国的命运依然掌握在某个领袖手中——此人开明，则中国改革开放；此人保守，则中国闭关锁国。

在诸多纪念活动中，最让我恶心的是黄金图书《伟人邓小平》的出版：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金版《伟人邓小平》，面向海外编号限量发行五千套。官方的报道中指出，黄金版《伟人邓小平》为古籍十六开本、四十八页金纸，精选了邓小平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九四年间珍贵照片三十九幅，题词手迹八幅，其中部分照片为首次公开发表。黄金版《伟人邓小平》的制作和印刷，采用了当代科研成果和纳米技术，以纯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黄金纸为材质，精心印刷而成。这种高纯度的金纸，改进了金箔制品的缺陷，可将彩色图像直接印刷于黄金之上，理论上可以保存万年以上。该书包装典雅精美，封面镶嵌有纯金度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纯金邓小平头像，由上海铸币厂铸造。封面盒由名贵高雅的紫檀木手工雕成，两尺为手工雕刻的《春辉万里》图案，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题写书名。

该报道还说，金书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内涵与典藏价值。近日，该书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贵宾，并颁发了国礼证书。“此书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图书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邓小平纪念馆永久收藏。”报道最后的段落几乎成了拙劣的广告：“这套金书集文化价值、纪念价值、艺术价值盒收藏价值于一体，堪称书业瑰宝，典藏精品”。

每套定价为两万两千六百元，究竟有谁会买呢？除了贪官污吏和暴富的商人，普通民众只能望洋兴叹。这套金书的价格比去年毛泽东的金书更贵。五千套金书，总码洋为一亿一千三百万元，出版社又借机大发了一笔“小平财”。看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至死也在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过，我却更愿意作这样一种换算：一套金书是五名农村子弟一年上大学的学费，五千套金书则相当于两万五千名贫困大学生一年的学费。

邓后中国是一个极端不公义的社会

这种充满了封建专制主义“阴沟里的臭气”的金书的出现，正显示了邓后中国是一个极端不公义的社会实质。而这种态势的形成，邓本人是始作俑者。

“文革”结束之后，邓面临着毛留下的一个乱摊子：一个贫困的中国，一个信仰崩溃的中国，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众叛亲离的中国。邓将毛昔日剥夺的农民在经济领域内的某些自由归还给农民，让被毛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农村恢复了生机；邓也打开国门，使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西方）发生直接的联系。此为邓的两大贡献。

但是，邓本人仍然是一个独裁者，而非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奉者。邓并没有像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全面否定毛泽东，他也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因此，他所支持的“真理标准讨论”，不过是对毛体系的修修补补而非“伤筋动骨”，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邓小平时代》的作者杨继绳所说：“真理标准讨论并不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还原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性、整体性，使得某些人不能再运用毛泽东某句具体话语来打击人。毛泽东的伟大得到了确认和维护，社会思想体系没有发生断裂，共产主义理想得到了坚持。”

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邓毫不犹豫地镇压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整个八十年代亦不断展开诸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这些行为已经昭示着在一九八九年的危机中，邓为了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必然采取血腥镇压的“非常手段”。邓在“六·四”下令开枪杀人，并非一时“过激反应”，而是其独裁本性必然。

于是，“十年改革，一夜屠城”这两句话、八个字，成为邓功、过、罪“三分”的经典概括。一九八零年，邓在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如果说邓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全身而退或者死去，他确实可以“对半开”。但是，邓在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血案之后，他就很难“对半开”和“问心无愧”了。如果说邓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有不得不实施毛的命令的一面，那么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则应由邓本人来承担最高责任。

“六·四”事件给中国造成了以下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军队成为镇压民主运动的工具，数以千计的无辜学生和市民遭到杀害；第二，已经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完全停滞，而且还走了回头路，党政系统内的开明派全部出局，此后中国出现了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第三，中国民众的信心、热情和爱国心在一夜之间全然崩溃，从此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丧失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和权力视为最高目标的丑恶社会。这个社会对农民权利的剥夺和歧视，早已超过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印度的种姓制度，这个国度堪称全球最大的集中营。一个民族的心灵整体性地堕落了。心灵的堕落乃是一个社会堕落的最后一步，而堕落的心灵要想重新获得拯救则难于上青天。

邓无法对这样的三种结果“问心无愧”。

邓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为《邓小平文集》写序言时宣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真的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

丁子霖女士的儿子蒋捷连以及若干“天安门母亲”的儿子们，是否也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呢？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漫长的十五年过去了，这些哀痛的父母依然不能公开悼念被杀害的子女。无论邓在世还是在他去世之后，北京政权都是一个“杀死了儿子却不许母亲哭泣”的冷酷政权。于是，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追问：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会命令军队杀害别的朝气蓬勃的“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些在广场上以绝食的方式来要求民主的大学生——吗？包括使用日内瓦国际公约中禁止在战争使用的“开花弹”以及庞大的坦克？

邓小平的女儿们开始大肆讲述“作为普通人”的邓小平的生活琐事。邓的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退休以后，父亲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上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她的另一个女儿在电视采访中说：“父亲说过，普通老百姓可以追求民主自由，但他却最没有民主自由，他被身边的人看管着，连抽根烟的自由也没有。”

我相信这些细节的真实性。许多独裁者在家庭中确实是温柔的丈夫、慈祥的父亲，但这丝毫不会阻碍他们对民众的蔑视和杀戮。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各集中营里先后囚禁过一千八百万人，杀害了一千一百万人。“集中营里的恶魔”希姆莱却是一个出名的“惧内”的人物。希姆莱在家中充当“受气包”的角色，一切都服从夫人的调遣，对夫人的斥责常常是忍气吞声，在家中没有任何尊严与地位。而统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赫斯，从一九四零年起便同他的四个孩子一起生活在集中营内的官邸中。赫斯后来在法庭上说：“我的家庭在奥斯维辛过得很好。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我夫人也有身处天堂之感。”但就在他们周围，每天都有大批的犹太人被打死、杀死、烧死或毒死。一九四四年夏天，赫斯被调离奥斯维辛，赫斯夫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随行的四个火车皮里装满了他们掠夺的财物。

杀害一个人也是不能容忍的罪恶，杀人不能被轻飘飘地看作是政治活动中“必要的恶”。正是在此意义上，双手沾满鲜血的邓小平根本不配自我定义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新京报》发表了署名“长平”的社论《纪念，以中国的未来》，文章指出：“他改变了人类历史，他撬动了地球。他想要中国人碗里有饭吃，结果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饭碗。他号召十亿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结果改变了历史长河的流向。他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还没到估量的时候，也许永远也无法估量。”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为无耻的文字之一。农民的饭碗是自己的，农民的粮食是自己劳动获得的。邓所做的仅仅是少掠夺他们一点口粮而已，怎么能说是“他想要中国人碗里有饭吃”呢？“影响到全世界的饭碗”更是一种流氓式的“灾民伦理”——难道中国自我的期许是“成为世界的麻烦和灾难”吗、难道中国人自己吃不饱饭就有权力去抢夺别人的饭碗吗？

邓给中国留下的复杂的政治遗产。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如果不能完成对邓遗产的超越，中国则不会发实现民主、自由与法治；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如果不能改变暴力崇拜和“以枪治国”的思路，则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儿子”。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在母亲节前夕，我收到了杨子立的妻子路坤给我发来的一封伊妹儿，后面附了杨子立十年以前写的短文《母亲》。路坤在信中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苦难的体会（承受），越来越理解子立的所作所为。我对子立理解的不深，现在常常在主面前忏悔，因为我感情粗糙没有给子立一段美好的恋情也没有温馨的家。我最大的痛苦不是他不在身边，而是做为他的妻子不知如何安慰他，如何帮助他。”

杨子立的母亲是一名精神病人，也就是中国社会上通常带有贬义的说法“疯子”。当年，这名劳苦担重担的农村妇女，因为丢失了一把铁锹，怕家人责备，晚上跑到坟头去哭泣，被“妖精附了体”，从此便疯疯癫癫的了。家人曾经请来术士来“赶鬼”，却毫无疗效。杨子立写道：“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能吻着娘的脸说，‘娘，我爱你！’而娘能听懂儿子在说什么。”

杨子立母亲的苦难，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悲剧。像杨子立母亲这样的劳苦担重担的乡村妇女，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比比皆是。她们不是“被妖精附了体”，而是被无边的苦难逼向了崩溃。她们是被这个社会遗忘、凌辱和蔑视的一群最没有权利的人。杨子立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为母亲的悲剧怨恨过父亲，奶奶，族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比娘更关心过我。他们都是纯朴、勤劳但无奈的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为什么爸爸、娘几乎一天不歇地把辛劳的汗水洒在有着繁重的农活和做不完的家务的土地上，而又节俭到把吃一顿油条当做改善生活，却至今仍被牢牢地锁在贫穷和愚昧的枷锁里呢？”杨子立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中共方面正在为邀请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参加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而进行若干幕后交易。中共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全然的“解放”。然而，杨子立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当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有哪位代表知道在距会场四百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农村妇女的故事呢？”

十年以后，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年和八年的重刑。在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这四名出生底层的青年依然坚持“五四”时代文化思想启蒙的理想，致力于探索中国变革和进步的真理。他们或者深入建筑工地给民工讲授语文和法律知识，或者主办个人网页宣传民主和宪政的理论，或者邀请自由派学者到大学发表演讲，或者骑自行车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虽然生活在贫寒之中，他们却以青年人特有的纯真和朝气感动了身边无数的朋友。

然而，仅仅因为组织了一个仅有八名成员的学术沙龙“新青年学会”，他们就被北京市安全局秘密绑架，然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的严重罪行起诉并审判。我不禁想起八十多年以前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和组织“觉悟社”的周恩来。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会而受到政府的逮捕和审判，他们的学会吸引了许多青年的参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一代青年却连这一丁点权利也被剥夺了。组织一个只有几名成员、一起讨论文化启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学会”，居然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我不得不追问：新政权难道真的比旧政权还要脆弱和心虚吗？要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转世，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继续组织“新民学会”和“觉悟社”，他们的下场会比“新青年学会”的诸君好吗？

我含泪读完杨子立写母亲的文章，这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他为什么要放弃高薪的职业、留学的机会，而走向一条苦难的不归路。他要为自己的母亲，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争取真正的做人的权利。因为这样的权利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不能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代表”。杨子立意识到，如果他老老实实在地做一个优秀的电脑工程师，确实可以挣到一笔钱，改善家庭的

状况，医治母亲的病痛，却无法改变更多的母亲的悲剧。他发现，建设一套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以及充满爱、同情和怜悯的道德伦理体系，才是让千千万万母亲过上健康、富足和幸福的生活的前提。于是，他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成了这个号称“保障人权”的国家内的又一名“良心犯”。

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杨子立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眼前和耳边，他和朋友们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我不是他们的亲人，没有去监狱探望的权利。我却从刚刚去探监的他们的亲人那里得知，他们在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并没有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然而，我深信，他们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却必将让自由更快地降临在中国这片浸透血泪的大地。那些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诸于四个青年身上的官僚和特务们，比当年将“莫许有”的罪名加诸于岳飞身上的宋高宗和秦桧还要可耻。自由主义的先驱者殷海光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按照某些专制统治者的逻辑，愚昧的民众就应当“莫谈国事”，“国事”是由“肉食者”垄断的。如果平民百姓谈论了“国事”，那么你就是在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恶活动。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描述的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台湾的事情，再次发生在今天的大陆。

杨子立为了母亲们的幸福而坐牢，那么我们都应当把杨子立的母亲当作我们自己的母亲。《圣经》中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

愿杨子立的母亲们都能得到安息。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华盛顿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晚，著名学者刘军宁在中国政法大学遭遇了一次奇怪的经历。这次经历对“政法大学”这个名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对刘军宁本来安排的学术讲座的题目“宪政中国”更是一次莫大的讽刺。

三月二十六日，政法大学学生社团“争鸣社”策划邀请刘军宁来学校作题为“宪政中国”的学术讲座。社团负责人将这一活动向学校团委汇报，得到了团委的支持。法大的学生社团活动比较有特色，采取各社团竞标的方式，结果争鸣社以十二票对六票击败了竞争的社团，获得了此活动的举办权，并得到校方拨给的六百元人民币的活动经费。从三月二十七日起，争鸣社的许多同学便着手操办讲座事宜，落实教室、张贴海报等，均有条不紊地展开。

二十八日晚六点三十分，刘军宁来到学校，几名同学陪同他到学生餐厅就餐。七点二十分，就餐完毕之后，学生陪同刘军宁走向讲座地点第一阶梯教室。与此同时，在教室负责接待的同学突然发现，学校的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带着数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不明身份者，来到教学楼大门前。七点三十分，也就是讲座预定开始的时候，刘军宁等人即将走进教学楼，突然之间，整座教学楼全部断电，在教学楼中的数千学生均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断电之后，校方人员开始封锁教学楼，只准出不准进。在现场“维持秩序”的人员，既有身穿制服的校警，也有学生会的党员干部。见到这种情况，争鸣社的同学只好将刘军宁护送出学校。其中有一个同学混入第一阶梯教室，发现还有许多同学不愿离去，他们看到有人走进来，还以为是主讲者刘军宁，便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争鸣社的几名同学在送走刘军宁之后，发现校门旁边停靠着两辆奥迪轿车。众所周知，奥迪轿车是某“特别部门”最喜欢使用的轿车。他们还惊奇地发现，在短短十多分钟时间里，他们在各宿舍楼张贴的关于讲座的海报全部被撕得干干净净，而其他活动的海报却完好无损。之后，这几名同学发现他们受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物的跟踪。他们便回到了学生宿舍。不久，社团负责人受到学校团委的召见，团委的有关官员严厉警告说：“今天的事情不仅惊动了校长，还惊动了教育部和安全部，他们都派人来了，甚至还准备了防暴警察，你要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你们不准再谈论此事！”直到第二天上午，争鸣社的一名同学在校园里行走的时候，还受到两名校警长时间的跟踪。

据政法大学的同学表示，像这种突然断电的情况，他们在学校学习数年间只遇到过一次。因此，据我分析，这次断电显然不是“偶然”的事故，而是有关方面精心的安排。采取断电的办法来阻止学术讲座的正常举行，也亏得某些人士想得到如此下流和卑鄙的手段来。本来，刘军宁这次讲座的题目并非敏感话题，因为在中共十六大之后，关于“宪政”的讨论逐渐浮出水面，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到民间社会，都在谈论中国的“宪政问题”。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学学者之一的刘军宁，来到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法学院之一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一次关于宪政问题的讲座，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校方事先也批准了这次活动，从程序上来说，这次活动完全是合法的。有关方面难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阻止讲座的举行，居然采取这种下作的手段，甚至拿“防暴警察”来威胁学者和学生，充分说明今天中国的大学早已经不是一块“精神的圣地”。中国的大学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呢？“有关部门”已经把答案告诉了我们。没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大学，还能算是真正的大学吗？处处是特务和警察的大学，只能是“特务大学”和“警察大学”。

“六·四”大屠杀之后，大学成为中共控制的重中之重。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学都沦为“警察大学”、“党化大学”和“奴隶大学”。官方通过地毯式的舆论宣传和若干御用学者的配合，在大学中拼命灌输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等邪恶思想，企图将新一代青年制

造成麻木、冷酷、自私的奴才和奴隶。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官方一方面打着关心教育的旗号，通过投入资金、改善待遇来安抚和招安大部分的大学老师；另一方面则用种种手段来打压、迫害那些坚持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学者和教授，阻挠他们接近并影响青年学生。秦晖、钱理群、肖雪慧、摩罗等诸多坚守学术良知的大学老师，都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待遇：要么被冻结职称评定，要么不准公开上课，甚至停发全部的工资。同时，某些御用学者却飞黄腾达、五子登科，如厉以宁、朱苏力、刘伟、林毅夫等人，俨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成功人士”。他们“辉煌”的人生轨迹，对那些刚刚考上大学的青年学生来说，具有莫大的“榜样”的意义。至于基本的学术品格和做人的良知，在许多青年学生眼中都成为了一些虚幻的、过时的观念。近十多年来，官方在大学校园中实施的“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学已经成为官方的“囊中之物”。

刘军宁的遭遇，最近几年来我本人也不断地遭遇到。两年前，我应邀到贵州的几所大学作学术讲演，本来贵州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学校已经安排妥当，但就在我到达的贵阳的第二天，省委宣传部就专门下文，命令取消所有活动，不准我进入贵阳的所有大学。去年我受邀到南京四所最著名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但我刚刚讲完一半，江苏省教育厅和宣传部便迅速下令取消后面两个大学的讲座。最近半年来，这类事件又连续发生了四次：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林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学校的讲座，先后莫名其妙地被取消。对方要么是说上面命令在“两会”期间不准安排活动，要么说临近考试学生太忙。中国人民大学采取了与中国政法大学相似的、却更加高明的手法：他们没有将整座教学楼断电，而仅仅是将这一间教室断电——无比“巧合”的是，恰好是安排我的讲座的那间教室的电路坏了，有关方面还特意派电工来装模作样地修理一番，然后告诉同学们说暂时修不好。而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则告诉我说，是学校“保卫处”通知他们取消讲座的。我感到好笑的是，一次学术讲座跟“保卫处”怎么扯得上关系呢？我不过是一名赤手空拳的文人而已，我不需要“保卫”，而我也形不成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伤害”。我和刘军宁先生都属于“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本不该受到“那双看不见的手”如此高度的关注。

最近我在读台湾启蒙思想先驱殷海光先生的文字，殷海光当年在台湾大学的遭遇让我深有感触。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教育》一文，痛斥国民党破坏教育、毒害学生的卑劣行径，他指出：“这几年来，在背后控制台湾教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党化教育’；二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如果把殷海光所说的“今日台湾的教育”改为“今日大陆之教育”，不仅惊人的相似，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不是解放人的教育，而是奴役人的教育；不是让人成为人的教育，而是让人成为工具和野兽的教育。今天中国大陆大学的沦陷，不是沦陷于异族，而是沦陷于本国的统治者。某些人按照管理军队、管理警察的思路和方式来管理大学，将大学逼进了一个“死门”。少数人为了保持自己并没有合法性的权力，不惜让斩断民族文化命脉、摧抑大学精神。

在我看来，对大学的戕害，是专制统治者对文明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大学的沦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衰败的开端和标志。殷海光当年感叹台湾教育倒退了五十年，我们今天离殷海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过去了将近五十年，我们是在倒退的基础上的再次倒退，这是何等的可怕和可忧啊！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日

莫把大学当监狱

几个月前，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某文学社团邀请我前去讲学，我给出了两次学术演讲的题目《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精神缺失》、《鲁迅与当代文学》。该文学社团向学院汇报了这个活动，学院领导也表示同意。就在我即将成行的时候，该社团负责人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学术活动不得不取消，学校保卫处来了几个人了解情况，并命令我们不要搞这样的活动。”

这位单纯的学生没有完全想到，邀请一个学者去讲关于文学的话题，居然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他万分委屈地告诉我，他不明白这个活动与保卫处究竟有什么关系。而我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我已经多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由大学保卫处出面取消我的学术演讲。

“保卫处”在今天大学的行政序列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我登陆上海复旦大学的网站，发现了关于保卫处的相关介绍：“保卫部（处）是校党委、校长领导下负责维护学校的政治稳定、治安安定、内部安全并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提供安全服务的职能部门。保卫部（处）内设八个部门：综合办公室、内保办公室、治安办公室、消防交通管理办公室、户政办公室、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挂靠）、校保密办公室（挂靠）、校安全管理办公室（挂靠）。”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行政机构，它的存在也是目前大学行政和后勤机关过于膨胀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些部门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呢？比如，其中比较重要的“内保办公室”承担如下职责：“负责做好学校内部的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做好情况信息工作、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协助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出国（境）人员的管理工作；做好要害部位和重大外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协助上级专门机关开展专项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校园文化管理及网络安全管理工作。”

中国大陆各大学保卫处的地位和功能，大致与复旦大学相似。在这些由保卫处承担的职责中，我并没有发现授权他们对学术活动进行控制和干涉的条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许多“持自我政见”的学者都有过与我类似的遭遇：保卫处往往直接干涉学者的学术活动，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章鱼，无所不至地伸展着它的触角。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我的出现难道对大学“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具有如此巨大的威胁吗？保卫处诸君，为什么对我到大学如此紧张和不安呢？他们对我的提防甚于对萨斯病毒的提防。我不过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我到大学去演讲，大部分时候不收取讲课费，几乎是义务的性质，因为我愿意与青年朋友们一起聊天。我无非是告诉年轻朋友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比如：怎样进行独立思考、如何学会爱和慈悲、通过哪些途径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摆脱奴性的“公民”……等等“常识”而已。我不会煽动他们起来搞学生运动，也不会鼓励他们退党退团，更何况我也不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具有“一呼百应”的“卡里斯玛”魅力。我只是一个坚持说一点真话的知识分子而已，我只是一个愿意把青年大学生当作朋友的写作者而已。他们为何如此害怕我跟学生们接触呢？我真的值得保卫处如此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吗？

近年来，先后有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等数十所大学，由于保卫处以及更为神秘的部门的干涉，取消了我的演讲会与座谈会。我知道，在保卫处的背后，还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他们。我也知道，我与那位文学社团的学生在电话中的交谈并不安全，“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记录着我们的每一句话。然后，“他们”再通过特殊的渠道，让大学保卫处出面威胁大学里的师生，要学校取消我的学术活动。保卫处不过是“他们”的傀儡而已。这恰恰说明，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所谓“保卫处”其实是专制机器中一颗重要的“螺丝钉”，是党控制大学的一种工具。中共政权把大学当作

监狱来办，大学中的学生都是监狱中的囚犯，而保卫处则正是管理这些囚犯的狱卒。在一些重要大学（如北大、清华等）的保卫处，一般都驻扎着相当数量来自安全部门的特务，他们专门负责搜集高校情报，及时向上级汇报。中共领导层从“六·四”事件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大学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一定要把一切“星星之火”都消灭在摇篮之中。于是，九十年代的大学中，一边是填鸭式的愚民教育，一边是保卫处的监控和压力，使得师生们“艰于呼吸视听”。正是在保卫处以及其他若干机构的控制下，今天的中国大学有如一潭死水。

写到这里，我想起我北大校友江绪林。在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这位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在北大校园内贴出了题为《爱之和解——燃起第十一根蜡烛》的呼吁：“我们期待着和解，为了从惧怕和怨恨中走出来，为了恢复普遍的信任，为了赋予社会伦理以坚实基础，我们伸出诚意的手来承担责任，来抚慰民族的创伤，来表白自己的过失，并从阴影中走出来，面向着艰难的未来，以宽容和爱构筑和完善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迈出第一步。我承诺，除非遭遇绝对不可抗力，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八点来到三角地，在夜晚来临的时候，燃起第十一根蜡烛！”然而，当江绪林手持点燃的蜡烛来到三角地时，北大保卫处的便衣们立即将其带走。作为基督徒的江绪林，以他的行动为“后天安门时代”的北大挽回了声誉，正如学者傅国涌所论：“江绪林在北大的作为对新一代青年乃至全体同胞都具有行动启示意义。”但是，前来抓捕他的不是别的部门，恰恰是大学的“保卫处”——他们究竟在“保卫”什么呢？江绪林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的行为是和平而理性的。

大学保卫处行使的是监视师生、“防民之口”的功能，因此他们对那些保护师生生命的事务并不上心。他们“保卫”的仅仅是“红色江山不变色”，他们会对某位学者的讲话记录和分析，会对学生的“思想动向”高度重视，却对高校治安恶化的现象熟视无睹。据全国高校保卫学会对十三个省区七十六所高校的调查显示，近两年间高校发生各类案件九千两百七十八起，非正常死亡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北京、南京、武汉、重庆七所院校被歹徒杀害的教授和学生有十六人。调查报告显示，梁上君子更喜欢在学生宿舍作案，因为这里出入自由、防卫不严。窃贼一般选择学生上课或上自习的时间作案，此段时间宿舍空空如也。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查获了一起宿舍盗窃案，案犯戚经健频繁进入上海某师范大学等高校踩点作案，经他顺手牵羊的赃物有手提电脑四部，各种型号的小型计算机、随身听、CD机、充电器应有尽有，初步估计盗窃价值达八万元。首都某高校一学生向调查者抱怨，宿舍管理员疏于管理，根本没有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少数女生甚至成为流氓犯罪的牺牲品。全国高校保卫学会秘书长吴心正指出，目前大学师生被歹徒伤害杀害、盗窃案件频繁、不法分子入侵校园等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主管机关责任不明，学校无执法权，采用高科技防范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他认为建立一个界定清晰、责权明确的校园安全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吴心正不敢揭露大学保卫处的实质，只好发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其实，大学保卫处的功能不是“保卫”而是“监视”——如果硬要说他们发挥着“保护”的功能，那么他们“保护”的不是广大师生而是中南海里的权贵们。保卫处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比那些普通的歹徒窃贼更是大学的戕害者，他们侵害了大学的独立精神，剥夺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使得大学成为唯唯诺诺、死气沉沉的“党校”。大学的品格沉沦了，大学的文化枯萎了，广大师生生活在无边的窒息感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委书记”（或级别更高的安全官员）及其直接控制的“保卫处”，才是大学真正的“不安定因素”。这个政权把精力和金钱都花费到了提防与控制大学上，在他们眼里，每一个青年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掘墓人。

以北大为例，北大不仅有编制庞大的保卫处，还在校园里专门设立了一个派出所，美其名曰“燕园派出所”。这在中华民国时代是不可思考议的，不说在“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亲自去营救被捕的北大学生；即便是在中共活动猖獗、北大学运风起云涌的三四年代，当政北大的蒋梦麟和胡适，也坚决拒绝军警进入校园抓捕学生。大学乃一个国家学术与文化

的重镇，岂能容许军警随意出入？然而，对于今天出于北大校园核心的“燕园派出所”，似乎并没有哪一个北大教授敢于提出批评意见。

大学必将以其对学术自由、文化多元和思想独立的坚守，摆脱其被“监狱化”的悲惨命运。我的信念是：自由是无法被消灭的，只要人类还存在——所以，中共及其爪牙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缘木求鱼罢了。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也就是大学彻底摆脱“监狱状态”，恢复“精神自治”和“行政自治”的那一天。那一天，曾经为中国现代大学打下伟大的人文传统的蔡元培、胡适、张伯苓等教育家们将在九泉之下深感安慰。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UnRegistered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八十五岁的赵紫阳因病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是千篇一律的简短报道：“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许多报纸都把新华社的这则“通稿”放在最不显眼的边角处。此七十字的消息，就赵紫阳八十五岁的年龄而言，平均一年不足一个字。不过，有熟悉中共政治体制的人士乐观地评估，由于消息中出现了“同志”一词，可以推测中共高层在赵紫阳后事的处理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弹性”。然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仍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政权而言，在近十六年前，曾经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早就已经不是你们的“同志”了。

正如赵紫阳女儿的说法，这位被幽居近十六年的老人“终于自由了”——赵紫阳在死亡中获得永恒的自由，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天，赵紫阳就作出了坚定的选择：站在和平一边，而不站在暴力一边；站在民主一边，而不站在专制一边；站在公民一边，而不站在“党”一边；站在失败者一边，而不站在胜利者一边。按照中共的权力逻辑，这似乎不是“明智”的选择。以青年时代便入党、从军的漫长的“革命经历”，赵紫阳当然也深知这个选择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即便自己身为党的总书记，也会被冠以“分裂党”的罪行，成为被“党内同志”所不齿的“叛徒”。

“以失败者的名义获得光荣”，在近十六年寂寞的晚年里，赵紫阳失去了身体的自由，却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他失去了权力，却赢得了历史。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在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开始了有限的而迅速的经济自由化政策。邓小平曾试图劝说赵紫阳在承认“六·四”的“错误”的前提下复出，发挥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优长。但是，邓的这一“好意”被赵断然拒绝。一方面，赵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另一方面，赵也不认同邓的“跛足改革”。赵紫阳再一次选择了自我放逐生涯，令他的助手胡启立屈辱的复出黯然失色。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赵紫阳的继任者们尽可动用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源为自己涂脂抹粉，制造新时代、新形式的个人崇拜，但这样的个人崇拜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宫殿，潮水一来瞬间便崩塌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在十六年前便结束了，他的名字从所有国内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消失，即便在互联网上也成为遭受过滤的“关键词”，但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流泪的讲话依然鲜活地保存在千千万万有良心的中国人心中——那一幕与王维林只身抵挡坦克同样光荣。那一幕亦成为我少年时代不能忘怀的画面，成为比任何理论更为震撼的“精神启蒙”。从权力舞台和公众生活中消失之后，这位老人没有接受木乃伊的命运、没有停止对真理的求索。对民主、自由、公民权利这样一些基本的命题，他逐渐有了比当权时更为深切的理解。他建议中共当局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也赞同“天安门母亲”关于公民权利的宣言。可以说，晚年的赵紫阳已经完全挣脱了党文化的束缚，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

由于若干的“中国特色”，也由于个人在权力与思想上的局限，赵紫阳没能像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一样改变中国。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元老一代大都去见马克思去了，所剩无几的“历史化石”也大都丧失了对政局的影响力；而赵紫阳上台的时候，“八老监国”的态势使他难以放手一搏。戈氏上台之初便提出了“公开化”、“新思维”等一系列成熟的社会政治变革的方案；而赵紫阳及其所依赖的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直至“六·四”前夕对究竟如何改革都没有通盘的考虑。在此意义上，赵紫阳的失败不是一个人的失败，乃是中共党内健康力量和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失败。至此，由中共自身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匆匆划上了一个

休止符，改革的动力由党内转向民间、由精英转向草根。

如果把赵紫阳的失败放置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看，亦是近代以来中国悲情命运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乐章。二零零五年赵紫阳在失去自由、被隔离、被丑化的处境中告别人世，与一八九八年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一九四二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及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突然去世一样，均具有丰富的历史象征意义。历史给了中国人以选择的自由，历史也给了中国人自己的“摩西”，但在几次“非此即彼”的重大关口上，中国人都选择了那种“最坏的选择”，放逐或者杀害了有希望带领自己“出埃及”的“摩西”。和平改良、民主宪政、议会政治等光明的前景，均与中国的未来擦肩而过，“枪杆子”成为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惟一的“主角”。

在中共历史上，赵紫阳的悲情命运超过了胡耀邦、彭德怀等“忠臣”与“好人”，惟有陈独秀能够与之相比。从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变成希特勒式和斯大林式的极权制度的最尖锐批判者，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骄傲地宣称：“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晚年陈独秀并没有因为中共的勃兴而有“回延安”之想。正是长期浸淫其中，至此反戈一击，才使得他比罗隆基、储安平等“一贯的自由主义者”更深刻地洞察到了中共的本质。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恢复民主制度，“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还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度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度。”这段话简直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的预言——只需要把“斯大林”换成“毛泽东”就可以了。难怪从三十年代开始，中共就对陈独秀这个“叛徒”恨之入骨，直到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作为昔日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然属于“不可纪念”的人物之列。胡适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一文中，对这位老朋友最后的回归表达了由衷的欣喜，并将陈独秀晚年思想概括为一句话：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之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赵紫阳与陈独秀这两位由中共总书记位置上跌入“深渊”的孤独者，都不再是中共及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同志”，相反他们乃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伟大的价值观的“同志”——也是我个人值得尊敬的“同志”。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八日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呼喊：

“还要走多久？”

就这么一直走到殉教的勇士头撞列柱的地方

——师涛《一九九二年的肖像》

《一九九二年的肖像》是诗人师涛诗集《天堂的边疆》中的组诗《与妻书》里的一篇。也许在写作这本诗集的时候，年轻的师涛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悲剧性的宿命，所以他才会写下这样自问自答的句子。是的，在今天的中国，要选择做一个真正正直的人、善良的人、热爱自由的人，确实需要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如同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师涛亦是走在荆棘上，鲜血淋漓也不回头。

我是从晓波那里得知师涛被捕的消息的。回家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师涛的弟弟发表的一篇简短的声明，抗议对师涛的非法逮捕，要求还师涛以自由。据一名长沙市安全部门的官员宣称，师涛的罪名与不久前被捕的赵岩一样，都是“泄露国家机密”。这是一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两位弱不禁风、无权无势的文人朋友，能够通过哪些渠道知道那些宝贵的“国家机密”？如果连他们这样的平头百姓也知道了“国家机密”，那只能说明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实在是太不称职了——最应该承担“泄露国家机密”罪名的应当是他们自己啊。

我不知道师涛在那地狱一样黑暗的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写到过的“没有光的地方”。时间一天天地流逝着，师涛依然没有音讯。师涛那带着孩子气的脸庞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在理性和情感上我都难以把他同监狱联系起来——他是一个需要田野的诗人，一位需要书桌的作家和一名需要报纸的记者，他能够忍受黑屋子中的生活吗？他会遭遇饥饿与酷刑吗？

我与师涛相识大约有五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一年的西安。我应一家民营书店的邀请，到西安签名售书并赴几家大学演讲。那时，“有关部门”还没有足够“关注”我，我也还有外出讲学的自由。在书店举办的一个小小的座谈会上，师涛一连提了几个尖锐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会后，他向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他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分配到航天部西安庆安宇航设备公司子弟校当老师。他比我大五岁，正是受过天安门学生运动洗礼的一代人。我虽然晚到了五年，却与他有着共同的青春深刻的创痛。我们的生命都因为那场残酷的屠杀而彻底改变了。

当上老师之后，师涛本来想在青年学生中从事基础性的启蒙工作，但他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作为一名政治课的教员，他必须按照课本堂而皇之地向学生灌输谎言。由于对学校里压抑的氛围忍无可忍，由于无法在课堂上讲授自己认定的真理，他从学校里辞职出来，在《华商报》担任记者。《华商报》是西北地区以保守闻名的新闻界中的一个奇迹：这份由私人资本参与运作的报纸，在九十年代末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由一份行业小报脱胎换骨成为地区大报。《华商报》向来以大胆著称，也屡屡遭到中宣部的打压，被业内人士誉为“西北地区的《南方周末》”。那天，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八九民运和中国未来的新闻自由。酒逢知己千杯少，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那么奇妙：有的人经常见面，却始终心灵隔膜；有的人初次见面，就如同老友一般心灵相通。

这以后，我们之间经常通电话和信件。两三年后，师涛到太原《生活晨报》担任常务副总编，我为他在新闻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更让我关注的是，师涛在海外网站上一篇接一篇发表的政论文字。这些文字大都是短小精悍的千字文，针对大陆社会的若干怪现状有感而发。由于在新闻界工作，师涛消息灵通、熟悉民情，所以文章如同投枪和匕首，针针见血，招招封喉。我们互相在互联网上交换新作，每每见到对方的新作，还时时打电话鼓励。此时，在互联网上的签名活动逐渐兴起，我起草或者参与的几次签名活动，都曾询问师涛是否愿意参与。这些签名，在中国大陆当下的舆论环境下无一不是“敏感事件”。许多在体制内有身份和地位的朋友一般都婉言拒绝，甚至一些我曾颇为尊敬的老师闻讯也都躲得远远的。师涛却从来都是一口应允下来，他在电话里总是毫不迟疑地说：“把我的名字签在你的后面！”

一年前，师涛来北京出差，我们共同的朋友、小说家老村约我们一起聚会。此时的师涛依然还是白净的脸庞，淡淡的微笑，他的模样不像是北方汉子，倒像是南方的秀才。我很担心他在报社会不会受到压力，他却毫不在乎地说：“我的业务很出色，报社的领导也很开明，再说报社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发表了什么文章。迄今为止，‘有关方面’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他还对我说：“今后凡是你起草的公开信、宣言之类的文字，需要签名的话，如果时间来不及，不必把文本给我看，就直接帮我签名字吧，我绝对信任你。”我的朋友中还没有哪个人有他这样的豪爽。看来，在报社当上了常务副总编，并没有使师涛胆小怕事或者受了招安。此后，我在好几份文件（如呼吁释放蒋彦永医生、呼吁为“六·四”正名、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等）上都替师涛签上了名。师涛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有他的签名的文本后，多次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其实，谁也不必感谢谁，因为我们所献身的是共同的事业。

师涛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存同这些鸟儿们没有什么两样：没有安全感，失去言论与呐喊的自由。作为人的高贵的思想被可怕的意识形态牢牢禁锢着。我也知道放弃就等于毁灭，揭穿就等于毁灭，我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艰难地存活，呼吸着污染的空气，说着虚伪的话，像个传染病人穿梭在人群中——尽管我已拥有了比别人更大的勇气，但我深深地为自己、为众人的生活方式而悲哀！”师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奴隶的幸福，他却选择了承担自由人的苦楚。这段悲凉的文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我们这类人共同的感受：我们都是那笼子里的鸟儿，我们都是广场屠杀之后的苟活者，我们又都是生活在一个患了失忆症的民族中的记忆者。师涛多次告诉我，他最好的文章都没有办法在国内的媒体包括自己担任常务副总编的报纸上发表，这让他感到无比地沮丧。他们的报社时不时接到宣传部的电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师涛说，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说一点真话、发表一点好文章。这种“无能为力感”经常折磨着他。是的，我们不是天生的勇士，不是无畏的英雄。许多时候，我们那么地软弱，那么地孤独。于是，我们开始了写作和言说。我们的写作和言说，并不是想要表明我们有多么聪明、多么骄傲。相反，我们的写作只不过是减轻我们的耻辱感，我们的言说只不过是捍卫我们的尊严感。师涛是一位温和的书生，他的内心深处充满着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的爱，他非但不是所谓的“不稳定因素”，相反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稳定的“磐石”。

那天，是我与师涛被捕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临别的时候，他送给我一盒山西的老陈醋。他笑呵呵地说，这是一种新型的“饮料醋”，很多山西人在夏天炎热的时候就直接喝上一瓶，它在当地比可乐还要受欢迎。他在山西呆了几年，也喜欢上了这种“饮料”。我回家后喝了一口，却差点把牙都酸掉了。于是，我只是在做菜的时候，稍稍加一点而已。每当用到这种山西老醋的时候，我便想起了师涛这位虽然不常见面却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又一位好朋友为了争取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师涛失去了自由，但他比千千万万的御用文人更自由——他拥有的是心灵的自由。他是一位失去自由的自由人。长沙的特务不远千里去抓捕师涛，不知道是否因为他的文章触犯了哪个湖南高官，否则懒惰的官员们也大可不必

劳神费事、跨省办案了。一个公民突然之间消失了，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行？他还会被关押多久？一切却依然还是“秘密”——这就是发生在一个开口“人权”、闭口“人权”的国家里的实实在在的事件。我不知道我精神上的兄长师涛被关押在哪里，甚至也无法给他送去一瓶他喜欢喝的山西老醋。充满愧疚的我只好写下这篇短短的文章，也写下“还师涛以自由”的呼声。最后，还是以师涛的诗句结束这篇文章，但愿诗人的预言成为现实：

大地的变迁和死亡的时间
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相关？
我只是愤怒地活着
把握、和解，那临终时刻的最终来临！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

——关于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

(余杰草拟)

北大的“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了。

据我们所知，“一塌糊涂”是一个以讨论文化教育问题为主的网站，它为北大师生和海内外诸多关心中国问题的思想者提供了一处多元的、自由的、宽容的言论平台。它是北大精神在网络时代的新的表现方式，它是许多怀着梦想的青年人的灵魂家园，同时它的存在也是中国社会缓慢进步的缩影。这个诞生不到五年的小小网站，聚集了北大内外数十万网友。然而，一夜之间，它却被强迫关闭了，主持网站的几名青年学生还受到了骚扰和恐吓。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关方面”为什么要关闭这样一个与“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毫无联系的网站呢？

“一塌糊涂”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网络世界消失了，同时也在现实世界消失了。虽然我们不是热心的网民，但一个网站的死亡依然像一个朋友的死亡一样，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哀伤。尤其是某种非“正常死亡”，我们又怎么能够假装不知道呢？当然，我们不会对中共政权的这一粗暴举动而感到震惊——对于一个曾经悍然动用坦克和机枪在首都杀害无辜民众的政权来说，关闭一个网站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事”。一通电话就可以终结一个网站的生命，这确实是“举手之劳”。在此之前，“思想的境界”、“不寐论坛”等成千上万的民间网站就曾经多次被关闭。迄今为止，中国的普通网民仍然不能自由地进入海外网站获取信息——只是在西方某国家元首访华时，个别西方媒体的网站才会被象征性地开放几天。即便这样一种“人权秀”，统治者还企图让我们跪下来“谢主龙恩”。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无可奈何地相信，在“被屠杀”的中国民间网站的“花名册”上，“一塌糊涂”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感到了无边的耻辱。我们被一个不是自己选举的政权所统治，我们缴纳的税款却成为统治者实施愚民政策的资本。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生存就是奴隶的生存。那么，在北大这个曾经发出过“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的地方，是否耻辱感就会轻一些呢？恰恰相反，此次“一塌糊涂”事件凸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北大与中南海一样厚颜无耻。在“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之后的一个月里，除了贺卫方教授和几位博士的公开信之外，北大师生对此事件的回应却是死寂般的沉默。数十名院士、三千名位教师、三万名学生以及数十万校友，统统闭上了他们高贵的嘴——其中的某些嘴巴在电视上在谈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词汇的时候，却是那样的滔滔不绝。

诚如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先生所说，北大已经从自由的摇篮沦为自由的坟墓。此时此刻，我们想起了“五四”时代的北大，想起了那如火如荼的青春，想起了蔡元培校长为从狱中归来的学生们亲手削的那个大鸭梨。那才是北大的光荣，那才是北大的骄傲。作为两名普通的北大毕业生，我们为母校的沉沦感到锥心的刺痛。“五四”精神和蔡元培传统在北大早已断裂了。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北大人，我们毫无身份等级和智力上的骄傲，我们内心所充满的仅仅是苟活者的耻辱——这种巨大的耻辱感，在“六·四”屠杀之后的十五年中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地伴随着我们。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十五年间，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北大没有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没有成为人文品格坚守者，也没有成为社会公义的中流砥柱。相反，北大以若干可耻的行径，加速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跌破人类底线：为了迎合当权者，北大率先开设了“邓小平理论”的政

治课程；由于人文教育的缺陷，北大毕业的留学生多次在海外行凶杀人；经过连续四年的军训洗脑，北大出现了一批以党棍为荣的“职业学生”群体；在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公然为“六·四”屠杀辩护；北大向高级官僚和富豪们奉送博士文凭和教授头衔，并向体育影视明星打开大门；“御用教授”朱苏力、潘维、林毅夫、张维迎、刘伟等占据北大讲台，持续对一届又一届北大新生施加恶劣的影响力……

我们没有颜面再说下去了，辉煌的北大已经变成丑闻的北大，自由的北大已经变成专制的北大。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北大选择的是后者。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在哀哭的时候，北大的师生在哪里？北大硕士杨子立被陷入冤狱的时候，北大的师生在哪里？蒋彦永医生挺身而出说出萨斯和“六·四”真相的时候，北大的师生在哪里？上访农民被杀害，矿工被瓦斯毒死，报刊书籍被查禁……当邪恶肆无忌惮地泛滥的时候，北大的师生又在哪里？北大占有着中国大学最为丰裕的资源，北大分享了来自广大纳税人的大笔教育经费。然而，北大既没有创造出一流的学术和思想来，也没有为捍卫苦难民众的基本权利出一点力。北大一步步地退却，心安理得地退回了象牙塔。今天，北大却连象牙塔也无法保全了：所谓“一塌（塔）糊（湖）涂（图）”，就是北大的一个塔（博雅塔）、一个湖（未名湖）和一个图书馆。然而，“一塌糊涂”的被谋杀，意味着学术尊严又一次被明目张胆地凌辱，意味着言论自由又一次被堂而皇之地践踏。如果这一次我们继续保持沉默，那么我们大概就只能无动于衷地接受“北大之死”的结局了。

在此，我们对“有关方面”非法关闭“一塌糊涂”网站的丑恶行为提出严正的抗议。我们认为，任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禁止信息的自由流通的想法和做法，都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每一个下命令的“官”和每一个执行命令的“吏”，都无法逃避历史严峻的审判。

在此，我们也向所有的北大老师和北大校友提出急切的呼吁，希望大家站出来为一个被关闭的网站、为一个被谋杀的“朋友”说点什么、做点什么，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一味地退让，我们最后就会完全被恐惧所控制，连耻辱感也丧失殆尽；相反，如果我们敢于打破沉默，我们就有可能赢得光明，过上一种崭新的、堂堂正正的、配得上“人”的生活。

与一切有良知的北大人和中国公民共勉。

余杰、余世存

——二零零四年十月九日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一九五零年，苏联势力在欧洲大肆扩张，在亚洲中共也战胜了国民党，与之形成结盟之势。邱吉尔“铁幕”之说成为事实，全球范围内冷战格局开始形成。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高涨，自由世界呈守势。在此阴影重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面对许多人的质疑，胡适在刚刚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文章指出：“我们可以宣告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胡适告诉中国同胞说：“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社会。”

五十五年过去了，胡适的乐观评估大部分都实现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全然崩溃；在亚洲，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先后实现了民主化，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更是成功地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成为全球“硕果仅存”的一个实施非民主制度的大国。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仅将使得十三亿人口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将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向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此历史的转折关头，胡适的这段话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众具有历久弥新的、深刻的启示意义。那么，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然丧失，共产党本身已经蜕变为“资本党”和“腐败党”。中共官方无法提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来整合民心民意。由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中共的“三个代表”学说成为水月镜花：在此社会背景下，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代表”所有民众的利益，因为不同阶层的利益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实际上，在堂而皇之的“三个代表”学说的背后，中共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对大多数民众，以教育和宣传体系来实施“愚民政策”，实现“全民催眠”；对公务员、商人和正在形成中的城市中产阶级，以经济利益收买之；对那些连“生存权”也朝不保夕的失业工人和农民，以“警察国家”的恐怖面目来恐吓之；对少数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则以招安与打压双管齐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政权仅仅是消极地充当“消防队”的作用，哪里发生事故便到哪里去灭火，已然丧失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创造力。面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启蒙努力，官方的文宣机构甚至无法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因为官方一旦批判某人，其民间声望立即直线上升，批判反而造就了经济学上的某种“广告效应”。用二零零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特色堪称“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凯尔泰斯·伊姆莱在《船夫日记》中写道：“极权主义未能达到彻底的极权。意识形态缓慢地耗竭。‘体制’不与国家的发展相一致；后者更具影响力，总而言之——就像某种经历了冰川时代、洪水时代而幸存下来的病毒——能够（乍看起来）消失于大众生活的表层，而退缩到行政制度之中。一个自由化的、潜伏着的、已然能够忍受一切了的多元极权主义——这才有着真正的危险，而且没有任何可以将其剪除的灵丹妙药。”这种“病毒”在崩溃前的苏联东欧国家只是刚刚萌芽，而在今天的中国却更加明显。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现了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原始资本主义”与“斯大林政治”相结合，使得中共政权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得以幸存下来，并以“经济奇迹”夸耀全球——尽管在这一“经济奇迹”背后隐藏着严峻的危机。

从坏的方面看，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确实深深地毒化了民众的精神和心灵：民

众在媒体上看到一桩桩腐败案件的时候，固然有一种天生的对贪官的痛恨，但更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是“我怎么没有他的权力和机会，否则我也会如此贪污一回”。这种基本的善恶评断的混淆乃至泯灭，将是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危险的精神疾病。从好的方面看来，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则无法像毛式政治一样，牢牢地控制全民生活的所有反面并催生出次宗教般的热情和理想。相反，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异端”的存在：既然官方自己号称要“依法治国”、要创造“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既然中国要遵守世贸的经济规则，就不得不在某些领域作出相对的让步。

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极权主义”使得“自由中国”成为可能。城市中产阶级尽管是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群体，却在“拆迁维权”和“住宅维权”中逐渐复苏了其民主意识和人权观念。他们一般由捍卫私有财产开始，逐渐意识到新闻不自由、司法不公正及其背后的病根：政治权力的垄断。富有的商人阶层与官僚共同瓜分国有财产，到了最后阶段，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如一位拥有上亿资产的商人所说：“在利用政治的弊端做生意的时候，即使九次得利，但只要一次失利，我们也会对官僚产生怨愤心理。”当国有资产瓜分殆尽的时候，两者必然产生尖锐的冲突。而在精神信仰层面，由于官方的文宣部门无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成为笑料，低俗文化四处泛滥，因此宗教信仰的复兴已经不可遏制。在此背景下，是否会出现类似于美国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对于创办《自由中国》的胡适、雷震、殷海光等先贤来说，台湾已然成为“自由中国”。而对我来说，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可为大陆之师，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台湾模式”（尽管“台湾模式”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缺陷）。台湾的民主化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和暴力事件，新闻自由与反对党的合法化几乎同步实现，政党轮替也通过选举和平进行。军队迅速由“党军”转变为“政府军”，只负担国防事务，而不干涉内政事务。这些经验对于大陆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大致有这样一些标志性的事件：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至此多党制合法化，报禁打开。

一九八八年元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蒋经国的去世，意味着台湾蒋家王朝的终结和强人政治的结束。

一九八九年，依据新通过的“人民团体法”，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民进党取得合法地位，成为正式的对党。

一九九一年，全面改选国大代表，本土化得以展开。次年，全面改选立法委员。

一九九四年，直接选举台湾省省长、直辖市（台北、高雄）市长，同年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直接选举总统。

一九九六年，首次直接选举总统，现任正、副总统李登辉与连战代表国民党再次当选。

一九九七年，举行县、市长选举，二十三个县、市当中，民进党获得十二个县、市长席位，首次超出国民党掌握的数量，开启“地方包围中央”的政治态势。

一九九八年，第二届直辖市市长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台北市市长选举，由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击败现任市长陈水扁。立法院由国民党取得过半数席位，民进党仍然是最大反对党。

一九九九年，国民党李登辉准备交棒，“连宋配”（连战、宋楚瑜）合作不成，国民党确定推出“连萧配”（连战、萧万长）。宋楚瑜确定参选，国民党开除宋党籍。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宣布脱党参选。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第二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结束国民党五十多年的执政地位。落败的宋楚瑜组织亲民党，结合成第三股政治势力。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举行民进党执政后首次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立法院中民进党跃居第一大党，国民党地位大幅滑落，亲民党崛起，但三党皆不过半。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三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再次当选总统。

这张时间表，值得每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思。台湾模式不可能“生搬硬套”到大陆，但是台湾经验却有颇多可以吸取之处。今天的中国大陆，既没有任何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反对党，就连乡村一级选举也停滞不前，不用说跟台湾相比了，就连阿富汗也比不上：不久前，阿富汗人民实现了直接选举总统，就连占人口百分之四十、昔日被完全排斥在文明进程之外的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在羞愧之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商人需要做什么？知识分子需要做什么？宗教界人士需要做什么？普通工农大众又需要做什么？中国大陆要成为“自由中国”，既需要像蒋经国那样专制体制内的开明领袖，也需要像雷震和殷海光那样有智慧也有勇气的知识精英，更需要无数热爱民主自由的现代公民。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

——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四川成都

中卷 无边的邪恶

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的开放式征集签名信

毛泽东，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命运发挥过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数千年来，深陷于专制主义的中华民族一直多灾多难。王朝的更迭不过是流氓们的“过家家”，如此循环，亘古如斯。近代以来，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面对“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几代中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生存奋斗。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也开始了民主宪政的尝试。然而，继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训政”统治，以及由于日本全面侵略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危机。

一九四五年，中国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走向民主化的一个绝佳契机。但是，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之争压倒和平竞争与自由选举，和谈失败酿成了同胞之间骨肉相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占据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败退台湾，继续中华民国之法统。新兴的中共政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独裁统治。这个新政权本应休养生息、致力于民族和解与现代化建设，但它刚一建立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始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成为至高无上的党国领袖之后，不仅没有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实现在野时许下的民主宪政的承诺，反而以“继续革命”的旗号在党内外实施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最后发动了一场被后人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民生凋敝、百业俱废中死去，这二十七年间，他带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的学说实行恐怖政治，从建政初的“镇反”、“三反五反”到“反右”和“文革”，家破人亡者数千万。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是一个高度极权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极为不平等的“身份歧视”的国家。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中国人，却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世界、两种人。城市和市民享受着种种制度优惠，而农村和农民却受尽剥夺和歧视。在本质上，这样的身份歧视与农奴制、种姓歧视、种族歧视等野蛮制度毫无区别。农民的后代只能是农民，就是奴隶的后代只能是奴隶的现代翻版。而且，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曾经有过的各类歧视制度相比，中国的身份歧视所覆盖的地区和人口，乃举世罕见：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生活在歧视之下。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好大喜功，违反经济规律，只顾好大喜功不顾人民死活地蛮干。由于异想天开的“大跃进”运动，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据最保守的估计饿死人当在三千万以上。在他一手遮天的近三十年里，老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票证时代”，亦即“供给时代”。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愚不可及的“大炼钢铁”等运动，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全球生态问题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为满足毛个人争当共产世界头号领袖的权力野心，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并把极为有限的资源用于核武器开发。中国在外交上陷于极度孤立的状态。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宣扬“人多力量大”的反科学号召，导致人口迅猛增长。直到今天，庞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由于号召批判“封资修”思想，断绝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以及人类先进文明之间的联系，自动隔离于人类文明的主潮之外。毛泽东在意识形态

上灌输残酷的斗争哲学和革命迷信，仇恨代替爱与宽容，一手操控的“造反有理”代替理性与和平。毛泽东的话语污染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语言，使暴力化、仇恨化、痞子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言行至今犹存。人与人之间的爱、同情和信任被连根拔起，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处于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论：“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如何，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的灾难，他个人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大。几千万中国人死亡、无数家庭的毁灭，整个中国社会生机的长期折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再受阻，都是他当权的二十七年（一九四九——七六）中造成的。而主要的关键则是他夜夜不寐，‘浮想联翩’，设计出一个比一个更荒谬的‘乱天下’的方案，并通过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和所当披靡的坚强意志，贯彻到底。读史者如果面对着这样血泪凝成的人间悲剧而竟然丝毫无动于衷，那便只能说他是别具一番心肠了。”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鲜血淋漓、冤魂飘零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表面共和、实乃专政的时代。千年易逝，而毛泽东的罪孽难消。

虽然毛泽东在生前签署了同意将遗体火化的文件，虽然毛泽东号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死后继任者们却将其尸体制作成干尸，永久保存并公开陈列。此为中共政治局之决定。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描述的那样“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为了永久保存毛的遗体，居然还大兴土木建造毛的纪念堂，耗用了达到天文数字的老百姓的血汗钱。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位于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完工，毛的遗体及几罐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内脏，被转运到纪念堂内。经过适应性处理后，遗体被移入水晶棺内。从列宁、斯大林、胡志明、毛泽东到金日成，世界上迄今为止仅有过五具可供“瞻仰”的遗体，无一例外全出在共产党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吧。

毛泽东的尸体被运进纪念堂供瞻仰，至今已有二十七年之久。遗体的保存工作并未结束，只是转入了长期阶段。为此，当局专门成立“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遗体保护的具体技术已逐渐规范，科研工作也在继续进行，每年年终还要举行学术讨论会。据参加过遗体保存的全国政协常委朱培康透露，一九九九年，遗体曾经差点腐败变质，纪念堂因此暂停开放。经过全力抢救及修补，遗体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遗体的保存，实质上是专家们同细菌和氧气的长期斗争。细菌和氧气无时无刻不在，又无孔不入；而专家们只能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与其到时候发臭生蛆，不如现在就及时实施迁移。

将毛泽东的遗体迁出毛主席纪念堂，进而将纪念堂改建为巴金倡导的“文革博物馆”；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进而让天安门广场真正归还到公众手中，成为举行国事活动和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国家广场。我们认为，实施以上行动已经到了事不宜迟的地步。这样做不仅是还原历史真面目，更是化解现实中民族怨恨和社会暴力的起点。我们注意到，邓小平执政以来，开始部分抛弃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的理念，致力于经济建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在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还尝试进行政治改革；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先后倡导“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希望将中共的性质由“革命党”改变为“执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改变为“全民党”。这些举措究竟有几分真实性尚且不论，至少说明中共领导人已然意识到继续实行毛泽东的血腥政策无法实现所谓的“稳定”，更无法让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我们不鼓吹仇恨和报复，我们赞赏忏悔与宽恕。我们虽然在这里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提出了我们的一些评价，我们并不准备与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个人、组织，出现毛泽东时期那样的斗争。我们理解各种关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但我们反对奴隶社会流行的“干尸崇拜”。在对待历史伤痕的态度上，我们认同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做法：只有揭示真

相才能实现和解。在一次关于种族隔离期间屠杀事件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作了这样的总结发言：“我们为人的精神的坚毅而深深感动。本该一蹶不振的人们，拒绝屈服于巨大的痛苦、暴力和威胁；拒不放弃自由的希望，因为知道自己应得到比遭受非人的不公正和压迫更好的命运；拒绝在威逼之下俯首帖耳。人们表现出的宽宏大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愿被痛苦和仇恨所吞噬，愿意和那些曾践踏自己人格、违反自己权利的人见面，愿意以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相会。他们急切想知道真相是什么、罪犯是谁，以便宽恕他们。”我们相信，中国公民也能拥有如此高贵的人性；我们祝愿，中国的未来充满和平与爱的光芒。图图最后说道：“我们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们欢笑，我们沉默，我们直面了野兽般的黑暗过去。我们经受住了煎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确可以超越既往的冲突，挽起手来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宽容的精神相遇时，宽容会盈溢而出。坦白之后，宽容会接踵而至，继而是创伤得到抚慰，民族实现团结与和解。”我们的建议是本着宽容的精神提出的，我们希望中国国民都是有宽容精神的国民，谁也不愿意未来的中国发生动荡，在动荡中毛泽东的尸体很可能会像当年墨索里尼的尸体一样被倒挂在街头。所以说，今天的迁移是和解的开端。迁移毛泽东遗体、厘清毛泽东思想、放弃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乃是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步骤。

我们意识到，是时候了，是化解民族悲情怨恨的时候了，毛泽东统治中国数十年来制造的爱恨情仇该有个和解的日子了。我们希望恢复中华民族内在的爱心和怜悯，恢复既有的厚德载物、仁爱慈悲、大中至正的宽广胸怀。我们知道，这个路还很长，我们希望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吁请迁移毛泽东遗体，让其回到家乡韶山。我们认为，迁移毛泽东遗体，与建设先进文化有绝大的关系。从社会主义本来的含义、从丧葬文明与国民的丧葬平等、从节约本已非常窘迫的财政等方面来考量，迁移毛泽东的遗体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为了文明迁移遗体，我们也希望有关当局能与毛泽东的家人进行必要而充分的协商。我们相信，毛泽东遗体的迁移工作，既符合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也将提升首都北京的文明程度，使之成为一个配得上举办“人文奥运”的城市。我们不愿看到，五年之后，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

我们相信，只有达成各阶层之间、党内与党外、各种信仰之间的广泛和解，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久福祉！

（此文由余杰、王光泽共同起草，并经刘晓波修改）

签名：

余杰（作家）、王光泽（记者）、刘晓波（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主席）、胡平（《北京之春》主编）、陈奎德（《观察》主编）、张伟国（《议报》主编）、王丹（六·四民运学生领袖）、任不寐（学者、《不寐之夜》网站主编）、师涛（记者）、晁爱宗（记者）、东方月（电视主持人）、黄翔（旅美诗人）、张玲（旅美作家）、蔡楚（旅美诗人）、孟浪（旅美诗人）、王怡（学者）、杨银波（网络作家）、樊百华（学者）、林信舒、黎明（作家）、吴洪森（文学评论家）、樊志军、陈宝成（大学生）、徐康、高氏兄弟（艺术家）、赵国君（研究生）、魏震、张晓平（笔名陆祀，寓言作家）、徐尧（北京市第五中学）、王中陵（诗词家）、高军生（自由撰稿人）、马晓明（自由撰稿人）、汤致平（自由撰稿人）、阎广英（辽宁师范大学）、王吉陆（大学生）、刘伟（南京、大学教师）、万耀球（北大退休教师）、北村（作家）等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余杰草拟)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决定，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章诒和女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会和自由写作委员会均认为，章诒和以三十年的苦难和血泪凝聚而成的文字，赋予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的当代汉语写作以崭新的质地——这种写作不仅是对黑暗时代的控诉，更重要的是申明了对不可摧抑的人性尊严的肯定。

如德国作家黑塞所说，“作家是读取周围世界之良心状态的指针和地震仪”，章诒和的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捍卫人的自由、尊严和历史记忆的勇气。作为当年“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与父亲一起承担了历史的重负。在长达数十年的牢狱生涯中，她曾被迫从事掩埋其他囚徒尸体的可怕工作。有一次，在风雨交加的荒野中，她几乎决心扑到死去的难友的墓穴里，以死亡来终结邪恶势力所给予她的一切凌辱。但她还是坚韧地活了下来，因为她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告诫——父亲希望女儿成为时代的见证人，父亲叮嘱女儿把那个时代的光荣与耻辱都记录下来。

三十多年之后，记忆之流终于迎来了破冰的一刻。二零零四年年初，随着遭到大量删节的大陆版本《往事并不如烟》和恢复原貌的香港版本《最后的贵族》的先后出版，章诒和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文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声誉，而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又为后世研究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尽管不久之后，中共宣传部下令禁止《往事并不如烟》的印刷和发行，但该书早已深入千家万户（包括数十万册颇具中国特色的盗版书），并成为二零零四年度广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

章诒和的作品是文学，也是历史；是记忆，也是现实。在当代中国，与专制主义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与官方有意制造的遗忘作斗争。章诒和用文字完成了对时间的超越，为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时代以消灭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反右运动”的真相。在她那冷静而不乏温情的笔下，那些身处备受屈辱的状态却努力保持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们获得了复活。章诒和为我们讲述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康同壁、马连良等旧时人物的故事，在已经符号化的右派之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那些抽象化宏观化的反右叙事之外，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深处的细节；在被打断了脊梁的知识界之外，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里，我们民族依然拥有高贵灵魂的闪亮，尽管与毛时代的无边黑暗相比，这闪亮过于微弱，但正是这闪亮见证了：他们虽然遭遇到突发的猛烈的残酷的打击，虽然深陷于暴力的恐怖阴影下，但他们独自凝视着生命的姿影，注视着生存的漩涡和死亡的石磨，守望着自由这一天赋的价值。

他们那抗争着的凄美存在，让暴君的画像和语录黯然失色，也凸现了暴政时代的丑陋；他们的存在，改变了中国恒久以来“成王败寇”的历史观。

章诒和的写作，根植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乃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在屈辱中秉笔直书的遥远回响。

章诒和的写作，也得益于她作为一位优秀的戏曲研究者的身份，她从古代沉沦在社会底层却写透人情世故的伟大的戏曲家身上获得了悲情的力量。

章诒和的写作，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心灵剧痛，并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信念——尽管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竭力羞辱、贬低和蔑视文化和知识的价值，但是文明将如同压伤的芦苇那样永不折断，人类的良知也必将战胜那些一度看似无比强大的邪恶力量。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相信，章诒和女士是一位严肃的历史见证人，也是让人尊敬的自由事业的发言人。她给当代汉语写作注入了活力。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以能够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感到骄傲。

——二零零四年十月，北京

（此文由余杰起草，经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修改）

UnRegistered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从中国近代化的歧路看江胡交班

印尼的大选波澜不惊地完成了。败者坦然面对失败，胜者从容接掌权力。败者与胜者之间没有仇恨，他们都接受竞选的规则，都承认宪法的权威。比起台湾大选加深台湾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来，此次的印尼大选将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文化、政治和经济走向新生的契机。早在印尼大选前一年，印尼最高立法机构“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人协）”就已经完成了对宪法的修改。统治印尼三十二年的强人苏哈托下台之后，印尼先后进行了四次修宪。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次修宪，主持修宪的人协议长芮斯表示，印尼现拥有一部较完善的国家大法，在宪政方面已跨进一大步。已予修改的宪法条文计十五条，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第一，把总统选举改由直选；第二，今后人协议员由大选产生的国会及地方议会成员组成，过去受指派在人协中各占有三十八席的军警系及五十五席的专业阶层系，日后将自动失去在人协中的席位，军方退出政坛将成为事实。

回顾印尼的历史，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由印尼三军和警察组成的武装部队开始长期在人协与国会中拥有议席，其人数比率于七、八十年代占百分之二十。这一数量足以左右立法机构的运作。军队高级将领自动拥有议员的身份，其根据是“武装部队具有双重职能”的理论——武装部队既作为国防与维护治安力量，也成为社会政治力量，许多行政部门职位也由军警担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印尼成为仅有民主制度面纱的“警察国家”和“军队国家”。

在印尼军方退出国家政治生活一年多之后，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却在江胡的“和平交班”而涂脂抹粉、大唱颂歌。胡锦涛终于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由此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领袖。军权不转移，中国的最高权力之争就不会结束，这充分说明军权高于党权和政权，也显示了中国社会“枪杆子出政权”的实质。这些学者们津津乐道于“胡温新政”这个虚妄的概念，幻想着拥有全权的胡即将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这一权力交接的过程，本身就说明中国依然是“准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中国离民主、自由还遥不可及。我认为，对江胡交班的所有评估，都不能忘记这样一个背景：对力量（尤其是暴力）的崇拜或者恐惧，乃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能维持“稳定”的惟一基础。学者任不寐用“军事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灾民社会的“政府体制”，这是我迄今所见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本质”最为准确的定义。任不寐指出：“军事专制主义通过力量、阴谋取得政治权力，并通过力量审美和阴谋审美以及凸现感恩来维持统治。力量崇拜、阴谋崇拜和恩人崇拜是军事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论述，至少部分回答了真正热爱中国的人们的两个疑问——其一是：中国的“法家主义”或“郡县制度”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二是：中国为何未能完成“现代化”的转变？

尤其是后一个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热点。中国可以拥有核武器，可以送宇宙飞船上天，但中国依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精神的现代化，没有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任不寐在《灾变论》中指出：“中国一百五十年来‘有限现代化’的失败，问题不是出在‘现代化’上，而是出在‘有限’上。”而这种“有限现代化”的“有限”，恰恰得以在军事领域迅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军事的现代化，而这正是中国的现代化失败的根本原因。

最近，我读到近代史学者姜鸣的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该书在回顾了近代中国海军的悲剧性命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

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对于“船坚炮利”式的西化，早在一八七四年，曾经担任清廷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未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郭氏认为，现代化应当是“全盘”的现代化，一个环节超前实现了现代化，而其他环节仍然埋在中世纪的废墟之中，那么“强国”和“富民”都是不可能的。姜鸣认为：“这种把海防建设同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观点，整整超越了时代二十年。”姜鸣的这一反思是正确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局限于在海军史的框架内。如果放宽视界，把军事放置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之中来考量，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军事的现代化不仅不会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反倒可能成为某种“尾大不掉”的“反作用力”。

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军事一直是最受到关注的领域。可以说，军队先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精神等领域而部分实现了“现代化”。一开始，军事的现代化确实是为了应对“救亡图存”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产生的。可是，这一努力迅速蜕变为少数野心家夺取权力的资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们发现了这样的真理：谁控制军队，谁就拥有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力，谁就能“无法无天”地“吃人”。从曾国藩组建湘军到李鸿章组建淮军，在近代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舞台上，稍稍有点“政治头脑”的“英雄”们，都承认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硬道理”。

在战乱频仍的二十世纪中，从满清到北洋，从国民党政权到共产党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让人眼花缭乱。但就其本质来说，无非是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独裁政权取代了一个不那么军事化的政权而已。无论满清王朝还是北洋政府，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意识形态固然有天渊之别，却都维持着巨额军费开支，有时军费甚至占到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韩战期间，中共政权的军费开支高达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然而，中国的国防力量从来就没能成功地抵御外辱，仅仅在对内镇压时成为“十分有效”的工具，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军人”只会创造“屠戮妇孺的伟绩”。中国的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而是“防民军”。

中共建政以来，将“军事专制主义”推展到顶峰。毛泽东连国家主席的位置都可以送给刘少奇，却绝对不会放松一点对军权的控制。毛泽东把自己当作高居于“十大元帅”之上的“大元帅”，在“文革”高潮中党政系统均陷入瘫痪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利用军队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林彪，尽管在军队中享有极高威望并安插众多亲信，但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他连一个连队的士兵和一架飞机都指挥不动。林不过是毛的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在邓小平时代，正是因为邓始终保持着对军队的牢牢控制，才使得他轻而易举地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改革派党魁赶下台——枪永远都在指挥着党。没有“枪杆子”的赵紫阳虽然身为党的总书记，却被强迫冠以“分裂党”的恶谥。这是连纳粹的天才宣传部长戈培尔都想像不出来的荒诞剧本。而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最为恋恋不舍的还是军委主席的职务，正是有这一职务在手，使得江得以蔑视“祖宗之家法”，堂而皇之地以普通党员和普通公民的身份，充当了两年多的太上皇的角色。

在“军事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自由成了天方夜谭，民主成了西方人的专利，法律成为随意摆弄的妓女。从上到下各阶层惟一的信仰乃是“力量”。在全然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政治架构之下，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都被这种“力量信仰”深深地毒化了。于是，“杀学生”是士兵们的“狂欢”，“打台湾”是军官们的“心愿”——此时，“现代化”的军队完全变成了“反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如果用任不寐的“灾变论”来解释，这就不再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最为顽固和保守的“灾民社会”，其成员多为希望“不劳

而获”的农民，他们的身上凝聚了“灾民伦理”最可怕的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虽然军方对政局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如中共政治局常委中不再有军人），但“军警宪特”的超级体系依然是独立于法律和舆论监督之外的“巨无霸”。“六·四”血腥屠杀之后，中国的强力部门发生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变化：“武装警察”作为一支介于正规军与警察之间的特殊力量，在人数和装备方面都得到空前扩张。如今，统治者已经不需要像一九八九年那样动用正规军，而只是动用“武装到也持”的武警，就足以镇压各种来自民间的反抗了。

江湖最后一次一起公开露面是接见军方高级将领。首先是江总结自己的工作，口是心非地赞扬胡的才能；然后才是胡对江竭尽赞美之辞，并向军方提出今后的发展目标——这一隆重的仪式颇具象征意义，宛如上古禅让典礼的最后一幕。作为中国的公民，看到这样的演出，不是我们的骄傲，乃是我们的耻辱——它清晰地说明我们离文明有多远、离野蛮有多近。中国固然无法与欧美源远流长的自由民主传统相提并论，但印尼的变革确实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印尼已经实现了总统直接选举，已经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和国防军化；那么，依旧深陷于“军事国家”和“警察国家”中无法自拔的中国，有什么理由为江湖之间权力的“和平交接”而洋洋得意呢？

——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

——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有学者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妓女。此语虽刻薄，却也极其真实。今年是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但如果走上街头询问普通的成都市民，却没有几个人记得这个日子。中国的历史太悠久，“遗忘”也许是“生存”的前提。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谁是指挥了那场屠杀的屠夫？那就更少有人知道了。在天府之国这块物宝天华的土地上，生命像稻草一样茂盛，时光却都消耗到喧嚣的麻将桌上。

三百六十年前，这片土地上浸透了鲜血，空气中飘荡着腐败的尸体的臭味。所有的房屋都空了，所有的田地都荒了，“扬一益二”的成都重新回到了史前时代。修建了都江堰的蜀守李冰，没有料到成都会遭受这样的惨剧；用华美的文字来讴歌家乡的司马相如，也没有料到死亡会笼罩这片世外桃源。即便是饱经战乱的杜甫和仕途坎坷的苏东坡，也难以想象他们所爱的土地会变成人间地狱、他们所爱的乡亲会成为刀下亡魂。

三百六十年前成都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就是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今天官方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张献忠依然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那么，这个代表“农民阶级”的“伟大领袖”究竟对人民做了些什么好事呢？吾友冉云飞学识渊博，整理出长文《明末清初蜀难编年初编（附杀人方法及死亡人数）——兼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文献。例如清代学者毛奇龄在《后鉴录》提及屠成都及其州县事：“（张献忠）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然后挨户杀，名‘草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面对这样的史料，秉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物史观”来撰写中国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则统统斥之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侮蔑”。然而，我在家谱中发现，母亲这一家族乃是源于“湖广填四川”——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功劳”，导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需要从外省大量迁入新移民。我想，这样的事实总不是谁能够的杜撰吧。

张献忠的“由魔成圣”，说明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凭借杀人之多而成为英雄。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传统，即“屠夫崇拜”。鲁迅是最早发现这一杀人和吃人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鲁迅最厌恶的人是谁呢？大概许多鲁迅研究专家都没有想到，鲁迅最厌恶的人就是张献忠。鲁迅在写到这个屠夫的时候，用的是最为尖锐的语气和最为痛恨的情绪。鲁迅看重每一个人生命的独特性，因此他万万不能原谅像张献忠这样以杀人为荣、以杀人为乐的屠夫。与鲁迅恰恰相反，与张献忠最为“惺惺相惜”的人是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毛泽东就是吸取了现代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思维方式的、推陈出新了的“张献忠”。鲁迅痛斥张献忠，而毛泽东却欣赏张献忠，这一细节说明了鲁迅与毛泽东之间根本的差异。所以，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是一句谎言，这种说法只能欺骗一些单纯的文人。

有人认为屠夫至少还有一个值得羡慕的品格，那就是“勇敢”。但我认为，屠夫不是勇士，屠夫的另一面乃是懦夫。真的勇士，乃是谭嗣同、秋瑾、张自忠、遇罗克、林昭等人，他们或为同胞之解放而断头，或为反抗异族侵略而战死疆场，或为求索真理而献身。真的勇士，乃是像殷海光这样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如林毓生教授所论：“殷先生言行的意义在于：在一般人不被允许参与政治的条件下，他受到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具有的责任感的召唤，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为原动力，硬要参与政治过程所发挥的政治性影响。

殷先生说：‘唯有对民族，对国家，对当前危局抱有严重责任者，才不辞冒险犯难，据理直言，据事直陈。’当时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唯一管道是言论领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殷先生以一个读书人扮演了近似反对党的角色。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份子对于政治避之唯恐不及，而殷先生却逆流而行。”这才是真正让人肃然起敬的大勇。与之相反，屠夫们在骨子里都是懦夫，他们背离真理并摧残真理，他们并非挑战强权而专门屠戮妇孺，他们出于恐惧和猜忌而实施他们那邪恶的屠杀计划，最后他们自己也走向了偏执狂和精神分裂。我们今天很难读到关于张献忠的日常生活状况的史料，但却能在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中发现关于毛泽东病态心理的详细描述。屠夫们最恐惧的便是众叛亲离，屠夫们最后的命运却无一例外都是众叛亲离。他们本该在疯人院中被治疗，却不幸地掌握了毁灭同类的权力。

中共建政以来，漠视生命价值、崇尚暴力英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传统，与作为“农民党”的中共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衍生出一套虚幻的“农民起义创造历史”的乌托邦（当然，与其说毛泽东的党是“农民党”，还不如说它是“流氓无赖之党”，因为它依靠发动农民革命夺取政权，却对农民实施了历史上最为严酷、最为恶毒的统治）。毛泽东喜欢阅读《水浒传》，因为这本书就是他自己的镜子，延安及此后的毛式王朝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其实，从刘邦、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到毛泽东，都是心狠手辣的流氓无赖，只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成者为王败者寇”而已。当然，毛泽东是这一历史人物序列中最伟大的“红太阳”，而张献忠也俨然成为不可以批评的、苦大仇深的“阶级战友”。张献忠文化水平不高、理论素养不深，兵力有限、控制区域也有限，所以他的杀戮主要还是集中在四川及其相邻省份。而毛泽东君临天下之后，以“继续革命”为屠杀的理论基础，以现代国家机器为屠杀的工具，其杀人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效率之高，都让张献忠望尘莫及。

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中国的“屠夫崇拜”变本加厉。近期《新京报》报道发表了一篇题为“伟人纪念商品京城热销”的专题报道，记者林文龙写道——

在北京图书大厦的读者留言簿上，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永久纪念，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将是我们的传家宝。北京图书大厦企业策划中心工作人员刘艳告诉记者，因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掀起的“纪念商品热”并未随纪念活动的结束而低迷，上周末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撰写的《毛泽东传》的首发式上，短短一小时内就签售了近百本，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全书共三十六页金纸制成，每套标价一万八千六百元，上市前就备受关注，自三月十一日正式发售以来，短短二十天内即卖出一百二十二套，这一记录刷新了北京图书大厦精品图书的销售码洋纪录。热销的除了图书外，还有音像制品。据大世界音像副总经理郭丰录介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退出的大型文献专题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VCD一上市就大受欢迎，现已卖出一百多套。

这段文字让我毛骨悚然。在西方，最黑暗的年代就是对屠杀保持沉默的年代；而在中国，对暴行的沉默却成了“道德高线”，因为大部分人都成为屠夫的真心实意或三心二意的帮忙与帮凶。直到今天，在中国对屠杀的肯定和对屠夫的赞美都不绝于耳，其中还不乏教授和博士这样的知识精英。新老左派虽然互相攻击，却共奉毛泽东为邪教教主。某些学者文士虽以“后现代”的西装革履出现，却怡然自得地与屠夫一起茹毛饮血。近年来，中共外交部多次谴责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己却对毛泽东这个比日本战犯们还要暴虐的屠夫顶礼膜拜，难怪日方从来就不理会中方那有气无力的抗议。在西方，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喊冤叫屈，无异于对抗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而在中国，张献忠依然像游鱼般逍遥于历史教科书之中，毛泽东的头像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他的子民继续遭受屠杀。这就是西方与中国的重大差异。

思想家鲍曼致力于对大屠杀进行研究，他深入探讨了大屠杀产生的背景：“杀人不眨眼

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屠杀者都不是基因变异而产生的“魔鬼”，屠杀者的背后都有一套僵硬的杀人逻辑作为支撑。当把人定义为“非人”的之后，屠杀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在张献忠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读书人都不是人，而是猪、狗、羊；在毛泽东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反革命”都是“牛鬼蛇神”，他们不属于这个“新社会”。屠夫蔑视爱、同情和悲悯这些高贵的价值。

当年的明王朝以剥皮始，亦以剥皮终。那么，今日中国是否还会重蹈此悲剧命运呢？人类有没有希望从仇恨和杀戮中解脱出来呢？鲍曼不接受“以屠杀始、以屠杀终”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黯淡的预测，他认为人内在的耻辱感可以将人类从屠杀中解放出来：“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沦为囚徒的潜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曼发现了人类摆脱屠杀、对抗屠夫的一线希望：“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个选择。”人类身上残存的神性及理性，人类重建道德伦理的决心及捍卫自身尊严的勇气，乃是终结屠夫统治的希望所在。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中国还是属于张献忠和毛泽东们，屠夫们依然在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因此，我们应该选择“这一个”选择，尽管我们会成为屠杀的第一批牺牲品。这是制止屠杀、击败屠夫的唯一办法。我们不能乞求屠夫突然大发善心放过我们，我们也不能祈求天国突然降临人间而自己什么也不做。今天，我们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乃是要追悼那些沦为孤魂野鬼的同胞，乃是要将张献忠这样的屠夫从“先贤祠”移入“西湖跪像”。让英雄享有英雄的荣誉，让屠夫接受屠夫的审判，中国人才能彻底告别被屠杀的命运。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威斯康星大学

毛泽东是农民的救星，还是农民的灾星？

——与李昌平先生商榷

从《我向总理说实话》到《我向百姓说实话》，从向总理上书到向百姓言说，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完成了从官场走向民间的转变。二零零零年三月，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上书，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同年九月，李昌平被迫辞职，南下打工，年底当选《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此后四年间，李昌平的人生充满了波澜和坎坷，从《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记者到香港民间公益组织施乐会的项目官员，虽然角色不断转变，但他对农民兄弟的关心却一直没有改变。

《我向百姓说实话》一书是李昌平近年来对“三农问题”的新的、也是更加深入的思考。其中，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呼吁、针对“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的乡村债务的思考等观点，我都我非常赞同。但是，李昌平的另外一些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如否定农村土地私有化等，在几次会面的时候中，我们也有过直接的交流和讨论。在我看来，李昌平对现实的观察相当敏锐，但对历史的评述却存在着相当的偏差，其中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政策的肯定。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如果不彻底厘清这一关键问题，将大大地阻碍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在《慎言农村土地私有化》一文中，李昌平指出：“站在五千年历史的长河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完成了中国漫长的农民革命。”他进而论述道：“农民革命的核心即是土地革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革命运动大多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革命目标，而毛泽东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并没有停止，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又建立起了土地公有制，至此土地革命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我认为，这一论述与中国现代史的事实完全背道而驰。毛泽东不仅不是中国农民的救星，反倒是中国农民的灾星。毛泽东并没有“完成中国漫长的农民革命”，反倒开启了一个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还要严酷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国农民由此成为丧失了基本人权（甚至包括中共所宣扬的“生存权”在内）的“贱民”。可以说，中国农村的一切问题，无不是在毛泽东时代埋下了祸根。我们不能因为现实中农民问题的严峻性，就对更加悲惨的毛泽东时代涂脂抹粉。这种“因为距离产生美感”的心态，正是史家之大忌。

的确，毛泽东从蒋介石手中夺取天下，依靠的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毛泽东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依靠的是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革命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但是，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专制王朝一般都会与民“修养生息”，唯有毛泽东政权立即将沉重的锁链套到农民头上：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稀里糊涂地在政策宣教和武力威逼之下，从互助组、合作社，又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最后走上了“人民公社”的不归路。所谓“人民公社”，其实就是变相地、不花一分钱地将农民手中的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农民完全沦为真正的“无产者”。这种土地所有制“静悄悄”的变化，不仅剥夺了农民经济上的自主权，而且剥夺了农民基本的人身自由，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满头乱发没发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在毛泽东时代高度集中垄断的经济体制下，国家轻易地控制农村的各种资源，以“剪刀差”的形式巧妙地占有中国农民全部劳动剩余价值。正如陈桂棣、春桃在《中国农民调查》所说：“共和国的工业化大厦，是中国农民的血肉之躯筑成的；中国城市建设最辉煌的乐章，也是用中国农民的心血和汗水谱成的。”

在这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下，农民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农民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农民失去了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的迁徙的自由，被户口牢牢

限定在农村。只要你出生在农村，你就是“二等公民”。一九五七年二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造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从此，“盲流”这一带有巨大侮辱性的称呼成为农民工耻辱的标记。毛泽东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民国时代相对自由的环境下，他可以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就外出求学，甚至拿着一封介绍信就到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担任管理员。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农民和在毛泽东之下的农民，究竟谁更自由呢？

在这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农民是中国占绝大多数的纳税人群体，农民却不享有任何纳税人的待遇：农民没有公费医疗、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农民不能组织自己的农会或者其他独立的社团。在中共一党独裁的体制下，更不可能出现一个代表农民利益、替农民说话的“农民党”。中共建政之后的五十多年里，虽然宣称以“工农为主体”，但农民一直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农民之所以成为“无权者”，首要的原因就是农民丧失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毛泽东所领导和实施的“土地革命”，其实是“革”了农民的命。中共在大陆推行的土地革命，是当代最卑鄙无耻的谎言和骗局，它与五十年代国民政府在台湾所实行的“还地于民”的土地改革乃是天壤之别。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台湾的土地改革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进行。当时台湾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还是一个半农业化的社会。土地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最初进行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国民党领导人很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夺取天下的根本原因是利用了农民的不满情绪。因此，国民政府迫使地主将土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土地卖给佃农。这样，为数比地主多得多的佃农买到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对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评论说：“土改的结果使乡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而在大陆建立起来的土地公有制，其实就是“官有制”或“党有制”。官僚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土地，今天中国沿海城市近郊疯狂的“圈地运动”，也是源于毛泽东创建的虚幻的土地公有制。在这套制度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农民，得到最大利益的是以毛泽东及其继承人为首的独裁统治集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然而，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是，像李昌平这样既有相当的学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底层体验的优秀人士，为何没能识破毛泽东的这一诡计？为何还把毛泽东这个中国农民乃至大部分民众的“灾星”当作“救星”来看待？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毛泽东的治下，被残害致死和饥饿而死的农民的数量，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一九五九年初，由于大跃进和浮夸风，一九五八年征了过头粮，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都给征走了。再加上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农村中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由于中共至今封锁档案材料，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的大饥荒中究竟饿死多少人依然是个谜。有国内学者估计死亡人数当在三千万左右，也有海外学者估计至少在七千万左右。据《中国农民调查》一书透露，仅安徽凤阳县，就死亡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其中大庙公社夏黄庄，死亡人数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八。全家死绝的，全县有二百四十户；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庄，占到二十七个。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指鹿为马地说：“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业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混世魔王的狰狞面目在此暴露无遗，毛泽东并不认为当时的困境是对农民过度的盘剥所造成的，反倒认为不识大局的农民在“瞒产私分”；他不仅丝毫不关心农民的死活，甚至还想进一步地剥夺农民的救命粮。

后来，毛泽东发现情况糟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他决定从十月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了，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然而，这仅仅是一个虚伪的状态而已，“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我相信，这种复杂的营养学的“计算”，所耗费的人力和资源远远大于几块红烧肉。毛泽东一边以自己不吃肉来显示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在庐山会议上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辞职一万次、判刑一千年都不足以补偿，毛泽东却希望以一场小小的“素食秀”欺骗民众。

纳粹德国的战犯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其实，比纳粹罪孽更大的是毛泽东及其帮凶集团，他们的身上负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的血债（当然包括千千万万农民在内）。因此，“千年易过，毛泽东的罪孽难消。”但愿李昌平先生早日接受这个朴实无华的真理。

——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

谁识老毛真面目？

——读《王申酉文集》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区的刑场上。一名年轻的文弱的书生被执行了枪决。

他因思想而被杀害。他的悲惨命运与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杀害的王实味一样。他以他的死亡证实了一个政权的独裁、残酷和无耻，他以他的生命捍卫了人类亘古以来就信奉的一条真理——“不自由，毋宁死！”

他就是王申酉，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对毛泽东的邪恶本性有深刻认识的少数先知先觉者之一。他被我们遗忘了二十多年，跟顾准一样，他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语）。如今，王申酉的文集终于整理出版了——遗憾的是，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分大陆读者依然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先知灼热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在这本文集中，收录了一些王申酉论文、交待材料和日记等文字。其中，他的日记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他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真的做到了“我笔写我心”。在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知识分子普遍处于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心态的背景下，王申酉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如果说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是出于天真和本能，那么王申酉对毛泽东缔造的极权主义体制进行质疑和批判则是出于一种思想的自觉。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依我看，只有回复到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大批的人们去做最简单而繁重、单调、效率极低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政策决定了将走向这个极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见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放在今天的背景下，这些观点似乎“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那个全民族集体被催眠、集体陷入疯狂的年代里，能够一眼看穿毛泽东的专制本性和阴险伎俩的人确实寥寥无几。在日记以及后来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停止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些思想后来部分地成为邓小平的施政思路，但直到今天他所涉及的某些方面还是言论禁区。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王申酉生前所希望的“自由中国”依然没能成为现实，这更说明其思想的“先锋”价值。尤其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绕不开的、官方也不敢触动的问题。

在新左派高举毛泽东画像作为反对全球化的旗帜的今天，重温王申酉的文字更加重要且必要。昨天，王申酉因为批毛而被杀害；今天，新左派却因为拥毛而获得国内外的各种资源。其间，历史的吊诡让人深思。愚昧往往与喧嚣联系在一起，而智慧从来被迫保持沉默。这也正是毛泽东至今依然呆在神坛上的原因，正如学者陈奎德所言：“现在是对毛泽东进行历史性清算的时候了。否则，在当代，由于官僚集团整体性的腐败，由于贫富差距惊人的悬殊，由于中国弱势群体的空前无助，由于被迫害者被冤屈者无法讨回公正，由于生存现状的

急剧恶化，由于人类的健忘本能，同时也由于审美的距离感所产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屡次的出现过的人类的集体性遗忘和集体性心理回潮一样，势将导致的对历史的诗化。中国大陆时起时伏地出现的‘怀毛热’就是明证。它把那血腥时代供奉上神坛，中国人的血泪成为装饰历史性浪漫画卷的色彩，使左翼极权势力卷土重来，强烈干扰中国进入文明世界的进程。简言之，没有对毛时代的批判性补课，中国的一切实质性进展都无从谈起。”

在阅读王申酉的文字时，我不禁想起了那些识破毛泽东丑恶面目的思想先驱们，他们当中，既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大师胡适，也有从中共阵营中反戈一击的启蒙领袖陈独秀；既有作为北大学子和基督徒的林昭，也有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我还想起了关于傅斯年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段故事：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在代表团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歿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

王申酉不是毛直接下令处死的，但毛无疑是杀害王申酉的元凶。王申酉之死是毛仇恨知识分子的又一例证。余英时曾经分析说，毛相信自己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合而为一，是后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则与人民群众合而为一。这两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里斯玛”。这种“信仰的卡里斯玛”最能感召虔诚的信徒，但是最终却最容易引起知识人或学者的怀疑。余英时认为：“毛一贯反知识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为智性的怀疑足以动摇他的卡里斯玛的信仰基础。”因此，像王申酉这样敢于怀疑毛的“伟大、光荣、正确”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毛泽东的帝国所容纳的，他不得不死。

王申酉为了揭露毛的专制合独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期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大屠杀博物馆”。或者将今天的毛泽东纪念堂改造成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中，应当揭露毛泽东的暴行和罪恶，也应该纪念许许多多像王申酉这样被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所残害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像学者陈奎德所揭示的那样——“清算毛遗产也是极富现实感的国民课题。”、“对毛的公开公正审判，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势将打碎仍然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后的体制性和精神性桎梏，冲破遮羞布式的意识形态牢笼，破除中共一党垄断政权的种种借口，把中国从半个多世纪的极权暴政下真正地解脱出来。”我想，只有那一天到来了，王申酉、林昭、遇罗克们才能真正安息；只有那一天到来了，我们才能真正过上“摆脱恐惧”的自由生活。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十八日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中国当代文学的堕落是从作家本人的堕落开始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曾经成为中国民众渴求民主和自由的先声，作家曾经充当了社会良知和百姓代言人的角色。随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枪声响起，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也可悲地终止了。

近十五年以来，大部分当代作家纷纷落水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帮凶和帮闲，成为统治者合法性的忠实辩护者。近十五年以来，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皆成为如同毒品和酒精的精神麻醉剂，成为这个时代臭气熏天的文化垃圾。

鲁迅曾经深刻地阐述过奴隶与奴才的区别。奴隶是那些身体被迫处于被奴役的姿态，心灵却还对自由充满渴望的人；而奴才则是那些心甘情愿地充当奴隶，并一心一意向奴隶主献媚以换取“奴隶工头”这一“尊贵”身份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干当代作家堪称“奴在心者”，他们深陷于官方的赏识、读者的追捧和商业的成功之中，得意忘形地以“大师”自居，却不知道自已不过是没有精神向度、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由立场的可怜虫而已。

在这些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中，尤以贾平凹和余华为代表。这两个作家在国际上颇具知名度——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有博士正在专门撰写关于贾平凹的论文；而余华趁着英文版著作出版的机会，赴美国多所名校演讲。他们在国内也极具市场号召力——他们的小说首印便是十万册以上，还辗转有多种版本问世。然而，他们恰恰是文学的“终结者”，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掩饰中国的真相，他们以自己的言论为独裁者们涂脂抹粉。虽然他们都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并亲身经受过种种折磨，却沦为毛泽东的吹鼓手。这些看似聪明的作家都患上了受虐狂的精神病症，也患上了心理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被绑架者在价值理念上认同绑架者，进而配合绑架者的恐怖行径。

贾平凹在《暗恋》一文中写到了一段他与儿子的对话：儿子知道父亲在“文革”时期被迫与情人分手的不幸遭遇时，对父亲说：“爸爸真可怜！是谁制造了这种罪恶的深渊？是‘文化大革命’吗？是毛泽东吗？”对此，贾平凹的回答是：“我严肃地批评了孩子，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领导的中国走出的每一步，是有着具体的国际大背景的，有着具体的天地大自然的环境的，有着具体的共产主义内部矛盾的。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农民出身，如果设身处地的为他领导的政府着想，他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

贾平凹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原因绝不仅仅是为维持在儿子面前的尊严，更为重要的是要捍卫“无悔的青春”——他将自己的生命与毛泽东的荣辱水乳交融在一起。任何对毛泽东的批评，都会转化成对他本人的质疑：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你在做什么？

自诩为“农民”的贾平凹（尽管他如今早已家财千万贯，在从事写作的同时，还是一个精明的古董商），却无比冷酷地宣称，毛泽东“做什么都是能理解的”。那么，仅仅因为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而发动“大跃进”，就导致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难道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更为残忍的是，毛泽东在知道饥荒在全国蔓延的实情之后，却动用军队禁止灾民外出逃荒，这是数千年以来任何暴虐的帝王都干不出来的疯狂行径。

在亲身经历了“文革”之后，贾平凹依然对“伟大领袖”赞不绝口，依然相信中国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大救星”。他认为：“所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那是到了非常时期的非常语，未达到质变的常规期，芸芸众生哪里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呢？‘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一个人又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那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在积极响应着。亲自经历了的我，如

果现在一味地倾诉苦难，一味地怨天尤人，那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性。”我不知道贾大作家遵循的是怎样的“历史”、怎样的“人性”——在我看来，真正的“历史”，是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独裁者和暴君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的历史，而不是把撒旦当作先知的历史。在德国和俄罗斯，由于历史档案的公开化、透明化，也由于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独裁者们罄竹难书的罪行都得以完全的彰显，独裁者本人也受到了民众的唾弃。而在中国，由于历史档案依然被封冻，也由于作家们受虐狂的扭曲心态，毛泽东依然还被供奉在“神坛”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石。在我看来，真正的“人性”，是对自由的热爱，对民主的遵从，对专制的厌恶和对暴君的批判。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呈现出高贵人性的，是尊奉基督教诲的自由战士林昭，而不是荒淫暴虐的毛泽东；是以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前进的王维林，而不是向民众挥舞屠刀的邓小平。

与贾平凹的“领袖崇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余华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访谈中也大肆吹捧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这是余华到欧洲领取一个文学奖的时候，西方记者对他所作的访谈——

意大利《团结报》记者苏珊娜·莉芭蒙蒂问道：“如今中国还留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痕迹？”余华在的回答是这样的：“那段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切灾难，但现在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笔财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只是他没有明白，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我刚才说到了财富，我的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段丰厚的历史，这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就像疾病会带来免疫一样，文革之后，我们的民族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上的空前活跃，尤其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了，就是平庸的时代只会造就平庸的作家，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一个不平庸的时代生活过。”

在回答《解放报》记者马可·罗马尼的问题时，余华进而认为：“毛泽东的英雄史诗进入合唱部时，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位舵手希望在社会各阶层中重新创造一种平衡，但后来局势逃脱他手中的控制，时代总是比个人更加强大，中国的历史就陷入了一场悲剧。在城市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然而在农村，尽管情况也很悲惨，但是毫无疑问比城市好得多。”他还赞扬了毛泽东在“文学”上的成就：“毛泽东的影响没有消失，他最大的影响留在了我们的语言里。他简化了汉字，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简洁。”

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余华的奴性》的文章进行批评。但在网络上，余华的观点却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由此可见，在中国进行文化启蒙、建构常识的工作任重道远。惨绝人寰的“文革”，在余华眼里，却成为毛泽东的“英雄史诗”；主要发生在乡村的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在余华眼里，却只是“比城市好得多”的小小的伤害。一个人为了所谓的“伟大理想”，就有权力剥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吗？这是什么浑蛋逻辑？更何况，这种“伟大理想”根本就是某些御用文人臆想出来的，毛泽东是一个没有任何理想的流氓，在他心目中惟有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为了保有自己的独裁权力，他不仅可以杀戮战友，也可以牺牲妻子和儿子。而毛泽东带给中国当代文化的，是暴力语言、暴力思维的泛滥，是爱的丧失和同情心的消亡，正是毛泽东的为所欲为，才使得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动物世界”的状况之下。

当我读到贾平凹和余华的文字时，不禁感叹道：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的人民，如此迅速地忘记发生在昨天的暴政和屠杀；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此厚颜无耻地从事改造历史、歪曲记忆的“文化工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够堪称古往今来最“幸运”的暴君：尽管他杀戮和戕害的人民的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总和），但他的画像却仍然能够挂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头像也仍然定格在各种币值的人民币的正面。

我们应当向犹太人学习，记住“文革”的血腥，记住毛泽东的罪恶。作为纳粹集中营

中犹太人幸存者后裔的美国学者阿伦·哈斯，在《大屠杀后遗症》一书中分析说，诸如“我为什么能活下来”的问题，在所有大屠杀幸存者中所激发出来的不是负疚感，而是责任感。他们当众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履行对死难者的职责：支持以色列；抚养犹太儿童以维持种族的延续；纪念六百万死难者；凭良心作证，驳斥种种对事实的歪曲。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自信，消除原来的脆弱感和屈辱感。

大屠杀暴露了人性中潜在的邪恶。阿伦·哈斯在一次采访中，询问从莫索森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的索尔·加伯：“你希望人们从大屠杀中记住什么？”对方回答说：“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所谓的文明时代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必须弄清楚，人们怎么可以对飞溅在他们衣服上的孩子的脑浆麻木不仁呢？人们怎么能对一位母亲不要杀她的孩子的苦苦哀求置之不理呢？如果懂得这一切是任何发生的，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的灾难。”在另一次采访中，父母和三个兄弟在大屠杀中相继遇害的安·查诺夫斯基强调说：“我希望人们不仅记住这次屠杀，也要记住其他屠杀。人们应当抗议和反对它，而不仅仅是了解它。”

在捍卫记忆上，犹太人是当之无愧的老师。伟大的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韦塞尔，在题为《希望、绝望与记忆》的演讲中也指出：“记忆是崇高和必要的行动。记忆是呼唤，呼唤去记忆，从历史的第一线黎明时起就注入了我们。在《圣经》中，没有别的命令出现得如此频繁、如此持久的了。记住我们所得到的美好，记住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这已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新年这一天，也被称为记忆之日。在这一天，这宇宙中审判的一天，人吁请上帝记住，我们的被拯救就依赖于此。”

在中国，敢于这样做和愿意这样做的人寥寥无几。学者王友琴出版了厚厚的《“文革”受难者》，收录六百多名受难者的悲惨经历。虽然只是“九牛一毫”，但余英时教授誉之为“起死回生的大公德”。学者宋永毅编著了《“文革”大屠杀》，发生在“文革”的若干次中共最高层授意或默许的大屠杀终于浮出水面。纪录片制作人胡杰以一己之力拍摄完成《寻找林昭》一片，一个美丽而刚强的自由战士的出现，乃是对毛泽东时代罪恶的控诉。还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打破沉默，秉笔直书，真实而详尽地揭示了“红太阳”背后的肮脏和黑暗。这些人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记录屠杀、谴责屠夫，恢复历史的尊严和人性的尊贵。与贾平凹、余华之流的受虐狂相比，他们值得我们支持与敬仰。

更不能忘却的是八九民运中的三位勇士：湖南省浏阳县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和长途汽车司机鲁德成三人。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位勇士用充满了颜料的鸡蛋成功涂抹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随后，三人被学生纠察队拿获，最后由高自联决定将其送交广场的国家安全部门。一个多月后，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宣传煽动罪判处余志坚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二十年，鲁德成有期徒刑十六年。

这是八九民运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页。在狱中受尽折磨、劫后重生的余志坚最近在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时，丝毫不为当年的行为感到后悔，他还提到他们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主门洞两侧张贴的横幅——一句是“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另一句是“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那些“著书惟剩颂毛魔”的作家们，面对这样的勇士的时候，能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吗？那些“惟毛是举”的北大博士们，真该老老实实地坐在小学的课堂上，由小学教师余志坚给他们上一堂最基础的启蒙课程。

邱吉尔在《二战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面对着纳粹德国和苏俄的吞并野心，一位波兰作家悲哀地说道：“如果德国人来了，我们将失去自由；如果苏联人来了，我们将失去灵魂。”在中共统治大陆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人逐渐失去了灵魂——贾平凹、余华、余秋雨、王蒙这些名声显赫的作家，就是其中“丧魂落魄”的代表。

——二零零四年九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投资和票房都创造了奇迹的《英雄》，显示了著名导演张艺谋最后的、彻底的堕落。最近十余年来，我一直都在关注张大导演的动向，我在前两年那部充满波普色彩的新编芭蕾舞剧《大红灯笼》中就闻到了一种腐尸的气味，“穿着旗袍跳芭蕾”、“边跳芭蕾边打麻将”，也亏得张大导演想得出来。他不以邪恶为邪恶、不以丑陋为丑陋、不以血腥为血腥，一边在商海里浪荡，一边向岸边的权势阶层抛出媚眼。

《英雄》体现了张艺谋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态度，也昭示了他无论如何也要“政治正确”的人生选择。正如一位署名“东郭先生与狼共舞”的网友在《请理解暴君》一文中所评论的那样：“我一直认为张艺谋电影中有一种深沉的奴性，它来自于中国农民普遍的恋土情结。拥有这种情结，使张艺谋不自觉地以土地和土地的主宰者的立场来理解天下。《英雄》最大的失败就在这里：‘笑傲江湖’的梦，‘沧海一声笑’的寄托，‘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激励，统统在这里化为乌有，只剩下一片虚伪矫饰毫无性情的顺臣奴像，还偏偏做出一副英烈的姿态，令人齿冷。”在张艺谋的心目中，“英雄”绝对不是“四大剑客”，而是“胸怀天下”的秦始皇。这俨然是“成王败寇”的暴力历史观的翻版。

改写历史通常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张艺谋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息息相通。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公然称赞秦始皇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说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说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大流氓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肯定，目的是为自己的暴政寻找一种历史“合法性”。而在中共“十六大”歌舞升平的“大气候”下，“三个代表”、“小康社会”和“政治文明”的谎言，遮盖了十一亿农民的呻吟和一亿失业工人的哭泣。此时，《英雄》的出现，对心灵空虚的亿万小民来说，就是一剂制作精良的精神鸦片；而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今上”来说，则是一次能够“龙颜大悦”的文化桑拿。

张艺谋通过这部史诗般的《英雄》，成功地完成了由一个“西部愤青”到“中宣部部长助理”的转变。一位署名“一无所有”的网友在《粉饰美化暴君的〈英雄〉》一文中评论说：“这种‘艺术’手法实在似曾相识，天下为暴君、苛政粉饰、辩护者，所通用的手法亦不过如此。在这种‘艺术’的装点之下，独裁者和暴君都成了暂时不能为世人所广为能理解的大智大慧之圣者，又都成了最能理解别人的人，还成了被‘激愤的民意’所左右、所要挟的无辜受害者，所做的一切‘违心’事，都不是出自于其本意。同时，乖戾没有了，残暴没有了，苛政没有了，‘宁任天下人负我不让我负天下人’的枭雄本性没有了，‘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不仁’没有了。反正，天下最美的词都能套到其身上，所干下的所有坏事都可以找出无可奈何，不得已为之的原因。于是，接受了这些灌输的人民，便会在瑟缩于其淫威之下，享受着其残暴之时，仍会深深地为自己有这么一位伟岸的君主而由衷地感激涕零，发自内心地谢主隆恩，山呼万岁。”因此，在我看来，《英雄》最应该获得的并不是奥斯卡奖，而是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略为遗憾的是，苏联帝国已灰飞烟灭，斯大林先生也寿终正寝，不然老谋子一定能够获得斯大林奖金之一等奖。他为专制和独裁辩护的功劳和贡献，岂是当年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所能比拟的！

如果说侯孝贤是一位有良知的大艺术家，那么张艺谋只能算是一个股票市场上绝顶聪明的掮客。我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的时候，曾经数度落泪。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余威尚存，“二·二八”惨案依然是一个不能被言说的“禁区”，而侯孝贤本着艺术和历史的良

知，第一次大胆地在电影中集中表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后来，侯孝贤说，他并不想批判什么，他只想呈现真实。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大艺术家的“底线伦理”。相比之下，张艺谋并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人生体验”，他不会坚持什么，也不敢触动什么，而只是对金钱和权势察言观色。张艺谋辉煌的成功恰恰是今日中国文化“空洞化”、中国文化人“宠物化”的典型代表。我认为，第五代导演中最优秀的人物既不是张艺谋，也不是陈凯歌，而是名气比他们小得多的田壮壮。田壮壮的《蓝风筝》呈现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在“文革”前后所承担的种种生活的煎熬和折磨，也像《悲情城市》一样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也有人说，《英雄》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只要好看就行了，不必对其做如此深入的“文化分析”。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角斗士》难道不是商业片吗？《角斗士》中张扬的是个体尊严的至高无上，拥有庞大帝国的暴君在这样一个坚韧的斗士面前，显得那样的卑琐和可怜。《勇敢的心》难道不是商业片吗？《勇敢的心》中主人公在被五马分尸前一刻，那响彻云霄的呼喊是什么？是“自由！自由！自由！”《泰坦尼克号》难道不是商业片吗？《泰坦尼克号》中音乐家们衣冠楚楚地站在即将沉没的甲板上，全神贯注地演奏《更加与主接近》，让观众感受到的是艺术对死亡的胜利、光明对黑暗的胜利，以及上帝对人类永恒之爱。商业片为什么不能宣扬崇高而善美的人性呢？商业片为什么非得充当权力的帮闲、帮忙和帮凶呢？

“六·四”惨案之后，像领导“天安门母亲”运动的丁子霖女士那样百折不回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相反，在金钱的“软招安”和权力的“硬威逼”之下，大多数文化精英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了“宠物化”。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海归派”们，除了拼命往仕途上挤和在商场中捞钱以外，并不在意中国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公义不公义。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现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方，在“十六大”上荣升“中央候补委员”。此人留学美国多年，曾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然而，在回答记者关于“六·四”屠杀的问题时，他撇开千百计的人命而振振有词地回答说：“这是对党的一次考验。”闵维方可耻的表现再次证明：北大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传统已经沦丧了，北大早已成为党化教育、奴化的牺牲品。

另外一名同样荣升“中央候补委员”的女作家铁凝，则因此成为作家之中拥有最显赫的“党内地位”的人物。近年来，铁凝先后担任了河北省作协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要职，此次更是飞黄腾达。“十六大”之后，她立即在报刊上发表学习“三个代表”的长文，宣誓效忠。

联系作为“十六大”代表之一、在会上发言强烈要求江泽民留任的“帝王小说”作家二月河来，“宠物”们向“主人”撒娇、献媚，确实需要争先恐后。“宠物”众多而“主人”只有一个。因此，无论是在“文代会”上声嘶力竭地呼喊“江核心”的王蒙，还是自告奋勇地充当为“十六大”献礼的大型电视专题片主持人的余秋雨；无论是以“法律资源本土化”之说为中共的恶法酷刑遮羞、从而成为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还是专门研究“不要良心的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才能讨得主人的欢心的问题上，他们全都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不久前，就连有“四小花旦”之称四个最当红的女演员——章子怡、赵薇、周迅、徐静蕾，也都纷纷表示要求“入党”，并且对记者表示：“虽然离党员的要求还很远，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入党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中国现实生活的戏剧化，超过了任何一个戏剧家的想象；从学术、教育界到娱乐界各类文化精英整体性的堕落，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度。

这是一个谎言泛滥的国度，而文化精英们在带头兴高采烈地说谎。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哈维尔早已有过精彩的描述：“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的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纪守法；压制文化

叫做百花齐放；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所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假装从不作假。”作为这场戏剧的主演的中共，需要文化人来当配角和帮腔。这场大戏演得轰轰烈烈。然而，谎言不可能永远占据真话的位置，“宠物”也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脱胎换骨”而拥有人的尊严。

我坚信，那些丧失了最基本的耻辱感的“文化名人”们，不仅将遭到逐渐恢复正常的判断力的公民们的唾弃，也将在未来民主和自由的中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UnRegistered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与钱理群先生商榷

钱理群教授是我所尊敬的恩师。然而，我在民间出版物《怀念李慎之》中读到钱教授写的《送李慎之先生》一文时，不禁大吃一惊。对于这篇文章中的若干混乱而错误的观念，我不得不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此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我发现，这些错误的思想，不仅存在于钱教授一人身上，而且存在于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厘清这类思想、恢复历史真相并认清中共真面目，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钱理群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李慎之先生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他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是怀着‘反封建，反传统，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参加革命的，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与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说，他和他的革命同志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就是高举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民主而斗争’的。——确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似乎国民党政府不曾是一个‘一党独裁’的政权，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一开始就是‘五四’民主、科学传统的对立面；这背后其实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是以共产党人后来的失误、异化，来否认他们最初的选择。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公允的。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曾经聚集了一批要求民主、自由的志士仁人，他们并且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所坚持的正是钱教授所认为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但是，我不仅不认为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我反倒认为钱先生的观点似是而非。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待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往往会把血腥美化，用“良好的愿望”来遮掩残酷的实践。在我看来，李慎之先生对自己“青年左派”岁月的难以割舍，乃是人性的弱点使然——一个人总是很难完全地、彻底地否定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但是，近年来，随着反思的深入，李慎之先生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共自一建立起就是一颗毒瘤，而非后来才发生“失误、异化”的。我相信，如果李慎之先生能够再活几年，他一定会写出一部比韦君宜的《思痛录》还要深刻的回忆录来。

钱先生的这段论述，与其说是为李慎之先生辩护，不如说是为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辩护。就好像某些人将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开”、以及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去发掘“早期人道主义”一样，其实是一种“缘木求鱼”的做法。钱先生的这段话里隐含着这样互相联系的两个观点：第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承接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第二，早期的共产党还是存在着一个“不独裁”的时代。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有严重的问题。它们遮蔽了历史的真相，淡化了中共的邪恶——而中共的邪恶既是一种思想、一种主义、一种制度的邪恶，也是人性的邪恶（中共领袖毛泽东就是人性的邪恶的最集中的代表）。

早期的共产党是否承接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呢？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五四”的先驱者们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时也是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的创建者。但是，以极权主义为组织模式的中共，很快就将陈独秀、瞿秋白等崇尚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领袖赶下台去，并在此后的岁月里将他们彻底“妖魔化”。三十年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们刻毒咒骂的“叛徒和奸细”，蒋介石对陈尚能网开一面，共产党人却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同样，瞿秋白并不是死于国民党的子弹，乃是死于中共“借刀杀人”的毒计。中共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具备了“五四”精神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

所信仰的民主、科学的现代精神。作为流氓无产者的代表，毛泽东一生都无比仇恨知识分子。他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严酷整肃。在蔡元培时代能够保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风的北大，在毛泽东时代却成为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枚棋子。作为“五四”运动摇篮的北大，遭到了毛泽东这个独夫民贼的残暴的强奸。其结果便是：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北大一直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陈独秀既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又是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他是否认为中共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党呢？早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也就是李慎之先生选择成为“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的时候），重新回归独立知识分子身份的陈独秀，对共产主义这一思想体系和共产党这一组织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对“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归为一类）”进行了比较：前者由各党派参加议会选举，各党发表政纲，以迎合选民要求，选民有最后的投票权；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而后的选举由执政党指定，国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因此，陈独秀感叹说：“每个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切，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民主吗？”陈独秀是最早指出“共产党乃是法西斯之母”的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对苏俄及中共不抱丝毫的希望。

那么，早期的共产党是否有过“不独裁”的黄金时代呢？共产党是否真的如钱教授所说，是后来才发生“失误、异化”的呢？（况且，相对于中共“重于泰山”的罪恶来说，“失误、异化”这种说法实在是过于“轻如鸿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以厚厚的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彻底揭露了中共的本质乃是一个庞大的黑社会——此前，我在李锐的《庐山回忆实录》一书中发现，中共内部的运作方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黑社会，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一书则告诉读者，中共的“黑社会化”并非始于其建政之后，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它就是一个比中国所有的黑帮更“黑”的黑帮。当时的国民党固然“民主无量”，但它又“独裁无胆”，所以还能容许一些反对声音的存在。当时批评和反对国民党的诸多政治力量中，固然有一些真心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分子，也有想趁火打劫、乱中夺权的中共在内。不能将这些力量混为一谈。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共反对国民党，就天真地认为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对独裁政权的力量，有可能是更加独裁的力量，如法国大革命中推翻吉伦特派的雅各宾派、俄国十月革命中推翻临时政府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国北伐革命中推翻北洋政府的蒋介石的党军。国民党固然离民主自由很远，但毋庸置疑的是，共产党离民主自由更远。

中共一向是“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曾经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宣部部长的毛泽东，深谙宣传之道，即“好花说尽，坏事做绝”。因为宣传工作的成功，共产党确实吸引、欺骗了一大批像李慎之这样的热血青年参与其中。我们不否认这群青年参加共产党的善良意愿，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参加了共产党，就认为共产党也“脱胎换骨”了。历史证明，是共产党成功地消灭了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而不是知识分子引导着共产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前几年，青年学者笑蜀编辑了《历史的先声》一书，搜集了一九四五年前后中共《新华日报》发表的若干社论，其腔调全都是赞美英美民主、反对一党独裁、提倡议会制度、争取新闻自由。然而，中共自己从一建党起，何尝真正实施过这一切？这是一本应该“反着读”的书，每一篇社论都是中共“自唾其面”。过于真诚的钱先生，莫不是没有读出编者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而把这本书全都当作了历史的真相？经历过“反右”、“文革”和“六四”的钱先生，再犯如此低能的错误，实在让人遗憾。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之旅中，每个毛孔都流淌着鲜血。它从一造反起便以反民主和反自由为旨归。《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摘录了部分来自中共方面的史料：在二十年代

的肃反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指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李昭九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挥肃反。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七日，李昭九将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等数十名高级干部逮捕，对他们实施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的人“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被害者“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十二月八日，其中三人的妻子来看望被捕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不仅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如此大肆杀戮，毛泽东还派遣心腹干将邓发去闽西根据地坐镇开展肃反，导致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百分之五十全部被消灭，高华感叹说：“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会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

中共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暴虐的独裁党，在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与“五四”精神息息相通的时期，也不曾有过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时期。但愿今天的中国人早日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常识。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读姚仁杰自传《心路》

鲁迅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曾这样写道：“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各种对北大“校格”的评价中最为准确和最为深刻的一种。鲁迅在北大任教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其心灵与北大息息相通。比起那些在北大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却对北大精神一无所知的学究们来，鲁迅更配得上“北大人”的称号。他不参与党派，不依附权贵，不屈从于群众，始终坚持着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鲁迅也许没有料到，作为五四运动的摇篮以及中国现代文化的肇始之地的北大，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却一步步地陷入了沉沦。北大的沉沦与整个当代中国的走向是同步的：当中国一步步地进入五千年未有之专制与黑暗的时候，北大也进入了百年历史中最黯淡、最萧条的时期。“杀死”北大的凶手是毛泽东——作为集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之大成的“超级独裁者”，毛泽东对北大所代表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取向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有史家认为，毛泽东对北大的仇恨源于他在五四时期到北大求学所遭受的冷遇，以及作为北大图书馆图书馆临时工的自卑心态。我则认为，这种典型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过于简单化了。毛泽东对北大的清洗和整肃，固然有个人的复仇心态，更加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北大是其实施独裁统治的过程中一块非清除不可的“绊脚石”。如果说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等两种手段，……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么中共建政之后立即开始的对包括北大在内的数十所中国现代大学的关闭、合并和改造，乃是其达成严酷的思想统治的前提。从所谓的“院系调整”到“反右”再到“文革”，这是一个庞大的、胸有成竹的计划。一次又一次如暴风骤雨般展开的政治运动，其目的之一便是摧垮知识分子的脊梁，使这一阶层成为俯首帖耳的奴隶。毛泽东深知，以民主和科学为旨归、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现代大学精神，与其暴虐、病态、兼有“猴气”和“虎气”的独裁统治格格不入。不首先摧毁北大，就无法让知识界匍匐在他的脚下。因此，毛泽东与北大的矛盾乃是不可调和、根本对立的——就像黑暗与光明、冰与火不能共存一样。

北大生物系退休教授姚仁杰先生刚刚完成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回忆录《心路——与北大同行》，其中最吸引我的部分是关于五十年代中期北大生涯的回忆，尤其是对日渐模糊的北大“反右”前后状况的描述。这段对北大未来走向发生重要影响的历史，在北大校史中却被轻轻带过。当时，姚仁杰是北大生物系年轻的助教，也是生物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此后，他被关押在清河等多个劳改农场，度过了将近二十年失去人身自由的苦难岁月。“文革”结束之后，在北大的七百多名右派中，他是凭借学术成就重新回到母校当教授的寥寥无几的数人之一。《心路》是一本非常个人化、不加遮掩的历史。在我看来，与官方的“大历史”、年鉴以及北大校史相比，这种毫无禁忌、秉实直书的叙述更具真实性，更有史料的价值，也更有生命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作为五七年夏天北大的“光荣与梦想”的当事人之一，姚仁杰写道：“一九五七年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大字报中，真可以提炼出不少文学的精品。一个多月百花盛开的大字报文学，

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其繁荣和影响都无愧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大字报、小字报和辩论笔记等文字材料，其弥足珍贵之处，并不在文学的激情与修辞的精美，而在于其中现实的批判性、思想的自由度和理论的前瞻性。直到今天，一直还有人企图贬低右派们的生命价值与思想价值，认为右派不过是“屈原”式的忠臣、他们思想也不过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内部作一些小的修修补补。其实，除了上述那种以“忠君”为准绳的右派外，也有一部分右派对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从“顶极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们提出的“党天下”、“政治设计院”的观点到北大普通学生的大字报，其民主自由的光芒直到今天依然不显黯淡。姚仁杰记下了许多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北大右派师生们的言论——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公开为胡风冤案叫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文系学生王国乡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其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杨路在辩论中宣称：“你们把民主当作手段，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而我却认为民主是神圣的权利。你们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这些思考显然已经触及到了中共专制制度的本质，堪称当代自由思想史上的奇葩。

北大的学生为何有这样一些异端的、超前的思想呢？除了北大固有的五四传统之外，姚仁杰还分析指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中，存放着多种可供阅览的国内外的报纸杂志。老师和部分同学有较高的外文阅览能力，比之社会上其他群体感知世情变化的敏锐性也强过许多。思想教育单纯依靠‘灌输’和‘洗脑’的模式，渐渐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多元文化的影响是根绝不了的，有存在就会有反映，不管怎样去限制和封杀，仍然不可挡地在部分知识分子中交叉感染、迅速传播！”这种亲身经历者的体会相当准确。北大一直是信息交汇的中心，信息的丰富才导致思想的多元。信息的自由传播乃是专制制度的死敌，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共都不肯放松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的原因——一旦人民可以自由地获得信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地判断和选择，那么独裁者的末日也就来临了。这也正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沦为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的原因——一旦青年都成为拜金主义、拜权主义者，失去了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失去了对自由精神的呵护，那么一党专制的局面就可以暂时维系下去。从“反右”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大学“失魂落魄”的状况依旧，党依旧实现着对大学的绝对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北大教改”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正像姚仁杰反问的那样：“究竟谁想把青年培养成俯首帖耳、任人摆布的‘螺丝钉’、变成没有理想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究竟谁在从文化上、价值观和道德观上实行全面的封锁，实行严格的一元化、填鸭式的灌输教育？”这是一个深爱母校的北大人对北大沉沦的痛切追问。

在放逐乃至残害了七百多名北大的精英之后，北大像失血过多的病人一样，再也难以昂首挺胸了。在这场“阴谋”中，中共政权对待右派分子们无所不用其极：在精神上实施侮辱、在物质上实施掠夺、在肉体上实施暴力。姚仁杰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们被驱逐出学校的第一天的经历：“从北大抓来的右派分子们，到了海淀公安分局，大家被按囚车到来的先后顺序分别挤在几间屋子里，等候补办正式的拘押手续。其实，就是要煞煞右派们的傲气。我不是学法律的，不了解法律是否有规定：行政处分也须动用刑事拘留的手续。但北京大学报送市政府新成立的‘劳动教养办公室’的、一百多名学校给予最高行政处分的右派分子，都被强行打了压上油墨的指纹、掌印。其间，一名大学生拒不接受这种侮辱，马上就被几名五大三粗的警察按倒在地，抓住两只本无缚鸡之力的细手，生拉活扯还是在登记表上打下了手模，反而是在挣扎中受了许多皮肉之苦。”那是一个敌视文明和法治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遗风依然影响到今天。而对于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涯，

他们被迫终止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沦为“共和国”里万劫不复的贱民。这是北大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连日寇也未能摧毁的中国文明的命脉，却被毛泽东彻底切断了。

尽管右派已经成为社会的异类、相当一部分右派也已低头悔罪，但依然有少数右派在高压下保持了嶙峋的风骨。最近，我比较阅读章诒和女士大陆版的《往事并不如烟》和香港版的《最后的贵族》，我发现一些重要的细节在大陆版中被删掉而在香港版中却保留下来。例如，章伯钧与罗隆基在落难之后有一段对话——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当晚，他俩谈得很久。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章诒和还写到章伯钧对毛泽东的评价：

父亲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足，还是个农民。”文革伊始，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成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与“右派们纷纷缴械投降”的官方宣传不同，章伯钧们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独立的思考，他们不以右派为耻，乃以右派为荣。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姚仁杰先生的回忆录里：一九五七年放暑假前夕，北大举办一次久违的舞会，以“庆祝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北影的一些演员以及正在北影访问的香港演员夏梦女士也应邀前来。在舞会上，夏梦女士以大陆青年已渐忘却的另类穿着和淡扫蛾眉的美艳震惊了四座，左派和右派都为之倾倒。舞会开始，没有人敢于前去邀请夏梦跳舞。此时此刻，一位气宇不凡的年轻助教，泰然上前，轻舒右臂，上体微向前躬，轻声问道：“可以请您跳舞吗？”夏梦在这位坦然大胆的青年的引领之下进入舞池，开始了一曲轻盈的华尔兹。

旁边的左派学生们发现了这一情景，立即嚣张地喊叫道：“右派分子不准参加我们的庆功会！”一时间，歇斯底里的吼叫不绝于耳。然而，这位年轻助教与夏梦小姐依然跳得优雅而欢快，根本没有理会外面的噪音。突然，有人在主席台上拉下了电闸，灯光骤灭，舞曲也嘎然而止。

这位“嚣张到了极点”的右派分子就是姚仁杰。这个小插曲彰显着部分“死不悔改”的右派的风骨和人格，一个大写的“人”字呼之欲出。在最艰难的时刻，姚仁杰还是以关汉卿所说的“铜豌豆”自许，他不仅没有承认“错误”乃至“罪行”，相反却开始了对毛泽东和中共制度的全面反思。他认识到，所谓“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乃是“不惜篡改历史，横扫几千年来中外文化多元发展的成果，以极度狭隘的霸权主义和市侩实用主义，任意阉割和剽窃前人的思想，利用一些极度权欲熏心的文痞”而拼凑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而伟大领袖本人则是以“笔杆子”和“枪杆子”相配合，“把党内群众和人民群众都

视为阿斗，并公开声明自己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强行营造他自己的‘独立亡国’——‘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些想法，姚仁杰在“反右”的过程中和牢狱生涯里就逐渐地形成了，比起人文科学领域某些至今还对毛泽东恋恋不舍的学者名流来，理工科出身的姚仁杰反倒有更加清醒和深刻的头脑。

北大沉沦了，“五四”精神在毛贼的摧抑下命悬一线；北大又没有沉沦，还有像姚仁杰、谭天荣、林昭这样的北大人，他们的生命会被终止、他们的肉体被消灭，但他们人格的尊严却不可战胜。我记得殷海光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中说过：“从一个角落看来，五四的生机正在受着后退势力的摧毁，正在受着某种力量的高压而不能抬头。五四的志士们也似乎过着冬天蛰伏的日子。然而，纵眼一观，整个广大的自由世界，何处不是民主为先？何处不是科学昌明？这样广大的力量，岂是一个角落所摧毁得了的？这样一个广大的发展又岂是一个角落所阻拦得了的？冬天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科学和民主的力量不是正在浸润着整个的自由世界吗？展望未来，五四运动所孕育出来的种子，将与自由世界这股力量合流；而且将成为中国人自己开拓国运之实质的中坚。看准了这个光明的远景，每个明智的知识分子都应毅然前趋，重整五四精神！”我愿意把这段话转送给姚仁杰先生，我更将勉力承接姚仁杰先生反专制、求自由的北大理想，在“五四”的激情与“六四”的血泊之后，继续走先贤们开启的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漫漫长路。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评柯云路《芙蓉国》

时至今日，在大陆研究“文革”依然是一个禁区。中宣部的文件中规定，关于“文革”的著作必须严格把关，不得随意出版。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段比较宽松的、研究“文革”的时期，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这个刚刚打开一点的门缝又关上了。九十年代末，专门研究“文革”问题的旅美学者宋永毅在回国搜集资料的时候被国家安全部绑架，秘密关押了相当一段时间。在美国的压力下，他才得以重获自由。至此，人们对“文革”的历史更是噤若寒蝉。而《芙蓉国》的出版可以算是打破禁区、陈说历史的一次尝试。它是第一部描写“文革”全过程的全景式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对“红卫兵运动”作出一定的反省与检讨的长篇小说。

《芙蓉国》的作者署名“辛克”，是英文“think”的音译。其实，作者就是大陆作家中颇有争议的柯云路。柯云路在八十年代是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长篇小说《新星》闻名一时，其主人公即近年来备受媒体关注的、主导山西长治新闻改革的吕日周。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柯云路是积极参与者之一，不仅参加了多封公开信和宣言的签名，还多次到广场上支持学生的行动。九十年代之后，柯云路一度沉寂，后来让人困惑地成为气功等神秘主义的支持者，为之写作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其中，最让他名誉受损的是为游医胡万林写作传记，而胡万林后来因诈骗罪罪名被判重刑。

就纯粹的小说艺术来看，《芙蓉国》显得比较粗糙；从反思深度来看，柯云路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无法跟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挖掘极权主义根基的巨著相媲美。但是，柯云路勇敢地掀起“文革”的红盖头，这一行为本身就让人肃然起敬。更何况这部七十三万字的宏篇巨著结晶了作者多年的心血，在人人都在迅速忘却历史的今天，这样的写作是对记忆的捍卫，也是对人的尊严的捍卫。

《芙蓉国》介于小说与纪实之间，写上层时多用史家笔法，写下层时则几乎都是虚构人物。小说穿插毛泽东在二十年间的心态变迁，不时展示其隐秘的宫廷生活。第六十二章中，一方面写毛波澜起伏的心理活动，对中国历史的回顾和对中国现实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写毛与护士李秀芝之间的暧昧关系。“李秀芝一双绵软而又柔韧的手在他肥胖松软的大脚上搓着，捏着，嘴里还说着：‘我料理这双脚这么多年，都料理出感情了。’”宫廷外的血雨腥风与宫廷内的春色无边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上层的腐化堕落与底层的困窘苦难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张力。我猜想，这些细节来源于早于《芙蓉国》而在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由此可见，历史资料的发掘对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刺激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残忍和荒谬，超越了任何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文学想象。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曾经在为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写的书评中指出：“毛确实是一个残暴的恶魔：自大狂、对二十世纪科技和语言充耳不闻、猜疑成性、残忍、诡诈、欺骗、荒淫不堪。如果对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暴君所造成的死亡、苦难和欺骗竟然不感到义愤填膺，那就是愚不可及了。”

我注意到，《芙蓉国》中有关周恩来的描述，也与以前大陆作品中周的“圣人”形象有所不同。周不再是慈父般的总理，而是城府极深的权臣。小说写道，在万人批斗会上，周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出席，他先伸手示意其他人跟在江青后面先走，而自己不前不后地走在江青靠后一点的位置上。周永远知道自己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也永远注意自己身边的一班人。小说用“春秋笔法”写道：“周恩来将这一切都看清楚了，又显得毫无观察。他总是亲切地、和蔼地、平易近人地同时又不失严肃地在自己的角色中。”

有人说，周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演员，此言不虚。周一生都在演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恢复真实的生活。小说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江青特意要乘坐周恩来的座车。周恩来有坐车办公的习惯，身旁放着一叠文件。这时为江青腾地方，就把文件收起来放在腿上。江青说：“影响总理办公了。”周恩来用他通常的幽默又不失严肃的口吻说：“和江青同志谈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办公。”他顺手将一个有一定厚度的松软而又光滑凉快的草席垫从自己身后抽出来，垫到江青腰后，江青对这样的照顾十分满意。这一细节将周的个性展现无遗，不加一字的评点，而读者自然心领神会。这些细节，也可以参照刚刚出版不久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两相对照，相映成趣。周是中共“先贤祠”中最后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圣人”，而还原周作为毛的帮凶和奴才的本质，还需要更多知识分子的努力。

小说的主人公卢小龙由中学生造反派领袖成为下乡知青，由高干子弟而入中国底层社会，终于大彻大悟，最后因张贴“反革命”的大字报而被杀害。卢小龙的身上有遇罗克的影子。他是小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

对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生、对“文革”完全陌生的中国的青年一代来说，阅读《芙蓉国》不失为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极佳的窗口。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

——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我在读完《古拉格群岛》这部宏伟而悲壮的交响曲之后，深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尽苦难而尊严不堕的品格所感动；我在华盛顿参观了大屠杀博物馆之后，深为犹太民族捍卫苦难历史的勇气与毅力所折服。我深信：只有保存了记忆，才能保证灾难不再发生；只有揭示了真相，才能确信屠杀不再重演。然而，让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依旧没有一部《古拉格群岛》、没有一个大屠杀博物馆、也没有作为自己民族历史见证人和苦难记录者的索尔仁尼琴和韦塞尔。

让人欣慰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新版的《牛津简明英文字典》和《牛津成语和语言词典》将“劳改”（laogai）这个词语收入其中，与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古拉格”并列。由此，苏联与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的极权国家的罪恶，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古拉格”这个词语在全球广为人知，“古拉格”制度的存在让西方普通民众了解到苏联国土上像癌细胞一样泛滥的奴隶集中营的真相，也让一度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终于放弃了对共产主义乌托邦最后的依恋；与之相似，因为中国人权活动家吴弘达多年来的搜集证据和奔走呼号，“劳改”这个词语也逐渐在全球传播开来，“劳改”制度的存在让西方普通民众意识到“中国制造”的诸多产品背后可能隐藏着斑斑血泪，也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政权在西方营造的“牙齿脱落的老虎”的新形象难以维持。在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中共当局取消“劳改”的说法而继续保持劳改制度，“以利于更好地在国际上开展人权斗争”。中共自己感到了心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弘达在国际人权事业上的贡献是许多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所无法企及的。

吴弘达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勉的银行经理人，出于对中共天真的幻想，没有选择离开中国大陆。中共建政之后，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连番变脸，愈发严厉。尽管全家被剥夺了家产并被迫“夹起尾巴做人”，但少年吴弘达对即将降临的灾难依然一无所知。当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之后，满怀着成为一名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士的希望，而对变化莫测的政治不感兴趣。然而，每一个生活在共产党中国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不去沾政治，政治却要来找你”。一九五九年，吴弘达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次年被捕入狱，此后等待他的是十九年暗无天日的劳改生涯。《昨夜雨骤风狂》这本自传，其主体部分即是描述劳改营中噩梦般的岁月。

作为一名天性热爱自由的大学生，作为一名童年即受洗并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天主教徒，在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当中，吴弘达仅仅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卒子”，他的际遇远远没有那些尚能保有一定待遇和自由的“大右派”们幸运。他不可能保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最后的贵族”们的优雅，他忍受了酷刑和饥饿，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当中国历史进入所谓的“新时期”之后，吴弘达的命运与那些屈原式的右派迥然不同：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等右派名流，因为信奉“党就像母亲一样，虽然错打了儿子一巴掌，但仍然是自己的母亲”这样的“真理”，很快就重新被起用而前程似锦、八面威风。中共鼓励他们的作品出版发行，并给予他们本人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因为这些作品有效地帮助了中共的宣传部门改写和掩盖历史的真相。而同样是在记叙劳改生涯，吴弘达的声音却被隔离在中国之外，因为他讲述的真相对于中共而言乃是“一针见血”和“釜底抽薪”。吴弘达彻底觉悟了，他对中共政权不抱有任何的幻想，把余生献给了揭露中共奴隶劳改营、死囚器官买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黑幕，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尊重的人权活动家。

如果说希特勒建立的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主要用于明目张胆地消灭犹太人；那么，中共政权建立的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劳改营，则以“废物利用”为宗旨，将那些属于被“新社会”唾弃的阶级的成员关押在一起，以高强度的劳动、饥饿和酷刑来“静悄悄”地消灭他们。比起前者来，后者的手段更加隐蔽、严密和残酷。吴弘达在集中营中亲眼目睹了若干匪夷所思的酷刑，比如一次为了惩罚“消极怠工”的右派知识分子，将其上衣剥掉，双手绑在后面的葡萄架上。田野里的大号蚊子霎时覆盖了他的脸部和上身，人们听到他的狂叫呼喊，个个都魂飞魄散。当队长下令松绑后，他双手在脸上、胸上乱抓，血流如注，一头扎进路边的水沟里。吴弘达写道：“我耳闻目睹过许多人痛苦的呼叫声，但铭刻在我听觉中最深的就是这一次。”

吴弘达在劳改营中一步步地看透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加上他那毫不妥协的倔犟性格，使他的肉体和精神都遭到了巨大的侮辱与折磨。六十年代初，因为饥饿，劳改营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为了能活下来，囚徒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所有可以吃下去的东西。有一次，吴弘达在田里发现了洞穴中有一窝冬眠的蛇，“我高兴极了，一下扑过去，把那一堆冬眠蛇一把拖了出来。我一声不响，一面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一边把一条条未醒的蛇拿在手里，一口咬掉蛇头，吐掉，退掉皮，五脏不去除，塞进背包里。”即便是当年漂流到孤岛上的鲁宾逊也没有这样可怕的经历。我想，最酷烈的专制制度，乃是那种将文明完全摧毁、将人推回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劳改制度超过了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而“当之无愧”地名列榜首。今天那些天天在网吧中玩电子游戏的孩子们，如果阅读到这个“生咬蛇头”的故事，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吧。然而，这样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最为真实的历史。

余英时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吴弘达在被流放到海外之后，“一直以宗教家的热忱，暴露这个人间地狱的真相”。那么，吴弘达的这种“宗教家的热忱”究竟来自于何处呢？来自于他的自由曾经被剥夺的切肤之痛，来自于他被关押到“活棺材”般的禁闭室的恐怖经验。那是一间一米高、一米宽、两米长的水泥棺材，被关在里面的人确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十二天的煎熬，长过十二年。那也是吴弘达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经历。有了这样的经历，便有了对死亡的超越，有了对自由的珍惜，以及说出真相的“宗教家的热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吴弘达来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因而享有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本应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他并没有忘却那些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失去自由的人们。他不是泰坦尼克号上提前逃生的老鼠，他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还有无辜者在坐牢，他的自由就不是完全的；如果还有无辜者在受苦，他个人的苦难就没有结束。

吴弘达从事劳改事业的热情让我想起了在纳粹集中营中殉道的神学家、人权活动家朋霍费尔。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朋霍费尔在狱中写下了没有经过打磨的思想札记《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并把它作为给一位友人的生日礼物。《狱中书简》的编辑贝特格认为，这篇文字之于朋霍费尔乃是“一种凄凉的总结”。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这篇文字乃是朋霍费尔对自由最为深切的体认，这种监狱之中面对死亡时对自由的体认，远远超越了任何睿智的头脑在书斋中对自由的体认。朋霍费尔有一段关于苦难的论述，这段论述用在吴弘达这样的身上也是适合的：“由于服从人间的命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自由负责的人承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同别人一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遭受肉体死亡之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吴弘达没有被苦难所消灭，也没有被苦难所征服，他勇敢地站了起来，像堂吉诃德一样冲向了风车，像西西弗斯一样扛起了石头。

中共的劳改制度是蹂躏人权、灭绝人性的罪恶制度，它至今仍然存在。只有当中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化的那一天，这一制度才可能完全地终结。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揭示真相是

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只要这一步能够顺利完成，那么接下来的关于重建尊严、和平、宽容和爱的的工作才能得以展开。我认为，比终结现实中的劳改制度更为艰难的是，在中国恢复被这一系列罪恶制度所摧残的活力、良知和理性。学者约翰·保罗·莱里奇一直致力于思考“真相揭示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他的灵感来自于《赞美诗》第八十五首第十节。这首赞美诗讲述了人们返回家园以及和平的机会的故事，诗歌的作者做了如下生动的描写：“真相与仁慈结伴，正义与和平相连。”也许，这也是中国这个长期被邪恶胁迫的国度唯一的救赎之路。仇恨不是受难者的解脱，报复也不是幸存者的特权，正如莱里奇所说：“真相渴望罪恶能够昭然若揭，痛苦和磨难能够得到同情和确认。但真相又与宽恕相伴，摆脱过去和重新开始，这是必须接受的观点。正义是对个人和团体的利益、社会重建和补偿的探求，但又与和平相连，和平强调的是相互依存、健康欢乐和平安幸福。”祝福中国能够拥有这样的未来。

UnRegistered

向西藏忏悔

——读班旦加措《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犯人的证词》

对于普通的汉族人来说，西藏只是一个遥远的“香格里拉”，是一处充满刺激和挑战的旅游胜地。几千年积淀的“大一统”思想深入骨髓，加之中共政权半个多世纪不断强化的宣传和教育，“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观念成为一种不能讨论的“元命题”。一般的汉族人没有意识、也几乎没有渠道去了解发生在西藏的真相，他们认为西藏只有诗情画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读到系狱三十多年的西藏僧人班旦加措的《雪山下的火焰》一书时，所受到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这既是一本个人的曲折的自传，也是西藏半个多世纪命运的缩影。一九五九年，中共军队对西藏动武，达赖喇嘛被迫流亡海外，大量藏族僧侣被捕入狱。班旦加措虽然没有参与抗暴运动，却因拒绝出卖师长而被捕入狱并被判刑七年。在狱中，他又因无法忍受饥饿企图逃走被加刑八年。十五年刑期坐满，班旦被“留场就业”十年。一九八三年，在刚刚获得自由三个月之后，又因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而再度被判刑八年。一九九二年，班旦终于逃离西藏。此后，他以一名良心犯的身份向世界民众讲述西藏人民的遭遇，讲述中共政权在西藏从事的宗教和种族迫害的罪行。这本自传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血泪交织的“苦难的历程”。

作为亚洲大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数千年来西藏一直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历代王朝与西藏之间有过征战的惨剧，也有过和谐相处的蜜月。总体而言，汉文化与藏文化在长期的相处中，既有交流与融合，也因地理的阻隔而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大多数时候，汉民族与藏民族是朋友和弟兄，而非仇敌与冤家。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

一元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崇尚暴力和斗争的哲学，其思维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归一”的傲慢不谋而合。于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段血腥味最浓烈的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在君临天下之后，既然胸怀“将红旗插遍全球”的狂妄野心，自然容不得西藏继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从一开始的怀柔政策到最后的图穷匕见，西藏毫无还手之力，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中共致力于摧毁西藏的社会体制和宗教信仰，将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加给西藏人民。班旦只是千千万万受难的无辜藏人之一，他写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耐人寻味的细节：一名中国军官把僧侣们的衣物堆在庭院里，一边是富裕僧侣僧侣的衣物，一边是贫寒僧侣的衣物。这个中国军官从富裕僧侣的衣物中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厉声追问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僧侣们回答道：“羊毛。”简单的答复把对方愣住了，他以为翻译漏译了什么，就盯着他看。翻译重发了问话：“这是从哪里来的？”僧侣回答说：“绵羊。”然后他哭了起来。中国军官希望西藏人迅速学会阶级斗争的思维，能够作出“这是富人剥削穷人得来的”这样的回答。偏偏西藏人以一种单纯得近乎透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愿意把别人当作敌人，他们的回答自然难以让中国军官如愿以偿。

要一个民族低头，首先得让它在精神上折服。中共政权不仅逐步实现了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精神奴役，还将毒手伸向世外桃源的西藏。暴虐的统治者将信仰也当作犯罪，在西藏的扎奇监狱里有三十名女政治犯，其中二十七名是尼姑。班旦观察到，在被审讯的时候，很多尼姑被迫脱光衣服，赤身裸体站在那儿，警卫们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手上拿着电棍做出各种下流和挑衅的动作。这一恶劣的做法，不仅无法剥夺被害人的尊严，反倒展示出加害者的邪恶，班旦写道：“想到这些尼姑所受的污辱、恐吓和残酷的殴打，对于他们的坚定勇敢，我特别感到尊敬。”如果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主要是肉体的消灭，那么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则集中在文化和宗教的摧残方面。他们以物质利益来诱惑藏人辱骂达赖喇嘛，却成效甚

微。这大大出乎中共官僚的意料之外。这些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家伙，是不会对“天上的生活原则”产生任何敬意的。把班旦的这本回忆录与其他汉族作者写的劳改文学相比，明显感受到藏人的监狱比汉人的监狱拥有更多的友谊和温情。在狱中，班旦宁愿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不愿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斗争会和批判会。他发现了中共“统一思想”的秘密：“对共产党人而言，肉体的惩罚是要达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会他们都要讲一段关于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们学习用真心诚意来赞美共产党。”人世间最邪恶的思想，便是那种企图改造人、控制人的思想。班旦在经历了饥饿、紧闭、半年手铐、两年脚铐、吊梁毒打、电棒捅进嘴里，最痛苦的经验是“出卖和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难友上纲上线的指控和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奖惩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就堕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个人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大部分汉族人一生都过着根本没有“精神生活”的生活，所以他们难以理解藏族人宽广、坚韧的精神世界，难以理解藏族人信仰献身的激情。

班旦的苦难横亘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包括胡赵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直到九十年代初逃离西藏才得以结束。狱卒用电棒塞进他的嘴巴、将牙齿全部打掉的暴行，就发生在以开明著称的胡耀邦时代。八十年代中共当局对西藏几次残酷的镇压活动，可以说开了“六·四”镇压的先声。如果中国的普通民众早点了解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不至于对中共抱有善良的幻想，认为中共根本不会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这个教训是沉痛的。班旦的经历证实了：在八十年代初，虽然胡耀邦曾经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向西藏人民道歉，但中共西藏地方当局对西藏人民的迫害并没有明显的收敛。胡耀邦个人的品德固然不容质疑——他能够从中共“善败恶胜”的人才筛选机制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是，胡耀邦一个人无法改变中共整个体制的暴虐、疯狂和蛮横的本性。我们不能因为胡耀邦良好的个人品质就作出对八十年代过于美化的描述。八十年代，班旦在第二次被捕之后所受到一系列凶残的虐待表明：一个善良的领袖之于庞大的、按照惯性运作的极权主义体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在班旦的回忆录中，没有丝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态，其讲述充满了平静与宽容。即便谈到曾经用酷刑对待他的警察，班旦也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怜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无论环境如何险恶，班旦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心灵的自由，他骄傲地宣称：“手镣脚铐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带给我心灵的平静，肉体的折磨只是牢狱之灾加在身上的印记，我依然有能力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我还特别注意到，达赖喇嘛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他三十三年的牢狱生涯中，班旦加措忍受了酷刑、难耐的饥饿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终拒绝向压迫者屈服。他之有勇气这样做，甚至能宽恕他的加害者，这不仅仅是西藏人天性达观的赐予，我想这跟佛教教导人们应当具有爱心、仁慈、宽恕，以及天下万物皆相亲相属有关，它是我们内心平和充满希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浸透了仁慈、宽恕和爱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权谋和血腥的汉文化不知道要“先进”和“崇高”多少倍。我们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嘲笑藏人的“落后”与“野蛮”呢？真正“落后”与“野蛮”的是我们自己，只是没有多少汉人敢于承认这个事实罢了。

本书的中文译者廖天琪在《译后记》中写道：“译完班旦喇嘛的传记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像德国总理勃兰特七十年代在华沙犹太人墓前下跪一样，有一天，中国的元首也应当将达赖喇嘛请回布达拉宫，并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请求原谅。”我也是怀着深深的忏悔之心阅读这本书的。虽然我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类似于班旦这样的藏人的迫害，但是作为一个汉民族的知识分子，我却对自己同胞的恶行长期保持无知和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耻的态度。我必须分担自己民族深重的罪孽，我必须像西藏忏悔——不是出于勇气，乃是出于责任。

——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读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被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夹边沟记事》一书，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该书作者杨显惠，六十年代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接触到许多劳改和劳教农场，也认识了一批从农场移交过来的右派和劳教人员。那时他就已经零零星星地听说了“夹边沟农场”的存在，那里关押过三千多名右派，经过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之后，仅有数百人生还。从一九九七年起，杨显惠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此后三年中每年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访问当年的幸存者和管理人员，查阅资料和两次实地考察夹边沟，终于写成此书，揭开了当年那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黑幕。虽然《夹边沟记事》名曰“中篇小说集”，但这也许是作者和出版者的“障眼法”——其实，书中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当年的九死一生者的“口述实录”，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真实历史。

夹边沟农场绝对不是“唯一”的。可以推测，在中国的大地上星罗棋布着无数像这样没有被官方正式命名的“死亡集中营”，它们完全能够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相提并论。因此，《夹边沟记事》的问世，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共政权的历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尽管它只是一个农场的“个案”，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只能算是索尔仁尼琴巨著《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章节而已；但是，这本书申明了这样一个极权主义征服不了信念：虽然书中所采访的幸存者都已经“泯然众人也”，从外表上看和普通人相差无几，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倍受折磨——消灭人的肉体要比消灭他们的记忆容易得多。他们没有放弃尊严，也没有放弃记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言说，就是对杀人机制的控诉和反抗。我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对于每一个惨死者和幸存者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专制制度使亲人变成敌人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它成立于一九五四年，撤销于一九六一年，原来是劳改农场，反右之后专门收容甘肃省机关、企业、学校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他言论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过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和工人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这里关押过不少的文化名人，如八十年代名噪一时、“六·四”屠杀之后流亡海外的美学家高尔泰，国民政府编译局的权威、著名翻译家章仲子等人。但更多的还是普通知识分子。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科级单位”里，活活饿死了两千多人，发生了不计其数的人间惨剧。《夹边沟记事》中所记载的是一些平凡人的极度悲惨的故事，它们直接来自于那些被任意凌辱和殴打、被剥夺了一切的自由和权利的人们的悲惨遭遇。相信这些可怕的故事能够修正年轻一代关于“右派”的错误想象。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像朱镕基、王蒙这样重新成为权力宠儿的右派，认为反右运动就像母亲错打了儿子一巴掌那么简单。在王蒙的回忆文章中，他被放逐到新疆的那段右派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瓜果飘香，因为他得到了王震的庇护。这类文字构成了后人对右派的基本认识。然而，在我看来，朱镕基和王蒙所讲述的右派生涯，既是“真实”的——对于他们这“一个”生命个体而言；又是“不真实”的——相对于数百万被虐待甚至杀害的右派和坏分子而言。

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短短数年间，就一举消灭了“中间社会”，制造出一个恐龙般巨大

而丑陋的“国家利维坦”。这个政权比希特勒的纳粹帝国更加严密，也比奥威尔设想的“一九八四”更加牢固。它将中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所发明的“编户制度”发挥到了极点，通过户籍制度、警察制度、号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的“小脚侦察队”以及强大的宣传和教育机器，使得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自从一九五七年之后，右派成为“地、富、反、坏、右”系列中的一部分，是贱民中的贱民。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明确的贱民制度，但共产党政权却创造了一套严酷的贱民制度，将数千万社会成员划入“不可接触的罪人”行列。我相信，即使是见惯了印度社会贱民制度的甘地，如果到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也会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贱民们的凄惨遭遇而感到震惊。这套制度深深地镶嵌到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中，它以空前残忍的力量切断了人类基本的血缘关系和伦理亲情，它把“亲人”变成了“敌人”。一旦被指认为“敌人”，你便被驱逐出了“人”的行列，你立即与你的家庭、你的生活分割开来，你被逮捕，被认为有罪，被打垮，被折磨，被关押，被贬至社会垃圾的水平。

在《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我发现了家庭和亲情是如何被割裂的。夹边沟的幸存者李祥年，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原来是兰州体委的教练、篮球队的领队。在被打成右派之后，为了逃避被押往夹边沟送死的命运，他逃到北京的姐姐家。不久，兰州体委的公函就跟到了姐夫的单位。姐姐和姐夫都是胆小如鼠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劝说弟弟回去。母亲应当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吧？恰恰相反，李祥年的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她见儿子不愿就范，居然通知管区的民警上门来威逼。当警察走了之后，儿子对母亲说：“娘，我不想回去，劳改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却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

二十年之后，李祥年“落实政策”，获得“平反”。当他回家探亲的时候，父亲告诉他，母亲半年前就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并不伤心，因为正是狠心的母亲将独生子送到夹边沟的，他们之间的骨肉亲情早就没有了。在家里，他质问姐姐说：“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怎么没情没义？”姐姐无言以对，只好翻来覆去地说：“我总认为党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许多右派都有过像李祥年的遭遇。极权主义的极致就是使亲人关系变成敌人关系，使平时善良的老百姓成为暴政的帮凶和帮忙。它让每个人都参与罪恶，让每个人手上都沾上鲜血——拒绝合作者立即被宣布为敌人。与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和塔利班领袖奥马尔一样，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切，而且实现得比他们都彻底和完美。蒋介石因为暗杀了一个闻一多而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毛泽东却残害了数百万像闻一多那样的知识精英而依然受到大众狂热的支持。因此，就统治术的高明和邪恶的程度来说，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毛泽东相比。

美国学者鲁伯特·巴特勒在《盖世太保史》一书中分析了为什么普通德国人会真诚地支持纳粹的暴政，他指出：“盖世太保依仗的一种心理因素是人们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那些与警察合作或支持警察国家队德国人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的错误，国家的敌人的确存在，而他们必须出力将敌人绳之以法。相信这一点要比反对流行的政治大气候容易得多。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在三十年代的种种证据表明，在没有可供选择的的情况下，人们会由衷地相信虚伪的宣传。”这也正是李祥年的亲人们为什么要将他拒之于门外、乃至送进火坑的根本原因。李祥年的母亲和姐姐真的相信“党是讲人道主义”的吗？她们要么是在单一信息的背景下真的相信，要么是假装相信而给自己的良心抹上麻醉剂。那个时代，人们死心塌地地配合官方作恶，他们的亲情早已经被暴政摧毁得荡然无存了——要么你泯灭自己的亲情，要么你自己一同牺牲掉。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选择了前者；于是，暴政得以在帝国的各个角落畅通无阻。你突然发现，对你最冷酷的原来是你的亲人和朋友；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精心构建的社会关系原来如此不堪一击。在希特勒帝国，盖世太保是一支特别的力量；而在毛泽东帝国，人人都成为潜在的“盖

世太保”——哪个社会更加可怕呢？

饥饿使人变成野兽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旬，夹边沟农场的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饿毙，农场的党委书记蒋洪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没有想到反而遭到地委书记的训斥：死几个犯人算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于是，一颗粮食也没有拨到农场来，死亡的阴影蔓延开来。右派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他们也找不到任何自救的办法。在漫长的饥荒中，他们成批地饿死，悲惨的命运比起纳粹集中营中被大量屠杀的犹太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夹边沟记事》的若干篇章中，幸存者最集中谈论的话题就是“吃”。在死神肆虐的时刻，“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在哈姆雷特那里无比复杂的问题，已经简化为：你有没有寻找食物的能力？著名书法家、教育家，从美国威廉斯大学留学归来，曾经担任天水市政协主席的六旬老人王鹤鸣，是怎样活下来的呢？他冒着被射杀的危险，潜入农场旁边骑兵部队的马厩，偷吃军马的马料。他说多亏“马大哥”救了自己一命，离开农场的时候，还专程去向“马大哥”作躬致谢。

播种的时候，人们偷吃麦种，他们使劲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晚上喝末糊汤的时候，他们的嘴已经被农药杀得麻木了。许多幸存者养成了生吃粮食的习惯，持续多年。右派俞兆远被释放之后，在家里虽然有饭吃，还是忍不住要吃生粮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用小勺子舀着苞谷面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后来，他才下决心改掉了这个习惯，因为妻子要与他离婚，妻子在法庭上提出离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偷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妻子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生吃……在饥饿面前，文明是无力的，人们很快就被推回了茹毛饮血的阶段。

农场的情况越来越恶化了。到了后来，什么也没得吃了，右派们便到河滩上去采摘黄茅草籽来煮汤。然而，这种东西容易造成肠梗阻，数十人就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述说：“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带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这些东西都不容易消化，排泄就成了问题。我们那个时候排泄出来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排泄的时候必须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面掏。工具是用红柳枝条做的木勺。”有一个名叫文大业的右派，原来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医学院的教授。他应当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但是，他还是不顾性命吃了草籽。肚肠里形成了一个硬块，直径超过肛门的直径许多，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李文汉帮他用专业工具一掏，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最后把他的肛门搞得鲜血淋漓，硬块安然如初。五六天之后，文大业被“胀”死了。

《饱食一顿》中高吉义的可怕经历，任何一个文学家也想象不出来。有一次，高吉义与几名身体尚好的难友一起被派出搬运土豆种。他们破天荒地获得了一次任意吃土豆的机会，个个都狼吞虎咽吃坏了肚子。一个姓吴的右派在回去的汽车上胃就撑破了，当天半夜就断了气。高吉义本人上吐下泄，无法动弹。木工组的难友、省建工局的老工程师牛天德一夜都在照料他，用脸盆反复接他呕吐出来的土豆疙瘩。第二天下午，高吉义起床来，发现有梯子搭在墙边，再一观察，有人上了屋顶。他偷偷跟过去，原来是牛天德趴在屋顶上。牛天德面前铺着一块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这是一些简直没有办法形容颜色的东西，是褐色、黄色和绿色的混合物。

高吉义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天啊，牛天德居然在晾晒他昨夜吐出来的和排泄出来的

污秽物，并且正从那些污秽物中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土豆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之后，牛天德便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高吉义飞起一脚，将包裹踢下房顶。牛天德没有料到背后有人，嗓子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扑上来抓住他的手腕说“小高，我把你当作亲兄弟，没有想到你这么坏！”高吉义说：“这东西不能吃啊！”牛天德却严厉地说：“怎么不能吃？怎么就不能吃？”

争执几句之后，高吉义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够这样作践自己呀。他哽咽着说：“老牛呀，咱们不要争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不能吃……”牛天德怔住了，慢慢松开手，但又猛地把高吉义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啊，我的小高啊……”眼泪滚滚而下，流到了高吉义脸上，高吉义也嚎啕大哭起来。

四十年之后，白发苍苍的高吉义依然在质问自己：当时究竟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而牛天德早已饿死在农场里。

饿死比枪杀更加残酷。将囚犯饿死，既免除了审判的繁琐，又逃避了司法的责任。夹边沟农场的惨剧发生之后，中央政府仅仅是轻描淡写地批评甘肃省地方当局犯了“左倾错误”，相关责任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这充分暴露了这个政权的流氓和屠夫的本质。

狱卒的贪婪和残暴超过了纳粹

美国学者戈德哈根在《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一书中提出“在社会上已经死亡”的概念，这是对异己分子、被搞臭了的人实行暴力统治的一种方式。“这既是对在社会上已经死亡的人的一种文化概念，也是对他们的一整套做法。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互相依存的。社会成员认为，在社会上已经死亡的人被剥夺了某些基本的人的特点，不值得受到社会的、法律的基本保护。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已经死亡的人不配受到尊敬。”在毛泽东时代，百万计的右派就是这样一个“在社会上已经死亡”的族群，仅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或者不可选择地出身于“敌对阶级”。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因为言论而被定罪的群体，因言论而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夹边沟农场关押的右派，地位比刑事罪犯还要低。刑满之后留在农场的犯人，一般都能够充当“二劳改”，配合干部管理右派。而右派则处于这个人间地狱的最底层，他们是衣服上没有佩带黄星的“犹太人”。

在农场里，右派们除了承受饥饿的折磨之外，还经常遭到名为“管教干部”实为“狱卒”的残酷折磨。有一次，管教干部宋有义奸污一名女右派而被旁人发现，人们纷纷传说这件丑事。宋有义恼羞成怒，召开全队大会，当场宣布将“妖言惑众”的两个女右派李怀珠和张淑香“特殊处置”。随着他一声令下，几名身强力壮的狱卒立即扑上前来，如狼似虎地将李怀珠和张淑香铐起来，而且用的是背铐。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办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的一种铐人的方法。铐的时候旁人听到她们的胳膊关节发出“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时，宋有义得意洋洋地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子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张淑香那天刚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每一个所谓的“管教干部”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土皇帝”，他们在自己的辖区之内为

所欲为。右派囚犯们没有任何的机会和渠道控诉他们，“罪人”是没有申诉权利的。而刽子手们是那样的卑鄙、懒惰、猥琐，他们虽然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是在极权主义体制中，他们自己也没有安全感，按照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美国作家威塞尔的说法——“他们也是恐惧的囚徒”，他们是凶猛的野兽，他们也是冷酷的机器。像宋有义这样以折磨女性为快乐的家伙，恰恰就是一个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器所制造出来的“变形金刚”。我们有时会感叹说：怎么会有这样丧尽天良的人？他也有姐妹和母亲啊！但是，确实有一大批这样的家伙，正如美国学者阿伦·哈斯在《大屠杀后遗症》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虽然大屠杀曾使人们陷入怀疑或者内疚，同时也揭示出人们是多么轻而易举地杀戮与折磨同类，而且居然相信这是一件正确的甚至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它表明，人类很容易抑制住同情心。”对于某些共产党干部来说，革命就是杀戮，就是消灭敌人，同情心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右派们不仅要忍受肉体和精神的非人折磨，他们的私人财产还被非法侵占。即使是死去的右派，他们亲属也得不到死者的遗物——稍有价值的遗物都被管教干部侵吞了。农场医务所所长陈天堂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虽然不懂多少医术，却因“政治上可靠”而占据了这个重要位置。陈天堂对生病的右派极端残忍粗暴，有一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着：“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种“过度联想”导致了无数“莫须有”的冤案。许多重病人根本就得不到基本的治疗，他还不允许将其转送上级医院，病人只好像牲口一样死去。由于陈天堂具有“死亡宣布权”，死者的个人财产往往被他据为己有。一位学医的右派当时也在医务所工作，后来农场幸存的右派被释放后，他被留下来工作了六个月，工作是给农场饿死的一千五百人制造“病历”，以便向上面汇报这些人都是“自然死亡”。在从事这一规模庞大的造假工作时，这位医生惊奇地发现，死者花名册上“遗物”一栏，大多填写的是“床单、褥子、棉袄”等，没有一个人填写有“现金、国债、手表”等。而据他的记忆，当时不少死者身上都有一定数量的财物。此时，他才恍然大悟：这些财物都落入了陈天堂以及级别更高的农场管理者的腰包。这些集中营的管理者们，都有一颗蛇蝎一般的贪婪之心。他们号称“党的忠诚卫士”，但他们跟那些送犹太人进毒气室之前捞走所有财物的纳粹分子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他们就是一群法西斯野兽。

后人也许难以想象狱卒们的残忍和贪婪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他们是制度产生的怪胎，他们也是制度的巩固者。这些贪婪而凶残的家伙，后来基本上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在长期充当绞肉机上忠心耿耿的螺丝钉之后，他们安然退休、欢度晚年。对于他们来说，道歉和忏悔简直就是来自于外星的语汇。

“贱民”也要活出尊严来

苦难让某些人沉沦，苦难也让另一些人升华。有的“贱民”沦落为野兽，也有的“贱民”依然保持着不可剥夺的尊严。一本黑色封面的《夹边沟记事》，好像是一片厚厚的乌云，压在读者的心头上，让人透不过气来。但是，偶尔也会有一缕灿烂阳光透过乌云，照亮人们的心扉。

《夹农》的主人公是女右派李怀珠的名叫“夹农”的婴儿。在艰苦的条件下，李怀珠把孩子生了下来，于是难友们成了孩子共同的母亲。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一名作为“积极分子”的女右派豆维柯，平时经常向上级打小报告，却一次也没有告发过。有一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使得大家对她的看法有了极大的改观。

一名女右派回忆说：“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有结过婚成天阴着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我也流过眼泪。我抱她就像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这段柔情似水的话，让我想起了那部著名的电影《美丽人生》——在纳粹的死亡集中营里，父亲竭尽所能、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为孩子营造出了一个幸福和快乐的氛围。我想，在恐怖的夹边沟农场，究竟是大人们在关爱孩子，还是孩子的出现拯救了这些即将沦落的灵魂？孩子是天使，是善，是美。孩子是最柔弱的，孩子却是人类伦理底线的捍卫者。孩子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最后的那点善良。

另一个关于逃亡的故事同样让人感动不已。高吉义是罕见的一名从夹边沟农场逃亡成功的右派。在逃亡前夕，他的木工师傅、老右派骆宏远已经病重了，也毅然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参与逃亡。他哀求高吉义带自己一起出逃。尽管知道老人身体虚弱，但高吉义不忍拒绝老人的要求——那是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两人趁着夜色搀扶着上路了。

走出数公里，师傅再也走不动了，徒弟便背着师傅跌跌撞撞往前走。再走一段，高吉义自己也累得走不动了。两人在荒野中休息片刻，徒弟想继续背师傅走，师傅却再也不肯起来。骆宏远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脱了，便叫徒弟一个人走。高吉义哪里忍心将老人扔在荒野中，绝望之下，便说要背老人回农场去，尽管会遭到重罚，但总比将师傅一个人扔下冻死好。师傅却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

在师傅的逼迫下，高吉义只好独自逃亡，他将棉大衣留给了老人。几年以后，他才得知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当农场的追捕人员来到两人分别的地方时，他们发现了一件血迹斑斑的棉衣和残存的人骨头。原来，骆宏远老人被荒原上的恶狼吃掉了。饿狼固然凶残，但是严酷的专制制度却比恶狼更加凶残；恶狼吞吃了几个、几十个人，专制制度却吞噬了数千万的人。高吉义呼喊老人的名字，他知道是老人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了自己的生存。

女右派们共同表现出来的对婴孩无私的母爱、高吉义和骆宏远师徒俩互相把生存的机会让给对方，这些都是极限状态中人性所绽放出来的灿烂光芒。奥地利哲学家弗兰克本人也是集中营中的幸存者，他在《活出意义来》一书中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因此，任何人就是处在这种情境下，根本上都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来决定他要成为什么样子。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这句话，在我结识了那些烈士后，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他们的痛苦和死亡，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丧失。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的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我想，那些给予夹农以母爱的女右派们，以及宁可自己牺牲也不连累徒弟的骆宏远，他们都保持了人性的尊严。他们的肉体可以被消灭，他们的名字没有被流传，但是他们反抗厄运的勇气、他们对同类满腔的爱，却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这个深陷于黑暗中的民族获得精神重生的希望。自由和尊严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正如弗兰克所说：“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韧、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至变得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得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

当有人问一位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人类从大屠杀中学到了什么？”他答道：“人类从大屠杀中学到的就是：可以杀死六百万犹太人而无人过问。”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性。然而，纳粹的暴行毕竟已经大白于天下，首要分子早已被送上了绞刑架，像艾希曼那样的漏网之鱼也陆续被抓捕归案。在今天的德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如果谁要为希特勒的暴行和主义叫好，他就会像一只过街老鼠一样被人人喊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犹太人的悲剧并非无人过问。

真正无人过问的中国人——比犹太人的命运更为悲惨的，是中共治下历次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被虐杀者，其中就有数以万计的右派。在中国，已经死去的人无人过问，而幸存者仅仅是“摘掉帽子”而已。他们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和一句话的道歉，在官方的历史书中关于“反右运动”也仅有含糊而简略的几行字。亲手实施这场迫害和屠杀的元凶毛泽东，在今天依然是大部分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偶像，他那猪头一样的照片依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那肥胖的躯体依然被安置在庞大的纪念堂的水晶棺里。即便是在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高潮中，有两名湖南青年用油漆污染毛泽东的巨幅头像，号称追求民主的学生们居然将两位勇士扭送公安局。后来，两人被判处重刑，据说其中一人已经被折磨疯了。正是这一事件开启了我对八九民运的全面反思——一群崇拜毛泽东的青年，能够理解民主的精髓、能够成为民主制度的建设者吗？让人悲哀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毛泽东这个杀人恶魔依然占据着天使的地位。在腐败横行、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血腥的毛主义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东北失业工人的游行队伍中，毛的头像被高举着；在以“左派”自居的剧作家张广天的话剧《格瓦拉》中，对毛大肆吹捧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他是在宣称自己站起来了。确实，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之外，中国究竟还有谁站起来了呢？连刘少奇、彭德怀和林彪这些“开国元勋”都没有能够站起来，他们一个个被毛整得身败名裂、死不瞑目。数百万知识分子成为“牛鬼蛇神”，数千万农民被剥夺了连皇权时代都有的“逃荒”的权利而被活活饿死。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毛泽东对人的戕害、对文化的戕害、对自然的戕害，都远远超过了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天皇和斯大林。我相信，如果在地狱里将这些恶魔排座次的话，毛泽东一定会坐上头把交椅的。

毛是当代中国灾难的源头，毛是千千万万个夹边沟的缔造者。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公众话语系统中，毛依然是一个不可批评的神话。敢于公开指斥毛的罪恶的，只有李锐、吴祖光等少数风骨嶙峋的老人，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少有人跟上。近几年来，我到若干所重点大学作讲座，当我谈到毛的罪恶、痛斥其为“独裁暴君”等时候，教室里的青年学生们大都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这样评说“伟大领袖”。许多同学纷纷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我的看法，他们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号召大家勒紧裤腰带，研制出了原子弹，我们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吗？美帝国主义早就侵略我们了，那样我们死的人会更多。”他们说：“搞大跃进，是毛主席好心办了错事，他内心深处还是很爱人民的，他就是农民子弟啊，当时他不是连最爱吃的红烧肉也不吃了吗？”

听到这样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不禁悲从中来。研制原子弹难道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拥有原子弹仅仅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独裁统治。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谈判的时候，就扬言道：“如果打仗，我们互相使用原子弹，中国死个几亿人我也不怕！”他哪里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老百姓在他心目中渺小如蝼蚁。在国际舞台上耀武扬威的赫鲁晓夫，面对这样一个残忍的流氓无赖，只好摇头而去。而在毛泽东的“节俭秀”背后，他的奢

侈和淫荡连古代最荒淫的帝王也望尘莫及。就在夹边沟以及全中国都饿殍遍地的时候，毛泽东一边做出“不吃红烧肉”的姿态，感动得身边那些来自农村的警卫员个个都热泪盈眶；一边却依然下令在全国各地马不停蹄地修建豪华行宫。其行宫规模之巨大、数量之众多，连康乾盛世的满清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仅在湖南韶山冲修建滴水洞就耗资三千万人民币，相当于今日的数十亿人民币。同时，毛泽东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拒绝苏联提出的数百万吨粮食援助，而这些粮食完全可以拯救上千万人的生命。

不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避免夹边沟悲剧的重演是不可能的，要使中国进入一个文明和民主的时代也是不可能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是党的领袖还是天子，意指毛泽东个人权力现象的两个方面：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即现代西方式政党的领袖，但又是处在一个视领袖为天子的文化环境中。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形成了一种混合或者说兼收并蓄的政治文化。把领袖看作天子这一传统观念，在这种文化中仍占重要地位。”今天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心态依然还停留在帝国时代、专制时代，诞生并孕育毛泽东这样的魔鬼的土壤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夹边沟的苦难并没有真正划上句号。

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个个都“一穷二白”。在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国家里，将昔日的“资产阶级”全都消灭光了，而毛泽东自己却是唯一的一个“资产阶级”。当毛泽东将全体中国人都变成“赤贫阶级”的时候，他自己却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他的稿费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当时就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我相信毛泽东一定会荣登中国富豪的榜首，他当之无愧的是“中国首富”。如今，他的所谓的“稿费”收入，已经积攒到了数亿人民币。这笔巨款依然被供奉着作为对毛的特殊“纪念”。将来有一天，当民主降临中国大地的时候，我建议用这笔巨款来建立一个“毛泽东赔偿基金”，这个基金作为“国家赔偿”之外的补充，专门赔偿给那些被毛残害的民众本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其中，当然也包括夹边沟农场的数千名死难者和数百名幸存者。但愿那一天早日到来。

夹边沟的罪恶与死亡

——读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所经历的内战、暴政、屠杀和饥荒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打着“解放”旗号的政权，却对其人民犯下了前无古人的罪孽；一个自称“大救星”的领袖，双手却沾满了数千万民众的鲜血。即便把德国希特勒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与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全部加起来，其罪恶与死亡都无法跟毛泽东时代千千万万个“夹边沟”相比。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以及红色高棉的大屠杀，都已经曝光在全世界的面前。在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里，人类对自己同类所犯下的残暴而血腥的种种罪行触目惊心。

然而，中国的“夹边沟”迄今为止依然被遮蔽在历史厚厚的帷幕背后，在“夹边沟”曾经发生的一切并不为大多数国民所知晓。“健忘”是深陷与苦难与黑暗而无法自拔的中国民众唯一的麻醉剂。多年以来，中国既没有史诗般的《古拉格群岛》，也没有个人化的《安妮日记》。这种记忆的“缺席”状态，使我们一直像奴隶一样生存在屈辱之中。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到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从当事人勇敢的讲述到后来者不断的追索，“夹边沟”的真相终于一点点地暴露了出来。

死亡是如何来临的？

西北民族学院的退休教师和凤鸣就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之一。一九五七年，在《甘肃日报》工作的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从此，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开始了一段苦难而恐怖的人生。不久，丈夫在夹边沟农场被折磨而死，和凤鸣本人则侥幸生存下来。四十多年之后，她终于拿起了笔，记载下那段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地狱之旅。

“劳动教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有的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惩罚制度，也是共产专制政体下消灭政治异议人士和某些没有资格进入“新时代”的阶层的有效工具。在毛泽东时代，“劳动教养”与死亡密切相关，《经历》中就描述了许多悲惨的死亡。尤其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饥荒中，外面的老百姓尚且大批死亡，更何况奴隶集中营里的右派分子呢？难友刘学琨在十七岁就参加甘南农民起义，领导者是其四叔刘余生。在刘学琨被迁入安西十工农场之后，很快就饥饿而死。临终前，他托人给难友马英送去一本笔记本，首页写道：“马英同志，你如果能活着出去，请一定转告我的四叔刘余生、省委书记高键君，就说，我是被饿死的、冻死的、折磨死的，我是无罪的。”刘学琨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也饿死在夹边沟。傅作恭兴致勃勃地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却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夹边沟。一九六零年三月，傅作恭再也无法支撑高强度的劳动了。同是难友的美学家高尔泰向管教干部赵来苟汇报说：“傅作恭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是黑屎！”赵来苟说：“我拉的也是黑屎！谁让他当右派，他如果不当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好东西。”傅作恭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告诉管教干部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他命令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围成一圈，前面绑着半截绳子，后边也绑着半截绳子。傅作恭仍然背着草筏子，前边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走不动跪倒在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将他拉起来继续向前走。三

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来了。当难友们把他拉到新添敦的时候，原兰州大学医学院教授、现劳教分子刘逢举走过来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在饥荒的高潮期间，夹边沟满山遍野都是右派分子的尸体。难友张露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小三去荒野捡柴禾。在一个大沙窝旁，母子俩捡着捡着，小三突然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她抬头望去，才发现那是一具被沙子半掩盖着的尸体，头脸都黑黑的，露出一只手也是黑黑的。她回头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又发现六七具未埋好的尸体，连本人的被子都没裹，就那样暴尸荒野。随着父母到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孩子，早早地就见到了死亡，暴尸荒野的死亡！

这些死者，大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于精神变态的独裁者毛泽东来说，折磨并消灭知识分子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就在右派们在无数个“夹边沟”里悲惨死去的同时，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里上演“不吃红烧肉”的“减肥秀”。在这个魔鬼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和尊严微不足道，他的子民仅仅是一串统计数据而已。

凶手是怎样炼成的？

毛泽东固然是这场苦难的制造者，但如果没有大量忠实的凶手和走狗的话，他也无法实施庞大的虐杀计划。这些中共权力体制下的“螺丝钉”们是如何忠心耿耿地执行领袖的杀人命令的呢？这套精密而庞大的杀人机器是如何启动的呢？学者凯尔曼在分析纳粹集中营的结构时指出，在三个条件下，普通的德国人转变成了德国集体罪行的刽子手：第一，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第二，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第三，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夹边沟的管理者们也是这样迅速“由人变魔”的。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这些农场的场长、队长、管理员，仅仅是金字塔底层的“芝麻官”，他们却掌握着无数右派分子的生死存亡。在“国家”和“党”的教唆与鼓励下，他们没有丝毫的“良知的弹性”，而是变本加厉地实施“上面”的命令，导致了死亡像瘟疫一样在“夹边沟”里蔓延。

《经历》中记载了在夹边沟农场新添敦站的诸多惨剧：一九五九年三月，站上组织大队人马劳动，早晨五点起床，站上用夹着谷糠的小米熬了稀米汤，供大家吃喝。因米汤太稀，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放上毛巾，把饭盆端来的稀米汤倒在毛巾上，汤里的水分渗走了，小米和谷糠流在毛巾上。这样就能得到少许小米，吃进肚里还能顶用。这种做法很快被管教干部发现，一个正在这样充饥的右派郭斟玉被抓住，在他的短大衣里发现了一堆小米。管教干部当即将郭吊到一间房子的房梁上示众。六个小时之后，吊郭斟玉的绳子断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头颅变成褐色，两个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气绝身亡。

另外有一位难友从地窖中偷了一个老番瓜、几个洋芋，被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当即命令下边的管教干部脱去他的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衬衣，用麻绳将其捆结实，扔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刘扬长而去。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干部这才想起来。但是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一夜之间已经将这位难友冻成了冰棍，哪里还能活过来？

有个原省检察院二十多岁的干部张雨沛，被打成右派之后也押到了夹边沟。他编了一段顺口溜说：“祁连山戴帽，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被人告密之后，由场方汇报到张掖地委。地区法院将张雨沛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后于九月判处死刑，在新添敦就地枪决。和凤鸣叹息说：“这一‘杀一儆百’的暴行，使每个难友胆战心惊，绝望到了极点，他们经受的真是人间地狱的苦难啊！”

这些案例还只是夹边沟的死亡和罪恶的冰山一角。像赵来苟、刘振宇等有名有姓、作

恶多端的管教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毛泽东政权的坚固基石，他们对毛泽东的指示深信不疑：阶级敌人都不是“人”，我们要将他们像蚂蚁一样消灭。所以，在赵、刘等人身上要寻找人类的基本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无异于缘木求鱼。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是，毛泽东的罪恶并没有得到彰显，这些帮凶们也并没有受到惩罚，他们比那些被追捕到天涯海角也不安身的纳粹分子幸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暴力和血腥为基本特色的“毛泽东时代”并没有真正过去。暴力依然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信仰。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以及他们的接班人依然在掌握权力，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中国的土地上。

尊严是如何消失的？

毛泽东的“国家恐怖主义”为何能够畅通无阻地“落到实处”？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是，即便在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也罕有公开的反抗？我认为，首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建构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最残暴的国家专政机器；其次则是因为毛泽东泯灭了中国人最后的尊严感和高贵感，将中国人降低到只知道“活着”的、植物般的、最低级的生存状态。英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分析纳粹主义风行德国的原因，他指出：“杀害和毁灭的景象使被激发起来的人都逃离了，而绝大多数的人更愿意闭上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但首先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与大规模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它不是公众所喜，而是公众的冷漠，这种冷漠‘成为了无情地围在千千万万个脖子上的套索的一根加固绳’。”与之相似，毛泽东时代绝非“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与人之间隔绝、敌视、仇恨、斗争的时代。作为一名心灵惨刻、生性凉薄的权谋大师，毛泽东深知：分割开来的民众是最容易治理的，一旦人民懂得“相爱”的道理，撒旦的权柄便走到了末日。因此，他提倡“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任由百姓在自己的手掌心中自相残杀。毛泽东帝国的反抗者远远比纳粹帝国的反抗者少，这也说明中国人残存的尊严更少、中国人患上的冷漠病症更重。

什么样的暴政能够将“知书达理”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知识阶层“改造”成抢着吃蛆虫的行尸走肉？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暴君能够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却做到了。和风鸣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农场财务处的张振英从二站转悠回来，说：“二站的右派把指头粗的长蛆也抓来煮着吃，叫站上把煮蛆的茶缸子给没收了。这些右派咋真不讲卫生，吃死了咋办？”对此，作者评论说：“我的难友们如果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在目前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救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却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

作者还讲述了省建工局出现了一件奇事：建工局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分子共八人，六人死在农场，两人被“抢救”回来。五月间，一个被宣布“死亡”的人，却突然出现在办公楼里，吓得大家惊慌失措。原来，此人名叫曹德明，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荒的日子里，他昏死过去之后被难友拉出去埋葬。难友胡乱在他身上盖点土便回去了。他苏醒过来后，被一个放羊人救起，辗转回到兰州。那么，埋葬他的难友为什么发现他活着却没有将他救回呢？后来人们分析只有一个原因：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如果他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都不会给他。为了两个馍，他便把曹德明留在了荒野中自生自灭。

两个馍比一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这就是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伦理逻辑。我们很难谴责那个为了两个馍而对难友见死不救的搬运者，因为他本人也是个可怜的受害者。这种精神伤害比肉体杀戮更加可怕，它取消了“人何以为人”的前提条件。《圣经》中说：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八章四节）

这句话乃是人类文明得以建构的基石。先有了神对人的眷顾，才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相爱。有了爱，才有了文明、尊严和勇气以及一切高贵的品质。而作为撒旦的化身，毛泽东所致力的是恰恰是消灭爱、尊严和文明。在夹边沟里，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罪恶的计划。

然而，毛泽东的成功仅仅是暂时的成功。爱和记忆终将恢复人类的尊严，中国人也必将摆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世界。这，也许就是和凤鸣和其他幸存者写作的动力所在吧。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三日

UnRegistered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一百多年来，“北大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和价值皈依。“北大精神”就是启蒙民众、质疑权力和抗争不义，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杜鹃啼血、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北大”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也远远超越了“最高学府”的身份，它一直处于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冲突、撞击的风头浪尖上，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宛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滚滚长江水。北大既充当过“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先锋，也曾沦落为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谓辉煌与挫败并存、光荣与耻辱同在。

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之后，“北大精神”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遭到了强权的整肃、压抑和篡改，已成残缺之状。最近十多年来，北大与其他中国的高等学府一样，盛行着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和恬不知耻的功利主义，相当大一部分的教师和学生打着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旗号，心甘情愿地成为权力的帮忙和帮闲。

刚刚在各大媒体上炒得火热的北大女生弓琳缴纳一万多元党费的事件，就是北大现状最为突出的展示。这个漂亮得足以去充当某网络学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让我联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个更加美丽的北大女生——林昭。林昭与弓琳形成了一组非常鲜明的对照：一个为了捍卫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则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业，以一脸天真状完成了连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尘莫及的一流表演。以“林昭”为象征的北大是光荣的北大，我为之而神往、为之而骄傲的北大；以“弓琳”为象征的北大则是丑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弃、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商业秀·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来，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于通过作秀来捞取个人资本——克林顿访问北大时，就有一个名叫马楠的中文系女生当面对“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是担负着从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负重“敌营十八年”的伟大使命，那么以我的智力简直就无法解释马楠女士何以打出这种“翻天印”来。

马楠给我带来的疑惑还没有消除，另一个名叫弓琳的小师妹又粉墨登场了。此人先是因为担任某网校“形象代言人”而一举成名，在获得一万多人民币的报酬后，立即作为党费上交。在媒体上我看到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当时，一名老师问道：“你是要把这些钱全交作党费吗？”弓琳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这是我第一笔劳动收入，我认为真的很珍贵。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给党。这是一个年轻党员对党表达的小小心意。我愿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热爱。”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体的热烈追捧。数日之间，相关报道就有数千条。看来，弓琳将来如果再接再厉的话，有可能被纳入“雷锋——欧阳海——张海迪——李素丽”的“模范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几个著名网络论坛上，对此几乎全是负面评价，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商业炒作。就连与弓琳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也表示了这样的猜测：弓琳很好，但也许背后是网校的又一次商业策划。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这一猜测被证实了：记者在访问

弓琳之前两小时，电话采访了网络学校的老板王跃胜。王说，弓琳事前没有和他商量过，他也是第二天看网络新闻才知道的，他很支持，“这说明我们的小姑娘爱党”。但是，弓琳却对记者说漏了嘴：“我说我想把第一笔代言费交党费，王总很支持。”记者立即追问说：“但是王总说他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此，弓琳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只好顾左右而言它：“也许他有他的考虑。”

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话，两万元能够买多大版面的广告呢？两万元的广告费用能够让这所网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于是，他们便合谋选择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营销计策，果然一举成功。

如果仅仅是一场商业秀的话，我丝毫不感兴趣。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它不仅是一场商业秀，更是一场政治秀，同时也将北大传统牵扯进来。弓琳强调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的两句话就是：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须追求自己的生活，只要你自己心里纯净就够了。别人评价你多么有心机，这些都不重要。这次举动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日来她却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类记者的采访。《南方周末》的记者敏锐地写下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在采访的中间，弓琳的手机响了，她接电话，显然谈到了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对呀，很牛吧。哪一张报纸上有报道……”显然，她并不是不在乎媒体的报道。很快，她又参与中央电视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称的《聊天》节目，作为特邀嘉宾与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广大人民要爱党爱国。因此，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问：究竟是谁最先将此事捅到媒体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还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网校的王老板呢？

在每次采访中，弓琳都得意无比地谈到身上的两重光环：“现在我身上有两个最大的光环，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入党。这笔钱交给北大党委，同时回报北大和党，我觉得这机会太好了。”她以一种“谦虚谨慎”的口吻回顾自己的中学时代入党的经历以及对北大的热爱：

“十八岁就入党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么苛刻的条件下。那时候，入党属于非常荣誉性的东西，相当于给你一种光环。北大是另一个光环。正如一位老师所说，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费北大、享受北大。因为北大给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实我和北大的关系，我和党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关系，我完全是个消费者，没作什么贡献。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是愿意做的。”这是一个无比聪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胆相照”的表白。其实，只要对北大精神稍稍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说的这两个“光环”不仅不能“重合”，而且互相对立——“非党化”是大学精神得以确立的前提。北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的专制主义和党化教育。中共的愚民政策对教育和文化的摧残都是空前的。一个依靠暴力来支撑的政权，一定会把文明当作“不安定力量”。因此，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着选择反抗专制和暴政、坚守民主和人权的人生道路；而选择做一个死心塌地的奴隶党员，也就意味着放弃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为权力架构中的一颗“螺丝钉”。

在两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种选择的是林昭，作出后一种选择的是弓琳，这两个北大女性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北大两个时代不同的“校格”。林昭的同学孙文铎在一篇回忆林昭的文章中这样写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决不低头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长、教授、学生中的最佳体现。可以坚信，这种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压制不住的，它将会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发扬光大。”我同意孙先生的判断，但同时我又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像弓琳之流的北大学生、像林毅夫之流的北大教授、像吴树青之流的北大校长，最近二十年以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他们肆无忌惮地败坏着北大精神，他们却被当作新时代的“北大代言人”。这是北大的悲剧，这是北大人的耻辱。

被忘却的林昭

谁是林昭呢？当大部分北大学子都忘却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女作家方方却写下了一篇题为《林昭的光芒》的文章：“静夜之时，总会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审视着这么容易忘却又这么容易满足的我们。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着果敢和无畏。她仿佛在说：历史就这么过去了么？你们就这样轻易地原谅了专制原谅了灾难原谅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们自己？她的诘问令我们霍然而起。她就是林昭——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取自由，在监狱中惨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亲交上五分钱子弹费而被枪杀的林昭。”一九六八年林昭惨遭杀害之后，北大的湖光塔影依旧；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北大的湖光塔影依旧。然而，今天的北大，除了长袖善舞的弓琳之流外，还有多少人在记忆、在沉思、在呼号、在呐喊呢？方方接着写道：“偶尔的时候，也摊开自己的双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这也是我想对自己说的话、想对那些尚未“奴在心者”的北大校友们说的话。正是因为呈现了这些带着血迹的文字，方方主编的《今日名流》杂志在两年前才被迫停刊——依然还有那么多丑陋的家伙不敢面对林昭。

对于今天的北大和今天的中国来说，林昭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低估。钱理群教授在《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一文中指出：“林昭是凭‘感性的直觉’去‘行动’的；因此，她不同与张中晓、顾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战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动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难的殉道的‘圣女’。”她比绝大多数同代人更早地透视出了毛泽东的专制魔王和嗜血独裁者的本质。在那最黑暗的“毛式法西斯”统治的时代里，林昭如同当年拯救法兰西的圣女贞德一样，用生命激活了北大的文化命脉，并且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精神高线”。要求人人都成为林昭是不现实的，但至少我们应当保留仰望林昭、敬重林昭的那点青春热血和心灵渴求，我们必须承认林昭比我们高贵而不是去嘲笑她——如果连这点“道德底线”都没有了，北大人何以成为北大人？知识分子何以成为知识分子？假如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去学习弓琳的那点“厚黑之术”，那么林昭也就遭到了第二次更加残酷的谋杀。

在带有很大的“自白”性质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里，林昭最频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录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曾对林昭列有“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对此，林昭大义凛然地批驳说，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钱理群教授特别指出，林昭又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这也很值得注意。林昭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并作了这样的发挥：“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面对着林昭数十万言的血书，钱理群感慨地说：“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探讨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身即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与思想价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说，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大概也是要强化这一点。”早在四十多年前，林昭就认识到并毫不畏惧地宣布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邪恶。我想，这些林昭在监狱中用血写下的文字，是值得作为时代弄潮儿的弓琳们好好捧读的。

当“谁是林昭”在北大成为“真问题”的时候，当言说林昭依然是“禁忌”的时候，电视屏幕上就只能飞舞着弓琳和倪萍那“忠党爱国”的泪花。林昭的同窗好友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写道：“她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

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體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从那个黑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人们发现，林昭在共产党监狱里的遭遇，比起江姐在国民监狱里的遭遇来，不知道要悲惨多少倍。我想追问的是：故作天真无瑕状的弓琳小姐，假如知道了林昭的遭遇，会不会更热爱她的“党”呢？

光环与丑闻

我在“关天茶舍”的网络论坛上读到一篇署名周秋鹏的、题为《光环与丑闻》的短文。同一天的报纸上有两则截然不同的新闻：一条是北大女生弓琳交了一万多元的党费，另一条是一名在北京某洗浴中心卖淫的女子，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体地往外逃跑。前面一则新闻的主人公被记者写得金光灿烂，后面一则新闻的主人公则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对此，作者若有所感地写道：“首先我觉得她们在我眼里是相同的。她们两个都是人，都是父母生的，都有居民身份证，也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己的尊严。借用《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一句话，叫‘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两个平等的人，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那就是挣钱。她们在挣钱的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给别人提供服务。当然在名称上稍微有点区别：那个女生做的，叫形象代理；那个女子做的，叫卖淫。但在本质上都是用自己的身体为别人提供服务。结果也差不多，她们都用自己的身体挣到了钱。然后，她们挣到钱的用途，那女生是用来交党费，那卖淫女是用来养家糊口。我看也没什么区别。至少我无法分出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借用那个女生的说法，都是属于‘很私人化的事情’。”将北大女生弓琳与妓女放在一起，既非故意贬低弓琳，也非刻意抬高妓女。这是一种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少有的宽广的人道主义立场。

然而，两人却拥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一个人像凤凰一样珍贵，一个人像泥土一样卑微。作者接着写道：“那个女生的举动被新华社宣传，然后又受到各个重大媒体的报道，成了一个热点人物。面对记者的采访，她神采飞扬、轻松自在地谈着自己身上有两大光环，一个是北大学生，一个是十八岁入党，当然现在又做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然又要多个更大的光环了。而那个卖淫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在正在用自己的身体为别人服务的时候，警察冲了进来。在那些五大三粗的警察面前，她没有来得及穿上衣服，可能也没有机会穿衣服，怀着极度的恐惧与羞耻，这个年轻女子赤身裸体地往外逃跑，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警察的抓捕，但她被更多的警察拦住了，而且她的举动也上了媒体的社会新闻专栏。作为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身上的丑闻肯定比那个女生的光环多，现在又做了这么一个举动，还上了报纸，自然又要多个更大的丑闻了。”两个年龄相近的女孩，却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生，真是发人深省。最后，作者用一种平静后面蕴藏着闪电雷鸣的笔调写道：“我在为这两个年轻女子进行比较的时候，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尽量不让自己的文字带有任何情绪的色彩。但是我的脑子里也总是在出现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孤立无援的卖淫女，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体地往外逃跑的样子，她的处境是那么的绝望与窘迫，是那么的恐惧与羞耻，我总是忍不住为她心痛，为她流泪。”

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光环”与“丑闻”倒置的“反义社会”。我们歌颂着那些卑鄙的人物，我们凌辱着那些可怜的灵魂。我们把小丑当榜样，我们把圣徒当笑料。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位裸体狂奔的女子的命运，却有无数双羡慕的眼睛盯着弓琳灿烂的笑容。我们学会

了以一种跟良知对立的方式来悠哉游哉地生存，或者干脆就将良心悬置起来。英国学者巴特勒在《盖世太保史》中分析了纳粹时期的民众心理：“许多德国人擅长所谓‘内心迁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里，而同时采取服从、驯服的形式。这就产生了纳粹政权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监督高效率地控制社会。……在这种形势下，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很快便不再持有不同的思想，而且开始支持政权，与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并服从它地要求。顺从要比反对容易。岂止容易，甚至还会有奖励。”当说谎成为生存的前提的时候，当认同罪恶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的时候，“吃人”便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巴特勒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希特勒德国，这也恰恰是今日中国的生动写照，也是弓琳缴纳党费的内在动因——林昭因为说出真话而惨死，于是人们在林昭的尸体前面止步；弓琳因为主动配合作为导演的“老大哥”（奥威尔《一九八四》）演出了一出声情并茂的好戏而飞黄腾达，于是人们便在这条道路上蜂拥而上。林昭被掩盖在幕后，而弓琳则出现在聚光灯的中央。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们是如许的美丽——林昭的美丽既是外表的美丽，更是灵魂的美丽，这种美丽是黑暗中的光，从天上来的光，照亮最为难熬的夜半时分；而弓琳那张漂亮的脸蛋，远远不足以遮盖她内心的虚伪和肮脏，她没有杀人，但是我为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迹。

我写下了这篇文章，也写下了对林昭的敬仰和对弓琳的鄙视，同时还写下了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与呼唤。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

自由之魂：从雷震到林昭

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是一种纸上的理论，乃是一种生命实践方式。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辨析自由主义内部各流派的异同，固然有其价值，但在中国更重要的却是“为自由而生活”。这是一种与专制抗争，与一切让人不自由的制度抗争的生活姿态，有时需要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均笼罩在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之中：台湾笼罩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戡乱条款”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大陆则持续展开了“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一系列以知识分子为整肃对象的政治运动。尽管外部环境极其险恶，海峡两岸都涌现出了若干“我以我血荐自由”的优秀知识分子，雷震和林昭就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理念，并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诚心诚意地身体力行。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到了孤岛台湾。第二年，台湾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著名自由知识分子雷震便邀请了胡适、殷海光、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一直支持《自由中国》，他相信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由于这种自由主义理想的号召和影响，以胡适和雷震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步形成了《自由中国》的强大阵线。他们把直言不讳当作荣誉，对当局措施和时政发表评论时均直抵黄龙，毫不留情，用词遣字针刺当局的痛处，毫无遮掩，极具震撼力。

一九五四年，《自由中国》刊出《抢救教育危机》，痛批党化教育之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开除雷震党籍。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自由中国》出刊“祝寿号”，尖锐批评蒋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抨击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反对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这期刊物轰动一时，一版再版，引起许多国民党官方刊物的围剿。雷震受到了特务的盯梢和恐吓。然而，他毫不退缩，随时准备赴死，并且坚决不请求美国大使馆保护。当时《自由中国》最年轻的编辑、女作家聂华苓在回忆录中写道：“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这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参阅聂华苓《三生三世》）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雷震被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莫须有”罪名，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停刊。胡适虽然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均未被采纳。后人因胡适未能为此案作更多的努力而对其多有垢病，胡适最后也抑郁而终。

最近，我从网上读到雷震长女雷美琳回忆父亲的文章，许多细节让我深有感触。五十年代，雷美琳尚在台湾一所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军训教官出了一道作文题目：谁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人？雷美琳写道，父亲雷震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教官大怒，在课堂上大骂雷美琳不要脸，并教育全班同学说：“最伟大的人应该是国父或蒋总统！”教官还威胁要她退学，并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最后，学校开了三天会，决定让教官走人，雷美琳留下。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著名报人成舍我。成舍我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斗士，在雷震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的時刻，他的这一决定真是可钦可佩。同时，我也为雷美琳的勇敢而感佩不已。在彼岸，张志新的男友向当局揭发其“反革命言论”，顾准的子女与之断绝了父子、父女关系。而雷美琳对亲情的坚守、对父亲的挚爱，让后人的人性中高贵和温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出狱前，狱方借口打扫房间，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来，

发现十年间写的回忆录手稿失踪。他坚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狱。于是，狱方请来“党国元老”陈启天、王云五等劝说。王云五表示愿意下跪，直到雷震答应出狱为止。陈启天是躺在担架上抬来的。雷震无奈，含泪答应离开监狱。出狱后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忆录至今不见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关当局查询，迄今无下落。她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台湾当局声称，要出五百万新台币悬赏回忆录，说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对此，老作家柏杨说：“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对雷家无补偿，是国家之耻。”雷美琳则表示，她将设立雷震纪念奖学金等公益事业。

雷震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监狱生活的代价，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剧结束，但是他的事业却成为台湾民主化的第一块基石。《自由中国》所追求的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政党介入军队、教育及司法独立和组织反对党的自由，都已经在台湾成为现实。台湾学者薛化元对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贡献有着高度的评价，他论述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间的关系自亲而疏而对立，是与《自由中国》坚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国》对民主自由理论由宣传而寻求实践的发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逻辑，配合着外在国际环境的发展与台湾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在当时是几乎无可避免的导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国》停刊悲剧的发生。但相同的逻辑，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却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而这也正彰显了《自由中国》在战后台湾发展脉络中的历史角度与意义。”（参阅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彼岸有雷震，此岸有林昭。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纵观大陆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噤若寒蝉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时代。当一个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经停止了思想的时候，二十五岁的北大才女林昭却开始了她那勇锐的思考。

美丽而坚强的林昭先是被打为右派，然后被捕入狱。她在牢狱之中，一边忍受着残酷的折磨，一边思考着这个民族苦难的来源。监狱的记录《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说：“她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在林昭的血书中有这样让人目不忍睹的片断：“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某某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谏。”

在一个不把政治犯不当人看待的监狱中，在受到各种难以想象的迫害的囚室里，林昭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无情揭示了历史迷雾，她发现在革命的旗号下是一场卑劣的骗局。在血书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片断是她设想的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对话。对着这个当时全民无限膜拜的“人间上帝”，林昭斩钉截铁地说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腥风血雨的、惨厉倍常的、臭名远扬的丑剧，是‘官逼民反’。”而她自豪地把自己定位为“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青年反抗者”。在这场虚拟的对话中，林昭淋漓尽致地批判个人崇拜，指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深刻阐述了民主、自由、人权、人道、法律和经济的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的一系列设想，以及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在血书中，她写道：“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的，因为当时我被非法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当时行于之于莱尼斯似乎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经过一九五七年惨烈的反右运动，以及饿死成数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文革大浩劫继而降临这片苦难的土地。林昭所反对所批判的邪恶，在这十年间如同溃疡崩决般发作起来。可以说，林昭是我们民族最早的觉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超过了遇罗克和张志新，她的远见卓

识直到她殉难二十年后才被后人所理解。

林昭的命运远远比雷震悲惨。林昭的好朋友、同是北大右派的张元勋曾经去探望林昭，林昭说，她每天都遭受到受狱卒唆使的女犯们的撕、掐、踢、打，“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掐、又踢、又打，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要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林昭还告诉张元勋，她面临着被狱卒凌辱和强暴的危险，而她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用针线将上衣和裤子缝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枪杀。据目击者描述，当天下午三时半左右，两辆军车开到上海龙华机场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开两枪，脑浆涂地，仆于荒原！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林昭母亲家中。当林昭的妹妹惊恐地打开大门的时候，警察脸上的神情是恶棍杀人之后的得意和对犯人家属极端的轻蔑。这个冷血屠夫只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参阅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许觉民编《林昭，不再被遗忘》）

正如后人所说：“林昭精神是我们民族少有的那种高贵灵魂的一部分。”面对着林昭，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那些帮忙、帮凶、帮闲们，那些以学术自诩的逍遥派们，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和“功勋科学家”们，倘若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和血性，你们会不会在闲暇时刻摊开自己的双手，反思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鲜血？面对林昭高贵的灵魂，我们难道不应当忏悔吗？然而，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忏悔成为人们口头的笑料，历史成为一道遥远的地平线。当金钱成为狂热的信仰之后，回忆也就成为一件多余的事情。

与雷震的回忆录不翼而飞相似，时至今日，林昭的诗歌、著作和血书仍然被关在狱中的铁屋里服着没有终结的刑期。林昭的生命被残害了。林昭的思想依旧遭受禁锢。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在北大的校史中，我找不到林昭的名字。这本厚厚的校史中，有那么多御用学者、流氓文人的事迹，却没有林昭的名字。这也是北大的耻辱，也是我的耻辱。

雷震和林昭显示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高度、思想的深度，他们以殉道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让自己成为一个燃烧着的火把。在他们的身上，隐藏着火种，蕴含着中国文明重生的希望。我们必须走向他们，走向这些崇高的灵魂，接受他们给我们的洗礼和启示。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此次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先生的大陆之行，在大陆媒体上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一个落魄党魁、一个失意政客，似乎比那些来访的欧美元首更受重视和爱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一夜之间就从臭狗屎变成了香饽饽——这是泱泱天朝大国对那些来朝的藩属所惯有的态度和伎俩。然而，在表面上沸沸扬扬的背后，连战此行其实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收获——中共方面未曾表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亦未承诺拆除六百枚针对台湾人民的导弹。因此，“连胡会晤”只是国共两个专制政党的一场“二人转”而已。

连战在北大发表的演讲，谈及萌芽于北大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更迭之后，此自由主义传统在大陆被中共极权主义政权连根拔起，薪火相传至台湾亦遭致蒋氏威权主义政权的残酷打压。有意思的是，连战在解答“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大部分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这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与中共的教科书的说法异曲同工，他认为：“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世纪的最初那二三十年，这个国家所面对的是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整个国家都在列强帝国主义烧杀掳掠下，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贫苦的极致，烽火连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中国人民实在是没有一个那样的环境来冷静地思考，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个深刻理念，当然在校园里面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但是终极在最后，能够吸引、号召青年人的，不外乎还是以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三民主义的路线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两条路线。”这是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学说的一个庸俗化版本。连战希望以此说法来讨好中共方面，却也不经意之间透露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之间“难兄难弟”的关系：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来自于苏俄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国共两党的本质都是“反自由主义”的独裁党。国共两党先后执政、两党的意识形态先后成为主导思想，并非由于两党及其领袖能够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是专制制度较容易在短期内实现社会力量的动员和组织。可以说，以上两种主义都是依靠着变种的列宁式的政党架构、通过暴力杀戮和谎言灌输的手段，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如今，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两大主义均已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在彼岸的台湾，当民众拥有了真实的选举权利之后，他们先后两次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思想；在此岸的大陆，民众仍然没有享有基本的人权，仍然被一党专政的中共的暴力和谎言所劫持，但绝大多数民众心中雪亮如镜。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有一个政治笑话，讲到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因反苏宣传而受审，说他在红场上向过路人散发空白纸张。问他为何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写时，他的回答很合逻辑：“有什么可写的，大家都一清二楚。”——这就是连战先生所谄媚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大陆的真实处境。连战以两大僵尸为圭臬，只能说明他自己也是僵尸家族的成员，台湾早已没有多少人信任他，大陆也没有多少人会敬重他——那些整整齐齐地排列起来欢迎他的人群，全都是中共方面精心安排的，若干场面与金正日所统治的朝鲜惊人相似。在大陆媒体上甚至出现了连战儿时伙伴的采访，说连战小时候摔了跟头也不哭，俨然非同常人。此种造神运动，沿袭于昔日帝王传记，任何一个热爱自由民主的现代公民都会觉得恶心之至。连战先生却不以为耻，反倒甘之如饴，诚可悲矣。

连战临行之前，有台湾的人权组织希望其向中共方面提及杨建利案件等人权事件，这显然高估了连战的人格、骨气和政治抱负。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国民党的现任主席，在访问大陆的时候，有一句话是非说不可的：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留在大陆数以千万计的与国民党及其政权有着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家庭，成为共产党时代被残酷迫害和长期歧

视的对象。仅仅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五十年代，土地改革、镇反运动等，就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在缺乏精确的官方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处决的人数，但城市主要的反对反革命运动可能造成了五十万至八十万人的死亡。”在此后的反右、文革等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更有数百万人成为永远的“贱民”（“黑五类”），他们及他们的亲人统统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参与国共两党的斗争，仅仅是与中华民国政府或国民党有过一丝一毫的联系，就被烙上了终身无法解脱乃至祸及后代子孙的“耻辱之印”。我的外曾祖父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一家药铺，因为他为人正直善良，被街坊推举出来做了几个月的保长。于是，中共政权刚一建立，外曾祖父就被剥夺了所有的家产和行医的权利，被游街批斗，此后被惩罚扫大街二十多年。外曾祖母则被强迫背着磨盘在地上像狗一样爬行，最终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杀。国共两党的残酷斗争，就这样让无辜的小民家破人亡。还有许多曾参与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虽然曾为民族独立建立过不朽的功勋、甚至留下了身体的残疾，在中共治下他们不仅未受起码的尊重和礼遇，反倒成为历次政治运动首先侮辱和打击的对象。我在《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一书中曾经写到一位名叫杨云峰的国民党老兵，这位九十五岁的老汉膝下没有儿女，已沦为一名叫化子。但是，作为长城抗战的主力部队二十九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要积攒盘缠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他把当年的战场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连战主席最该会见的是这样一位民族的英雄。我还在最近出版的《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一书中，读到了数十名当年参加抗战的国民党老兵的照片和简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比别人承受了更多一份的政治磨难。当年选择居住在云南腾冲一地的，就有一千三百五十多位官兵，如今在世的不到百人。看到这写老人衣衫褴褛的照片，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连战主席最该见的也是这样一些民族的脊梁。

这些人是连战先生最不该忘记的，这也是中国国民党必须面对的“历史债务”。我想，连战先生出于客人的礼节，可以不去谴责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但对这些留在大陆、因国民党的缘故而受苦受难的同胞，是否可以说一句安慰和关心的话呢？今年恰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连战先生是否可以对当年留在大陆的、如今还活着的国民党老兵们表示几分敬意呢？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说，连战先生从政多年，当然比我更懂得组织语言、拿捏分寸。然而，让我深感遗憾的是，直到离开大陆的那一刻，连战也没有说出这句最应该说的话来——连主席自然可以轻轻松松地对中共党魁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因为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中共政权的伤害。但是，那上千万被伤害的同胞呢？他们是弱势的、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像连战这样的政客是会不会在意他们的感受的。但是，一个没有历史感和人情味的政治人物，又怎么可以承担起所谓的“破冰之旅”与“和平之旅”呢？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

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李思怡，是女儿，是中国的女儿，是死于冷漠与邪恶的女儿。一个女儿悲惨的死亡，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了自身的罪，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发现了爱的价值。学者任不寐说的不错——“李思怡之死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为了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我们必须站出来，我们必须行动。那么，被终结的时代充满了罪恶、伤痛和眼泪，而即将开启的时代则有可能充满爱、希望和笑声。

在毛泽东之流的恶魔眼中，李思怡之死“轻如鸿毛”。诚然，与独裁者们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庞大帝国相比，女儿、妻子和母亲显得无比渺小和软弱。帝国不会在乎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眼泪——秋瑾、刘和珍、林昭、李九莲、张志新们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而丁子霖和路坤们依然在路上。作为“天安门母亲”的杰出代表，丁子霖第一个站出来揭示大屠杀真相，承受着中共政权长达十多年的监视、骚扰及恐吓，她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与和解。作为“新青年案件”受难者之一杨子立的妻子，路坤由不问时事的传统“贤妻”变成勇敢无畏的妻子，她说：“我用蔑视的眼光看着那些便衣，他们自己处于恐惧中，而不是我们。”丁子霖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儿子，而路坤新婚的丈夫杨子立被判处八年的重刑，这就是“三个代表”的帝国施加给她们的“仁政”。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卑鄙的特务们给丁子霖打去匿名电话，辱骂她“卖国”；同样卑鄙的特务们登门威胁雇用路坤的公司，强迫其解雇工作出色的路坤。所有这些凌辱和折磨女儿、妻子和母亲的恶行，都在以“人民”的名义浩浩荡荡地进行着。然而，女儿、妻子和母亲们并没有屈服，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她们要为李思怡们带来一片蓝色的天空——与海子的追问“天空一无所有，有谁给我安慰”不同，这片天空将充满爱、幸福和快乐，将被安慰、同情和关怀所包裹。丁子霖和路坤们知道，李思怡也是她们的女儿，李思怡需要她们来安慰和拯救。我想，在上帝慈悲的眼里，女儿、妻子和母亲其实是一个人，女儿终究会成为妻子，妻子终究会成为母亲。她们都将是爱、正义及和平的坚守者。

在这个“遗忘”成为一种生存本能的国度里，我们确实应当为李思怡们，为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们做点什么。如果我们习惯于奴隶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也自然成为了奴隶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如果我们依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呢？

日前，在中国大陆的多个独立网站上，一场为纪念李思怡而进行接力的绝食活动正在展开，已经有几百人报名参加。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若干位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正在体验着饥饿的滋味。这一自发的绝食行动是为了对李思怡表达迟到者的忏悔，它既是一种向外伸展的抗议与批判，更是一种直指内心的自尊和自爱。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真实的日常生活还是对于虚拟的网络空间来说，这一事件都具有“震撼性”的价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比“暴风骤雨”更有力量。如同当年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掀起的“公民抗命运动”一样，这次事件点燃了我对于中国未来的信念，这种信念建立在每一个信仰爱与和平的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所谓“胡温新政”的海市蜃楼之上。同时，这一事件也大大地改变了我对网络的负面看法。网络不再是一个我们逃避残酷现实生活的避难所，也不再是一种物美价廉的“精神鸦片”。相反，网络有可能像一张坚固的鱼网，聚集起“沉默的大多数”对自由和权利的呼吁。这种呼吁也正如一九八零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根廷“为正义与和平服务”组织领袖埃斯基维尔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我们相信我们人

民的使命和参与，他们每天都更加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良知，表达着对于他们改变现状、对于社会全面民主化的渴望。这是建筑在正义之上的改变，用爱来建筑。这种社会将为我们带来我们最渴望的和平之果。”在天安门的血泊之后，这种呼吁已经久违了。

我曾经用这样三个词语来形容中国：“太监中国”、“优孟中国”和“流氓中国”。中国的这三大特性在“萨斯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李思怡之死告诉我们，“萨斯时期”并没有结束，我们依然置身其间。孙志刚之死和李思怡之死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再也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了——怡然自得地生活在罪恶之中而不自省，麻木不仁地与黑暗共舞而不自觉。如此残酷的事件已然发生并还在发生着，那么我们如何确立我们自身的尊严、爱与怜悯？在拉美诸国的暴力和专制统治之中，埃斯基维尔选择了非暴力，甚至选择了像甘地一样绝食，他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答词中说：“我相信非暴力的真理的力量代表着一种抉择，这种抉择向我们提出了采用全新视野的挑战。它提供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将基督的基本价值置于优先地位，这就是人类的尊严，人类神圣的、超越一切的、不可改变的尊严，由作为上帝之子、作为基督的兄弟姐妹，因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而获得的尊严。”今天，每一名为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绝食的公民朋友，所作出的也是与之相同的抉择。如果说绝食是一种象征意义，那么我更看重“绝食之后”能够发生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比如建立一个“儿童权利基金会”，并且将对人权的关怀拓展到每个公民的生活中；比如起草并签署一份中国的“七七宪章”，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我们的道德和信仰。

我们需要一个充满爱的中国和世界。在这里，女儿、妻子和母亲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儿子、丈夫和父亲们，能够免受逼迫、诽谤、囚禁和折磨。当然，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在今天就得勇敢地承受种种逼迫、诽谤、囚禁和折磨。这是我们的重负，也是我们的光荣。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五章十至十二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思怡悲惨的死亡不是对我们信仰的打击，相反乃是对我们信仰的验证；不是让我们失望，相反乃是让我们振兴希望。正如埃斯基维尔所说：“我们抱有希望，因为我们像圣保罗一样相信爱是不会死亡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总是用团结和为了人们充分权利的积极活动创造着相互之间的爱。为了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不能仅限于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非正义的识别，或者是随之而来的对那些应负责任者罪恶的谴责。基督徒必须行动，基督徒必须和所有心地善良的人们一道行动，用他卑微的力量去支持一个更加正义和更有人性的世界的建造。”那么，让我们与所有心地善良的朋友们共勉吧。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妻子的绝食日记

在网上发起为纪念死去的小女孩李思怡而进行接力绝食活动的时候，我正走在访问日本的路上。非常遗憾，我无法参与这次绝食活动。但是，妻子却打电话告诉我，她要参加这次绝食，为了她自己，为了我，为了今后将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的孩子。

李思怡悲惨的死亡凝聚了这个时代所有的罪恶——冷漠、贫困、凶残以及无耻。我能够想象到李思怡的母亲向警察们下跪时候的情景，以及警察们惯有的冷酷、傲慢与不屑。他们才不理睬这个女窃贼的家中是否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呢。他们多抓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奖金便有可能增加一点。晚上他们要去喝酒或者打麻将，反正警察条例也没有规定警察必须去关心囚犯的家属，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虽然他们自己也是父亲，但他们只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的良心遗失在成为专制机器的螺丝钉的路上了。

孩子的揪心的哭喊真的没有人听到吗？咫尺之遥的邻居们的耳朵都聋了吗？不是耳朵聋了，而是心灵聋了。这是一个人心比石头还要硬的时代。邻居们根本不会在乎吸毒女和她的女儿，因为她们是“害群之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人们，不仅不会帮助这对可怜的母女，反倒振振有词地谴责她们给社区带来了“麻烦”。于是，孩子的哭喊就像浪花拍打在坚硬的礁石上，毫无反应。

记者采写的新闻被领导枪毙了，这样的新闻当然不利于“稳定和团结”。无奈之下，记者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发表到网络上。一夜之间传遍全国。成都的宣传部门封杀此消息的企图破产了，当外地媒体开始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成都本地的媒体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虽然冒险将此新闻上网的记者最后被报社开除，但换来了正义部分的伸张。

在舆论的压力下，那些残暴的警察因为“渎职”的罪名被送上了法庭。可是，孩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死不瞑目。而我很难设想，那获得了十万元赔偿的母亲，还能继续活下去吗？她要面对的是一个共同谋杀她女儿的世界。据有关媒体报道，李思怡的母亲在被释放之后，已经从其姐姐家中离家出走，不知所踪。

我们听到了孩子的哭喊，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泪水。我们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母亲和父亲。我们的绝食既是一种抗议，更是一种忏悔。我们都是罪人。妻子体弱，老实说，我不愿意她参加绝食。但她心意已定，我也不便阻止。她要通过这种方式与小思怡在一起，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与小思怡在一起。也许，不久之后，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女儿，美丽而聪颖的女儿。今天，我们如果对小思怡的死亡保持沉默；明天，我们将无法面对女儿那亮晶晶的大眼睛。

我在异国的列车上为小思怡和她的母亲祷告，也为绝食的妻子祷告。这是一尘不染的新干线列车，面对雪白的床铺，我羞愧难当。

事后，妻子写下了这篇“绝食日记”，这是一篇比情书更让我感动的文字——

今天是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离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已经三个多月了。我决定参加网上的接力绝食活动，为这个小女孩的死绝食一天。

清晨七点，闹钟响起，我醒来，默默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把今天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或向左，或向右，都必听见心中有你对我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阿门！”

起床后，习惯地打开录音机，在赞美诗的歌声中开始新的一天。歌声响起，是马丁·路德作词 的《马槽歌》——

远远在马槽里 无枕也无床 小小的主耶稣 睡觉很安康
众明星都望着 主睡的地方 小小的主耶稣睡在干草上

众牲畜呜呜叫 圣婴忽惊醒 小小的主耶稣 却无啼哭声
我真爱小耶稣 敬求近我身 靠近我小床边 守我到天明

恭敬求主耶稣 靠近我身旁 爱护我 接受我 做主的小羊
也保护众孩童 一齐都安康 叫我们都能够 跟主到天堂

悠扬宁静的歌声中，我忍不住鼻子发酸。这多像小思怡唱的歌，我多希望——“主耶稣靠近她身旁 爱护她接受她 做主的小羊 也保护众孩童 一齐都安康 叫她们都能够跟主到天堂……”

七点半，我出门去上班，小区里很安静，有老人在锻炼，有孩子在玩耍，还有人在溜狗。他们也许都不知道小思怡的惨痛。我想起鲁迅的文字——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更何况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孩子。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是的，这血痕已经浸渍了我的心。自我知道小思怡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不能好象不知道一样平静如常了。孩子充血嘶哑的喉咙和抓踢出血的手脚已经象尖刀一样插进了我的心。这悲痛和耻辱笼罩了我，我甚至耻于说我为孩子的死而绝食一天，在这样的沉重面前，一天的绝食是多么轻飘飘啊。

路上下起了雨，越发堵车了。车窗外，有很多工人正在摆放花盆，“十一国庆”的彩旗到处悬挂，收音机里的主持人说：“今年准备了数万盆花……天安门的花坛已经摆好了……庆祝成立新中国五十四周年……北京市十一旅游黄金周已经开始，全国数十万游客前将前往天安门……”车内人并肩接踵，个个面无表情，车外大小车潮如涌，互不相让。《圣经》里的一句话涌上我心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八点五十到达公司所在的大楼，总算没迟到。在这座“中央商务区”中心的大厦内，电梯里无数的白领丽人和西装革履男士挤在一起，焦急地看着手表，等待打卡。有人还提着早餐——星巴克的咖啡、永和的豆浆、麦当劳的汉堡……各种香味弥漫。

两位小姐在轻声交谈，一位问：“你不是减肥吗？”

另一位回答说：“这是刚推出的脱脂无糖的健康早餐啊，卡路里特低……”

我的胃开始隐隐作痛，是何勇的歌吗——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像一个垃圾场
人们就像虫子一样 在这里边你争我抢
吃的都是良心 拉出来的都是思想
有人减肥 有人饿死没粮 饿死没粮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九点整，我喝了一杯白水，开始工作。

向信息产业部申办国内互联网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向国家广电总局申办视听节目网络传播业务许可证，向文化部申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业务许可证。

大家在网络上玩的每一个游戏、下载的每一个电影，都要经过这些繁琐的审批程序，由多个国家部委颁发许可证方能与大家见面。而实际上，这些官员们是根本不看电影更不玩游戏的。那他们审些什么呢——

“本公司保证在节目运营过程中时刻接受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政策审查，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党和国家的宣传政策保持高度一致。”

工作时，我总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觉得自己提交这样的保证好象是为虎作伥，愧对对象小思怡这样的强权牺牲者，可另一方面又觉得网络还是有作用的，小思怡的事不就是通过网络才公开的吗。我们还是要争取更多的空间，为网友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可自己心里还是很不安，求主指引！阿门！我祈祷在工作中荣耀主。

在电话、电脑、传真中匆匆忙忙了一上午，我开始感到胃越来越疼，习惯的早餐，忙碌的工作，使饥饿感格外明显。办公室里咖啡飘香，我忍住想喝一杯的欲望，倒了一杯白水。小思怡连一杯水也没有，我佩服那位绝食绝水的网友。惭愧自己的软弱。

中午时间，大家都去吃饭了。我打开信箱。昨天告诉几个好朋友我今天绝食的消息，并请他们也关注小思怡。

有个朋友说：“绝食是为了求得自己良心的平安吗？”

我回答说：“不是求良心平安，而是公开表明自己的抗议态度。不在乎绝食的形式，在乎我们抗议的态度和公开的勇气。”

另一个朋友说：“我们绝食有用吗？”

我回答：“有用，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人多了，就形成舆论，舆论压力可以推动事件的调查解决。孙志刚案件不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最后取得修改收容遣送法的成果吗？”

还有一个朋友说：“好像没人报道她母亲的现况。我一直在想这位看起来不负责任的母亲给孩子取的名字有何含义。“思怡”——像是她的理想。”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思怡”，一个母亲的理想吗……这问题残酷得让人窒息。

同事们吃饭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餐后水果。我感觉更饿了，胃里象伸出千万支手，在抓在挠。我闭上眼睛，想像孩子在门上抓出的血印。

下午的时间格外漫长，我今天也奇怪地格外感到饿。我曾经为加班饿过，也曾经为节食饿过，甚至为赌气饿过，可今天却似乎难受的不能坚持，不过大半天而已啊。可能与经期有关，更可能是上帝要让我真正体会到饥饿的痛苦，不使我陷入游戏式的轻松。感谢主。我知道，主你与欢乐的人同笑，与痛苦的人同哭，亲自担当我们的疼痛。就让我学习你的万分之一，体会小思怡在饥饿和绝望中等待死亡来临的恐惧。

下午开了一下午会，我头昏眼花，手脚冰凉。我体会到人在饥饿的时候会特别冷，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耻辱了，通过这短短的绝食，我不仅没有一点点仿佛做了好事的感觉，相反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挨过饿，没吃过苦，没体会过被凌辱、被欺压、被抛弃、被惨杀的滋味，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天空下，那么多人在受苦，我却没有为他们做什么。我有同情的资格吗？我跟本没有“同”过情，我知道他们的感受吗？

亲爱的主耶稣啊，在苦难中，我才更明白你的爱是何等深！你高洁为神，却为我们来到人间，忍受一切的痛苦与磨难，只为拯救罪人的灵魂！肯求你告诉我当行的路，求你使我能

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做光做盐的基督徒，真正学会爱人如己。真正把信仰活在日常生活中。

五点半，下班了。有的同事仍在加班，有的同事去健身，有的同事去约会聚餐，有的同事去上进修课程。我一点力气也没了，头重脚轻地随着人群走出大厦。

街上大大小小的饭馆开始喧闹起来，门口的轿车停的满满当当。觥筹交盏，歌舞升平。张楚的歌声响彻大街小巷——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吧 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 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而我，小思怡，让我可耻地陪你饿一天吧。从昨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我要坚持陪你三十六个小时，原谅我并接受这微弱而有限的心意吧。

路上，我打开报纸——

《中国水稻技术将为世界消除饥饿作出贡献》

“新华网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水稻科技等方面展开日益深入的合作，中国先进的水稻育种和基因技术将为解决世界人口的饥饿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水稻大会上，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王韧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在水稻科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现在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饥饿和粮食短缺问题提供了经验。”

可是，小思怡，我们俩都在挨饿。我是为了你，你是为了谁呢？

七点，到家。我换了衣服，一口气喝了两大杯水。我决定今天多花一些时间准备周日的礼拜。准备好圣经资料，笔和纸，打开台灯。

还有一个漫漫长夜，小思怡，我们俩一起度过。你是那么弱小，我也毫不强壮，我们都会被饥饿打倒。可是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无论生死，永不分开。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high处的、是low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的。

写于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夜

这是妻子最好的文字之一，一如当年她写给我的情书。这些文字事关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我相信，几十位与妻子一样参与了接力绝食行动的朋友们，大概都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和肉体历练。

那天晚上，我在遥远的东瀛，在新干线列车上，从笔记本电脑中看到了妻子发来的电子

邮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开着电脑，直到电池耗完了电，屏幕变为一片漆黑。车窗外是万家灯火，我却彻夜难眠：每一盏灯火后面都有一双孩子的眼睛，像李思怡一样的漂亮的大眼睛。

我敬重这些参与了绝食的朋友们。我当然知道，绝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绝食无法挽回李思怡的生命，也无法让“有关部门”变得柔软而公义。但是，我坚持认为，这也许是改善我们自己生存质量的重要尝试之一。无论多么困难，无论多么微弱，我们都值得一试。

萤火虫同样可以用自己的微光挑战黑暗。再也不能让黑暗如此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了。否则，继续目前这样麻木、僵硬、苍白的生活，我们总有一天会沦落到猪圈中猪们那种可怕的状态。

我想，人之高贵便在于人有同情、怜悯和爱的能力及需要。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存在应当荣耀上帝而不是侮辱上帝。《圣经》中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至十六节）

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上的盐，这个世上的光。让我们在经受了悲惨的打击之后重新寻找到尊严、自由和爱的价值。

李思怡的饥饿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听到了她悲惨的呼喊：“我饿！我渴！”因为当年耶稣也曾经发出过同样的呼喊。我们也听到了李思怡的呼喊，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懂得什么是爱。我们把小思怡抱在怀里，就像抱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天国，我们将与获得拯救的李思怡不期而遇。

孔泉的“同情心”与李思怡之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日前就美国、加拿大部分地区断电事件发表谈话，声称他代表中国对美国和加拿大人民在停电时所经受的痛苦表示关注和同情。这番说辞似乎表明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正在变成一个有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国家。

我不知道美国和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听到孔泉这番款款的慰问，并对此作何感想。但是，作为一个仍然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公民，一个仍然过着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的中国公民，我感到孔泉的这番表达过于奢侈、过于夸张了。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应当关注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人民，美国和加拿大人民自然有他们的政府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解决困难；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应当关注的是自己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公民的生存权。

前不久，在四川成都发生了一个名叫李思怡的三岁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居民向警察报告说，旁边一户人家中传出阵阵恶臭。当警察强行打开门时，他们发现一个三岁女孩已腐烂的尸体。门上有她的手指抓过的痕迹。一位政府官员认为女孩死于干渴或饥饿。

次日，《成都商报》刊登了李思怡死亡的故事并寻求她失踪母亲的线索。记者很快找到了答案。思怡三十九岁的母亲李桂芳，从六月四日起就被警察监管。虽然李桂芳给警察下跪哀求，请他们通知家属，帮助照顾家中的小孩，但遭到警察粗暴的拒绝。

派出所李桂芳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一百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后没有警察去通知她。直到十七天之后孩子的尸体被发现。目前，李桂芳还在被拘捕中，她将来有一天应该记住以下这些名字：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小兵、王华麟，城郊派出所辖区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实习警校学员穆羽——她直接和间接地向他们哀求过。记住这些名字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他们进行报复和审判，记住这些名字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恶是如何发生的。罪恶不是孤独的个案，罪恶深藏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之中；同时，罪恶也不是抽象的存在，每一桩罪恶都是由具体的人实施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可耻的参与者，没有人真正能够置身于事外。《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李思怡之死是一系列突出中国司法系统缺陷的最新的案例。”网络上一位学者愤怒地质问说：“整件事体现出我们的系统冷酷的本质。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

我想，能言善辩的孔泉先生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来说，没有他们回答不了的问题。在我看来，孔泉最应该谈论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停电事件，而是像李思怡事件之类的、正在中国发生着的惨剧。李思怡之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着，它的被披露却是偶然的。同样，几个月之前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被警察拘捕并殴打致死的事件，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淡淡的一抹血痕。学者任不寐写道：“李思怡走了。一个三岁的小姑娘。我们对她的悲惨的死完全无能为力，只有默默垂泪，心魂俱裂。任何繁琐的论证都是愚蠢无良的，是国家及其精神杀害了她。国家又一次凯旋了。我们在这个国土上找不到为孩子放一朵白花的地方。我祈祷上苍把这白花放在更多人的心里，并选择一个日子让所有的心灵在那里汇集。我们将在那片草原上哀悼和忏悔，然后走向天安门广场，把李思怡在那里高高举起。”李思怡是我们的孩子，她死于冷漠，死于残暴，死于我们的“习惯”。李思怡死了，而外交部发言人的谎言依然在按原有的模式有条不紊地运作。我的问题是：一个连自己的同胞、连死亡的孩子都不同情的官僚，有什么资格去同情彼岸的人们所遭受到的一点点生活的不方便呢？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孔泉难道不应该为李思怡惨案的发生向全世界表示愧疚和忏悔吗——以

他背后那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党和政府的名义？

然而，孔泉先生的同情心仅仅是“似乎过于充沛”而已。在面对像李思怡事件这样的“国耻”时，孔泉要么死不承认，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再也不肯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心来。他把官职看得比同情心更加重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他的心里话。像他这样的官僚不会有耻辱感。同情心与耻辱感紧紧相连，一个没有耻辱感的人，又怎么会有同情心呢？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孔泉先生为什么不同情那些“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呢？直到今天，“六·四”大屠杀已经十四年了，死难者们依然死不瞑目，家属们依然连公开谈论和悼念自己家人的权利都没有。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们，不断遭到安全部门的骚扰、恐吓、跟踪和囚禁。杀了人家的孩子，还不许人家哭泣，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同情心”的党和政府啊！我还想追问的是，孔泉先生为什么不同情那些受到残酷迫害的天主教、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信徒和法轮功修炼者们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做任何违背宪法和法律的事情，仅仅为了坚持单纯的信仰，而被专政机器搞得家破人亡。不仅要管制人的身体，还要控制人的心灵，这又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的“同情心”的党和政府呢？

说到底，孔泉的“同情心”不过是“同情秀”而已。其实，这也怪不得他。既然连李肇星这样的“当代红卫兵”都能出任外长，在每个外交场合都强词夺理、信口雌黄，那么，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孔泉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极权的政权之下，哪一个官员又能够维持完整的人格和基本的人性呢？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的结尾处写道：“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出一个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鲁迅之后的时代，中国人的鲜血继续淤积着，从“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的小女孩李思怡。李思怡不知道什么是“三个代表”，而政治局的会议室里的巨头们也不会知道她的悲惨命运——与他们讨论的那些“军国大事”相比，李思怡的生命轻如鸿毛。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在千千万万黎民百姓的心目中，李思怡的中国显然比“三个代表”的中国更加真实；李思怡的生命显然比那些政治巨头的生命更加珍贵。

李思怡走了，她用他们的名字标志了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为这个时代的耻辱和残忍负责。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后人会在编年史上发现李思怡的名字，并且会愤怒地谴责这个逝去的时代的野蛮和邪恶。而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我们将被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以深深的忏悔洗干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然后去拥抱还活着的李思怡们。我们要成为合格的父亲和合格的母亲，我们要成为不与邪恶合作的人，让我们发誓——以李思怡的名字。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六日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从孙中山和赵紫阳的葬礼谈起

民国元老、教育家马叙伦在回忆录《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写到了当年孙中山在北京的葬礼。当时，孙中山到北京与段祺瑞执政府谈判，希望能够达成南北统一、恢复约法的理想。虽已下野多年，活动区域也多限于广东及上海租界，但孙中山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决非段祺瑞辈掌握实权者所能企及，当年的形势正如马氏所描述的那样：“孙中山先生扶病来到北京，北京的青年，没有剩了一个，都涌到东车站，要见孙先生的颜色，市民也疯狂似的挤得正阳门前，路也不易通过。”马氏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还兼任了一个国务员的身份，便和内务总长龚心湛等人到孙中山专列停车的地方恭候。车到了，马氏上车去看望孙中山，“我就向头等车卧室里找到了孙先生，看他满面病容，着实感动，他是为什么？”

孙中山在北京并未完成其政治理想，很快身体状况便急剧恶化。如果孙中山不死，南北和谈达成，则民国的历史会是另一种写法。然而，死神没有给孙中山留下时间，也没有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留下时间，对此马氏不无遗憾地写道：“到了三月十一晚上，我刚从铁狮子胡同回家不久，想睡了，杨杏佛一个电话，叫我快去。我晓得孙先生到‘弥留’的时候了，急忙又赶了去。果然，孙先生这天就抛弃了中国国民，也和世界诀别了。”孙中山在北京突然去世，其葬礼对北洋政府来说是一个难题。北洋方面非常担心孙中山的葬礼成为国民党在北方收拾民心的绝好机会，却也不得不开始为之操办丧事。马叙伦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冷静的观察者：“十二日有国务会议的例会，我正要看段祺瑞的态度，到了段宅。那时，国务会议都在他的家里开的。晓得国务会议为了孙先生过世，停开一次，这是前清‘辍朝’的例子。看见大家都在段祺瑞书房里，我也走了进去。……段祺瑞拿出他做好送孙先生的挽联来，叫大家推敲，特别对李思浩说：‘赞侯，你是进士出身，你斟酌斟酌。’李思浩自没说话，也就商量到孙先生‘饰终典礼’，不过‘照大总统在职病故例治丧’，派内务次长王赍办理。”

孙中山的葬礼一天都没有拖延。军阀们还是有这种最基本的智力：葬礼拖得越久，就对自己越不利。孙中山的遗体定于第二日下午二时入殓，段祺瑞原说要来送殓的，临时却说脚痛不来了，马氏的推测大致是可靠的：“他是害怕革命党和成千上万的青年。”果然，首都都有三十万国民自发为孙中山送葬，其灵柩移住西山碧云寺时，人群从中山公园一直延伸到碧云寺。葬礼之后，段祺瑞最害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虽然官方尽量迁就民间的舆论，但是段政府的声望还是跌到了谷底。

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孙中山乃是一名被数次通缉的“叛贼”，他以广州为基地发动了多次“武装叛乱”，南北双方惨烈的内战大多与之有关。但是，北洋政府仍为孙中山举行了“在职总统”规格的国葬。这是固然因为孙中山是民国之开国元勋、在国民心目中有享有崇高威望，更是因为北洋政府毕竟是一个初具民主宪政模式的政权、一个在大部分时候都还懂得要“讲道理”的政权。相比之下，此次赵紫阳先生的葬礼却让国人倍感心寒和绝望。赵紫阳担任过两届国务院总理并担任过中共党魁之高位，死后官方居然连生平简历都不予发布，其葬礼亦不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小规模追悼会拖了十二天才得以举行，会场外边如临大敌，密布数千名号称“维护国家安全”的警察。一个被幽禁至死的老人如何能“危害国家安全”呢？果真如此，这个号称“太平盛世”的“泱泱大国”是否也太脆弱了呢？一些粗暴的警察就在一旁殴打那些希望入场表达哀思的上访民众，使得本来相当低调的葬礼成为一次赤裸裸的“国家暴力”的展示会。由此可见，此政权哪里有什么“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可言，

它心胸狭窄、刻薄寡恩，比之北洋当局真是大大退化了。

民国初年的中国，如今常常一言以蔽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们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其实这是一种故意颠倒的历史表述。学者唐逸在《中国问题与中国思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期的宪政民主实验，虽属幼稚，困于军阀和腐败，但毕竟是中国历史自发走上的正确道路。……我们今天之看不清民国政治的先进性质，只知道那是军阀混战、腐败无能，是由于北伐以后先后建立的两套权力话语彻底改写了这段历史，否定宪政民主，为独裁或极权设定合理性。丑化民国的目的其实是丑化宪政民主。”民初的历史遭到了国共两党共同的改写。尤其是中共建政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教育和宣传领域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妖魔化”。实际上，民初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皆蒸蒸日上，彼时的中国宛如逢春之病树，呈现出勃勃生机。在政治上而言，“军阀政权”并不足以全面概括民国政府，如唐逸所论：“民国政府不等于军阀。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乃是民意选择的政府，其政体是多党议会宪政。有识之士参加这个政府，如黄兴、蔡元培、梁启超、颜惠庆诸人，是为宪政民主、收回主权、复兴祖国而工作，不是为军阀工作。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思潮皆以宪政民主为中国的希望。”在经济上而言，当时的经济增长，不仅超过了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的“黄金十年”，也超过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深为中共当局自夸的“经济奇迹”。有详尽的资料显示：从辛亥至北伐，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至九，发展之速，令人瞠目。而贡献出这一增长率的，多为民营企业、自由经济。在此背景下，公民空间逐渐扩大，公民社会初具雏形，如唐逸所论：“自由企业，公民社会，空前茁壮。晏阳初于一九二零年开始的农村调查，一九二三年在京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仅为一例。各地商会、工会、同业公会、学生自治会、专业学会，研究会等民间组织，遍地出现，如雨后天春笋。一切结社、报刊、出版、成立公司或政党，无须政府审查批准。地方自治，盛况空前。”

因此，彼一时代，政府在相当程度上遵从民意，孙中山这一段祺瑞心目中的“敌人”，死后仍然能够得以享受国葬的荣誉，三十万普通民众仍然能够自由地参加其葬礼，各大报刊仍然能够详尽报道其逝世的消息及葬礼的安排。在得知段祺瑞在葬礼上缺席的消息之后，民众甚至还能愤而砸毁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牌匾”。而此一时代，政权却罔顾民意乃至强奸民意，对于赵紫阳这个不遵守中共以杀戮为最终解决手段之游戏规则的前任政府首脑和党魁，即便去世也要予其最后的羞辱，强调其反对屠杀民众即是“犯有严重错误”。官方不仅不允许其生前的同事和部下前去吊唁，还明令不准将追悼会的“门票”发给大学师生、上访民众、基督徒等“敏感人群”。在中共内部传达的所谓“不准参加赵紫阳追悼会的十三人名单”中，年纪最大的是已经八十六岁的胡绩伟老人，年纪最小的正是刚刚三十出头的笔者本人。由此可见，彼一时代，政府尚有“君子之腹”；此一时代，政府仅存“小人之心”。

不同的葬礼，背后折射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及不同的政治制度。孰优孰劣，孰“先进”孰“落后”，只需简单一对比即可知晓：彼一时代，政府仅能控制部分的公民生活，尚有许多领域是政府所“鞭长莫及”的，如报馆、商会、大学等，均以独立的身份发唁电、发宣言；此一时代，政府控制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将权力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媒体、企业、大学等都仰其鼻息，故而对赵的逝世只能“万马齐喑”。彼一时代，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共同存在，新闻出版和宗教信仰相对自由，传统社会的温情尚有保留；此一时代，罢黜百家、独尊毛术，官方垄断意识形态的阐释权，官员带头破坏社会的伦理底线。彼一时代，被目为“军阀”的国家元首，多兼有文人习气，如大总统徐世昌乃是前清进士、临时执政段祺瑞亦是饱读诗书的秀才，这样的军阀决非后人所想像的蛮横无理、粗鄙无文之徒。因此，徐世昌方能屈尊向五四学生低头，段祺瑞亦在其侍卫开枪击杀十余名学生之后向国民道歉并承诺司法机构进行独立调查。而此一时代，最高决策者皆是在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完成其大学教育，并形成其基本的价值立场。“政治辅导员”的出身，使他们除了僵化的意识形态之外一

无所有，甚至连工程师的技能也不具备。封闭的视野、畸形的教育和险恶的官场斗争，使得此一时代的领袖们只能较量谁更“左”、谁更残酷、谁更娴熟于权谋厚黑学，哪里会有一分文人的同情与宽容？他们不懂得妥协的道理，也不会有向民众道歉的雅量。政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斗争哲学和暴力信条。因此，他们仍然把死去的赵紫阳看作危险的“敌人”——所有可能对他们的面子和实权造成威胁的人都是“敌人”。在此意义上，所有渴望成为公民、享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中国人，也都是他们的“敌人”。赵先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孙中山和赵紫阳都将在历史上享有各自的地位。今天的当政的衮衮诸公，活人差点给死人吓倒，可见心胸还远不及段祺瑞开阔。那些剥夺赵先生自由的人，历史终将把他们跟“耻辱”这个词语联系在一起；那些企借此次葬礼再次图羞辱赵先生的人，最后羞辱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导演这一丑剧的人，让我有了一次观察和思考此一时代的绝佳视角。

对于赵紫阳先生来说，葬礼早已不重要了，我谨以以下的诗句来表达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你选择了苦难，而非罪孽，你的离开是如此平静，你的离开让你重获自由。
你早已原谅了世人的健忘，以及世态的炎凉。所有的选择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空空如也的广场，空空如也的帝国，空空如也的记忆，而你的告别唤醒了历史。
你不需要隆重的葬礼，以及官方字斟句酌的悼词，你惟一的需要便是此刻的宁静。
你与约伯一样，以无罪受难来获得荣耀。你如那棵青青的大树，静静地长在溪水边。
在尘土与炉灰中，你望见了通向故乡的道路。故乡在千山万水外，而回去是必需的。
今天早上，一切都已经结束，一切却尚未结束。你淡淡地微笑着，与未来相拥而眠。

——二零零五年二月六日，四川成都

下卷 溃败的中国

邓小平的“亲民秀”

凤凰卫视播出了一部最新拍摄的关于邓小平的专题片《他是蜀中人》。与那些空洞无物的所谓“史诗”式的领袖巨片相比，《他是蜀中人》这部记录片从细部入手，呈现了作为四川人的邓小平生前在四川许多不为寻常人所知的活动，因而颇具观赏性。我特别注意到其中谈到的八十年代邓小平到峨眉山游玩的故事。

记者采访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榕告诉记者说，邓小平决定到峨眉山游玩的时候，特意叮嘱地方官员，这次是单纯的游玩，不得扰民、不得封山，让山上的游客继续各自的游览。邓说：“不能因为我来了，就把老百姓赶走。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来了。”谈到此处，邓榕对父亲的“亲民”作风感慨不已，说父亲和从来都是老百姓“心连心”，父亲一直都喜欢“与民同乐”。

接着，记者找到了当年陪同邓小平爬山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位老先生回忆说，邓小平再三强调不坐小轿车，而要坐普通的面包车。因为在面包车上人多，人多才热闹，才好“摆龙门阵”。这个细节确实也符合邓的性格。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面包车在半路上抛锚了一次。于是，邓下车观赏风景，周围有一群正在做科学考察的林学院的学生和老师发现了，便都围上来，激动地欢呼、鼓掌。邓的警卫们都很紧张，担心人多会出事，便迅速组织起一道警戒线，让人们都站在线外。邓却让师生们都走到自己面前来，亲切地向他们询问路边植物的名称，并了解他们在山上的生活情况。邓问道：“大家在山上苦不苦？”有学生回答说：“我们愿意一辈子都住山上，为祖国的林业研究作贡献！”邓感叹说：“在山上的生活很苦，要是作为一个游客来游览一趟，确实处处是美好的风景，但是要长年累月住在山上，滋味可不好受。”

影片中类似的比较“煽情”的细节还有很多，我不一一描述了。总之，这些细节似乎都在表明，邓是一位具有“亲民”作风的领袖，邓喜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平民本色”，这说明邓确乎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与今天某些高高在上的高级领导相比，邓小平确实生活简朴、性格随和、不讲排场、不喜张扬，但这是否就能说明邓小平有多么多么地了不起、就是一个具有真正民主思想的政治家呢？

一个国家领导人去某处风景区游览，主动提出不要扰民、不要驱赶普通游客，在我看来，这本来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且不说如果在一个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里，领导人本来就没有驱赶普通游客、独自占有某风景区的特权。然而，在我们这个“非常国度”里，一切“非常”情况都成了“正常”情况，而一切“正常”情况又都成了“非常”情况。在中国，绝大多数领袖在游山玩水的时候，都会扰民、而且大大地扰民——领袖所到之处无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而任由领袖一个人“独钓寒江雪”。一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剥夺其他千百人快乐的基础上，这就是中国直到今天依然在上演的现实。于是，邓小平轻车简从、不扰民的举动，反倒成了一件稀罕事，成了民众个个都要感激涕零之事。

在我看来，在专制独裁体制下，领袖们所谓的“亲民”作风，无不是一种高明的“秀”而已。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我们必须“揭开面纱，深入到内部”，不能被一些表面想象迷惑住了。诸如毛泽东在大饥荒的时候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衬衣上打着很多补丁等等，很容易让善良的百姓以为他们真是人民的好领袖，而忽略了他们荼毒生灵、倒行逆施的种种暴政。托克维尔指出：“当一些共和国落到一个独夫控制之下时，这个独裁者却能依然生活简朴，不尚虚荣，作风谦逊，好像自己并未处于万人之上。当皇帝们大权在握，对其同胞的财产和生存进行专横统治时，人民在谈话中称他们为恺撒，而他们本人却又能屈尊到朋

友家里做客。”中共领袖，无不是现代“恺撒”。邓小平给人一种不摆架子的形象，比起那些喜欢摆架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首脑们来，会让许多百姓感到多了几分的亲切。但是，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是绝对不会“亲民”的。一九八九年的春天，邓小平一定从电视上看到了三个大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递交情愿书的情景。他要是真正“亲民”，就会亲自到现场去接受情愿书、安慰这些掏出心来爱国的学生们。但是，邓小平不仅没有到广场上去看学生一眼，反倒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机枪和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此时此刻，他的心肠比石头和钢铁还要硬。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亲民”呢？

由邓小平游览峨眉山的故事，我又想到了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向我讲述的克林顿到教堂做礼拜的故事，两相对照，颇有趣味。朋友家住华盛顿郊区，星期日都会到社区的教堂里去参加礼拜活动。有一个星期日，当他们来到教堂的时候，忽然发现门口的一侧停着两辆警车，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牧师正式的讲道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位朋友发现走进来了几个陌生人。仔细一看，走在中间的竟然是现任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旁边有两三位保镖。此时，牧师照样在聚精会神地讲道，并没有因为总统先生的亲临驾到就中断他的讲述。而总统夫妇和保镖们也轻手轻脚地随意选择一排空座椅坐下来，认真地听牧师的讲道。牧师的讲道完毕之后，是孩子们组成的唱诗班的唱诗活动。二十多个孩子用他们天真而美妙的声音演唱着动人的赞美诗。孩子们都沉浸在赞美诗悠远深邃的意境中，没有一个人因为总统的光临而紧张或激动，甚至没有一个孩子偷偷地用眼睛的余光去看总统先生一眼。

当所有的活动都完毕之后，牧师这才对教友们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今天很高兴总统先生和夫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待会儿，教友们不要着急，继续坐在座位上，请总统先走。”这就是他们给予总统唯一的“特殊待遇”。克林顿夫妇离开之后，朋友缓缓走出教堂，发现警车也离开了，周围的一切依然是那样的宁静和安详。教友们没有一个人感到大惊小怪，甚至没有人讨论总统的驾临。美国民众确实觉得总统就是一名来自我们大家中间的普通人。

在美国，对于普通的美国人而言，总统也就是他们选出来的“首席公务员”而已，总统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也不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者。老百姓无须崇拜、敬畏和害怕总统，因此也不用为总统的来临而“喜出望外”。而对于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说，他来自于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他是“美国人民的儿子”。他来教堂参加活动的时候，与周围的老百姓一样，都是上帝制造并深爱的孩子，他并不比别人高贵和优秀，他一样需要祷告和忏悔。

而在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像邓小平这样的最高领导人是权力的化身，他掌握着对百姓生杀予夺的权力。老百姓只能匍匐在统治者脚下，如果有机会见到最高统治者，他们即使不会像过去那样三呼万岁，一定会感到受宠若惊。而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来说，因为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既可以亲热地抱起一个老百姓的婴孩亲吻，也可以命令士兵向无辜的学生开枪射击。他到民间视察或游览的时候，前呼后拥、龙旗飘扬是理所当然的待遇；而他减少随从、降低接待规格、与百姓面对面地交谈，则是他赐予百姓的“意外”的礼物。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比了美国总统与法国国王之间权力的差别，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两者的主要差异，第一，“在美国，行政权像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一样，是有限的和例外的；而在法国，行政权像国家主权一样，可以扩及一切事务。”第二，“在法国，国王实际上是主权的化身，因为法律不经他批准就不能生效。同时，他也是法律的执行者。美国总统虽然也是法律的执行者，但他并不实际参加立法工作，因为他不同意并不妨碍法律的存在。因此，他决不是主权的化身，而只是主权的代理人。”托克维尔的论述十分深刻，不妨引用过来分析克林顿与邓小平之差异：担任美国总统时的克林顿，表面上看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他的权力主要发挥在国际事务上，他甚至却没有权力免去美国任何一位州长县长乃至一名地方警察局长的职务；而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晚年邓小平，即便已经九十岁的

高龄，仍然能牢牢操控中国的政局，亲自拟定高级干部的任免名单。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克林顿仅仅是行政权力分支的领导人，他的权力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双重制约，他担任公职的时期也有明确的时间规定；而在一党专制的中国，邓小平掌握着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他就是权力的源泉和核心，而且只要他还活着这一权力也就永远属于他。克林顿再怎么丧心病狂，也不可能命令军队对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以及在白宫前面游行的人民开枪，而军队也绝对不会接受同时也是“三军总司令”的总统先生的这种命令。但是，早已退休的邓小平却在自已家中召开元老会议，作出了调动军队进京“勤王”的命令，而以“解放军”自居的军队也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一命令，用机枪和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

邓小平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我永远是中国人的儿子。”然而，他却向军队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他最终站到了中国人的对立面，成为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这也许是专制体制下绝大多数统治者的必然命运。与“六·四”的枪声和血泊相比，邓小平在峨眉山上自觉不自觉地表演的那一幕“亲民秀”，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虚伪。两个“邓小平”，哪一个更真实、更接近其内心世界，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邓曾经把毛剥夺的人民的自由归还了一丁点给人民，他居然就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就是赤裸裸的强盗的逻辑。而我们安于这种逻辑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只能在两个强盗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我们对那个不那么残暴的强盗心怀感激和赞美。我们一直不知道，其实我们可以不选择强盗作我们的父母。我想起了爱默生尖锐批评中国的一段话：“中华帝国享有的纯粹是本乃伊的声名，将世界上最丑陋的特征小心翼翼地保留三四千年之久。我没有这种天赋在这个非凡民族的古老呆板生活方式中看到任何意义，他们不是其他民族所能使用的工具。即便是悲惨的非洲还能说我砍了木头，汲了水来促进其他地方的财富和文明，但是中国，可尊敬的乏味！古老的白痴！……中国是它自己的纪念碑。”中国的历史是从一种专制制度蜕变到另外一种专制制度的历史，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享受过民主和自由的滋味。龙的阴影笼罩在这片可怜的土地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此后若干的中共领袖们，都是在暴力和作秀中获得并掌握了权力。最后，他们都成为自己的“纪念碑”。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十二月三日是国际残疾人日。这天，中国媒体大肆宣传这样一个消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获得两千零三年“联合国人权奖”，他将于一个星期之后的世界人权日赴联合国总部领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话中说，邓朴方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国际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我国残疾人事业和国际残疾人事务的发展，为改善残疾人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获得“联合国人权奖”当之无愧。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网站介绍说，联合国人权奖始于一九六六年，是联大为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发布二十周年，通过一项决议而设立的。此后每五年颁发一次。“中国人获得这一荣誉是第一次。把一项世界性的人权奖授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不仅是对邓朴方本人的赞赏，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的肯定。”还有御用文人撰写了《喜闻邓朴方获得联合国人权奖》的文章，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除了有识之士的发奋努力外，更主要的是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中，通过健全法制、实施国家计划、动员社会力量、提供平等机会等重大措施，发展残疾人事业，建立并逐步完善残疾人人权保障体系，帮助和促进残疾人在事实上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残疾人事业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事业，成为国家大局的一部分。”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邓朴方的获奖与中国人民无关，更与中国残疾人无关，这一事件不仅不是中国人民及中国残疾人的荣誉，相反却是一次莫大的侮辱。这一奖项，唯一能说明的是：作为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与作为流氓国家俱乐部的联合国之间达成了一次可耻交易。这一荒唐的颁奖，是对“人权”两个高尚字眼的玷污，也是联合国堕落的又一显著标志。

以邓朴方为主席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真是致力于改善中国残疾人的悲惨处境吗？据“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告诉我，邓朴方不仅坚定地支持父亲邓小平镇压民主运动、制造“六·四”惨案，而且在此后还直接参与了对在“六·四”惨案中致残的残疾人的再次迫害。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邓朴方下令不准残疾人运动员方正参加残疾人运动会，虽然方正极有希望获得奖牌，但因为他是在“六·四”中受伤致残的，不能让他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给“国家”抹黑，所以他参赛的资格被剥夺了。

就在邓朴方获奖前的几个月，残疾人、网络作家罗永忠被捕入狱，据说将以“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被起诉。一个只是说了几句真话的残疾人，居然能颠覆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宪特的强大政权？据海外媒体报道，罗永忠在狱中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其家属无法探监。对这样一起赤裸裸地迫害残疾人、剥夺残疾人基本人权的案件，同样也是残疾人、而且担任中国残联主席的邓朴方，迄今为止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话。

就在邓朴方获奖前半个月的十一月十九日，残疾人叶国强因为在天安门金水河自杀未果，而被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北京的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无业人员只有小学文化的叶国强曾先后因流氓，偷窃被强制劳动，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今年五至九月间为发泄不满，先后到市政府及天安门地区静坐。滋事数十次，为造成更大影响，跳入金水河，引起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其实，叶国强曾经有过一个温馨的家（有国家发给的房产证明），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宣武区开立了一家餐馆（有国家发给的营业执照），同自己的父母过着恬静的生活。只是由于几个月前，宣武区政府个别腐败官员野蛮拆迁，雇用一批流氓打手，闯进叶国强的家，摔伤了叶年已八十的老父；野蛮拆除了叶的住房，捣毁了叶家餐厅。这使得其成为了一名“无

业人员”。

叶国强的家被强制拆除后，他被迫流落街头，无奈中走上了漫漫“上访”路。然而，他的十多次的上访，非但没有受到政府人员的接待，反而被污蔑为“滋事”。最后，绝望的叶国强不得不选择了自杀。但是，独裁者们无比看重面子和稳定，如果你在其他地方死去了，即使尸体腐烂了也没有人会过问；如果你在金水河自杀，那么你就伤害了独裁者们的面子，你将招致比死亡还要残酷的惩罚。叶国强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自杀也成了“犯罪”！

遭到官方媒体妖魔化的叶国强，在街坊邻居眼里究竟是什么人呢？群众都说，身残志坚的叶国强是一位好心人、勤快人。他曾为灾区民众捐献过衣被，为抢救危重病人献过血。他千方百计为国分忧，不因自己的残疾增加国家负担，自筹资金开办餐馆，并安排多名下岗人员就业。就是这样一位残疾人，却被迫走上了绝路；不仅走上了绝路，还受到了扭曲的法律的迫害。在审判过程中，有关方面不通知叶国强的家属参加庭审、不允许叶国强聘请律师、不报导叶国强在法庭上的讲话内容、不让关注此事的群众旁听、不出示叶国强提供给法庭的证据。这样的“五不审判”就这样施施然地发生了！北京一千多位市民在抗议书上签名，在这份抗议书上，我并没有发现邓朴方先生这位“人权斗士”的名字。

中国是当今全球人权状况相当恶劣的国家之一，而作为残疾人的种种权益更是得不到起码的保障。在山东从事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盲人陈光成，曾告诉我若干起发生在基层的骇人听闻的虐待残疾人事件。陈光成还转给我一份残疾人刘乃堂口述的笔录——在我看来，这份文字比邓朴方先生的“人权奖”更加有价值。而那些腐败的、官僚气的、与独裁者暗送秋波的联合国官员们，真该读一读这样惊心动魄的文字：

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沂南县孙祖镇三位盲人诉孙祖镇人民政府违法收取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税费一案，在沂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午不到八点，乃至沂蒙山区的六十多位盲人和其他残疾人及其家属至少有百余人，不顾天气炎热，早已聚集在沂南县人民法院的大门口等候旁听案件的审理过程。残疾人困难的甚至连拿出几元坐车的钱都没有，但他们仍然积极参加。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残疾人点燃了一盏法律的灯。原来党和国家对残疾人的优惠政策法规还未落实。残疾人事业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农村残疾人都在受着不同程度的歧视。有挨打，挨骂的，受罚的，还有没收土地拔青苗的，都是因为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接受义务工，没钱交纳提留、农业税集资等而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自一九九一年施行，可乡村政府只管收钱不管法律，还说什么你只要种地就得交提留、农业税和各项集资。当时拿不出钱来就会遭到辱骂或毒打。

其中我就是挨骂的对象。我叫刘乃堂，是沂南县孙祖镇六里沟村村民，六十三岁的男性盲人，持有县级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人证，属一级盲。使我难忘的一个冬天，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晚饭时，两个村干部上门找我要提留。当时家中没钱交纳。我说失去劳动能力的盲人自己吃饭都困难，不应承担这些社会负担。一句话惹烦了那个村干部，他无好气地说：“你的眼瞎了是怨你祖上没做好事，应该瞎你的眼。这也是不给国家出力造成的。你算什么东西？”说着就大发雷霆地走了。第二天下午就在高音喇叭里破口大骂起来。骂了些惨无人道的话不能一一写在书面上，一气骂了四十多分钟嗓子累哑了。我像挨了一阵暴风骤雨似的，只好眼含痛泪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次日我到镇政府讨个公道，镇里正好召开农村三大员干部大会。骂人者早就在场了。我一进去就被很多人围了起来。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交钱？”干部们七言八语，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残疾人保障法国家有，在我们孙祖镇是无效的，永远实现不了，绝对行不通的。

当天回家后，家里的电就被断了。从此，村子的前后左右山沟田野随时都能听到骂瞎子的喇叭声。该干部公开骂道：“你们这些瞎子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你们给国家做了什么贡献？现在我的官还小，说话还不当事，等有一天说话当事了，我定把天底下的瞎子全部杀光，

把你填在井里。”更让人伤心的是，有一天他竟然发动他全家男女老少八口人在村子前边围攻我。多亏了有好心人把我拉走，才避免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风波。

为了早日听不见肮脏的骂声，我天天到镇政府请求上级处理。十二月十七日镇长来我村解决此事，触及结果是：叫挨骂者向骂人者赔礼道歉。我不服气地问领导这是何种规定？镇长说，论领导他是你们村的党支部书记，论家族他是你的长辈，你就该挨骂。我还想分辩，却被他们轰出了办公室。

在这样的岁月里，我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也不知道流下了多少伤心的泪水。好似一层浓云布满了天空的黑暗，真叫人看不见日月的光芒。我周围的残疾人和我一样，都在受着不同程度的歧视和侵害，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由于这些残疾人的遭遇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农村残疾人是处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底层。农村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很难得到保障。

我开始寻找法律帮助，一连奔波了五六个县，有时就在公路边和草堆里睡觉。半年之后，终于在费县遭到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还是油印的。从此我就拿着这本法律书爱不释手地反复学习。一九九八年冬天，听说有个上过大学的盲青年陈光成在为残疾人维权。我就找到他求助。

两千年我们就做好了起诉的思想准备，五月二日村干部向我征收教育集资二十元，我说：“依照法律规定我不应该交这个钱。”村干部说：“你就别说法不法了，你把钱交上别人的钱就好要了。”

七月二十日我在沂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立案庭很快立案。八月十日法院开庭，十六日终结，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刘乃堂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官司虽然赢了，我又遭遇了黎明前的黑暗。镇里的小分队来我村清理欠款，撬开我家的大门，还损害了家里的东西，家人被迫到邻村借来三百元钱。十一月九日，村委会又向我强行征收土地承包费三十七元五角。由此可见镇政府不服法院的判决，顶风而上。受侵害的还有其他的残疾人，如书堂村高会杰，父母全是盲人，女儿和儿子患婴儿瘫。全家六口中四个残疾，家境非常窘迫，不但得不到照顾，还受到同样的迫害。

我们又把镇政府告上了法院。两千零二年七月五日立案，七月二十九日公开审理此案。过了两个月，法院电话叫我去，动员我撤诉。审判长说，你若撤诉就能多判七八十元，若不撤诉就少判。当时我觉得很别扭：公正的法律为什么会有两种判法呢？我坚决不同意撤诉。一直等到十月下旬，审判长又打电话叫我去法院拿判决书。负责发判决书的人态度很不好。判决结果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费一百五十元由原告承担五十元，没有经济返还之项。

我们不服本判决，十月三十日向法院递交了诉状，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千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凌伟的监督下，才把非法收取的税费返还给我，而起诉费和上诉费至今未返还。

这一连串的问题很明显地告诉了人们：当官的是官官相护，互相勾结，老百姓想讨公道是万万不能。

试问作为金字塔顶端的残疾人的邓朴方先生，你在领取“人权奖”时，会想到自己的国家里还有千千万万像刘乃堂、叶国强、罗永忠这样被凌辱、被压迫、被监禁的残疾人吗？比你更有资格领取这个奖项的，是用法律和生命捍卫自己尊严的刘乃堂、叶国强、罗永忠们。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六日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二零零三年三月，朱镕基结束了四年一届的总理任期，“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地告别了中国政坛。离任之前，他在会见各界人士时频频表示，自己的退休将是彻底的，甚至学术教育界的名誉职位也一概不会担任。同时，他也对自己在任期内没有完成诸多承诺而表示遗憾和歉意。然而，对于朱镕基的下台，中国民间并没有像对他的上台那样给予十足的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老百姓太过无情，还是朱镕基本人辜负了老百姓的厚望？

我的答案是后者。回想起四年前，朱镕基上台伊始，发表了中共历史上罕见的大胆直率的演讲，声称无论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自己都无所畏惧，一定要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老百姓和知识界都为之一震，而将希望寄托到这位“政治强人”身上。一时间，朱镕基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高峰。人们看好朱镕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因为源远流长的“清官神话”传统。从诸葛亮到范仲淹，从曾国藩到周恩来，中国的黎民百姓历来都对清官贤相充满了幻想。殊不知，他们其实与专制暴君互为表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共同构筑着牢固的独裁政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人们看好朱镕基，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极度腐败的中共官场上，朱镕基有着比较清廉的声誉；第二，在普遍说官话和假话的媒体上，朱镕基能够说一点真话；第三，在平庸无能的高级官员群体中，朱镕基具有相当的才华，与李鹏之流相比简直如同“鹤立鸡群”。然而，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如今人们再回头来重新衡量朱镕基以上的三大“优点”，会发现它们都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首先，在“动物庄园”般的专制体制内，“权钱交易”是一种常态。中国的腐败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它已经形成了学者吴思所说的“潜规则”。腐败与个人的品质并无必然联系，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新闻和舆论的监督的社会里，几乎没有完全拒绝贪污腐败的掌权者。权力者的腐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所谓“五十步笑一百步”是也。因此，朱镕基的“清廉”仅仅是“相对”程度上的清廉而已。例如，他从来没有公布或透露过自己的子女和亲人的相关情况，而民间关于其多名亲属经商致富的传说也日渐兴盛。相比起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两个儿子因腐败入狱、金大中本人公开向国民真诚致歉来，朱家之“云深不知处”则多少让人心怀疑惑。同时，朱系要角、金融巨头王雪冰、朱小华等人纷纷落马，这其中固然有不同派系角力、政敌“敲山震虎”等因素，但对朱镕基本人的“清廉”形象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其次，四年来人们日益认识到，朱镕基所说的“真话”不过是“大话”而已。比如，让国有企业起死回生、让农民负担切实减少、让腐败问题得到扼制等等，最后朱镕基均是“自食其言”。在远华惊天大案中，朱镕基不仅无法抓出幕后元凶，反倒眼睁睁地看着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贾庆林青云直上，名列政治局常委之第四把交椅，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如果说此事朱镕基是“力有不逮”，那么李昌平的遭遇他就是“视而不见”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痛陈农民的苦难生活，朱镕基虽然签字批复并派人调研，但李昌平依然不见容于当地官场，辞职外出，漂泊不定。堂堂一个国务院总理，居然保护不了一个乡级干部，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即便是在专制帝国时代，帝王也要装模作样地表彰三五名敢于说真话的低级官员，而今日僵化的体制却连李昌平这样一个通过传统渠道上书、“向总理说实话”的低级官员都容纳不下，看来这套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了。

如果说朱镕基在迫害法轮功等“大事”上保持沉默，是为了避免与江泽民发生直接的冲突，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多少还有点“情有可原”。那么，他在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表现就让人很难谅解。高行健获奖的消息传出后，朱镕基正在日本访问，他对日

本媒体发表谈话说，对华人作家的获奖感到高兴。但是，回国之后，他发现举国都在“声讨”高行健这个“卖国贼”，便借国务院发言人之口，拒不承认自己曾肯定过高行健。如此出尔反尔，哪里有大国总理的风度？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江西芳林小学爆炸案发生，数十名小学生遇难。虽然海外媒体已经披露孩子们死去的时候手里还捏着制作鞭炮的引线，但朱镕基却一口否认孩子们参与制作鞭炮，认定这是精神病人所为。这种毫不脸红地说谎、欲盖弥彰的行为，引起了许多有良知的公民的愤怒，学者笑蜀就曾撰文痛斥说：“朱镕基已经死了！”

第三，朱镕基固然比江、李等人更有“治国之才”，但他的才华也仅仅限于经济领域。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并无通盘的考虑，也没有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出过些许的努力。为了保持中国“生机勃勃”的经济增长态势以及“百分之八”的增长率，他不惜牺牲多数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丝毫不顾及未来之“洪水滔天”，而安于今日之“繁荣昌盛”。他不懂装懂地嘲笑台湾的民主成就，却无视大陆层出不穷的严重侵害人权的事件。在我看来，朱镕基的才能深受他的教育背景的限制：他出身于清华大学，青年时代所接受的是最典型的苏联模式的“工程师”教育。这种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个人培养成计划经济复杂的齿轮中的一颗“忠心耿耿”的螺丝钉，它忽视乃至反对人的独立思考、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它缺乏乃至斩断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承。此种教育与儒家传统中的忠孝观念相结合，在朱镕基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担任总理期间，朱镕基一直就倾向于加大中央集权的力度，削弱地方力量的兴起。虽然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中贡献甚大，但他的经济思想却始终笼罩着陈云以降“鸟笼经济”的影子。这些举措和策略均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

朱镕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右派总理”。据说，当年上调北京的时候，朱镕基“右派”的身份颇受某些元老的质疑，幸而邓小平力排众议，将其“破格使用”。同时，许多开明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十分关注朱镕基独特的“右派”身份，并由此判断其思想倾向于开明、民主和自由。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不能高估朱镕基“右派”身份的意义，因为“此右派”非“彼右派”也。在一九五七年的数十万“右派”中，庐山真面目各有不同，情况非常复杂。其中，至少有“真右派”和“假右派”两类。所谓的“真右派”，即储安平、章伯钧、林昭等人，他们识破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共产党的专制特性和毛泽东的流氓面目，并用生命的代价来捍卫说真话的权力；而所谓的“假右派”，即王蒙、朱镕基等人，他们不过是想给敬爱的党中央提一点点“意见”而已，却万万没有想到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被莫名其妙地打入另册、受尽屈辱。在数十万“右派”中，前者是绝对的少数，后者是绝对的多数。“文革”结束之后，“假右派”们对于迟到的“平反”感激涕零，认为二十多年的折磨不过是母亲错打了儿子而已。他们并没有彻底的觉悟，当然就更谈不上对专制主义进行深入的反思了。所以，朱镕基的“右派”身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至多也就是一个屈原式的“忠臣”罢了。

随着未来十年间中国危机的不断加剧，各种问题渐成“死结”——如农民的大量破产和工人的大量失业，人心的堕落和环境的恶化等等。朱镕基所洋洋得意的“经济软着陆”，是以牺牲数亿底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得来的。而这部分残酷的掠夺，不可能被朱镕基一笔勾销，未来的政府终将为之“买单”。我个人认为，人们对朱镕基的评价将如同中国的股市一样，一步步地进入无可挽救的“熊市”。朱镕基必将为他刻意回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懦弱和狡猾付出历史的代价。朱镕基不是胡耀邦，也不是赵紫阳，也许正是因为前面两任领导人的悲惨遭遇，才使得他吸取教训，避开了政改的“雷区”以及个人仕途的风险。虽然他如履薄冰地干完了一届任期并“全身而退”，但在他手中失去的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却再也难以找回来了。诚然，朱镕基的身份仅仅是“CEO”，他并不拥有作为“董事长”的江泽民的决策权，但他至少应当为此承担“第二责任”。朱镕基更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本来拥有向戈、叶二人靠拢的资源，却自动放弃了这种需要冒很大风险的选择。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计个人得失，致力于终结专制制度和建设民主制度，从而成为留名青

史的伟大政治家；而朱镕基没有这样的勇气，他仅仅是一个焦头乱额的“维持会”会长，一个兢兢业业的大管家，一个精明能干的技术官僚，一个外表看上去很刚烈内心却非常怯懦的政客，他的最高理想也就是做一个“清官”而已——于是，他成了历史的附属品和牺牲品，而没有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这既是朱镕基本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九日

UnRegistered

中共官僚“信”什么？

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没有信仰的，因此“忏悔”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过于奢侈的品格。我注意到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喜欢“忏悔”乃至拼命“忏悔”的，往往是已经倒台或沦为阶下囚的中共官僚们。是不是因为他们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具备了“忏悔”的能力呢？

因贪污受贿数千万而落马的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可谓声泪俱下。媒体报道其陈述的标题极为煽情：“一想到给党抹了黑，我就悔恨终身！”肖当作中学老师，口才自然过人，法庭陈述也不亚于平常大会作报告。直到此时此刻，这名大贪官还想扮演“忠党爱国”的典范，简直比周星驰的电影还要搞笑。有人用“三段论”来概括肖作新的“忏悔秀”：一为“出身论”，二为“功劳论”，三为“赎罪论”。

所谓“出身论”，肖作新一开场就迫不及待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我两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亲相依为命。我是吃助学金长大的，是党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有了这段话的铺垫，肖作新接着便顺水推舟地历数党对他个人的深切关怀：“二十八岁的时候被提拔为原阜阳市教育局副局长，三十八岁时当上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最后把我放到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市，在阜阳市人代会上以仅失五票的高票当选市长。”中共历来就是一个很讲究“出身”的党，它看重“根正苗红”。“革命后代”当然是“自己人”，“贫下中农的孩子”也是值得信赖的。当年遇罗克因为反对“出身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见“出身论”在中共意识形态体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聪明的肖作新紧扣“出身论”大作文章，希望由此唤起中共高层的“阶级认同”，不愧为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分子官员”。

所谓“功劳论”，肖作新在法庭上对自己的“政绩”侃侃而谈：“为了报答党，报答阜阳人民，我在工作上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替自己表白还不够，他还见缝插针地为一同受审的老婆周继美表白一番：“她为人热情，性格耿直。一生忙了两件事：一是忙于工作，二是操持家务。正是因为她忙于家务，才使得我能够超脱于家务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这番“动了些感情”的话，却经不起稍微的推敲：肖夫人在家里干些煮饭、炒菜、洗衣之类的家务，是家庭主妇的平常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对一千多万阜阳人民的奉献和牺牲了呢？难道普通市民的妻子们都在坐享其成吗？更何况，对于肖夫人来说，花在收受贿赂上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了操持家务。

所谓“赎罪论”，肖作新在二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最后我要强烈表达的是，我期盼着神圣法律的公正判决，若能得到从宽处理，我将倍加感谢和珍惜，认真改造，重新做人。”到了这样的时刻，肖大市长还想获得“从宽处理”并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他要让领导相信自己是“可以改造好”的“犯过错误的忠臣”——对于共产党来说，贪污腐败不是关键问题，忠心耿耿才是首要的标尺。让我感到迷惑的是，正是因为前几年肖作新在市长任上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才聚敛了一千九百万人民币的巨额财富；倘若让他继续“服务”下去，人民的损失还会增加多少倍呢？

与肖作新的“忏悔秀”不同，另一名高级官员丛福奎在受审时打的是“佛教牌”。作为河北省前常务副省长、省委常委的丛福奎，因贪污受贿数千万元人民币而被捕。案发之后，丛福奎不仅拒不交待贪污腐败的具体情况，反而在书写材料时大书特书“佛教治国”的论调。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身陷牢笼，还把自己当作“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才呢。

办案人员发现，丛福奎迷信一个名叫殷凤珍的“女大师”，他对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的农村女子崇拜得五体投地。丛福奎在石家庄和北京的豪华住宅内，不仅设有佛堂、供奉着佛像，还设有供道台、供神台。在卧室的被褥下面，铺着一大块红布，上面衬着黄绫，四周还缀有铜钱，黄绫下面压着五道佛令，枕头底下还有五道道符。“女大师”告诉他，有了这群菩萨的保佑，他就万无一失了。

然而，这一切还是没能挽救丛福奎的垮台。丛福奎案发之后，“女大师”也被捕入狱，经审讯承认自己是一个江湖骗子。像丛福奎这样一名副省级的高级干部，居然堂而皇之地放弃党章上首要的规定“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唯物主义”，转而加入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的行列，对于中共这个奉行僵硬、单一而顽劣的意识形态的政党来说，不啻是一莫大的讽刺。后来，丛福奎交待说，作为一名有二十多年党龄的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的原因，是得知自己在仕途上没有进一步升迁的可能。由于无法再往上爬，他便“改换门庭”，从“党啊亲爱的母亲”的怀抱扑向装神弄鬼的“女大师”的圈套。他家中的各种神像不过是他祈求权力和财产的符号而已。由此可见，中共在广大官僚和党徒心目中，也只是获取权力和金钱的敲门砖，没有人再愿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了。中共政权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可以设想，中共政权一旦发生动摇，不能继续为这些官僚和党徒继续提供权力和金钱，那么五六千万的党徒必然会在一夜之间作鸟兽散，这个号称“世界第一大党”的“利益共同体”也会在瞬间灰飞烟灭。

再说已经被判处“死缓”的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这群贪官怎么看都像“难兄难弟”。比丛福奎幸运的是，李嘉廷摘掉了官衔前的“副”字，实现了成为一省之长、封疆大吏的梦想。但是，李嘉廷是否就坚守住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呢？办案人员从李嘉廷家马桶的水箱中搜出五本不同国家的护照来。看来，李省长信仰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而是“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其实，背后的道理极其简单，以李嘉廷的清华学历和聪明才智，他不难作出这样的基本判断：“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全球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全球已经没落。于是，他就像泰坦尼克号上敏感的老鼠一样，及早地觉察到了中共这艘巨轮即将沉没，便运用自己的特权，提前为自己及全家老小都办好了西方各国的护照，这些护照对他来说就是逃上救生艇的“船票”。此种打算，在高级官僚中比比皆是，中央屡屡下令上缴私人护照，却收效甚微——就是发令者本人，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毫无信心。

肖作新、丛福奎和李嘉廷都是中共“久经考验”的高级干部，他们一边敛聚数以千万计的财产，一边“改辕易帜”而“别投他宗”。老百姓们会算一笔简单的账目：安徽、河北和云南都是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几千万的财产可以救济多少失业工人、破产农民和失学儿童呢？而我更加关注这些贪官们的信仰——就在丛福奎事败之前几天，他还在河北某市主持“三讲”教育工作，脸不红心不跳地大讲人生观、世界观问题。有哪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能够设计得出如此荒诞的情节来呢？中国社会的荒诞色彩，远远超过了卡夫卡、马尔克斯们的想像。说到底，无论是“毛主席的革命理想”还是“江核心的三个代表”，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真正信仰的只有权力和金钱。

二零零四年“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仍然掌握着中共最高权力的江泽民，公开到安徽烧香拜佛。江泽民迷信鬼神早已众所周知，南山寺几乎成了他的家庙。而在北京市中心略靠西的地点修建世纪坛，据传也是一位高僧的指点。当年，专制帝王康熙在承德避暑山庄大行土木修建寺庙，雍正甚至将他当皇子时候的王府改作喇嘛庙，今天，中共领袖又回到帝王们的老路上去了。倡导唯物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痛斥这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徒子徒孙？

其实，在所谓“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上，几乎所有中共官僚都与肖作新、丛福奎、李嘉廷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伪信仰”，曾经迷惑了无数在苦难中挣扎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然而，由于在经

济上取消私有财产、在政治上剥夺公民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在文化上毁灭一切异质思想，这种“伪信仰”发展到最后只能走向暴力镇压和专制统治。在经历了漫长的“文革”和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这种“伪信仰”彻底破灭了。虽然它依然存在于党报和政治教科书上、存在于官员们在大会和电视屏幕上的讲话之中，虽然还是有那么多的大学生“争先恐后”地写入党申请书，但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党，更没有人会把党的教条当作自己的信仰。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新三民主义”，都已经沦落为一种谁也不会当真的“笑话”和“大话”。失去“原教旨主义”支撑的中共，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已绝无“起死回生”的能力。那么，让我们像苏联崩溃时那些聚集中苏共中央门口、向仓皇逃出老巢的苏共中央委员们吐唾沫的苏联人民那样，等候那一时刻的降临吧。

UnRegistered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谏纬党”？

就在中共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一轮“修宪”、宣传“新三民主义”和“政治文明”的时候，中国新闻社属下之“中新网”发表了一篇旷世奇文：

十二月二十三日电 贵州平塘掌布河峡谷地质奇观又有新发现。人文学者、北京东方英才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副秘书长刘学文先生最近对平塘奇石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贵州平塘神秘，疑是外星人所为。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河峡谷一巨石图案惊似“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的消息在媒体发布后，海内外一百多家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和网络媒体争相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十二月初以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李廷栋，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专家刘宝珺、北京东方英才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刘学文等十五名地质专家、人文学者、文化名流组成的“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专程赴贵州平塘对这块巨石图案进行实地考察，并在平塘县向随团采访二十多家新闻媒体公布了考察结果。

中国新闻社是仅次于新华社的第二官方通讯社。在举国上下的传媒都在大张旗鼓地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前夕，以中新社的渠道首发此篇报道，显然是有关方面的精心安排。也许决策者认为，以新华社的名义发表如此“怪力乱神”的内容恐怕还是有点不妥，于是便通过中新社这个次一等的、但依然相当重要的媒体来发布。这篇报道还指出：考察团专家除了在巨石上观察到“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外，经认真考证，还在巨石图案上发现许多神秘的文字，如汉字中的“八一”、“小平”、“石”字以及许多尚未辨认的类似英文、阿拉伯文以及中国古代的西夏文字等。清华大学魏宏森教授还发现了个性独特的“布依族少女”图案。这些现象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在科学上目前还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学者刘学文认为，这块巨石应该是“天外飞来石”，而“神秘天书”则有可能就是外星人留给地球的一份“特殊礼物”。

这篇报道在“中新网”上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国内多家重要媒体也以重要位置和新闻时段予以转载、转播。然而，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两个月，即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我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站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份文件——“国家广电总局关于下发《关于在广播电视工作中加强无神论宣传和科普宣传的意见》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重要批示精神，以及中宣部的有关工作部署，广播电视工作要把无神论宣传和科普宣传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和长期任务，纳入总体部署，加大工作力度，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宣传报道工作。”

该通知之第一条规定：广播电视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三贴近”原则，将无神论的宣传作为一项长期宣传报道任务纳入总体规划。通过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帮助广大群众增强辨别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能力，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愚昧、抵制各种歪理邪说的良好氛围。

该通知之第三条规定：无神论的宣传要突出重点。要宣传各级党组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党员干部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搞封建迷信，不求神拜佛，率先垂范，在全社会营造文明和科学的社会环境，把无神论的宣传同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文明和科学观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良好舆论氛围。要加强对青少

年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多制作适合青少年听众观众收听收看的科普知识类节目，防止不当节目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

该通知之第八条规定：防止宣传伪科学。不要宣传类似“水变油”、“人体自燃”、“外星人”、“超感知觉”等特异功能和所谓的神秘自然现象；不要擅自宣传未经严肃的科学检验的少数人的某些观点；对于人们已经认清其原理的奇特现象，可以通过广播电视节目揭示其科学原理。广播电视科普节目要杜绝出现伪科学的内容，要确保导向正确。

该通知之第九条规定：要发挥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在相关访谈节目中，可以邀请理论界、科学界专家学者解疑释惑，引导人们接受科学，接受教育。要加强同研究和宣传无神论的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大众媒体的联系和沟通，形成合力，协同作战，使现有科学理论成果发挥出最大效益。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大段大段地引用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份通知，因为在“外星人写下‘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的报道和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之间，我不知何去何从、何是何非。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是否应当向国家广电总局举报包括中新社在内的一百多家媒体违反“通知”精神的报道倾向呢？对于中新社等媒体明目张胆宣扬“伪科学”的行径，我们应当迅速展开“揭批”工作。然而，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国家广电总局已经下明确命令不准报道“有神论”的内容，而且在规定中明明白白地指出“外星人”亦在禁止之列，那么中新社以及其他媒体为何还敢如此“知法犯法”、“顶风作案”呢？刘学文、李廷栋、魏宏森等院长、院士、教授级别的著名学者，为何还敢大肆宣扬“伪科学”和“神秘自然现象”呢？他们不怕自己遭受到跟法轮功修炼者一样的悲惨命运吗？

“外星人”报道之所以有恃无恐，其关键在于：石头上的五个大字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他的字样。在“中国共产党”五个光芒四射的神秘大字面前，冠冕堂皇的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顿时成了一纸空文、被束之高阁。由此看来，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虽然报道的是“外星人”、“伪科学”、“神秘自然现象”、“有神论”等“违禁内容”，但只要对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有利，就可以被新闻检察官放行而畅通无阻，甚至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前些年，海南之“毛公山”的发现、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中主席显灵等新闻，不也是得以大肆渲染吗？

看了这则惊天动地的新闻报道之后，本人有如下三个郑重建议。

建议之一：中共在此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修宪建议中，应当将这一“铁证如山”的事实加进去——既然外星人承认我们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并许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那么老百姓更应该俯首帖耳接受共产党的统治了。这个神秘的题字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君权神授”的“永恒党”。像“天书”这样不言自明的强大信息，理所当然必须写进宪法这部基本大法里面，跟“三个代表”一起相映生辉；像“天书”这样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理所当然应该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和领会，并像当年的毛主席语录一样挂在每个家庭的墙上，每天饭前饭后都要念叨几遍。

建议之二，中共也应当将此伟大发现写入党章之中。党章具有“传宗接代”的神圣性，而这次的重大发现则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又一证据。中国古代的皇帝喜欢追溯尧、舜、禹三代之盛世，并在“宗圣”之后汲取统治的合法性；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应当“青出于蓝胜于蓝”，直接与外星人沟通信息，在获得了外星人的授权之后，“宝刀屠龙，号令天下，倚天不出，谁与争锋？”（金庸《倚天屠龙记》）当然，在写入此“神迹”的同时，也要相应地将“坚持马列主义”之条款取消。因为马列主义的根基即是无神论和唯物论，马列主义与“神迹”是断然不能融合的。在当下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摇摇欲坠的时刻，宣扬此“神迹”显然比坚持“马列主义”更加重要，也更加容易征服人心。所以，尽管删除“马列主义”会使得邓小平老人家念念不忘的“四个坚持”残缺不全，但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新一代领导集体大可壮士断腕，此乃“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也。

建议之三，我们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是学地质出身的，兼有政府首脑和地质专家的双重身份，在当今世界政坛上独一无二。因此，温总理可以大大地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肯定与宣扬“天书之‘中国共产党’”的神迹。一来加大政府所控制的传媒的报道力度，二来亲自以地质专家的权威身份对其进行钦定。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将此神迹推出国门，调动有司，积极申请联合国自然与人文“双遗产”的保护项目，为祖国和人民在全世界扬眉长脸，亦可带动贵州贫困地区的旅游经济。同时，还可以展开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申请“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政党”的殊荣——人证物证俱在，中共的历史已有数百万年之久，岂是你英吉利之“辉格党”所能比拟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接受以上这三个建议，那么无论有多少工人失业、多少民工拿不到工钱，无论有多少个孙志刚被打死、多少个李思怡被饿死，都不足以动摇中共的统治。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谶纬”和“迷信”远远比“唯物主义”重要。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宣布，中国共产党就是“谶纬党”和“迷信党”，而不再是“唯物党”，这就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谶纬”乃是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唯有抓住它，中共才可以避免重蹈苏共亡党亡国的覆辙——谁让反应迟钝的苏共领导们不知道这关键的一招呢？谁让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没有此“起死回生”的武功秘籍呢？有了外星人所书写的“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我们自可笑傲如今在野且日渐萎缩的俄罗斯共产党；有了外星人所书写的“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我们大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信心，因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了外星人书写的“中国共产党”五个字，亦可与香港电影《倩女幽魂》中大法师“婆罗婆罗密”的符咒相媲美，可以实现中共一党统治之“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当然，在实施以上建议的时候，必须禁止任何人发表质疑和批评的意见，那些都是看见我们的神迹而眼红的“敌对势力”和“卖国贼”们的胡言乱语。比如，有一个旅居美国的名叫林保华的人就居心叵测地说：“中国共产党不愧是农民党，虽然现在找了一些包括‘地质专家’（总理温家宝也是此类专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来研究，但仍不改农民本色，对胡锦涛发迹地贵州出现的神秘现象更视为灵异的天人感应。所以才有‘天书’之说，只是把玉皇大帝之类中国尊神改为现代社会的‘外星人’，以为经过如此包装之后就可以增加公信力了。”这个牛鬼蛇神居然把我们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的乌合之众的农民起义相比，他还恶毒地攻击说：“这个玩意不就像是《水浒传》第七十回中‘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的情节？那是为一百零八条好汉排席次时天上掉下来的奇石；既然上面有天书决定席次，敬畏鬼神的农民哪敢有异议？元末农民造反，也是在黄河挖出一块‘奇石’，上书‘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农民更乐意的去造反了。中共这个农民政权面临难以缓和的社会矛盾，也只能靠‘天书’的神话来迫使中国的农民接受中共符合天意的统治。”好，既然他们如此露骨地攻击我们，那么我们更要加快将此“天书奇迹”宪法化、党章化、世界遗产化、吉尼斯世界纪录化的步伐。等到这“四化”的目标实现之后，看这些跳梁小丑还有什么话可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前苏联艺术家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是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彼·科拉西克夫的养女。由于养父位高权重，一家人长期居住在苏共权力中心克里姆林宫之中。从小耳熏目染，她对苏联统治阶层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沙图诺夫斯卡娅作为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后来她出版了一本小书《克里姆林宫内幕》。

家住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左邻右舍不是将军就是部长，她冷眼观察到了这些高高在上的苏联神秘阶层的日常生活。二战之后，尽管饱受战争摧残的苏联社会百废待兴，但是特权阶层的奢侈生活却并没有受到丝毫的节制。沙图诺夫斯卡娅描写了一位跟她关系密切的部长的家庭生活：部长配有两辆小汽车，两位司机，一辆为部长服务，一辆为其家人使用。部长的月薪是教授的六到七倍，是工程师、医生和熟练工人的二十到二十五倍。同时，部长每月还能得到一个数额相当惊人的“红包”，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部长在郊外拥有漂亮的别墅，还配有一个女厨师、一个女佣人和一个花匠。

那么，高薪是否就能够实现“养廉”呢？过着如此优越的生活，部长们是否就会像党章上所说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沙图诺夫斯卡娅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在书中愤怒地写道：“同他们夫妇混得更熟了以后，我发现了一些使我深感吃惊的新事，那就是这些人的贪得无厌、麻木不仁和利己主义。”她发现这些高级官员没有任何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其官位的高低与品质的优劣几乎成反比。部长夫人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特权享受，还亲自参与倒卖各种紧俏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贪得无厌让人震惊。有一次，沙图诺夫斯卡娅忍不住问部长夫人克拉夫季娜说：“你这样搞投机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你什么都有了，何必还干这个呢？”

克拉夫季娜一本正经地向沙图诺夫斯卡娅解释说：“你不明白我们的处境。你丈夫今天是教授，明天还是教授，你可以放心。而我们……我们是‘片刻为王’。今天，我丈夫是部长，我们什么都有。而明天，他到部里去就可能发现，一切都翻了过来。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会从报纸上读到自己不是部长的消息。他什么也不是了。所以，只要还有可能，我就想使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得到保证……从过富日子转向过穷日子难啊！”

部长夫人的这番心里话让沙图诺夫斯卡娅明白了受到斯大林重用的那些人的真实心态。命运把他们提升得再高，他们也总是为自己的地位是否稳固而备受折磨。他们在灵魂深处总是觉得自己的高升是昙花一现。于是，就产生了“片刻为王”大捞一把的心态。明天怎样，不知道，管它呢！疯狂地捞啊，捞啊，头也不抬，管它良心不良心。这种心态不也是今天依然处于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的大小官僚们的心态吗？

还有一次，部长夫人得意洋洋地向沙图诺夫斯卡娅炫耀他们一家即将到高加索某疗养胜地去疗养。他们将乘坐配备了带有公共客厅的高级火车专列，老百姓称之为“了望车”。由于丈夫还得“坚守工作岗位”，只有夫人带着孩子以及“炊事员、警卫员、保姆”等一系列工作人员出发。

沙图诺夫斯卡娅忍不住又质问道：“难道你为了自己、孩子们和保姆而乘坐重型了望车飞驰全国，不问心有愧吗？你知道，现在还有几千人带着孩子昼夜辗转反侧地躺在火车站里等机会回家。你知道，把你的了望车挂到列车上，就要甩掉一到两节普通车厢，这就是说，还要有好几百疲惫不堪的人上不了火车。难道你就不能克制一下自己，改乘软席包厢吗？”克拉夫季娜微微一笑说：“那怎么行？你知道，我们是‘片刻为王’。今天，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片刻为王”是俄罗斯人的一句有名的谚语，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一小时的哈里发”。在这个“一九八四”的世界里，除了惟一的“老大哥”之外，元帅、书记、部长、州长们个个都是“一个小时的哈里发”。有了官位，他们可以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但如果突然之间失去了自己的职位，他们立即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从高层到底层，人们都像生活在世界末日，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高级官员尤其是领袖们只能维持权力到死亡，他们不可能像美国总统一样，卸任之后悠哉游哉地去做一名大学的教授。这些官僚已经蜕化到除了当官什么都不会的地步。因此，他们一方面把权力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则抓紧一切机会捞取每一点好处。用中国官场的话来说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沙图诺夫斯卡娅笔下的前苏联社会跟今天的中国十分相似。惟一的区别就是：今天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比起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苏联官场来，不知突飞猛进了多少倍。近年来遭到查处的几名省部级高干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前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湖北省前省长张国光等人，以及垮台的十多个省市交通部门的负责人，贪污受贿的数额都是老百姓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腐败之易和数量之大，大约都是前苏联的高干们所望尘莫及的吧。中共在其他方面比不上苏共，一直无法从苏联手中争夺到社会主义阵营“旗手”的地位。但是，今天的中国在腐败方面倒是能在如今所剩无几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独占鳌头”。

今日之中国大陆，官僚阶层普遍是“片刻为王”、疯狂捞钱的心态。对于这些看不到明天的官员们来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官则疯狂敛财一天。大概没有一个中共官员相信他们还能建设成功“共产主义制度”，那只是中国人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时候的“宣誓”而已。已经被处死的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就在电话中赤裸裸地告诉在美国的儿子说：“赶紧帮我们打好前站，一旦这边不行了，我们就到美国来继续享福！”这句话被安全部门窃听之后呈送最高当局，之后为胡引来了杀身之祸。但是，这句话确实是今天中国的那些坐在火山口上的官僚们最真实不过的“心声”。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九日，新华社报道了中纪委在国内对“一把手”进行“家属出国登记报备制”试点的消息。报道的新闻导语简短而明确：鉴于近几年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外逃人数不断攀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腐败犯罪后，携巨款，阖家分批逃往海外的情况，近日，中纪委开展试点建立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的报备制度。消息报道，此次进行试点的地方和单位约有四五个，北京市的“某单位”也在其中。近日，又有一份与此话题相关的材料发表：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指出，近二十年来，约四千官员出逃国外，外逃资金五百亿美元；平均一下，也就是每年外逃两百人，每年外逃资金二十五亿美元。每人所涉金额大致是一千两百五十万美元，即一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反过来证实了，那些外逃的四千余人个个的“能量”都不低。有专家透露，这一数字其实还是大大“缩水”了的，实际外逃的官员和资本的数量高出其数倍。对于宣传部门宣称要传承千秋万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官员比昔日的苏联官员还要缺乏信心。显然，这些“硕鼠”们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即将来临，他们早早地为自己安排各种后路。他们就像是泰坦尼克号上的老鼠，最先感觉到巨船即将沉没，便匆匆忙忙地夺路而逃。

中国社会科学亚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邵道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九十年代初（尤其是中后期）开始了腐败高发期。腐败的主要表现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向“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发展，也即是“权力资本腐败”。诸如“国企改革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股市黑金操作中的腐败”等，腐败的面大、量大、范畴广、危害大、层次高。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正式生效，国内一片欢呼。紧接着，《联合国反腐公约》的草案也获得通过。有人乐观地预测，有了这两个公约，就是有了追逃的国际文本，外

逃贪官们将无宁日，中国贪官大规模携款外逃的现象终于有望得到遏止。但是，邵道生却不无忧虑地指出：“从最近一个阶段而言，在短时间内难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追逃过程中国际合作的艰难，包括程序上和实际操作当中的各类问题，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

为什么贪官们会有末世之感并上演最后的疯狂呢？邵道生研究员不敢捅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一九八九年以反腐败为触发点的民主运动，最终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残酷镇压。中共固然稳住了他们“铁打的江山”，却导致了自身彻底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并堕落为一个“腐败党”。各级官僚“风起云涌”地贪污腐败，乃是“六·四”惨案的又一“反向后遗症”。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幅只有末世才有的图像：有的贪官将数百万人民币压在床垫下睡觉，有的贪官在家中供奉起了从观音到关帝数十个神仙牌位，有的贪官张开血盆大口去喝“婴儿汤”，就连最高领袖也要赶到庙宇中去烧第一柱香。

不久前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监督省委书记》的文章，洋洋万言却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近日中央组织部派出所谓的“督察组”到各地巡视，企图给地方诸侯施加压力，抑制越来越猖獗的腐败现象，结果却是无功而返。这种派出“钦差大臣”到地方上走上一趟的方式，古代的皇帝们早就用过了。不过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皇帝自己也不相信真有作用。今天，“聪明”的中共领袖们又祭出这个“翻天印”来，不过是让老百姓笑话笑话而已。不结束一党专制、不实现“还权于民”、不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中共官僚们个个都只能是“片刻为王”的吸血鬼。他们最后的疯狂不会持续太久了。

——二零零年十二月十日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二零零三年八月九日，距程维高的七十大寿还有一个半月，中纪委提前给他送去了一份大礼：“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称待遇。”而在此前三四年间，程维高的两任大秘书吴庆五、李真就先后被捕，并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死刑。程的倒台是河北省政坛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对于“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中共官僚系统而言，他不过是又一个“运气不好”的落马高官而已。

程维高的两任秘书吴庆五和李真都是河北官场的巨贪。两人随随便便以河北某国有企业的名义就能从银行里拿到数以千万计的贷款，然后做一个假帐，钱就流入了私人公司当中。尤其是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后来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七年间收取贿赂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美元十七万元、港币一万元，合伙贪污公款两千万元，与他人合伙非法侵占爱尔兰尼瓦利斯公司股权折合四十六万多爱尔兰镑，非法侵吞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兴电子有限公司价值一百一十二万五千美元的股权。一个秘书能够如此“大肚能容”，不说绝后，也算空前的了。

李真在河北省官场上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公开买卖官位，不仅县级官职随意调度，甚至与自己同级的厅级官职也能自由支配，这在等级分明的官场上堪称奇观。李真的垮台，引发了河北官场的一次“大地震”，他的案件牵扯到厅级干部八人，县级干部六十七人，其中四十人是一把手。据知情者透露，李真在国税局作风霸道，有三个秘书、两个女服务员和一个在部队服役的警卫人员。副局长及其以下人员向其汇报工作必须提前预约，否则不得进入他装修得富丽堂皇的办公室。

其实，李真并非高干子弟，他出身贫寒，确实是“崛起于陇亩之中”。他的权力源泉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主人——前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可以说，没有程维高的专权就没有李真的专权，没有程维高的腐败也不会有李真的腐败，正如《社会观察》记者曹怀宇所论：“李真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是有理由的。作为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他的胆子是程维高给的。他敢于把鸡毛当令箭，至少程维高要给他鸡毛并默许是令箭才行。李真在河北省政界能呼风唤雨被称为‘二书记’，实际上执行的都是程维高的指令，当然少不了顺手牵羊。”一般人从李真、吴庆五贪污受贿的数量就可以推测程维高贪污受贿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就好像《红楼梦》中的描写，丫头的装束尚且让刘姥姥眼花缭乱，夫人小姐们只会更上一层楼，断无夫人小姐比丫头节俭和寒碜之理。

然而，两个秘书一个在黄泉路上转了个弯、一个已经刑场伏法之后，主人却仅仅失去了“党籍”和“正省级职称待遇”。这简直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版本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我有三个问题想质问有关方面：其一，既然吴、李两个大秘书在五年之前就被立案调查，那么为什么要等到五年之后才把他们的后台老板程维高拉下马？吴、李两个大秘书被捕入狱之后，不仅供出河北官场许多同僚贪赃枉法的行径，也一定供出了诸多关于程维高的劣迹。但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程维高依然稳稳当地做他的省人大主任，同时还利用专政机器对揭发他的工程师郭光允实施逮捕和劳动教养。以中共官场的惯例，每一级官僚背后都有更高一级官僚作为后台老板，科长依靠局长、局长依靠县长、县长依靠市长、市长依靠省长、省长依靠中央首长，如是者类推。那么，程维高在中央的靠山究竟是谁呢？民间有多种传说。可以确认的是，这个靠山动用了他的影响力，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护着程维高，使他不至于被牵扯到秘书的案件当中，直到纸包不住火为止。

其二，既然程维高在仕途上最后的一个官职是“省人大主任”，那么对他的调查就应该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共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而更应当由司法机关介入。在程案中，中国的司法机构究竟在哪里呢？公检法部门全都不约而同地缺席了。程固然是党员，更担任过省委书记的要职，中共自身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进行惩罚是理所当然的，但仅由这样一个党的部门来发布对他处分显然是不够的。在这则新华社播放的消息中，丝毫没有提及下一步是否由司法机关介入、继续深入调查。这种“虎头蛇尾”的惩罚方式，就好像大人打几下调皮的孩子的屁股一样。程虽然受到了查处，但他依然超然于法律之外。这是对包括宪法在内的诸多法律的蔑视和不尊重。在这种思维的背后，隐然可见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党权”高于“法权”，“党纪”高于“宪法”。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它对于包括中共党魁在内的高级官员都在声称的“依法治国”来说，不啻是一大讽刺。

其三，秘书伏法而主子逍遥，是不是在暗示官僚们这样的道理：官越小越不安全，反之，官越大就越安全？庄子时代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共产党时代则是“秘书受死，首长免罪”。吴、李二人的诸多恶行，都直接与程维高联系在一起。拔出萝卜哪能带不出泥来？许多媒体也开始揭露程的一些具体的“严重违纪”的事实，如干涉建筑工程和高速公路修建、买卖官爵、迫害揭发他问题的干部百姓等等。岂止是“严重违纪”，件件都是严重的犯罪。然而，直到今天为止，程维高依然没有被进行司法意义上的调查，他甚至连“犯罪嫌疑人”都算不上。

在中共体制下，要做贪官就要做大贪官，程维高案不仅不能给官僚们以警醒，反倒启示和鼓励他们拼命往上爬，因为“无限风光在险峰”。

——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由于对今年夏天酷热气候造成的社会危害应对不力，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吕西安·阿本哈伊姆引咎辞职。

阿本哈伊姆在辞职信中说，酷热导致的流行病使很多人死亡，社会上对卫生部门应对不及时和采取措施不力指责颇多。在这种情况下，他提交了辞呈，并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解释卫生部门所采取的行动。

阿本哈伊姆是在卫生部长马太当天在电台发表讲话后提出辞职的。马太批评卫生总局等部门在危机期间表现欠佳，对酷热引起的流行病导致大量患者死亡没有预警，未能及时准确地向卫生部通报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马太说，当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医院和社会救助部门频频告急时，卫生总局等部门依然上报说局面已经被控制。马太指出，虽然卫生部门随后采取了补救措施，但仍对危机处理不及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合民众的抱怨，阿本哈伊姆其实并非“必须”辞职，有关部门也并没有启动让他下台的程序。但是，显然阿本哈伊姆是一个有羞耻感的官员，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和失误，他认为自己应当为之付出代价和承担责任，他是人民的公仆而非人民的主人。阿本哈伊姆的辞职显示了民主社会的诸多优越性：新闻舆论的自由，人民有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官员有责任感和起码的良知。而这一切在极权主义的中国还是天方夜谭。

就在阿本哈伊姆辞职的当天晚上十点钟，山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就搞好当前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发生进行了紧急安排部署。十九日的《山西日报》报道说，会议要求，全省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从八月十九日零时起停产整顿一周。

进入今年八月中旬以来，山西省连续发生三起煤矿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八月十一日，大同市杏儿沟煤矿风井发生瓦斯爆炸，四十三人死亡；八月十四日，阳泉煤业集团公司三矿裕公井在排放瓦斯过程中发生瓦斯爆炸，二十八人死亡；八月十八日，晋中市左权县辽阳镇河南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九人死亡，十八人被困井下，生还可能性极小。

在此次电话会议上，山西省省长刘振华要求：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重视和加强安全生产。他说：“一是安全生产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几起事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二是近期发生的三起事故都属于重大责任事故，是没有真正把安全工作放在头等位置，嘴上讲安全，心里想挣钱的结果；三是安全管理松懈，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四是安全管理职能部门把关不严，许多环节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段话依然是中共体制类司空见惯的官话、套话和空话，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刘振华利用事故让自己的“总结概括”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中共官僚的“基本素质”。很明显，刘振华是不会“引咎辞职”的，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还要一直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呢。因此，即使再发生一百起矿难、再死亡一千名矿工，他都不会“引咎辞职”。

如果因为仅仅对高温酷暑应对不足，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就应当辞职；那么，因为连续不断发生特大矿难，山西省乃至中央主管部位的官员当中就应当有几十人、几百人辞职。短短一个星期山西就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矿难，三次死亡矿工人数之和接近百人，如此密集的事故发生率和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即使在军阀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极为罕见。法国卫生部门对高温应对不足与中国政府对安全生产的漠视显然是不同的性质：某些公民在高温酷暑中突发疾病死亡，政府部门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地带；而

公民在矿难中悲惨死亡，政府部门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则是一个清晰明白的界线。正是权力部门的纵容以及背后的黑幕买卖，才导致许多不符合生产条件的矿井的非法开采和长期开工。在这一系列背后复杂的交易中，唯一被牺牲的就是矿工的生命安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口口声声宣扬“三个代表”、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却卑贱如猪狗，这是何等的讽刺和悲哀啊——在繁峙矿难中，死难矿工的尸体就是被老板们胡乱扔到了荒郊野岭，他们生前没有自由和幸福，死后也没有尊严和安宁。

在中共体制内部，不会出现像阿本哈伊姆这样有羞耻之心的官员。在几个月前萨斯病毒肆虐的时候，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信口雌黄、掩耳盗铃，当真相被曝光于全世界面前之后，他依然没有“引咎辞职”，一直硬撑到上面一纸罢免令下达。在被免职之后，人们（包括萨斯中的死难者的家属）也从来没有听到张文康说过一句自责、道歉和忏悔的话。同样，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矿难之后，山西省的各级官员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表谈话，向矿难中死亡矿工的家属表示道歉和愧疚——有的只是居高临下的“慰问”和“关怀”；也没有一个官员——大到省长，小到乡长——提出要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对于已经是“封疆大吏”的陕西省省长刘振华来说，矿工的生命轻如鸿毛、贱如草叶，他之所以关心这些矿难，仅仅是因为矿难造成了“政治问题”，因为矿难将“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在这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过于频繁的矿难，有可能使得他的官位不稳，使得他进一步的升迁受阻。在刘大巡抚心目中，“政治”、“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自己的官位和权柄，显然比老百姓的生命更加重要。这是典型的冷酷而僵化的中共高级官员的思维，这种思维脱胎于“六·四”大屠杀中王震的名言：“杀他个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的安定团结！”每一次矿难死难者的鲜血，都呼应着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青年学生和市民的鲜血。对于天安门工厂的悲剧没有恻隐之心的官僚，同样不会对死难的矿工有恻隐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矿工们和天安门广场上帝学生、市民一样，不是死于偶然事故，而是死于残酷的谋杀。

这一切的罪恶，都根源于习惯于“瞒”和“骗”的专制制度。中国的基层官员和矿井承包商们一致认为，如果矿难不被曝光，如果可以瞒天过海，那么即使将死难矿工们毁尸灭迹也在所不惜。在去年的繁峙矿难中，他们就是这样尝试的，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而像刘振华这样的高级官员，当然也乐得被基层“欺骗”，基层“欺骗”了他，他再去“欺骗”中央。这个官场，本来就是一个骗子的舞台。蹩脚的演员们永远不退场。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九日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有感于“新青年”案件维持原判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十七法庭驳回“新青年”一案四名上诉人之上诉，维持原判——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靳海科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当代中国法制史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这一天，撒旦在炫耀他暂时的胜利——他强迫人们把白说成黑，把是说成非；这一天，用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话来说就是：“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就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在一个星期前长达十个小时的法庭“公开审理”中，徐伟的父亲徐连胜、徐伟的女友王丽、杨子立的妻子路坤、靳海科的父亲等家属早上八点半就来到法院传达室领旁听证。传达室声称：法院未通知他们今天的开庭，没有旁听证。随后，莫少平、高峡二律师先进法庭与审判人员交涉，但他们发现已有六名“旁听人员”占满了第二排旁听席。审判人员称，旁听证已发完，旁听席已满，家属等旁听人员已无法入内。这六名“旁听人员”虽然从开庭起便占着旁听席，但下午快到下班时间都走了，而审理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这六名所谓“旁听人员”根本没好好听审理过程，他们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翻阅不知是什么宣传材料……而同一时刻，家属们在法院外、在寒风中守候了将近十二个小时。

在最后的辩护中，徐伟指出：“新青年学会无罪，其成员无罪。”他进而痛斥司法机关诱欺骗证人、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执法犯法的行径。杨子立坚定地宣称：“如果我被判刑，是因为我所崇尚的自由、民主、公正、平等，那我很荣幸！”靳海科这样说：“我们无罪！如果我为国家法制的完善而被判刑，我觉得很光荣。真正对国家有威胁的不是这些关心国家的爱国青年，而是那些践踏法律和公正的人。”张宏海骄傲地宣布：“我们无罪。我们所说、所想的无非都是没失去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说的。我们所做的是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我以加入新青年学会为荣。希望我们也能如彭德怀那样被平反。”

事后，律师告诉我，在多年的法律生涯中，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掷地有声、斩钉截铁的自我辩护，他被这四位热血青年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也为这四位兄弟的勇敢和刚毅而感到骄傲与欣慰。他们是七十年代人中的杰出代表，在专制肆虐、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今天，他们以自己的受难凸现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屡遭摧残而生机犹存的现实。他们是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希望所在。

这一次，某些善良的人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四名被告的上诉，依然维持一审时荒谬绝伦的判决。这一判决也显示了一个号称“三个代表”的政权，已然沦落到只能依靠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来维持其统治的地步了。他们什么都害怕：害怕手无寸铁的法轮功修炼者，害怕只有二十岁的大学女学生刘荻，害怕为乡亲说了几句真话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害怕由四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组织的读书沙龙……他们比当年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还要胆怯和卑劣，他们一边利用中宣部及其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成批量地制造谎言、伪造历史；一边色厉内荏地展示军警宪特的力量，企图以恐怖气氛来征服人心、维护“稳定”。

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艰难的民主化进程中，“新青年”案件应当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四名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既是对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的直接回应，也是对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多灾多难的民众的深切共鸣。让我们记住为此案而承受了巨大痛苦的四位青年的家属，让我们记住为四位青年提供过种种帮助的、他们勇敢的同学、朋友和师长们，也让我们记住在艰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为四位青年辩护的律师们，他们的名

字是：徐伟的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莫少平、高峡律师；杨子立的辩护人——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李和平律师；靳海科的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刘东滨律师；张宏海的辩护人——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张思之、阎如玉律师。同时，也让我们记住这些专制权力的帮凶和帮忙、罪恶的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们，他们的名字是：审判长金星、审判员张永忠和仁民宾、检察员张晓霞，以及安全部的线人李宇宙，负责逮捕、关押并折磨四位青年的安全部特务，当然还包括法庭上那六名奉命占据旁听席的“旁听者”。更多的名字总有一天将大白于天下，而最终被送上审判席的应当是他们。

人皆有父母、妻子和儿女。我相信，上面我所提及的罪恶的参与者们，在家庭中也许是称职的儿女、丈夫、妻子或者父母，他们却可耻地参与了伤害他人无辜的儿女、丈夫和兄弟的丑恶行径。他们辩解说，自己不过是工具而已，必须服从上级命令。在一个司法不独立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在法庭上扮演丑角也是“身不由己”。但是，在我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相信康德所说的“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人做了坏事，也许可以逃脱现实中律法的惩罚，却无法躲避历史永恒的审判。德国作家霍斯特·布尔格写过一本名为《父亲，请你回答》的书。这本书撕开了历史的帷幕，作者写道：“五六百万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六千万民众的眼皮底下，而他们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料到。或者是不想知道？干脆把眼睛闭上了？人们依然生活、工作、相爱、欢笑——就像在一个自由、和平的世界上，而不是在一个巨大的屠宰场上。”于是，作者向曾为希特勒浴血奋战的父亲提出了如此严峻的质问：“屠杀犹太人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能容许这种事发生呢？还是你们真的对此一无所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青年”一案中的法官、检察官和安全部特务们与“希特勒的自愿行刑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即使良心早已被狗吃掉、不会受良心的谴责，这些穿着道貌岸然的制服的法官、检察官和特务们，也将面对他们的子女乃至孙子孙女的严厉追问。那时，他们将无言以对。他们不能说自己仅仅是傀儡、是螺丝钉，不能说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因为，没有人能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你所有的作为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一旦参与了罪恶，手上的血迹就一辈子都洗不干净。在这个世界上，谁争取过自由，谁扼杀过自由；谁与真理接近，谁与罪恶共舞，上帝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不能谅解和宽恕这些罪恶的参与者们，正如我不能不向“新青年”四君子致以尊重和敬意。在这一点上，我不认同混淆是非的“相对主义”，也不接受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秩序。分辨善恶是我生存的前提。我拒绝参与刽子手们人肉的宴席，我情愿分享杨子立们光荣的刑期。这不是在彰显胆量，而是在承担最基本的义务。霍斯特·布尔格在《父亲，请你回答》的结束语中指出：“当人们对富裕生活比对言论自由更重视时，法西斯霸权很快就会出现。此后，其他自由也就会迅速消失。因此，人人都要承担义务。”他认为：“光谈一点法治国家和一点民主是不够的，这两者如果还值得人捍卫，就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地发挥作用。人人都要承担义务！如果哪里有人在耍花招，就把他指出来。如果他们口口声声说民主，却听任警棍挥舞的话，通常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实，这段话也是说给中国人听的。在“新青年”案尘埃落定之时，我愿把这段话转送给所有对中国未来抱有良好愿望的同胞。

有的人生来就是为了飞翔，再高的围墙和再黑的牢狱，也关不住他们想飞的翅膀。我相信，我监狱中的四位兄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失败。在愤怒和泪水中，我写下这篇文章，写下对罪恶的鄙夷，写下对兄弟的敬意，写下对自由的执着，也写下对一个终将属于我们的“少年中国”的信念。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那些参与“金盾工程”的“海龟”们

二零零三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接见全国“金盾工程”专家代表，并与之合影留念。我在央视的“新闻联播”中看到了这个画面：黄菊面带中共高级官员惯有的“计划经济式”的笑容，与这群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重要专家握手。众人则一律鼓掌欢迎。这则简短的新闻并没有普通公众的注意。大家以为这不过又是有中共特色的“文山会海”中的一滴浪花和一点尘土而已。

央视报道说，黄菊勉励大家精心规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确保“金盾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为加快国家信息化进程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开展了“金关”、“金税”、“金卡”等信息化工程建设，有力地推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公安信息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应用领域，全国公安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电子政务建设的十二个重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之一。“党中央、国务院对公安信息化高度重视，把‘金盾工程’作为国家信息化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安排，并批准了‘金盾工程’的立项。”

然而，“金盾工程”的实质并非如同新闻报道中的那样冠冕堂皇。我在电视上发现，那些参与“金盾工程”的计算机专家，许多都身穿制服，显然相当一部分都是军方、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人员。看到这一场景，我不禁想起了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第一圈》。当时的苏联就是一个布满克格勃特务的帝国，公民的电话和信件随意受到监听。而监听者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宏大叙事”来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第一圈》的开头是写一位中级官员听到了将清洗他的老师的消息，出于师生之情，他偷偷到外边的公用电话亭给老师家打了一个报信的电话。这个电话被克格勃监听到了，但是要辨别声音的归属，还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在由克格勃控制的“古拉格群岛”之中，就专门有一个地方是从事这一研究的。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在各此政治运动中被清洗的科学家，他们被强迫从事类似的研究工作。因为他们还有使用价值，所以他们在“古拉格群岛”中的待遇还稍好一些，也就是所谓的“地狱的第一层”、“地狱的第一圈”。小说的最后是窃听中辨别声音的技术终于研制成功，那名泄露国家机密的官员被揪了出来，送进了“古拉格群岛”的另一处。当时，苏联的统治者认为，依靠监视、依靠压迫、依靠暴力。依靠恐惧，就可以让苏共的独裁统治永远维持下去。他们认为自己的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坚固的帝国。然而，强大而坚固的苏联帝国终于灰飞烟灭，苏共也成为大多数民众唾弃的政党。苏联的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后才意识到：历史的推动力不是对暴力的使用，而是人类对自由的追求。

今天的中国继续走在前苏联的不归路上。投掷数百亿的“金盾工程”，也就是要把庞大的中国变成活生生的“一九八四”。这一工程成功之后，将实现对全民的严密控制，从网络、电话、信件到所有的活动，都成为“老大哥”眼皮底下“公开的秘密”。早在二零零一年，美国互联网独立研究专家格里格·渥尔顿（Greg Walton）就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的金盾工程》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以目前的发展趋势，到了二零零九年，中国安全部门对每个人的监控可以深入到每家每户。在电话上一开口，声音就被识别出来；一上街，摄像机就能确认你。即使不是全国范围，至少在城市里，公民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受到监控。

在二零零零年北京举行的一次贸易博览会上，中国的保安机器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字监视网络，连接全国、地区和本地保安机构，能展示全景的监视网络。北京的构思是一个以数据库带动的遥距监视系统——能够实时取得全中国每一个市民的登记记录，同时连接庞大的摄影机网络，确保可以加快警察对付示威的应变时间。格里

格·渥尔顿指出：“一个庞大的智能监视网络所需科技其实复杂到惊人程度，无论如何，由于方案是模仿人类智能，所以我们可以用每个人熟悉的术语来类别这个方案：北京有意要的‘金盾’监视网络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

在中国，网络自由成为中国政府最惊恐不安的领域。一旦信息在网络上自由流通，一旦上网的人数超过一亿，中共长达半个世纪精心营造的谎言帝国就将面临崩溃的下场。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类，这将是专制与自由殊死搏斗的一个领域。在这份报告中，格里格·渥尔顿批评了某些西方跨过公司向中共提供技术的“不道德”的行径。他列举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利用西方的监视技术实施大搜捕的事实：“紧随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国政府折磨和审问了成千上万的人，试图找出组织示威的人。即使学生和工人能够反抗秘密警察的恐吓，那些倒霉示威者并无匿名机会。整个天安门广场均装有英国制的监视摄影机网络，设计用途为监视交通流量和调整挤塞。这些摄影机记录在坦克车进驻广场前几个月在广场内发生的每一件事。在其后日子里，这些影像反复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几乎所有违反者均是被这个方法认出。Simens Plessey 公司制作和出口这些摄影机，而世界银行负责支付安装费用，两个机构均表示他们从未想到他们的‘中立’科技会这样被应用。”格里格·渥尔顿警告西方政府说：“政府必须认清楚，科技不是中立的——它是变色龙，而且会随著环境改变颜色。”

在“金盾工程”实施的过程中，除了某些惟利是图的西方高科技公司的介入之外，还有许多中国的“海龟派”的积极参与。他们大多是近二十年来到西方留学的青年知识精英。与五四时代远赴重洋留学的先辈不一样，他们缺乏理想、激情、道义和伦理底线。他们觉得参与这样的事业是人生价值的实践方式之一。有意思的是，身份暧昧的中国亚信科技公司也是“金盾工程”的重要参与者。这家公司虽然表面上看是由一群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创办的，但实际上却有着相当的官方背景。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亚信科技的董事长丁健经历极其跌宕起伏。

丁健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八十年代中期赴美留学。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爆发之后，他曾经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到中共驻美使领馆门前去表示抗议。后来，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积极参与全美学者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活动。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丁健突然淡出民运圈子，与一批在海外留学时结识的朋友回到国内组建了亚信科技。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亚信科技奇迹般地成为拥有数十亿资产的一家高科技集团公司。而其前任老总田朔宁，后来成为中国网通的老总，据说与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电信大洗牌中，网通竟然将中国电信在北方的半壁江山通通收入囊中，演出了一出“小蛇吞大象”的杂技，令业内人士惊叹不已。丁健本人虽然没有田朔宁那样丰厚的人脉关系，但他积极参与“金盾工程”等事务，同样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近两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一直处于六、七十名的位置上。

丁健的转变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香港著名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的主人公许文强。由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早年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积极参加反抗军阀的学生运动，他的初恋情人还在一次游行示威中死于警察的刺刀之下。但是，当他来到上海之后，他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接受了上海滩的“血酬”（吴思语）原则。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力量才是唯一值得信赖和信仰的东西。为了权力和金钱，许文强不惜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终于成为上海滩的霸主。这一人生轨迹正是九十年代之后许多经历了“八九”民运洗礼的青年留学生的人生轨迹。有带领民众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先驱蜕变成成为参与剥夺民众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的帮凶，这个过程地完成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丁健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高级公寓中，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网络上畅游。即便在北京的居所里，我相信在他居住的高级“涉外公寓”中，一打开电视就能够看到美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他不觉得中国有什么不自由，也就不会为自己参与“金盾工程”而感到有丝毫的内疚。还有更多的没有

丁健“成功”和“著名”的“海龟”们，大致也是同样的心态。

我在访问美国期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了一次演讲。我谈到自己对“海龟派”的看法，我认为留学生回国效力、经商乃至发财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必须把握一道底线，即不能成为专制力量的帮凶，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反作用力”。中国有一句古语说“于己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在西方学习到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留学生，既然自己知道信息封锁是一件丑恶的行径，既然自己在上网的时候不愿意出现障碍，那么为什么自己要去参与阻碍自己同胞自由获得信息的下流事情呢？

在我演讲结束之后，有一位正在念理工科博士学位的青年朋友站起来反驳我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个工程师，他只是“匠人”，他不愿意去思考道德层面的事情，那只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工作。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仅仅是把自己的技术运用到需要它的领域去，不管是为美国政府工作，还是为中国政府工作，以及为私人公司工作，性质都是一样的。如果参与“金盾工程”，那也无可指责，因为“科学无国界”。他不会像毛泽东时代“忠党爱国”的科学家一样，以能够为“党国”服务而感到自豪；也不会感到有道德上的压力和羞愧感。因为，这仅仅是一份能够挣到钱的“工作”而已。

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开脱。我发现如今在海外的许多留学生都持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这表明“六·四”之后官方实行了十多年的摧毁国民的信念和道德感的教育获得了相当的成效。这种卑鄙的教育方式造就了整整一代没有底线伦理、没有起码的是非善恶观念的青年人。其实，即便是在纯粹的理工科领域，道德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体制下，一个科学家难道就可以打着“科学中立”的幌子，心安理得地对无辜的囚犯实施化学试验和活体解剖吗？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加拿大外长洛雅德曾经在一次网络论坛上宣称说：“科技正在改变权力的平衡，挑战常规通信管道。网络散播和宣传的影响将变得非常深远，它甚至可以将‘管道’民主化，摆脱‘看门人’。技术有令人惊奇的潜能，可以突破栅栏和战胜政治障碍……鼠标比导弹更强大。”但是，技术也有可能被运用到对人的控制和压迫上。就像美国电影《国家的敌人》一样，当少数邪恶分子掌握了这种力量之后，他就可以利用它们来肆无忌惮地戕害公民的自由。格里格·渥尔顿并不像洛雅德那样乐观，他尖锐地批评了像北电网络和思科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这些公司在中国不仅没有增加当地政府对人权的尊重，而且用他们的技术帮助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人民党控制和对自由的扼杀。他指出：“在独裁和压抑的国家里，对付罪恶与镇压异见被蓄意地混淆。”因此，某些西方公司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帮凶。最近，大名鼎鼎的思科公司在美国遭遇到了起诉。无论审判的结局如何，警钟已经敲响：危害中国人民的自由，必然也危害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我相信，丁健之类的“海龟”精英们，也终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

官逼民死

据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报道，二零零三年七月，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的涌泉村，在五天之内连续发生了三起农民自杀事件。这三位自杀的村民分别是五十六岁的李立文、三十一岁的李祥和三十二岁的陈音富，李立文在七月十一日自杀后被抢救过来，而李祥和陈音富分别在七月十三日和十五日自杀身亡。

在有着“好死不如赖活”的文化传统的中国，尤其是在信奉“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生存哲学的中国农村，这三位农民为什么要选择走上绝路呢？比如，那位比我只大一岁、年龄仅仅三十一岁的李祥，家里只有岳母、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离开将给亲人带来怎样大的悲痛和苦难。在农村，青壮年男性是“顶梁柱”，顶梁柱的坍塌，对于家中的两个弱女子和两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我相信，如果还有一点生存的可能性和希望，他们不会如此轻易地作出告别人世的决定。毕竟，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那句苦苦的追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对于所有人来说，生与死都是不那么容易作出的选择。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呢？究竟是什么力量将他们的脊梁压垮了呢？我想，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恐惧啊，它在几天之间就摧垮了几位沉默而坚韧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意志。而中国农民的生存意志一向是举世闻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在缅甸战场指挥中国士兵对日作战，这些士兵大都昨天还是手中拿着锄头的农民。史迪威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农民的温良性格和谦恭态度在战场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任何时刻他们都充满了幽默感。我尊重并赞赏他们，他们能够忍受任何国家的士兵都会因之而放弃的种种艰难和痛苦，他们会一直战斗下去。”然而，在战争年代都能够熬过去的中国农民，今天却无论如何也挨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一个怎样的关口呢？

李立文家有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但收入很少，难以补贴家用。妻子是聋哑人，智力不太正常，无法从事正常的劳动。他的家里只有两间土房，陈设十分简陋。李立文一次喝下了十支农药自杀，自杀的态度显然十分坚决。但幸运的是，他被抢救了过来。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我在退耕还林的地里栽了桑树，套种了黄豆和红薯，但工作组强迫拔了它们，还要罚款，没有钱、没有办法。”

李立文家里的两亩四分地，属于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补助的地块。按照国家《退耕还林条例》规定，退耕还林者应当按照作业设计和合同的要求植树种草，禁止林粮间作和破坏原有林草植被的行为。今年六月，旬阳县对全县二十八个乡镇的退耕还林工作进行全面检查。而将涌泉村成为乡里退耕还林核查整改的试点。乡上派出工作组在七天之内对涌泉村进行“地毯式”核查，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

李立文在退耕还林的地里套种了红薯、黄豆等粮食作物，在这次桐木乡工作组的核查整改中，被要求或立即将粮食作物拔除。李立文告诉记者：“一共要交五百六十块罚款，但家里一年的收入连两百块都不到，吃盐的钱都没有。”李立文身上穿的是一件儿子穿旧的衣服，他自己从未买过新衣服，连自杀喝的农药都是赊来的。李立文活了过来，不管以后的日子怎么难过，他对生命的意义一定有了另外一番体认。

然而，另一位自杀者、第三村民小组组长李祥却永远离开了人间。涌泉村第三村民小组共有近四十户村民，他们大都套种了经济效益较高的烤烟。由乡人大副主任薛成芳担任组长的工作组对这一组进行核查整改，而李祥则负责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李祥是一个正值壮年、性格直爽、既受村民欢迎又与乡干部工作配合良好的村民小组长。据李祥的妻子讲，李

祥服毒自杀的前一天，曾带领工作组在向退耕还林不到位的村民收回国家发给的补贴，并“替村民讲了几句话”。李祥替村民“讲话”，是因为年初乡里驻村干部曾号召村民大力发展烤烟种植，并提出可以在退耕还林的地块进行。但正当烤烟即将成熟、农民马上要见到效益时，桐木乡却开始了退耕还林的核查整改工作，李祥觉得无法跟农民交代，于是选择了一条一了百了的道路。

就在派出所民警介入李祥死因调查之后的第二天，涌泉村的自杀事件再次发生。在李祥的葬礼上，村民陈音富被民警叫走。在被连续审讯七个多小时以后，陈音富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家中。几个小时之后，陈音富的尸体被村民们发现。

七月二十一日，旬阳县公安局对李祥和陈音富的死亡事件出具了一个完全对工作组有利的调查报告。对于李祥和陈音富的死因，报告引用了一些村民的话作为结论：“李祥平常胆子小、心眼儿小，受不了气，遇事想不开，就服毒死了，不怪政府工作人员。”而陈音富个人素质差，未见过大世面，心理脆弱，认为派出所找他就是追究他的责任。派出所民警在询问过程中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地讲政策、讲道理，无体罚、打骂等刑讯逼供现象。

这则新闻引发了我多方面的思考。这三个农民的自杀，已然凸现出当代中国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即：当权者的基本国策，已经从古代中国的“官逼民反”进化到了当代中国的“官逼民死”。在冷兵器时代，农民在面临被饿死的命运时，常常会孤注一掷、揭竿而起，说不定能够绝处逢生；而在热兵器时代，在中共军警宪特力量已经“武装到了牙齿”的今天，农民造反无异于以卵击石，即便是苛政猛于虎狼，他们也只好默默地等死或者自杀。

我与许多海外的朋友讨论中国的现状时，听到了诸多正面的评价。一些朋友到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觉得这些城市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豪华的酒店和奢侈的商场，“现代化”的程度已然超过了纽约、伦敦和巴黎。他们进而以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全部的中国。我则告诉这些朋友说，他们所观察到的，只是中国的“特例”。用经济学家何清涟的话来说，这四个提前进入“现代化”的城市只是“现代化的橱窗”而已。要了解真实的中国，必须深入到占中国人口和地理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去。如果说农村是海洋，那么这几个“红得发紫”的城市仅仅是海洋中的几个孤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个城市的繁荣就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村的掠夺和压榨的基础上。依靠农民运动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大陆的中共政权，一九四九年之后数十年间却对农村采取了凉薄的态度和残酷的剥削政策。在中共治下，中国农民的苦难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王朝。在毛泽东时代，大饥荒中的农民甚至被禁止外出乞讨，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只能在家中活活饿死。仅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有上百万农民饿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也赶不上这位“大救星”的凶残和暴虐。在邓小平及其之后的时代，农民重新获得了理所当然的外出打工的权利，这一丁点“德政”居然被吹捧为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即便如此，农民依然没有起码的公民待遇，他们在城市被视作“贱民”和“盲流”，随时可能遭到警察的抓捕、凌辱和殴打。

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大陆，一方面少数都市已经实现了“超英赶美”的梦想，一方面广袤的农村则呈现凋敝和困顿的状态。湖北监利县棋盘乡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朱镕基的上书中，沉痛地描述了农民因为种田亏本、不得不让土地荒弃的现实。然而，尽管有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多人的批示，当地的农民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依靠朱镕基和温家宝的几句批示、几滴眼泪不可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

中国农民被强迫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却无法拥有纳税人的任何权利。他们被屏弃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一旦患病，无法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只好在家中等死。另一方面，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农民无所适从，成为任由官员宰割的鱼肉。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的涌泉村村民的遭遇就是如此，政府一会儿告诉你可以套种烟草，一会儿又强迫你将即将收成的烟草拔掉。在某些地方，基层官员为了显示其政绩，一声令下便强迫治

下所有的农民都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结果，或者是种植失败，或者是收获物卖不出去。这时，农民连赖以维持生存的基本食物都没有，却还得承担政府的各种税收。农民独自负担这种可怕的后果，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官员们却权当是一次试验的失败，或者来年继续作新一轮的试验，或者调到其他地区安稳当官。

涌泉村村民的遭遇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某些农村，所谓的“环保”已经成为杀人的旗号和工具。环保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提升人类的生命质量，但是当某些环保政策占据了农民基本的生存资源的时候，我们是否继续坚持“环保至上”的原则呢？在涌泉村事件中，“退耕还林”政策成了官方的“面子”、成了地方官僚的“政绩”，于是也就成了农民的“追魂令牌”。在今天的中国，环保是都市“小资”们体现“社会关怀”的一个安全的话题，他们常常高高在上地指责农民们“不环保”、不以“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未来”为重。我对于这些“环保秀”一直非常反感，不知道这次“小资”们会对两位死去的农民说些什么呢？

让我最愤怒的还是报道最后提及的那份调查报告。报告中涉及到了农民的“心理素质”问题，报告认为两名死亡的农民是因为“心理素质差、心眼小、没有见过世面”等原因。也许这些都是事实，比起见过大世面的中共各级官员们来，中国的农民确实怯懦、脆弱而淳朴。在今天的中国，“心理素质”最高的是中共官员们，他们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指鹿为马、逼良为娼，干尽坏事而不会有任何的心理压力。比如，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世界各国记者信口雌黄，睁着眼睛说瞎话，宣称萨斯已经得到控制，北京和中国非常安全。张文康早就没有了作为正常的人的良心，他自然也不会夜里睡不着觉，内心感到愧疚和痛苦。比如，前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对西点军校的学生斩钉截铁地宣布，在“六·四”事件中，共军没有对人民开枪，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迟浩田同样也丧失了人最基本的品质——诚实，他的生命早就与谎言融为一体。张文康和迟浩田乃是中共专制体制塑造的官僚的样板，比起那些年年轻轻就走上绝路的农民来，他们健康且长寿。

那么，为什么农民的“心理素质”会如此之“差”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在他们眼里，官僚和警察不是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而是凶恶的阎罗和催命的死神。农民依然挣扎在贫困的边缘，温饱对于许多人而言依然是遥远的梦想。而贫困的源头，许多时候并非自然条件的恶劣、或者农民文化知识的匮乏，而是官员们的为所欲为和横征暴敛。假如你随时可能被警察带走审讯七个小时，假如你的庄稼和房屋随时可能被基层干部破坏，你的“心理素质”能够“好”起来吗？

两个农民兄弟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们，还有一个农民兄弟活了下来，还得面对无边的苦难。这就是“三个代表”的中国。就在报道这个新闻前一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消息。据说，此次全会将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项修改就是将“三个代表”写入宪法。既“三个代表”写入中共党章之后，它又将昂首进入宪法。

在胡锦涛曾经令许多人充满憧憬的“七一讲话”中，“三个代表”出现了数十次之多。“三个代表”似乎成了今天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源泉。然而，在我看来，今日中国最不幸的一个事实就是：没有经过农民和其他黎民百姓的同意和选举，一个腐败透顶的官僚群体和一个穷凶极恶的党，就“自告奋勇”地成为了“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正是因为他们“当仁不让”地“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涌泉村的村民们才不得不走上死亡的道路；正是因为他们“堂而皇之”地“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十亿农民直到今天都无法过上温饱、幸福、自由以及有尊严的生活。如果继续让他们“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李立文、李祥和陈音富们不得不悲惨地死去。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六日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一直到晚年都在思考东西方对个体生命的不同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论‘文明’的那篇文章里，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特点，也就是人对生命的日趋尊重。东方国家和欧美国家的区别主要也在于此。据说在法国的日本人对执行一次死刑所需要的巨大准备和耗费感到惊奇……”与日本相似，中国也是最不尊重人的生命的东方国家之一。其中，农民的生命受到了最为极端的蔑视，“草民”、“草民”，也就是说人民的生命像小草一样卑贱。直到今天，数量超过十亿的中国农民，依旧终日生活在恐惧和匮乏之中，大人物的一举手一投足就能让他们家破人亡。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都在不断地演绎着“苛政猛于虎”的悲剧。在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的惨剧，而且农民连出门逃荒的最后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农村改革严重滞后，激发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农民收入越来越少、负担却越来越重。中国的乡级财政普遍都已破产，有的一个乡就有上亿元的财务黑洞。在此背景下，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无情盘剥和粗暴干预便越来越厉害，“官逼民死”的现象怵目惊心。那么，逃到城市讨生活的农民情况如何呢？城市不是农民的家。领袖喜欢在“国庆”的庆典上挥手，然而就因为领袖要挥手，数十万计的民工便被警察驱逐出北京城。“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耳熟能详的儿歌，但一个残酷的现实却是：天安门从来都是帝王们的天安门，天安门从来不会“爱”一个农民的孩子。农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而那些自愿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务的好心人，却被政府看作捣乱分子和坏人。在北师大组织“农民之子”社团的大学生徐伟，因为挚爱农民兄弟并质疑官方的农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门秘密逮捕并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这样，谁还敢为农民说一句公道话呢？

在中国，“农民”不是“公民”，“农民”是可以被政府和高级华人们任意掠夺、欺凌和侮辱的对象。农民没有未来，他们只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无主名”的生命：他们被当作“盲流”关押在收容站以及遣送回乡的闷罐车中，他们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拆毁了房屋而成为流浪在他乡的“超生游击队”，他们因为没有钱去医院看病而只好在家中等待死亡，他们因为缴不起苛捐杂税而只好喝农药自杀，他们因为拿不到建筑公司的工钱而被迫跳楼……他们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是对于他们来说，此生的痛苦并不亚于死亡的恐怖。

偶尔，农民也会揭竿而起，以暴易暴。不抗争是死，抗争也是死，他们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只好仿效两千多年以前的陈胜和吴广。据说，某党国要人到农村视察，到一农户家中，见其家徒四壁，乃故作关心状，问道：“大爷缺点什么？党和政府会很快就给你送来。”老农答曰：“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就缺陈胜和吴广。”老农说的是一句大实话：从被动的“民不聊生”到主动的“民不畏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据陕西《华商报》报道，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日晚上，因为西安市北郊徐家堡一钢厂拖欠工人工资及一名工友被打，数百名四川籍民工群起抗争。有的手拿钢筋、有的手执木棒，聚集到工厂里，砸毁了四五间办公室，还砸坏两台电机。闻讯，西安市公安局巡特警队、西安公安局未央分局以及谭家派出所、徐家湾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力赴现场制止。

劳工与资方的对峙，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通宵。到了二十一日上午，双方协商无果，矛盾再度激化。当四川籍民工得知他们当中有四人被工厂的值班人员用铁丝捆绑殴打、老板也没有答应给他们回家的路费之后，群情激愤。民工们持械将厂里的围墙砸开个大洞，冲出厂外继续闹事，场面一度失控。在有民警被打伤之后，警方鸣枪警示。当时真可谓千钧一发。

十一时许，未央分局所有派出所包括特巡队前往钢厂支援，这才勉强控制了局面。下午一时许，老板和十多名带头闹事的民工被警方带回讯问。

关于冲突的起因，十余名四川民工告诉《华商报》记者：八月二十日下午五时许，一名四川籍民工唐某想不做了，要求发放七月份的工资，在与老板理论时遭到厂里的值班人员（民工称是老板雇的打手）用砖头和铁棍殴打。唐某被打得跑向车间，随后又向东翻过围墙跑，随即失去踪迹（民工们猜测是被打手们抓住关了起来）。晚上八时许，数百位民工再次来到厂里，一方面继续讨要工资，一方面寻找那名被打民工下落，但是工厂老板一直躲着不出来。随后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以至于警方介入。

此次西安警方出动的警力，分别隶属不同的部门，拼凑起来简直就是一支小型的军队。为什么政府要出动如此庞大的警力才能控制局势呢？为什么警察要把枪口对准手中只有“冷兵器”的农民呢？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加深层次的疑问：一向纯朴老实的民工，为何要拿起武器来抗争？一向胆小怯懦的民工，为何突然间变得毫不畏惧死亡？

由此事件可以看出，首先是“民不聊生”，接着才是“民不惧死”。这个制度已经蜕化成一种不让人好好活着的制度了。农民们失去了“活着”的希望，便不得不挑战这种邪恶的制度，尽管农民的挑战通常不会有好的结果，反倒会导致更加悲惨的命运。但是，他们还是孤注一掷，我能想象他们蜷缩在工棚之中时的绝望、无奈和痛苦。他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民间机构能给他们“主持公道”，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僚中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包青天”式的人物。哀莫大于心死。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惧死”，中国的“三农”问题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那么，还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南方窗》杂志在一篇题为《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社论中提出：“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只要给农民自由，农民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历史奇迹。现在是进一步解放农民的时候了。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虔诚地恭请神圣的宪法之母从幕后走向台前。理性在召唤我们，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宪法关怀，是解放农民的终极选择。”让宪法真正成为农民的“保护伞”，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好的解决之路。只是，我认为文章的作者未免过于天真了：那些长期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权柄而给予农民充分的自由吗？而早被独裁者们玩弄得遍体鳞伤的中国的宪法，还能够发出“宪法之母”的光芒来吗？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由中共一手操办的“修宪”终于在三月初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浮出水面。在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宪法及相关法类共有十件。其中《宪法修正案》位列宪法类立法规划的首位。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将对宪法进行十四个方面的修改。此次大张旗鼓的“修宪”，让国内某些持乐观看法的人士大喜过望，因为“政治文明”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可能在大会上通过，从而得以正式写进宪法。此时此刻，香港凤凰台的政治评论员们情不自禁地对“新政”高唱凯歌，即便是一些西方媒体也对此表示了些许的谨慎乐观。

但在我看来，把“政治文明”写进宪法，丝毫不意味着中共对自己的“政治不文明”有了起码的自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意识到了自己每时每刻都在侵犯人权。这两条冠冕堂皇的说法，并没有改变目前中国“以党治国”、“党权”远远高于“法权”的状况。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情况，还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就在“两会”轰轰烈烈地召开的时候，北京大批的农民工被野蛮遣送回乡，北京回龙观小区的维权代表被非法拘捕，“持自己政见”的知识分子如刘晓波出门时背后总是跟着神秘轿车，郑恩宠律师的妻子蒋美丽到北京上访时被秘密绑架至今下落不明……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是“代表人民”的大会，为什么如此惧怕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的声音呢？众所周知，每年北京及各地的“两会”宣布“胜利召开”的时候，也就是特务活动最为猖獗、人民受到最多骚扰的时期。

虚无缥缈的“政治文明”不可能改变中共官僚们所信奉的一党独裁的“党国逻辑”。在几个月前，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高调宣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幽灵依然游荡在中国的土地上。胡锦涛的这一讲话显然不是简单的敷衍塞责，而是对中共“道统”的坚持，学者余英时评论说：“要是用一个王朝的说法，就是共产党这个红色的王朝是毛泽东创建的，毛泽东等于是太祖高皇帝，如果你背弃了高皇帝的话，你下边合法性全部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想在共产党执政不捧毛泽东出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如苏联如果把列宁抛弃了，那整个共产主义就崩溃了一样。”所以，今天中共虽然自称“三个代表”，企图蜕变成“全民党”（其实是“资本党”），但依然要装模作样地敬拜毛泽东的僵尸，这一仪式比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更加重要。我一直不认为一年多来中国出现了所谓“新政”的气象，因为今天的当政诸公处理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坚持和巩固中共的绝对统治。在萨斯肆虐的时候撤换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网络作家杜导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出台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所谓《二零零三年度美国人权报告》，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胡锦涛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其实是在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共产党的利益”，正如余英时所论：“今天共产党所走的路线是百分之百的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但是胡锦涛今天说话的时候还要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是很荒谬的一句、不真实的假话、敷衍话，这种话说出来，对他个人是有很伤害的，表示说他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两个任何’，就跟当初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后华国锋当时搞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差不多的一种口调。‘两个凡是’与‘两个任何’——现在许多人已经把它们等同起来了。”

在某些中共高级官员看来，这个“党国逻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方面，爱国必须爱党，进而爱党的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另一方面，这套逻辑不仅在大陆适用，也应当实施于已经回归七年之久的香港和将来“必将统一”的台湾。在这些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

中共官僚的心目中，“东方之珠”的香港不过是一条换了主人的狗而已，新主人已经养了你七年了，你还不俯首帖耳、肝脑涂地？倘若你还想有二心，那简直就是犯下了天打雷劈的叛逆之罪。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七日，香港建筑、结构工程及保险业界与中国国家建设部及保监会，在北京签署专业资格互认协议仪式。这是中央政府进一步安抚香港民心的招安之策，他们以为在经济上给了香港一些好处，香港人便怪怪地“忠党爱国”了。他们用主人对待宠物狗的方式来对待香港——不就是多给你几块骨头吃吗？从“自由行”到“CEPA”，根根都是油水丰富的骨头。但是，要骨头吃可以，要民主自由则绝对不行。

与会的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与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随后召开记者会，安民被问到港人是否“爱国爱港”、值不值得中央给予更紧密经贸合作（CEPA）优惠时，他笑称相信绝大部分港人都是爱国的，以去年内地和香港的贸易额达到八百多亿美元，增幅逾百分之二十，正是港人爱国的表现。稍后有媒体提到立法会议员吴靄仪大律师因当局拒发回乡证而未能参加会议，是否反映只有爱国的人才可以出席会议时，安民立即脸色一沉，不悦地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再也不是大不列颠（英国）的治下；爱国也不是抽象的，任何（人）对香港发展不是进善言、做善事的，我肯定不能认定他是爱国的。”戴墨镜的安民越说越气，他说有些人就爱国发表“谬论”，他不屑去跟这些人争论，又指“爱国不等于爱党”，他突然动气提高声量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也是香港同胞的代表。”虽然并非一定要爱党，但想破坏香港和中国的稳定，“那就是休想！”安民接着叫坐在旁边的唐英年补充，唐尴尬地苦笑，赶紧回答说：“没有要补充的。”

我不知道中共何以能“代表”我，我根本就没有投票选举过它；我也不知道中共何以能代表香港同胞，中共从来就没有参加过香港的各级选举。天下还有比强迫“代表”别人更加可耻的行为吗？然而，中共官僚向来都听不得不同声音。从当年江泽民怒斥“不知轻重”的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到今日安民以“爱国爱党论”应对香港记者的问题，完全如出一辙。我在电视上看见安民那黝黑的墨镜和扭曲的脸庞，不禁联想到：安民副部长的这副尊容，可以同“六·四”屠杀之后举世闻名的“袁木的脸”相媲美。与其说此人是现代政府机构中的一名副部长，不如说他是一个庞大的黑社会中某堂口的“堂主”。近年来，中共高级官员以戴墨镜为时尚，简直比香港的演艺明星还要时髦。他们个个皆做出黑社会老大的派头，他们的这副打扮确实也同中共的本质“名副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超级黑社会。他们将黑社会崇尚暴力的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同时还添加了一层虚伪的面纱。“暴力”加“虚伪”成就了中共的霸业，使其他所有的黑社会都对中共俯首称臣。作为这个黑社会的“龙头老大”的毛泽东，也以无法无天的猴王之居，荼毒神州大地三十余年。如今，这个黑社会又君临香港，开始指手画脚地让港人“爱国爱党”了——有意思的是，中共在香港的活动如今仍然是“地下党”的性质，诸多香港高官和富豪均是“秘密党员”，港人如何爱这个“地下党”呢？

“爱”应当是一种自发的感情，爱“人”是如此，爱“国”更是如此。那些强迫公民去热爱的国家，往往都是不值得热爱的国家；而真正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增进公民的福祉和安全的国家，根本不必“动员”公民去热爱，而公民自愿会热爱之。从孙中山批评国人“一盘散沙”开始，近代以来若干政治家都批评国人没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民族凝聚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中，许多人也震惊于中国军队和民众崩溃之迅速。其实，老百姓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在数千年“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老百姓从来就不是“公民”，也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天下从来都是“皇帝”独享的，不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概念发生了小小的转变——“皇帝”变成了某个“独裁党”。历史已经说明：老百姓不会死心塌地爱“皇帝”，也不会死心塌地地爱“独裁党”——他们仅仅是“逆来顺受”罢了。进一步来说，既然“爱国”是自愿的，那么“爱党”更应当是自愿的——“爱党”可以是政党对党员的要求与约束，但不能成为非党员乃至特区人民头顶上的“紧箍咒”。在美国，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说“我爱民主党”、“我爱共和党”，美国的政党仅仅是松散的竞选组织；更没有一个美国人

会说，如果你不爱民主党或共和党，你就不爱美国乃至不配做美国人。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说过一句名言：“假如必须加入一个政党才能进天堂，那我宁肯不去天堂。”按照中共官僚们的“党国逻辑”，杰斐逊一定应当被作为“卖国贼”而送上绞刑架。

我决不接受荒谬绝伦的“党国逻辑”，也不接受这种“党国逻辑”背后虚伪的“政治文明”，还是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先生说得好：“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日

UnRegistered

捍卫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

——兼论我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一位朋友捎来一封一名普通大学生毕业生写给我的短信。面对这封信件，我无法保持沉默。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余杰先生：

您好。作为您的一名读友，老早就想和您展开交流，一直未能如愿。我是一名刚刚毕业于湖南株洲工学院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家境，没能缴纳完四年的学费，所以至今未能领到学位证和毕业证。

从大一开始接触到您的作品之后，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每次到书店里首要便是看有没有您的新作问世。到目前为止，已积攒了您十一本作品了。很有一种成就感。

我这次写信给您的目的主要是向您求助，实在是万不得已。我想请您帮我想想办法，救助我在狱中的父母。

事情是这样的，我父母由于修炼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散发传单向民众讲明真相，在被秘密关押了将近一年之后，分别被判处重刑。我母亲刘秀春，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第一中学退休教师，被判处五年徒刑，被关押于天津市女子监狱；我父亲陈同庆，一名老知识分子，被判处八年徒刑，关押于天津市大港区港北监狱。以上判决都是秘密审判，没有任何家属在场，不能上诉。

我本人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我尊重每个人的信仰自由，深知每一位公民都有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都是堂而皇之写入我国的宪法的，应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可被任意践踏。我对当局如此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费解和愤慨。但我的愤慨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表达的愤慨及强烈谴责一样，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父母深陷囹圄而我却无能为力，这让我无地自容和羞愧。

父母双双入狱，对我精神上和经济上来说是双重打击，到现在也没能交完学费，而且每天靠打工、干体力活维持生存。对于本科毕业的我来说更是一种羞辱。

希望您能帮助我向世界上的人权组织反映我父母的遭遇，因为真担心已年过六旬的他们熬不到出狱的那一刻。如果您肯帮忙，我将不胜感激。另外，还应感谢您的作品给我带来了精神粮食。

读友：陈怡茗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读完这封信，我的心境久久不能平息。我珍视这名陷入人生绝境的青年给予我的信任。这封信将被我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保存下来。今人与后人应当读到它，它与宋祖英的颂歌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真”与“伪”的两极。

就我个人的信仰取向而言，我是被上帝拣选的基督徒，而绝对不会成为法轮功修炼者。早在九十年代中期，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曾读到过李洪志先生所著的论述法轮功的系列书籍，发现其观点与我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相去甚远。有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我皆一笑置之。但是，我尊重那些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并认为他们所坚守的“真、善、忍”的信条，在今日盛行谎言、欺诈、暴力和仇恨的中国具有相当正面的意义。“政教分离”是近代以来

国家政权与宗教信仰之间所达成的一种最佳关系，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都不会轻易逾越这一界线，去粗暴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然而，在“六·四”屠杀之后的九十年代末期，已然失去“法统”的中共政权，悍然对法轮功信徒发起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此行动持续至今，堪称是针对某一特定宗教群体的“文革”。近年来对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波及数以百万计的公民，无辜而被刑讯、逮捕、劳教甚至杀害的信徒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八九民运，可以说是当代世界罕有的由国家政权实施的宗教迫害。在我受到警察骚扰的时候，他们亦问及我对此事件的看法，我坦然回答之：我绝对不同意中共政权的做法。如果少数法轮功信徒有违法犯罪行为，就当以法律手段公正处理，而不应以政治方式禁止某一宗教团体。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仍有责任为法轮功信徒争取信仰的自由。因为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都息息相关，不存在着一种只属于某一宗教或教派的信仰自由。警察对我的这些言论作了笔录，并要求我签字和按手印。这是我一贯公开表达的观点，我又怎么会害怕签字和按手印呢？

我理解陈怡茗朋友的痛苦与绝望，以及他的彻底的无能为力感，因为在这一系列的谎言和暴行面前，作为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我也感受到了彻骨的羞愧和耻辱、无能与卑微。中国知识界在此事件中整体性的失语，成为其全面堕落的又一标志。

我不能给予陈怡茗朋友更多的帮助，以我的能力无法营救他的父母，我所能做便是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我不能保持沉默，因为沉默将直接危及我的生存质量，良心将时时发出揪心的疼痛。我必须替那些为了信仰自由以及其他一切的自由而受难的人们呼吁——他们是无罪的！

因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因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第十八条也明确规定：

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强迫。

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到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四、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作为以上两个重要的国际文件的签署国，中共政权却在大肆地从事着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恶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必须站起来揭露这些事实——为了在工地上负轭的陈怡茗，为了陈怡茗在狱中的父母，为了更多更多陌生而亲密的同胞。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十时左右，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的川东北气矿天然气矿井发生“井喷”。富含硫化氢和二氧化碳的天然气喷出高达三十米，毒气在附近几公里的山谷中飘动。一批作业人员吸入硫化氢当场死亡，大批民众在睡梦中吸入毒气，也有人伏尸菜田、街头，尸横遍野。毒气迅速弥漫，使方圆五平方公里成为死亡区。最接近矿区的晓阳村灾情最严重，据悉有百分之九十的村民罹难，许多家庭全家共赴黄泉。许多死难者都是体弱的儿童。

直到二十四日，重庆市地方政府还在刻意隐瞒消息，宣称只有八人死亡，而且情势已迅速受到了控制。然而，随着国务院官员和国际媒体的介入，才使得这个“罗生门”式的说法破产：二十五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一再急遽提高。晚间七时，一百九十一人死亡的事实突然公诸于世。而当地人透露说，死亡人数还会持续上升。但是，官方的“新华社”对一夜之间死亡人数暴增的奇怪现象只字未提，却用凯歌高奏般的声音指称，国家安全监督局调查人员在统一领导指挥下，救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这是典型的“中国新闻”的口吻，冷漠且冷血。当地大约有二百九十人入院治疗，还有三千人出现结膜炎和发冷等症状。邻近村镇居民纷纷涌进医院求治，使医院应接不暇。医生表示伤者大多双眼红肿、疼痛，严重呕吐、晕眩、站立不稳，感到窒息，情况相当恐怖。事故发生之后，已经有四万一千人紧急疏散。海外媒体声称，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起矿灾事故。法新社引述中国政府今年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今年年一到十月，中国已经有一万三千两百八十三人死于各种工厂或矿井事故，比去年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九点六。

我看到电视上那些眼睛受伤、衣衫褴褛的孩子的时候，心中像刀割一般疼痛。事故发生的区域是重庆比较困苦的地区，就在官方洋洋得意地号称中国人均收入突破一千美元大关，已经趋近于“小康社会”的时候，这些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老百姓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极端贫困状态。我有好多朋友的家乡就在这片地区，我曾多次听他们讲述童年悲苦的生活。“小康社会”与他们毫无关系，“三个代表”更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复杂名词。从古代到现在，这些生活在长江边上的老百姓，一直都是金字塔最底部的奴隶。这场事故让他们雪上加霜。这次事故也印证了今天中国的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越是贫困，你就越是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主席和总理们又在作出铿锵有力的批示了。然而，也仅仅是批示而已。我猜测，没有一个高级官员会“引咎辞职”的，这是一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时代。中共当局至多会像在萨斯事件中免去张文康的职务一样处理一两负责官员，等几个月后风声平静之后，又会给他安排一个同级别的职位。三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号称最关心底层人民命运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发言，没有一个人对死难同胞表示同情、对无能的“党国”表示谴责。我想起几个月前“新左派”们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那份签名声明，那是当代中国最可笑、也最虚伪的一份文字。我想，若干年之后，后人在研究这个时代思想和文化资料的时候，这份文字会被当作衡量这个时代汉语堕落程度的一个重要标本。这些看似无比正义、无比高尚的知识分子们，口口声声说他们如何关心伊拉克人民的悲惨遭遇，如何与伊拉克人民站在一起，分享他们的苦难，却偏偏对自己同胞的苦难熟视无睹。这是怎样的厚颜无耻啊。

当时，我还曾经与韩德强、童小溪等“反美先锋”在 BBC 和美国之音中有过两次直接的交锋。我追问道：你们声称关心中国的底层民众，那么你们为他们做过些什么呢？你们关心过“哪一个”具体的农民和工人、囚犯和乞丐呢？你们能够说出一个事件和一个名字吗？

他们两人都是支支吾吾了半天，还是一个事件、一个名字也说不出。显然，他们所谓的关心底层民众，关心的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遥远的名词，而不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他们对无数的矿难和拆迁户的自焚保持着矜持的沉默，他们对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保持着矜持的沉默，他们也对“天安门母亲”和法轮功修炼者们所遭受的迫害保持着矜持的沉默。今天，他们继续对重庆数百名死难百姓保持着矜持的沉默。因为他们深知，只有这种沉默才能够确保他们继续心安理得地享有“国际级知名学者”的身份。他们趾高气扬地宣称，他们不屑于批评国内的事务，他们还有更加高远的目标，那就是批判国际资本主义，那才是一个无比宏伟的事业呢。

其实，与这些懦夫和孱头般的“新左派”辩论，无须在所谓的“理论”的层面上纠缠，只要看看他们对中国今天的现实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就一清二楚了。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据新华社报道，陕西渭南市抗洪一线发生了一桩怪事：已于九月十日晚成功封堵合龙的罗纹河入渭河口，第二天日上午又进行了一场封堵成功的“表演”仪式，目的仅是配合专程赶来的当地有关领导参加的合龙仪式。

经过十多个昼夜的奋战，九月十日晚十时，一千多名驻守在渭河大堤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终于将罗纹河入渭河口封堵合龙。本来，官兵们应当休息了，但是十一日上午大批官兵又在原地集结。原来当地有关领导要来搞一个盛大的“合龙仪式”。上午九时许，记者发现，这里正在为举行仪式做准备。渭南市林业局领导正在现场紧张地布置“场面”，要求战士们把一部分沙袋放在指定位置，以备有关领导投放。九时三十分，上千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烈日下排队站在大堤上等候。九时三十五分，十多辆小汽车浩浩荡荡地来到渭河大堤。

由于“仪式”地准备工作相当复杂，原定于十时举行的仪式直到十一时二十一分才开始进行。战士们在烈日下站立了两个多小时，等领导一一到位之后，突击队战士在猎猎红旗下象征性地将沙袋投放到已经合龙的河口上。事前，负责现场布置的官员就明确指示说：“你们只要应付应付场面就可以了。”果然，只是过了短短的三分钟，渭南市有关领导即宣布：“罗纹河倒灌入水口封堵成功！”随后，仪式转移至渭河大堤继续进行，先是介绍领导，接着是领导宣读嘉奖令、念贺电，最后是领导讲话。

仪式举行期间，连日奋战在大堤上的部分战士有些支持不住。记者看到，后排的一些战士已悄悄坐在地上，有的已经睡着了。

央视新闻频道“论坛”栏目专门请来两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个新闻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央视屏幕上很难说出真话来。这两位学者也就是泛泛而论“官员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官员不应该如此树立形象”等等。我却注意到了演播室挂出的一张背景照片：就在领导们天女散花般地夸夸其谈的时候，一些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们都在大堤上就地睡着了。由此，我发现了中共专制制度的一个核心秘密：军队乃是权力者的家奴。

官僚们不会尊重军人们，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形象工程”，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在抗洪第一线战斗了十多个昼夜的战士们继续充当他们的“道具”。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军队就是工具，就是家奴，所谓“党指挥枪”也。这种思路与帝国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念殊途同归。当然，“党指挥枪”这个原则也是虚化的——归根结底，掌握最高权力的不一定是党魁，而是那个“卡里斯玛”领袖。这个领袖可能不是法理意义上的“国家主席”以及党内部章程中的“总书记”，而可能是一介布衣，比如当年决定在天安门开枪的邓小平。这就是当年胡耀邦和赵紫阳被罢黜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们都曾担任过所谓的“党魁”，但他们却没有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因此邓轻易就可以将他们逼下台，甚至给赵这位党的“总书记”冠以“分裂党”的罪名。这也是今日胡锦涛和江泽民之间斗法的根本原因——虽然胡已然具有党魁的身份，但江依旧挟军权而令诸侯。“胡总书记”和“江核心”并存，让下属不知该向谁效忠。在中国这个非民主的国家，“枪”与“党”之间的关系，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方面，谁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谁就掌握了最高权力。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在官方的宣传中，“人民子弟兵”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文化思想以及中共森严的权力体系，“解放军”的普通士兵却备受歧视与凌辱。此次渭南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天安门惨案之后，刽子手李鹏等人企图将北大新生“洗脑”，命令新生到军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我

不幸赶上了最后一届“军政训练”。幸运的是，我不仅没有被“洗脑”，反倒有机会观察到军队内部的黑暗和腐败。在石家庄陆军学院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校中，我看到了军官对士兵的虐待和羞辱，看到了僵化的军队制度如何将纯朴的农村子弟变成冷血的杀人机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六·四”大屠杀。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苏联的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最后庞大的苏联帝国才轰然倒塌。

在中国，军队不是职业化的国防军，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党军”和“党卫队”。所以，“党”可以理所当然地命令这支“人民军队”对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党”也可以命令这支军队去抗洪抢险并配合领导们制造一个指挥若定的“历史画面”。除了“服从”，军队不能有别的反应——如果说中共官员们就是贾府的主人的话，那么“人民子弟兵”们就是贾府中的家奴。这些家奴必须全心全意为主人服务，不能独立思考，不能有自由意志，即便像焦大那样想提点意见也不允许。这支军队可能拥有现代化的武器和准备，但是其家奴的身份一天不改变，中国的民主就一天不能实现。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重庆考察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路过农妇熊德明的家门口，一时兴起停下来与之聊天。这一举动让地方干部猝不及防。熊德明鼓起勇气告诉温家宝说，自己的丈夫在外打工的两千多元工资被长期拖欠。温家宝立即指示地方政府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后，熊德明拿到了被欠的工资，这一速度可谓神速。

在官方媒体伤大肆渲染这张照片：总理伸手握住了农妇带着泥土的手。对于熊德明而言，几乎是“一句实话、一夜成名”；对于温家宝政府而言，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清理民工被拖欠工资的老大难问题。熊德明的丈夫被拖欠工资仅仅是冰山一角，多年来数以千万的农民工被拖欠了数百亿工资，而拖欠环节的源头往往是那些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的各级政府机关。因此，温家宝的做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机构，党政领导依然为所欲为，解决了一笔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新的被拖欠的工资又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我认为，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内要想完全解决此问题根本是不现实的。而堂堂一位政府总理，居然亲自出面为民工讨要工资，足见这套制度的运作已经是如何的无效了。

与温家宝总理的几句对话，让熊德明成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评出的“二零零三年年度经济风云人物”之一，与那些腰缠万贯的总裁和口吐莲花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登上了领奖台。然而，熊德明所获得的，除了荣誉之外，更多的却是困惑：每天都有大批访客来到她的家中——有七十余家媒体记者的采访，有络绎不绝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慰问，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请求她帮助解决问题、帮助伸冤的农民兄弟。

三月九日，熊德明对《重庆商报》的记者说：“从去年十月电视播我之后到前天为止，我至少接待了六百多个民工，就在前天，我还接待了十二个。”她说，那些民工一看见她，便如同看见包青天一样大声喊了起来：“我们等你一天了，你终于回来了。”熊德明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听完他们的陈述。然后告诉他们说，自己并没有为他们解决难题的能力，正如她在央视“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社会公益”的颁奖现场所说：“大家都知道我了，说：你能不能帮我追工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钱还是总理帮我追的。”

谈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了。来访的农民兄弟们有的来自遥远的陕西汉中，最近的也是来自巫山，熊德明还得安排他们的食宿。她用完了家中的两斤面条，还从邻居家借了五斤。然后，她跑了一里多路，在八个乡亲家借来十床棉被，为客人们安排好地铺。最近几个月来，丈夫每月寄回的七百元人民币几乎全部用在了接待来访的农民身上，由于不堪重负，熊德明不得不像丈夫一样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对于熊德明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自己消耗的时间、精力和钱财，而是无法为那些比自己更加困窘的农民兄弟帮上忙，她对记者说：“那些没有拿到工钱的人，本来就没有钱，花路费来找我，我又的确帮不上忙，总觉得别人花了钱没办到事，心里不好过。”很多时候，“我很想哭”。

熊德明的这一困惑，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也曾经历过。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那封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后，他也是一夜成名。然而，耀眼的光环并没有让他真正为棋盘乡的百姓解决任何问题。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县的领导们糊弄过去，而李昌平却不得不辞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这一事实，既是朱镕基堂堂一国总理的耻辱，也说明中共政权内部已经难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而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背井离乡的李昌平被《南方周末》评为二零零零年年度人物。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出版之后，已经在北京《中国改革》杂志社担任编辑的李昌平每天收到三十多封信件和

五十多个电话，访客平均每天也有二十多人。幸亏《中国改革》杂志社专门请了一位律师帮助他应付这些事务，负责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都不够用。李昌平在新作《我向百姓说实话》中写道：“我仔细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委屈的身心，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我是无力给予帮助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临走时还是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唯一一位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特别无奈和难过。”

李昌平和熊德明的困惑，正彰显出了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盘根错节的复杂性。农民已经在传统的体制内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作出了种种努力，如上访、诉讼等等，但所有的这些努力最终的结果都是无效的。因此，他们已经对“正常的渠道”失望乃至绝望，他们不再对“三个代表”的政府有丝毫的信任度。而李昌平和熊德明可以说都是以某种“非常规操作”的方式直接向总理反应问题，他们的呼吁获得了总理的正面回应，并因此而拥有了巨大的知名度和道义资源。因此，广大农民兄弟便对他们产生了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在中央有关系”，一定能帮助自己解决难题。殊不知，他们本人尚且处于困境之中，哪里有能力帮助他人呢？

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在农村改革伤所能做事情的并不比李昌平和熊德明多。他们根本不敢实施实质性的改革，如改变农民作为“无权者”和“贱民”的悲惨身份、赋予农民以基本的国民待遇、撤销庞大的乡级党政机构等等。这样的改革需要与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中共不会真正启动“伤筋动骨”的政改，所以李昌平和熊德明们还得继续困惑下去。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三日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中共的宣传机构有这么一个特点：一件所谓的“丰功伟绩”，非得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非得宣传过度，让大多数公众感到像吃多了肥肉而反胃一样。中共的宣传部门对自己的愚昧毫无知觉，即使有所知觉，也由于专制制度本身没有“纠错”功能，而只能一错到底。此次关于“神州五号”上天的报道以及太空人杨利伟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活动，即是又一明证。我在电视上看到这名像木乃伊一样“航天英雄”，除了拼命向领袖效忠以外，他连一句人话也不会说了。我不会为他而感到骄傲，我只会对他充满了怜悯——他不过是又一个被工具化的“雷锋”而已。

就在“神州五号”升空前夕，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官员访问中国，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漠视。朱镕基政府曾经宣称要将教育经费提高一个百分点，但几年以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升反降，跌落到了百分之二以下，不足联合国推荐比例的三分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在世界一百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中，中国大陆名列第一百四十五位，也就是全球倒数第八位，低于非洲穷国乌干达等。据今年二月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数据显示，十五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不到八年，也就是说不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而此水平美国、日本等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达到了。

中国真的没有钱吗？非也。为了办奥运会，中国将投入三千亿人民币，而一年的教育经费仅仅是三百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办一次奥运会的花销等于中国十年教育经费的总和。同时，“神州五号”的研制计划总共耗资一百八十亿人民币，有关决策者潇洒地大笔一挥，却对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雁过拔毛”。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适龄儿童失学情况相当严重，九年义务教育形同虚设。如果按照中西部地区的孩子完成一年基础教育需要一千元人民币来计算，一个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总共需要九千元人民币；那么，“神州五号”的这笔经费，足以让两百万适龄儿童完成他们的基础教育。我想问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到底哪一项投入更加重要呢？我也是纳税人中的一员，但我却没有权利过问国家的税收如何使用。

极权主义体制由于自身缺乏足够的“法统”，就需要不断地制造“富国强兵”的假相来维系其权威和面子。办奥运会是这样，女排比赛是这样，送太空人上天也是这样，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那就是“政治”。此“政治”就是少数特权者的地位和面子。

出于同一原因，昔日的苏联政权将航天工业和军事工业放到至高无上、优先发展的位置。在冷战时代，聪明的美国总统里根洞察了苏联制度的这一致命弱点，抛出“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在天空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终于拖垮了苏联的经济。就美国而言，航空航天业与其他产业齐头并进，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而对苏联而言，其航空航天业疏离于其他工业门类，是一个封闭的、无法民用的“面子产业”，它只能不断输血而没有造血功能。所以，最后苏联的命运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学者霍布斯邦曾经分析苏联体制崩溃的原因，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在六七十年代，虽然苏联一度在天空、军工等领域方面超过了美国，但终因缺乏后劲，逐渐走向衰退。霍布斯邦的诊断书是精妙的：“其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思想导致的思想活力与质量的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

况、新问题的。”因此，纵然拥有一支基数庞大（数量超过美国）、职业素质良好的科技队伍，依然没有办法挽救苏联社会在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技术领域）的停滞状态。

昔日，中国出于更加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嘲讽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今天，中国自己却又走上了苏联的不归路。虽然没有冷战的压力，但基于某些领导人的虚荣心和愚民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国不惜劳民伤财争当“天空第三国”。这个座次来之不易，却毫无意义。它不能挽救极权主义制度的崩溃。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UnRegistered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今天（十二月十一日）早上，我家的电话终于恢复了正常；而在昨天（十二月十日）晚上，这同一部电话却被切断了几个小时。

昨晚十点五十分，BBC 的记者给我打来电话，向我询问对北京昨天正在进行的区人民代表选举的看法。国内的媒体吹嘘今年出现了若干独立候选人，海外的某些媒体也被中共的这一“选举秀”所迷惑，给予大篇幅的正面报道。于是，我谈了自己的几个看法：第一，普通民众对此次选举极其冷漠，大家对独立候选人的出现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和惊喜。无论是我身边知识界的朋友，还是我所接触到的普通工人、售货员、出租汽车司机，没有一个人参加了投票。第二，寥寥无几的独立候选人的出现，不过是中共表演给西方人看的民主把戏而已。就在几天之前，中共统战部部长刚刚宣布，中共绝对不允许成立反对党，成立反对党违反宪法。没有反对党的选举还叫选举吗？对比台湾的各种选举，大陆一党专制的实质昭然若揭。第三，此次选举中，尽管出现了少数的几位独立候选人，他们也遭遇到了各种压力和困难。这些压力和困难远远大于八十年代初期胡平等人在北大参加选举所遭遇的压力和困难。比如北京著名的维权律师秦耕，刚刚宣布参加竞选，就被自己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强迫辞职。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独立参选的学生，其助选团的二十多名成员全都被校方找去训话，威胁取消保送研究生资格、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不予留京指标等，结果最后只有五人敢于继续此项工作，候选人本来准备好的竞选演说也被故意刁难而多次推迟。比如北京大学的参选学生在目睹了选举过程中的各种违法情况之后，毅然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并退出竞选。

BBC 的记者很重视我谈话的内容和观点，于是我们约好在二十分钟以后进行正式的采访，此采访是直播的形式。然而，我一直等候到十一点三十分，家中的电话却再也没有响起来。我想，对方不会失约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疑惑地拿起电话，立即发现电话与平时大不一样：电话听筒中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轻微的电流的声音。

我分别使用我自己的手机和我妻子的手机拨打自己家的电话，手机迅速反馈出“联系失败”的声音，屏幕上显示的文字是“无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二点多。在我睡觉前，家中的电话依然没有恢复正常。到了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电话却像一个病人一样，没有经过任何的医治却自动复原了。

世界上没有这样“巧合”的事情。我恍然大悟，这不是电话的自动罢工，而是安全部门对我的“特别关照”，他们切断了我的电话，故意破坏这次采访。如此赤裸裸地被切断电话，于我而言还是第一次。他们既是要破坏这次采访，更是企图给我造成某种心理压力，让我“知难而退”。以前，刘晓波曾经告诉我，他已经多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了。近几年来，我也明显地知道我的电话被长期地窃听，别人给我打电话，经常出现的状况是：我去接第一次的时候，听筒中什么声音也没有，直到对方第二次打来，才有声音。但是，我从来就不把特务们的窃听放在心上，因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都是可以放到阳光之下的话，没有一句是见不得人的话。无论是接受 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采访，还是与刘晓波、包遵信等所谓“敏感人物”通话，我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从来不会因为“隔墙有耳”而吞吞吐吐。我已经习惯了在窃听中生活。然而，这一次被切断电话，则是特务门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公民的个人生活进行干涉和破坏。

我不得不愤怒。我不会被他们吓倒的。尽管我的采访被破坏了，但特务们的丑恶行径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在文章中、在日记中，我会把这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特务们这几年的每一桩行为：窃听、跟踪、切断电话、扣押信件、向各大学施加压力取消我的学

术演讲、向各出版社和报刊施加压力禁止我著作的出版和文章的发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黑暗中、阴影里进行的。在愤怒之余，我对他们是那样的蔑视，一个执政党沦落到搞这些地下阴谋的地步，这不是我的悲哀，而是他们的可耻。他们像是洞穴中的老鼠、垃圾中的蟑螂、粪坑中的蛆虫，尽管有“忠诚于党国”作为幌子，但不足已支撑他们内心的虚弱和卑琐。我曾经当面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像普京学习，他虽然是一个克格勃头子，却第一个拿起斧头砍断彼得堡苏共的旗杆。世界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们真的心甘情愿地做专制制度的殉葬品吗？他们不敢应和我的话，只能尴尬地笑笑而已。

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的诞生，那时我将对这个丑恶政权的所作所为提起诉讼，让每一个参与过罪恶的特务们曝光于天下。至少他们应当享有他们东德同行的待遇：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此以后不得在任何国家机关担任公务员职务。我不寻求报复，但我们必须让正义得以彰显、让邪恶成为历史。

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权日，我家的电话却打不通。中共政权所拥有的尖端的技术手段和邪恶的用心，固然可以一时掐断我的电话，却掐不断我发誓要永远说真话的喉咙；即使他们使用各种手段终于使得我的声音无法被别人听到，但他们无法消灭千千万万中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愿望，也无法割断千千万万中国人言说真相、表达真理的舌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最近，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人民解放军少将朱成虎关于先发制人发动核战争的公开言论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国外交部将其言论定义为“个人看法”，但是对中共权力运作稍稍有些了解的人士都明白：在中国，不仅普通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即便是贵为政治局常委的九大巨头，也没有多少言论自由——除了老大哥胡锦涛之外，其他人的所有言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讨论和审查。温家宝总理在其前任上司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时候，连一个花圈都不敢送去，可见他也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更何况在等级森严、以愚昧为光荣的军队内部，哪里有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的空间呢？在此背景下，近期突然出现了从刘亚洲到朱成虎的“奇谈怪论”，似乎表明刘、朱都是“不守规矩”的、有个性有见解的军人。但是，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我并不认为在军方系统内出现了刘、朱这样分别代表鸽派和鹰派立场的人物，就表明胡对军队失去了控制，或者说军队已经蠢蠢欲动试图夺取对外交内政方面的决策权。在我看来，这些言论其实都是为最高层所默许的。换言之，是最高层故意放出来探视外界反应的气球而已。

朱成虎将军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公然鼓吹对美实施核战争的观点，甚至放言中国即便牺牲西安以东的全部城市、资源和人口，也要摧毁美国的上百座城市。这些言论让西方世界大跌眼镜，焦国标将其比作中国的本·拉登，应不为过。朱成虎七月六日在国防大学的内部讲话中更是公开宣称：“核武器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人类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越来越加剧，必然就会产生这种高效率的人口调节工具，来缓减人口数量与生存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问题，使其重新回到平衡位置上去，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他还对核战争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方案：“我们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照顾到，所以应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几个威胁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我们既要针对性的也要兼顾到全盘，具体说来，我认为我们周边的邻国特别是那些人口大国如印度日本等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而美国相对来说反而要好对付一些，因为他们的人口少得多，而且主要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只要用少部分的核储备就可以解决掉他们，另外，美国距离我国遥远，在核战后将来的上百年间我们都不大可能向那里大量迁移，但是美国的国力强大，所以我们有必要用干净彻底的手段解决掉他们的国家力量，估计用十分之一的核储备就足够解决了。”这些丧心病狂的言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犯罪，朱成虎将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每一个被他在假想战争里无情地牺牲掉的中国公民，都应当站出来揭发和指证他的这一罪行——我们应当打电话报警。

从“反革命罪”到“颠覆国家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名称虽有差别，实质却无变化，长期以来中共均以之来打压和迫害异见人士。从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到在萨斯灾难中拯救千万同胞生命的蒋彦永医生，这些伟大的心灵，这些民族的脊梁，这些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者们，在中国却统统被看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在近几年间发生的“新青年读书会四君子”案件、郑恩宠律师案件、师涛案件等多起莫须有的政治案件中，“危害国家安全罪”成为检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杀手锏——谁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谁就理所当然地被判处重刑：无论是为那些被非法拆迁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郑恩宠，还是为官吏腐败、民生疾苦而大声疾呼的记者师涛，都成为这一“紧箍咒”下的牺牲品。我与刘晓波先生也曾因此而被北京警方传唤，并被通宵审问。当时，警察威胁我说，你的文章就是“火药桶”，你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但是，我无法理解的是：一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的政权，难道是我的几十篇文章就能够“危害”乃至“颠覆”的吗？那岂

不说明这个政权已经心虚到了何种的程度？

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是像我这样手无寸铁的书生，而是朱成虎这样比希特勒还要疯狂的战争贩子。当然，朱成虎不过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罢了，他自己并没有多少的“创造性”。毛泽东当年就曾经威胁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中国不惜引爆核弹，让自己的人民死亡一半。这样的赌局，世界上还真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与这个伟大领袖赌一把。今天，朱成虎将军再次重提核战争的话题，把核战争当作“调节人口”的最佳方式，在并没有得到民众授权的前提下，居然将数以亿计的民众的生命当作其战略计划上的微不足道的“数字”。朱成虎的这些言论，已经突破了现代社会言论自由的底线，正如在德国鼓吹纳粹的种族屠杀、种族清洗理论本身就构成犯罪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鼓吹核战争，都构成了对国家安全乃至全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这样的人不仅应当受到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制裁，而且还应当被送到联合国海牙战犯法庭上接受审判。如果任由朱成虎这样的“人类公敌”为所欲为下去，将来他和他的同伴们对于地球的危害不知将比米洛舍维奇、萨达姆辈严重多少倍。

朱成虎的言论的惟一意义，是让西方世界和中国国民看清了中共政权的本性并放弃对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对希拉克和施罗德等惟利是图的西方政客和思科、雅虎等助纣为虐跨国公司而言——你们所提供给中共的资金和技术，很可能会迅速地让核弹在你们的头顶爆炸；贪图眼前的小利，也许会导致你们的妻子和儿女成为核战争中的牺牲品。朱成虎的狂言，又让我想起了义和团运动中那个歇斯底里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为什么那么仇恨西方呢？因为西方诸国的公使们不同意她废黜光绪的意图，使得这位“家天下”的皇太后对西方恨得牙齿发痒。在义和团入京大肆屠杀无辜民众前夕，慈禧太后本来决定召李鸿章和袁世凯进京主持大局、并与列强修好，但在一夜之间她却改变了主意，转而重赏义和团，不顾国际公法而攻打使馆。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指出，慈禧太后之所以突然改变主意，是接到了一个所谓的洋人将强迫她归政于光绪的假情报。“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四十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后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失去权力之前，她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泼，和洋人拼命了。”于是，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于是，她老人家就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与十一国开战了——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而不绝后的最勇敢的人了——因为毛泽东、朱成虎等人似乎比她更加勇敢。

而朱成虎们对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仇恨，也与慈禧老太后惊人地相似。事实上，美国从来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仅以抗日战争为例，没有美国兄弟般的支持，中国何能从日寇的残酷杀戮中重新站起来？但是，中共政权为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将美国当作最大的敌人，以至于出现朱成虎这样的“反美狂人”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美国不反华而反共，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之间、以基督信仰为依托的政权与信奉无神论的撒旦政权之间，确实势不两立。毫无疑问，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把中共“一小撮”剥夺十几亿民众的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当权者作为敌人。美国不会忽视台湾两千多万民众的自由与幸福，美国也不会忽视中国大陆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求，因此美国自然被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妖魔化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正如朱将军自己表白的那样，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左派，而是现实主义者。他才没有意识形态的纠缠和民族情感的羁绊呢，他有的只是对权力赤裸裸的持守：谁要危及我们虐待和压榨人民的权力，我们就不惜与谁同归于尽。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三个代表”更能代表中共党内高层的利益和意志；在这一点上，中共这个流氓政权比起北韩、伊拉克、伊朗等“无赖国家”来并没有“先进”多少。以此观之，尽管朱将军有教授头衔，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在灵魂深处仍然是一个有“中共特色”的泼皮无赖，他的祖先是杨志卖刀时遇到的牛二，是屠杀数百万民众的明末流寇张献忠，而他在军内的长官则是“大刀向人民的头上砍去”的王震之流——哪能指望这样的家伙存留一丝的人性呢？

带领苏联人民走出极权主义的泥沼的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指

出，他之所以要进行“新思维”的尝试，无非就是要复活全人类的价值，承认自由与人权，让朴素的道德规范与人类社会的法则真正得以复苏。这也正是他被中共党魁胡锦涛咬牙切齿地辱骂的根本原因。而在回顾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和展望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和平共处时，戈氏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人的生命是最基本的，而理论是服从于它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此，既不存在可任意牺牲人的生命的冠冕堂皇、强词夺理的理由，也不应有认同这种说法的理论或理念。生命只有一次。去体味人生的喜悦、体会心和心的交流也只能有一次。因此，我们说生命的权利是神圣的，不管什么人也没有权利去侵犯这惟一的生。命。将‘不择手段’性的想法予以正当化的目的是没有的。这，不正是我们对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选择吗？”是的，这也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也是我指证朱成虎少将是真正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的根本理由。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前不久，北京一名出租车司机载客途中身亡，死因是疲劳驾驶，突发疾病。据统计，北京出租车司机平均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每月实际收入一千元至两千元，低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而出租车司机最大一笔支出是交给公司的车份钱，两千元至五千元不等。

吴师傅向新华社记者叙述了一天的工作经历：上午十点开始出车，至午夜十二点二十分才回家休息，拉活时间约为十三个小时，车辆行驶累计三百多公里。十三个小时总收入三百零五元；主要支出两百六十六元，其中一天的车份钱一百八十六元，行驶三百公里耗油近八十元，实际收入仅为三十九元。北京市现在营运的在册出租汽车共六万七千辆，像吴师傅一样，众多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两年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尚勤撰文揭露北京出租车市场的黑幕，新任北京市长刘淇闻讯勃然大怒，下令严惩记者。两年后，北京出租司机的境况每况愈下。新华社记者为题《车份钱逼的哥成“拼命三郎”》的文章中指出，如果一位出租车司机严格按劳动法的规定工作时间，一般每月收入约六千四百五十元。而每月固定支出合计共七千元。如此算来，出租车司机每月还要亏损五百五十元。所以，司机们几乎都处于无节假日、无上下班的超负荷工作状态，且没有任何的医疗和健康保险，堪称新时代的“包身工”。

就在我读到这则新闻的同一天，在《新京报》上我又读到了另一则关于原北京市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的腐败网络的报道。北京市纪委在披露案情时称：毕玉玺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承建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上谋取利益。据传，毕玉玺贪污受贿的钱财多达六千多万，仅在其家中便搜出一千多万现金。毕在被捕时辩称，他根本没有违法犯罪，这些钱只是朋友们送给他的“茶钱”。

近年来，中国已有超过一半省市区的交通部门的负责人落马。毕玉玺任职的“首发”集团，是一家资产上百亿的大型企业，“被认为是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而其实质乃是“政府公司化”的典型个案。有媒体计算：该公司负责修建的全长九十八公里的五环路，批复概算投资为一百三十六点四亿元。而全长六十五公里的四环路，道路工程花了只有七十多个亿。相差不足三十五公里，预算高出约六十六个亿。毕玉玺贪污受贿的六千多万，与这六十六亿的“黑洞”相比，确实是九牛一毫，只能算是“茶钱”了。但是，六千多万与“的哥的姐”们的收入相比，就堪称天文数字了——以月收入两千元左右计算，三万名的哥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才相当于毕局长的这笔小小的“茶钱”。

把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对照，充分显示出北京当局“三个代表”理论及“新三民主义”的虚伪、荒谬与可笑。中国残存着社会主义中最坏的部分，如行业垄断和“黄色工会”；同时也在大肆扩展最坏的资本主义，如“圈地运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强制拆迁）和对工人及农民工的疯狂掠夺（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中国是全球贫富悬殊超度最大的社会，宪法中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大众已经彻底沦为边缘群体。这个政权只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治理国家的“技术专家”、在权钱交易中暴富的权贵商人和为腐败辩护的知识精英。毕玉玺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动辄上百亿的国家资金，却不必受到任何人和机构的监督与约束。而北京的“的哥的姐”们却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具有垄断权力的出租汽车公司的残酷盘剥，因为能够拿到运营牌照的公司老板无不是擅长“化公为私”的高干子弟。“的哥的姐”们想建立一个行业性的自治组织，代表全体司机与相关部门交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个设想在现政权之下根本不可能实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特色

就是禁止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这恰恰也正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工厂的中国，对西方资本家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六·四”屠杀之后十五年来，中国变化之快，超乎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想像。当许多知识分子成为这一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得益者（尽管与官员和商人相比，他们所获得的利益仅仅是“小头”）之后，迅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者、抗议者和大众代言人的角色，转变为官与商的帮忙与帮闲。有的人大肆鼓吹“仁政”、“和平崛起”，有的人重新祭起“新权威主义”的大旗，有的人企图掀起新一轮的儒学热和“读经运动”，还有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名流也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官方的招安。在蒋彦永医生站出来揭露萨斯真相和写信为“六·四”正名的时候，大部分知识分子对此无动于衷——可以设想，假如有一百位著名学者和作家起来回应蒋医生，那么一党专政的政体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让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一个具有道义力量的群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乐登（Michael A. Ledee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从共产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成熟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中国所选择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臭名昭著的“第三条道路”的“公司国家”。

“国家被专职政治家和腐败的‘精英’主导，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这个制度并没有特色，而是政治压迫，犬儒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在我看来，乐登只是揭示了中国社会部分的真相，中国社会远远没有“进化”到“成熟的法西斯主义”的阶段，它仅仅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雏形而已。普通中国民众并没有当年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为法西斯主义献身的激情，中共政权也没有那样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乐登指出：“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去煽动它的大众，而不是用共产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固然是事实，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三心二意”的民族主义，许多时候它仅仅是受到长期压抑的、没有言论自由的民众不得不选择的一个“发泄口”而已。也就是说，这种民族主义通常只是用来掩饰自我的懦弱和卑琐的“口头上的爱国主义”，而非真正能够付诸于实践的、扩张型的爱国主义。比如网络上关于“打台湾”的叫嚣，无非是许多网民满足“口腔欲”的话题而已，如果真要让人们牺牲个人的财富乃至生命去打台湾，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另一方面，对于这种暗潮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共当局既想利用之，又害怕它失去控制，所以也陷入相当尴尬的处境之中。

在政治制度的极端僵化和腐败的疯狂蔓延的意义上，中国社会有点像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但是，中共政权对异己力量的镇压和对支持西方式自由民主声音的控制大大超过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力度。勃列日涅夫仅仅是将索尔仁尼琴等异议作家驱逐出境，而中共对天安门母亲的持续的骚扰和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比如中国出现了私有经济占到当地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温州模式”。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台湾、韩国以及某些拉美、非洲军政权国家，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中共政权向来是不甘落后的。不久前，由国际特赦、人权监察、无国界记者等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评选，选出了如今依然在位的全球十大独裁者。在位十年的北韩金正日位列榜首，在位十三年的缅甸军政府领袖丹瑞位居亚军，而作为仅两年的中国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则荣列探花之位。该报告指出：“胡锦涛上榜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处决囚犯的数目，比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国际特赦估计每年约二千五百人被处决，其他有指达一万五千人。其次，中国内传媒都由共产党控制，约有三万名‘互联网警察’监控国民上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公民也逐渐争取到了某些个人生活中的自由，比如在结婚和离婚上有了更多的自由，比如部分地区的户籍制度出现了松动，比如民间维权运动开始兴起。当然，这些“缝隙”的出现，不是中共政权的“恩赐”，而是民众权利和法治意识的觉醒，以及经济对政治的强有力的侵蚀。

就在中共政权宣称自己的人民生活得无比幸福的同时（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对这种幸福的“过度阐释”），据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九月六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有两百万人自杀未遂。而在十五岁至三十四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是首位的死因。二十五是一个惊人的数量，相当于每年消失一座中等规模城市人口，尤其是自杀竟然成为了青壮年死因首位，更是让人惊心动魄。连官方学者也感叹说：“中国人自古有个说法，叫做‘宁做治世犬，不做乱世人’。身逢乱世，以自杀以求解脱，还有可理解的地方，但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和平的年代，在这个并不存在多少波澜的年代，以自杀的方式来做了断，很难不被称做消极。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尤其是这么多的青壮年选择用这样消极的方式做自我了断？”这恰恰说明大量的中国人对未来完全绝望，他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对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统治的否定。

今天的中国社会，堪称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希望与恐惧同时存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和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存在着种种似乎截然对立的看法。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现成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能够全面地描述中国的现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已经相对固定的说法，都只能概括中国社会的部分的真相，就像盲人摸象只摸到了象的某一部分一样。中国这个扭曲的“四不像”式的怪物，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一流的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们提供了考验其智慧的场所。社会结构已经相对定型的西方，知识分子难有纵横驰骋的空间。而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却急需“贴身”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来描述之、分析之。中国就好像是一名患上了最奇怪的疑难重症的病人，这种前所未有的病症对医生来说乃是巨大的挑战。我期盼着一位优秀的医生的出现——即使他开不出药到病除的药方来，至少他应当对病症进行准确而细致的描述。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二日

附录 余杰—萧然通信录

（一）、李敖·学术·常识

余杰师兄：

你好。

自从上次您在我母校演讲后，已有两年没有看见您了。一直很关注你的近况，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者在中国的命运，不可能是金光大道。何清涟已经被迫出境去美国了，因为她的文章揭露了中国社会真实的底层；听说摩罗所在的北京印刷学院也已不让他教书了，不知道现在他的近况如何；秦晖在清华也挨整了，尽管他是一代名教授。而你呢？自从莫名其妙被中国作协单方面撕毁合同之后，也成为了自由撰稿人，与王小波一样。当然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喜事，因为你的血性与良知是不适合在那样的“衙门”工作的，尽管在上次见面中你给我的印象是谦虚有礼，很会做人，温文尔雅的，然而，君本非池中物，又何需要那个鸟位。

第一次阅读你的《火与冰》的时候，你还尚在边缘状态，现在的你已经是大众传媒的宠儿，由边缘走向中心，书一本接一本出，可以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我也担忧的是，你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比如对李敖在中央电视台的演讲，您大骂其无耻下流，越来越剑走偏锋，让我也十分为您所担心。我一朋友燕舞曾经很激动地说：“余杰算什么学者，他有自己原创的思想体系吗？我认为余杰最终会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而已。”我不认同他对你的价值评价，你的价值并不在于思想是否原创，有多深邃，而在于你的勇气与锋芒，正如在武汉采访王岳川先生的时候，他对我说：余杰的意义在于敢于撕开意识形态的虚伪面具。在我看来，你和余世存应该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摩罗亦是如此，当然风格截然不同。

文化顽童李敖是你和我都十分钦佩的勇士，而你的轨迹与他的轨迹有些类似，就差没进监狱了。当我得知某些权势者很痛恨你的消息之后，我就隐隐约约有些担心。当然，你现在已经名满天下了，这对你是个累赘，又是个保护。然而，那些掌权者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权大于法，自然可以黑白颠倒人妖不分，想想那个勇敢的为民请命揭露黑幕的“扒粪者”高勤荣的命运就明白了，这位有大良知的记者至今还被关在山西的监狱里，惨受折磨。希望你也注意保护自己。

台湾大学哲学系的陈鼓应先生我也曾与之在讲座下交流过，当然他十分搞笑，居然问我：你知道余杰现在如何了？我告诉他：余杰现在结婚了，很幸福，并写了本新书《香草山》。他的信息之闭塞也让我觉得为之叹惋。现在的陈鼓应已经躲在书斋成一统了。尽管我很佩服他在老庄哲学上的贡献，但比起当年与王晓波一起抗议白色恐怖的“台大哲学系事件”的陈鼓应，他已经老态龙钟，不复当年之勇了。不过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很适用，他对我说：希望余杰扎实一点做做学问。在我看来，这句话还是很适用于你，毕竟你的本行领域不应该抛下，我也不希望你成为闪光灯下的“花瓶学者”。

我是新闻专业的学生，明年即将毕业，现在在北京新东方学习 GRE，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还在北京，希望能看见你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出现，也祝福你与宁萱一生幸福，这样的爱情，永远是人间弥足珍贵的情感。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五日

萧然兄：

你好。谢谢你的来信。

我个人的处境还好，最近两年来，虽然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和非议，还是一点点地争取到了些许的言论空间。我不认同“自由撰稿人”的说法，今天的中国并没有《大公报》、《观察》、《每周评论》之类的独立报刊，所以像我这样的写作者至多也就是“半自由撰稿”人吧。

现在回想起来，两年前没有去现代文化馆，倒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没有“单位”和固定工作，但我现在的心态非常良好，写作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顾忌和条条框框。一部分文章能够发表，可以维持生计；另一部分文章依然是为“抽屉”而写的，这是一种“深水鱼”式的写作（索尔仁尼琴），这些文章暂时不能发表，但我个人认为它们更有价值，而且我也相信它们必有问世的一天。

你认为我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认同”，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不少人在读我的文章，尤其是大学生，但是我依然感到真正接受我的观点的人并不多。看热闹的人多，而在认真思考的人少。这两年到一些大学与同学们交流（包括你们华中科技大学），我感到诧异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大学生的思想能力居然退化到了如此程度！

下面回答你信中的几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批评李敖呢？这是因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李敖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敖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民主斗士，他以自己的写作乃至生命实践（比如坐牢），对台湾的民主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台湾解严、民主化、政权更迭之后，李敖是没有完成自己在新时代里的“身份转化”，就好像一个拳击手突然失去了对手一样，处于迷惘和失落的状态。于是，不甘寂寞的李敖对自己的炒作进入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在新作中附上裸体照片，比如进行赤裸裸的色情描写等等。

而最不能原谅的是，近年来李敖在央视这样的大陆最主流的媒体上，对大陆发表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言论（他知道大陆农民的生活状况吗？）；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他居然在电视上公开赞扬恐怖分子的“英勇行为”。李敖现在俨然是反美的先锋，但自相矛盾的是，昔日被国民党审判入狱的时候，他却把《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当作莫大的光荣。李敖的这些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失误”，我思考，这与他和他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身上的纵横家气质有关。我曾经写文章谈李敖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我逐渐发现与其说自由主义对李敖影响最大，不如说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一个流氓气、霸气与乌托邦气质结合的传统文人。他只知道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没有深入研究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他不知道民主正如老丘吉尔所说“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当民主制度初步实现的时候，他却无法接受民主的弊端和缺陷了。李敖的这一悲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展开来谈。

你的信中提及陈鼓应先生，我在北大的时候，先后听过他的几门课。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讲尼采与陈独秀的自由精神、直陈对学生运动的看法等等，在九十年代初沉闷压抑的校园里让人耳目一新。作为大学教授，他还是比较有魅力的。后来，台湾为当年台大的学生运动平反，台大重新请他回去任教了（也许从此他对大陆的了解就少了吧）。我记得大二、大三的时候，曾经把一些文章送给陈先生看，那时候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呢。陈先生近年来鼓吹道家文化主流论，这种观点固然是对“独尊儒术”的专制道统的一种反动，但我并不同意他对道家文化的过度推崇。我认为，从本质上说，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一样，都是专制帝制的附庸和装饰，从其中生长不出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来。鲁迅说“中国的根底在道教”，鲁迅是从负面来说的，陈却是从正面来说的，我是鲁迅的“志同道合”者。正如你所说，陈氏“已不复当年之勇”，他的同门师兄弟王晓波也是如此，我看了这位殷门弟子最近的一篇访谈，大谈传统文化如何美好，让我大失所望。是不是人的年龄越大就越容易保守呢？但愿我今后不会像他们这样。

至于专业的学术研究，我当然会一直做下去的。明年，我会出版一本关于近现代学术史、文学史和思想史方面的论文集（包括我的硕士论文《〈知新报〉研究》在内），暂名为《彷徨英雄路》。这本文集主要讨论从“戊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到“五四”（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的两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学术、政治活动、思想倾向与个人命运。我对学术颇有兴趣，但我并不把学术看得那么高，学术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也

是我离开学院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在今日之中国，说出“常识”比做“专业学术”乃至创造“思想体系”更加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梦想创造“思想体系”？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思想体系”吗？中国更需要的是恢复常识、言说常识和在个人生活中实践常识。什么是常识呢？比如“农民也是公民”、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比如“信息应当自由传播”、比如“是纳税人养着政府而不是政府给人民饭吃”、比如“爱比暴力更有力量”等等……这些都是常识，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即便是一些获得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的所谓“知识分子”。因此，我愿意用大部分的文章来言说常识、传播常识，至于别人批评我“没有自己的学术贡献”、“没有自己的思想创见”，我都一笑置之。我经常遭遇到如你那位朋友的那种攻击，我谢谢他们对我的“期望”，但我只愿意按照我的本心来成长。

我的写作是从“说出真相”开始的，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就没有预设自己的身份是“学者”抑或“作家”。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每次回到家乡，我都能够感受到当年鲁迅先生写《故乡》时的那种锥心的痛苦，“我们的家乡都在陷落”（王怡）。虽然“农民是公民”、“农民是纳税人”不过是“常识”而已，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承认这个“常识”呢？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和排斥以及种种国家政策对农民的盘剥和欺辱，跟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有什么差别呢？农民就是我们的“黑人”——有几个所谓的“大学者”和“大作家”在关注这些被凌辱、被漠视的灵魂呢？而这，恰恰是我自己所认定的使命（当然，一定要警惕民粹主义，在歌颂“人民”的同时，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救世主”，这是某些中国文人最恶劣的品质）。

我基本上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我认为，不对中国文化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则无以救中国。我在读中国的历史书时，震惊于其残酷和厚黑的一面。如鲁迅先生所感慨的“写满了‘吃人’两个字”一样，我感受了了铺天盖地的黑暗，却怎么也读不出“温情与敬意”（钱穆）来。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认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打开的死结”，“决定性的权力，远离人民社会，而一层一层地安放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其势真有如以一丝而悬千钧之重。在此一意义的专制之下，若把权力集中于朝廷，就必定有外戚宦官之祸。若分寄于地方，则不论是封建的形式，或者是州牧的形式，就必定有互相劫夺之祸。”也就是李慎之所说的，中国的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那么，它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先写到这里，非常高兴与你交流。

余杰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

（二）、民粹主义·爱国·俄罗斯知识分子

余杰师兄：

深感你回信速度如此之快。因本人在中国农大上 GRE 班，适逢北京因蓝极速网吧事件，有关方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治网吧，所以上网极其不方便。为此，我曾经专门写了一篇评论，但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敢于刊登。大意是这样的：查封是违背法理的，逻辑很简单，比如一位同志在一家餐馆吃饭食物中毒了，我们不能因此就查封所有的饭店，这样的一刀切式的运动效果不可能好。据说很多网虫后来干脆就跑到廊坊去上网了。执法者思维简单化，老百姓可得吃苦不少。什么时候学会依法行政、科学决策，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就健康了。

关于民粹主义，我心里一直有着一种很深的隐痛。问题在于：民众愚昧谁之罪？？

在我看来，历史的审判中，和统治者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中国古今所有的知识

分子和一切精英。在谈到义和团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愚昧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标鉴。义和团绝大多数徒众都是贫苦农民。在解读那段历史时，常常有一种锥心的痛。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里度过的，我的长辈、邻居和村民都是最普通的中国农民，我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热爱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使是现在，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关帝显灵，巫婆神汉等仍是村民们热衷的话题，义和团运动发生以来，许多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尖锐针对农民。这样的讽刺挖苦让我愤怒。掌握着知识和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不知道反省，而是卑劣地转移责任并借这种转移自欺欺人爬向道德的制高点，这样的态度让我恶心。伪精英心态和流氓习气的结合，使中国知识分子和儒家文化走向死胡同并且无可救药。

“五四”最终没能走到法国启蒙思想高度。以启蒙自任而同时对被启蒙的对象心怀轻蔑和不屑，使中国知识分子最终丧失了一切话语活力和影响。“躲进小楼成一统”，蝼蚁春秋，象牙塔里自鸣得意的精英与中国和中国的社会毫无关联。他们可以在网上大谈不着边际的自由主义，可以指责国人的愚昧，但更重要的一点，如何启蒙如何让其摆脱愚昧，却始终缺席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我看来就很有与现实脱钩的味道。脱离现实语境，这样的理论再精深，也如白纸一张。中国文坛玩弄术语技巧搞得自己都腻味了，《读书》杂志的堕落就是一个明证。问题进一步深入思考下去，在我的理解就是历史观的问题，我不同意你的“全盘西化”的观点。

著有《哲学书简》的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对本国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在信中他说：“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昧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恰达耶夫是爱国的，只不过他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自己的爱国之心，在《疯人的辩护》中，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

如恰达耶夫所言，爱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忧国忧民的爱国无疑比随波逐流、歌功颂德的爱国更为有益，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逆于行”。从这个意义上，就能更好理解你所选择的道路的价值，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但在我看来，恰达耶夫在其历史观上，具有极大的缺陷。他曾经在比较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的时候，说：“东方，恭顺的智慧跪在历史权威面前，在对他们的神圣原则顺从的服务中耗尽自己，最终，他们睡着了，封闭在他们景致的综合中，没有猜透那些为他们而准备的新命运；与此同时，在西方，人们却在高傲，自由的前进，他们只对理性与天国的权威俯首，他们只在未知的东西面前停步，他们永不停息地将目光投向无限的未来。”

恰达耶夫将东西文化绝对割裂开来，然后在宗教的基础上比较优劣，这实在很荒谬。这也是正如你所言的“全盘西化”中隐藏的一个价值判断，就是东方文化一定是野蛮的、不好的，应该用西方文化将其取而代之的。这种价值判断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这样的进步的历史主义观念也有线型单向思维之嫌。余杰师兄的逻辑链条我可以分析一下：人类的历史发展只有一条“共同的道路”，走在前面为优，走在后面为劣。西方文化一定优于传统文化，因为其近现代都走在我们前面。但我们有没有想到，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自然发展与历史发展是一回事吗？对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的批评，正是防止走入达尔文主义的死胡同。我想起翻译过《天演论》的严复，他在读《老子》的时候写下了一段话：“万化无往而不复，不反则改，不反则殆，此化所以无往而不复也。”这与进化历史观格格不入，我倒宁愿相信斯宾塞的不可知论。经验主义者人为：认识开始于经验，终结于经验，知识是主观的，宇宙的根本不可知。这种不可知论承认人的有限性，也让我们理解单纯以进步和落后来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准是可笑的。印第安文明就一定劣于美国文化？火与剑的胜利就一定是历史的胜利？

在师兄的书中，洋溢着浓郁的“白银时代”的文化情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化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别尔嘉耶夫对这次运动有着严厉的批评，在《思想自传》中他说：“这次运动有

狭隘的文学性质，它的悲剧在于文化精英只孤立于不大的圈子里，而脱离了当时的广阔的社会潮流……在沙龙里谈论着文学，谈论着上帝与救赎……”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文化复兴时代的知识分子要为此负责。

俄罗斯知识分子有着高贵的人文精神，顶着时代的压力，忍受身心的创伤，将俄罗斯精神的血脉薪火相传。我对这片美丽的文学森林表示我极大的尊重。我并不完全同意别尔嘉耶夫的批评，他们的贵族气息是在维护着人的尊严，维护着精神文化的尊严。但与此同时，我们要学会谦卑的低下头来，拥抱我们苦难的大地，拥抱我们苦难的人民。伟大的文学作品，骨子里流动的一定是民众的血液。在谈“超越人民”之前，我们应该拥有这份谦卑与反省。

萧然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

萧然兄：

对于网吧事件，我也有跟你相似的看法。我想追问的是：政府究竟有没有权力随心所欲地关闭那些已经取得合法身份的网吧？那些业主的损失究竟由谁来赔偿？在我看来，政府的行政权力绝对不能无限膨胀。一个好的政府不是管天管地管空气的、无所不在的政府，而应当是“有所不为”的政府。然而，在此一事件上，媒体上的声音全是一边倒。

恰达耶夫对本国的专制统治者和专制文化的批判，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曾经专门写过《疯人的辩护》一文。古今中外，真正的爱国者往往被冠以“疯子”、“叛徒”、“卖国贼”的恶谥。恰达耶夫说过：“请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结果他被沙皇宣布为疯子，并派医生上门强迫他接受治疗——不过，比起斯大林动辄让异议知识分子“立即消失”来，沙皇还是要“文明”得多。而在战场上当逃兵、并对纳粹政权以及德国的民族性格提出尖锐批判的作家伯尔，也成为“爱国者”们的眼中刺，“具有歇斯底里情绪的人给我来了一些信：威胁要杀死我！我明白，在一个长期以来所有人都习惯于收买和叛卖的国家里，一个捍卫无望事业的人应该被视作叛卖之人。”鲁迅不也被某些人攻击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吗？

今天的中国缺少的是恰达耶夫的这种“另类的爱国主义”，今天的中国泛滥的是那种义和团式的“虚伪的爱国主义”。对此，青年作家王开岭分析说：“一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仅仅是人们习惯的那种‘爱政府主义’、‘爱领袖主义’吗）？真正的爱国使命应当由什么样的‘人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那么，‘人民’又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它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数字集合——由所谓的‘大多数组成的粗糙的‘人丁象征物’吗？”（《跟随勇敢的心》）我想，一个不爱身边的每一个具体的同胞（比如街头的民工）的人，会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吗？

我不同意你对恰达耶夫的历史观的批评，你走向了一种混淆善恶、是非的“文化相对主义”。你了解恰达耶夫时代的俄罗斯吗？一个实行奴隶制度的专制帝国与民主自由大步推进的西欧相比，难道真的没有“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区别吗？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读读那个时代俄国的史书，看看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就能理解恰达耶夫的愤怒了。

关于民粹主义的问题，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专门有《俄国民粹主义》一章进行论述。中俄的民族性非常相似，因此伯林的分析对中国也颇有警醒意义。你对知识阶层的批判固然有道理，但是切忌走向“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受压迫者是未受腐化的质朴美德的体现，认其社会组织为重建俄国未来社会所必用的天然基础。”这种将“人民”无限美化的思路，正是雅各宾主义的沃土。伯林论述了从赫尔岑、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到列宁的思想脉络，并指出：“正如列宁经常满口承认，共产主义的实践作法受赐于民粹主义运动之处甚多：共产主义袭取了它这个对手的技术，正好转用于助长这技术原本要抵制目的，而且大获成功。”由“人民崇拜”走向“人民暴政”，

俄罗斯的历史经验摆在那里，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中国需要民主，中国更需要共和。

深知“人民”中蕴含着巨大力量的革命导师列宁，同样对“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充满了恐惧。有一次，列宁面对数十万人演讲，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站在旁边的斯大林献媚地说：“您看，人民多么热爱您啊！”列宁却冷峻地说：“如果今天是我被沙皇绞死，来看绞刑场面的人会比现在还多，而在我被送上绞刑架的那一刻，掌声也会更加热烈和持久。”鲁迅在《药》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所以，我认为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知识分子、并片面地认为民众具有某种“天赋善良”的美德，这样就很容易走向“无知者无畏”的“痞子运动”。同时，对于“精英主义”也不能完全否定之。现代社会确实需要“分工”、需要“专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连高等教育也没有受过，他能够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吗？

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讨论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别尔嘉耶夫的指责是中肯的，但他自己何尝又站在被批评者之外呢？

余杰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三）、传媒·忏悔·文人的虚妄

余杰兄：

近况可好？前途风雨交加，冷暖自知，希望你保重。

我之所以如此关注余杰先生，是因为你的作品感动了我，一份柔情，一缕剑气，在老年文体、夕阳写作泛滥的今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表达的可能。记得两年前，十八岁的我第一次阅读《火与冰》的时候，心中的喜悦是莫名其妙的。当时的我在精神上还是个奴隶，带着太多制式教育的伤痕，而并为意识到这是一种何等的耻辱，习惯在意识形态说教下的孩子，所以看见你这样的文章，震撼是巨大的。坦率的说，我第一次阅读时是这样想的：这个叫余杰的家伙好“反动”，居然没被抓起来！

时光推移，对于你的认识有一些新的变化。我理解并认同你将“常识言说”作为写作的底蕴，但对于你的一些观点，我不仅不认同而且持针锋相对的看法，比如在《昆德拉与哈维尔》里，流露了青春写作中的十分专制的倾向，当时我也十分担心你会走到自己的反面。而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肯忏悔》这篇文章中，文革语言太多太重了，反而把文章本身的严肃性与思辩的特质消解掉了，具体内容我就不展开说了。不肯忏悔是个人自由，对于余秋雨的定义，我基本把其定位为一“花瓶文人”，无狼心有狗肺，媚权贵而少反思之流也。你和他后来的“互相谅解”在我看来十分奇怪，他真的值得你原谅吗？你这样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觉得是一种作秀。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中国你提倡的观点，如“忏悔精神”、如“原罪意识”、如“全盘西化”等落入无人喝彩的尴尬处境？比如“二余之争”到最后被传媒修改成一场弱智的演出，我不知道是弱智的传媒造就了弱智的受众还是弱智的受众成就了弱智的传媒，这是一个二律背反。

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我确实担心传媒造就你的同时，也同时毁了你。想想这两年无数的人事纠纷发生在你身上，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你的才气，你的渊博，在青年思想者中是最牛的一个，也正因为如此，也是最容易遭人嫉妒中伤的人，一个光芒万丈的个体是肯定要被庸俗的大多数所攻击所不理解的，朱学勤先生说得好：中国是一个最培养人耐性的地方！

我的一位朋友是大学的讲师，私下里总有不少关于晚清史、民族主义等的真知灼见，他也愿意与我交流他的思想。但有过被“正统”学生到教务处告发的经历后，这位老师只好明哲保身地照本宣科。实在难受，他会试着不犯忌到透露一些真实想法。这位老师二十二岁就

在一所名牌大学念完了历史专业的硕士，但他今天的处境很让我惋惜。（因为八九年的原因，他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像其他青年教师那样忙着考博士、炮制论文以求评职称，我劝他从长计议要“入世”点，但他坚持认为按校方那套僵化的标准教书对学生是不负责任的。为了良知，他付出了不得校方认可的代价。课堂上，他常引用李泽厚先生高足刘东的话：大学教师的责任就是“拨乱反正”，将高中学的被曲解的那一套纠正过来。

而你、摩罗、钱理群、余世存、任不寐、王怡、伍立扬正是一代沿袭“五四”香火打通中西文化开展思想启蒙的“新文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我个人倾向于“出世”型的知识分子，即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或萧功秦先生的“观念型知识分子”。但同时我对刘得福、李辉、李书磊这样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也是尊敬的。在我内心，深藏着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由于自己比较热衷于关注学术思想的“追星”，自己也同样忽视了底层的真实。几次实习经历虽然接触了社会的最底层，根却没达到。自己无才无能，却常以精英自许，这些都是我自己所要忏悔与思考的。去参观《南方周末》的时候，曾经被陈明洋编辑的话所打动。明洋师兄说到了自己的爷爷，说是“解放”的第二年自杀的，而且是当这全家老小的面自杀……做过国民党时代的小学校长、培养过无数学生的这位知识分子，预见到了读书人在五六十年代会遭罪，不愿屈辱地死去，所以提前有尊严地了结了自己。也许这就是《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成为大陆唯一一家能够带些当年《大公报》影子的报纸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曾有许多如陈明洋一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其中。与他聊天中，觉得他的话多得象他抽的烟一样多。关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大量介入社会问题的弊端，关于“革命”与“传销”之间的关系，都包括在陈的话题中。说起季羨林，陈简直觉得不能原谅，认为季老的“知识分子原罪说”是辩解之词。而在我看来，如季老这样的人如过江之鲫：周一良、陈白尘，包括现在的郭其勇，当代知识分子有很大一批都犬儒化了。而这同样是我感到深深悲哀的原因。

今天先写到这吧。希望与余杰先生继续交流，希望你保重自己，注意安全。

祝你与宁萱一生幸福。

萧然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九日

萧然兄：

你好。谢谢来信。

你是学新闻的，你很关注媒体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这确实是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非你选择做非常专业的学术，比如研究甲骨文，可以不用跟媒体打交道；但如果你要做一个“公共性知识分子”，你就离不开媒体。

这四五年来的，我与各种媒体有了一些接触，从没有经验到积累了一点经验，其中有让我愤怒的事件，也有非常有趣的经历。面对媒体的时候，我坚持这样的几个原则：第一，珍惜已经出现的一些发言的空间和渠道，能说出一句话算一句话，但绝对不说一句违心的话；第二，只在自己所研究和了解的领域发言，不能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抢着说话，像余秋雨这样的“万金油”式的学者是不可取的；第三，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能迎合媒体以及媒体背后的大众，不能挑他们喜欢的话说。

我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单刀直入，该批评就批评，该肯定就肯定，没有丝毫的犹豫与含糊。我一般都会直接点名批评，我是对事不对人、对观点不对人。我可以坦坦荡荡地说，我没有“私敌”，而只有“论敌”。但这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说话的习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是：你批评了谁，谁就是你的仇人。因此，我得罪了不少的名人，不得不卷入如你所说的诸多的“人事纠纷”中。并不由自主地陷入到“漩涡的中心”，乃至成为“箭垛”式的人物。其实，我是一个好静的人，喜欢宁静的家庭生活，而不喜欢卷入争论与热点之中。但是，我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喧嚣都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内心的宁静和超然。

对余秋雨的批评，请注意我的两篇长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和《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尤其是后一篇），请读原文，而不要相信媒体上臆捕风捉影的新闻。为什么我要批评余秋雨呢？有人对我作了“动机分析”，认为我想通过批余秋雨这个大名人来“出名”。这种“诛心之论”既可笑又阴险。

首先，我并不只是批评过余秋雨一个人，或者说“精心选择批评的对象”。此前，我在若干文章中曾经对郭沫若、周扬、舒芜、周一良、吴晗、钱穆、季羨林等比余秋雨重要得多的文化名人都作出过严厉的批评。

其次，我批评余秋雨，本意是想以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为个案，通过对其人格缺陷的分析，来讨论能否引进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意识”，从而对中国文化来一次“刮骨疗伤”。遗憾的是，许多媒体把这一批评当作花边新闻来炒作，严肃的批评被传媒所“妖魔化”了。因为时间相近，许多人还将这场论争跟王朔和金庸的对阵相提并论。其实，在我看来，“金王论争”并无多少学术和思想价值，不过是个好玩的游戏而已，它满足了“演员”表演的欲望和“看客”观赏的好奇心。可悲的是，在世纪之交的新闻“热卖”、“热销”中，我的文字居然被归入“酷评”一类，我的写作初衷和真实想法都受到了有意无意的遮掩和歪曲。

我与余秋雨之间并没有达成“和解”，那是媒体的误传。我只是与他在成都魏明伦先生的家中见了一面，他向我解释了他在“文革”中的某些作为（是否可信，当然另当别论）。我难道拒绝他见面的要求吗？论敌之间难道不可以见面吗？难道只要见过面了，两人之间的观点和理念的分歧就不存在了吗？那些捕风捉影的报道背后，体现出了中国人的一种非常糟糕的“面子”观念，在某些记者看来，为了维护“面子”居然可以牺牲价值观的分歧！

关于你指出的“不忏悔的权利”，也有别的学者谈到过。学者甘阳就曾在《明报》上撰文指出，当年的丑事“毕竟不是余秋雨一个人的错”。我同意甘阳的说法，而这也正是讨论“忏悔”问题时需要凸显的、而又比较难于言说的“前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有对“文革”乃至一九四九年以来若干惨痛的事件进行清理，元凶和大小爪牙们依旧逍遥法外。在这样的背景下，难怪甘阳认为，谴责像余秋雨这样一个小小的御用文人，似乎有点“不近情理”。但是，我认为，呼唤知识分子忏悔，尤其是被今天的广大青年读者视为“人生导师”的余秋雨忏悔，并非强人所难。我当然知道更应当谴责那些手上沾着鲜血的罪魁，然而以文字的形式参与迫害的文人，难道就应该心安理得吗？同时，也请你注意，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我仅仅是建议和呼唤他忏悔，我并没有试图（也没有能力）运用权力来强迫他忏悔。

在我看来，忏悔是开始有尊严的生活的前提，忏悔是人类精神自觉的开端。忏悔体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理性的成熟和道德的诚实，体现了人的责任感。意识到我们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和我们道德上的责任，这是人类的荣光。因此，余秋雨对自己的历史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它，让我感到十分失望。他把我对忏悔的呼唤理解为“强迫忏悔”，更加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忏悔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正如任不寐在《忏悔是一种尊严》中所说：“我们的耻辱不是因为我们忏悔了，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忏悔。呼唤余秋雨忏悔，这就内含着一种尊重：余秋雨应该是一个有道德责任感和理性能力的大家。”忏悔是拯救，忏悔是恩典，只有认识到自身罪性的人才会有忏悔的愿望，只有渴望得到新生的人才会有忏悔的行为。

《圣经》中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是在罪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第五十一章二至五节）首先有对罪的认识然后才会有对忏悔的内在需要。这种自觉的意识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渗透到写作者的文字里。刘晓波在《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一书中谈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说：“《忏悔录》既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部浸透了原罪感（悲剧体验）的心灵独白书，又是第一部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著作，是西方哲学家真诚的忏悔意识的开端。它不仅影响过卢梭、尼采等人，以及整个浪漫派的艺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客观叙述之主观独白式的叙述方式，

这种由内向外的叙述方式，因其对人性的巨大洞察力和表现力，而遍及整个世界。”以此来对照余秋雨的散文，主人公的灵魂始终是缺席的。余秋雨没有这种原罪感，也就不可能有忏悔的意识。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在涉及自身忏悔的话题时，他立刻将自己的身体背了过去顾左右而言他。任不寐在《忏悔是一种尊严》中还谈到，两千年春天有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向全世界忏悔天主教在历史上的罪恶。有人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不幸（“他真傻”）、愤怒（“要谴责”）和欣慰（“哈哈，他也和我一样干过坏事”），而任不寐却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人类的希望。我也一样，我在忏悔中发现了人类的尊严，在忏悔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你在上次的信中提到别尔嘉耶夫对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批评，别氏也提出只有忏悔才能催生新的俄罗斯文化，他指出：“在历史的当下时刻，知识分子所需的并非自我张扬，而是自我批判。我们唯有通过忏悔和自省才能进入新的意识。在反动的八十年代，当人们在自我陶醉地谈论保守的、本真的俄罗斯美德时，弗·索洛维约夫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揭示了社会的这一部分，呼唤他们进行自我批判和忏悔，去发现我们的病症。然后是谈论我们激进的、同样是本真的俄罗斯美德的时期来临。”可惜的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走上了一条与他预测的完全相反的道路。

你的信中提及了《南方周末》，本科毕业的时候，如果不是继续念研究生的话，我就去那里了。《南方周末》有好多北大的师兄弟，他们做了好多让我敬重的事情——为此也受到了种种威胁，我的一个同学甚至还收到过带着火药味的子弹壳。当然，《南方周末》也有自己的问题，包括对本地事件的沉默，包括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等。近期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批优秀人才也相继离开。这种趋势不是由人力所能左右的。

陈明洋对季羡林的评价，我基本同意。在中国当一个老名人也真可怜啊，像巴金就被迫当了多年的植物人，欲安乐死而不得，不由自主地成为“盛世”的点缀以及亲朋的“饭碗”；季羡林频频出席各种会议，主编各种丛书，发表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云山雾罩的言论。在一时洛阳纸贵的《牛棚杂忆》中，季先生只知道唠叨当年受的苦，却丝毫不反思自己在运动之初是如何积极主动、响应领袖号召的。

昨天刚好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季羡林先生九十二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侧记》，作者宋晓梦。不妨把这篇妙文抄给你看看：

依旧是一袭蓝衫，依旧是气定神闲的模样。当大病初愈的季羡林先生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庆贺季先生九十二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十月十二日在北大勺园举行。据说，今年八月，季先生生日的前一天，门前干涸了很久的池塘中，季先生亲手种植的、曾被周一良教授称为“季荷”的满塘荷花，清晨竟然全部开放。人们都说，这是先生的精气神所致。

人文教育是季先生一贯关心的，所以今天的庆贺会加入了人文教育的主题。周汝昌教授首先以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先生祝寿。他说，菊花可以延年益寿，是最祥瑞的东西；我们为人祝寿时常说“寿比南山”。周老希望能有学术团体经常创造些机会，“让我们几个老书生见见面，同时也让人文科学在社会上更受重视。”

杨叔子是到会的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教育部人文教育委员会主任，目前正在北大蹲点。他回忆了季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什么？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他说，季先生对我国人文教育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感激！

金开诚教授是带病前来为季先生祝寿的。前不久听说季先生急诊住院他很担心。当看到已经摆脱了病魔的季先生脸色红润，精神矍铄，金教授非常高兴。他说，什么叫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要把人教育成文明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有荣辱感。季先生并不为自己追求什么荣誉，但他以自己的言行、成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来给季先生祝寿的还有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他说，任何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之中，商场不是战场。战场你死我活，商场“和解就是双赢”。今天是对手，明天就可能是合作伙伴。汉民族是个宽容的民族，当你看到“和解就是双赢”的局面时，你就会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

叶朗教授的发言满怀深情：加强人文教育就要在大学营造一种氛围。北大之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氛围，就是因为有季先生这样一批大师。他们的人品、学问、胸襟、气质以及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北大的学生。

郭预衡教授认为，现在一些人文教育的文章太深奥，让人看不懂。如果能像季先生那样实实在在做人，朴朴实实做学问，写出一些平易近人的文章来就好了。

本来，侯仁之、张岱年、林庚三位老先生也要来祝寿，季老连忙定下一条原则：比他年纪大的都不许来。结果，三老都捎来了贺信。

在庆贺会临近结束时，陈祖芬女士代表大家向季先生献上一束盛开的鲜花。季先生感谢大家的鼓励，并介绍了他近期将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他说，将来人文科学的发展，必定是西方的分析加东方的综合。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如果不是周星驰式的幽默的话，也亏得这个记者能够写出如此文字来。都已经是什么时代了，还在渲染生日荷花开之类谰纬的把戏！这位记者简直把季老当作神仙了，而季老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他大概也把自己当作神仙了！人一老，就容易自己崇拜自己、并以为所有人都崇拜自己。由此可见，中国文人的虚妄和自恋达到了一种怎样的境界！昔日，刘邦不是说自己曾经路斩白蛇、乃是天子下凡吗？这种鬼话历代统治者都喜欢编造，“盛世”哪能没有“祥瑞”的出现？最后，文人们也攀附其后，开始制造一系列“文曲星”下凡的神奇故事。例如，在《儒林外史》中，胡屠父打了中举的范进之后，胳膊不就抬不起来了么？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份专门给知识分子看的国家级大报上，居然还在津津有味地讲述类似的、“天人感应”的荒唐故事！我想，季老的“功力”简直比那些研究转基因的生物学家还要高，能够遥控花开花落。既然季先生的“精气神”有如此厉害（不亚于《封神演义》中各路呼风唤雨的神仙），那么他为何不让农民地里的粮食亩产上万斤，不就一下子解决了中国“扶贫”的难题吗？

同样可笑的下面诸位“大师”的发言。杨叔子院士好像当过你们的校长，他居然说中国的人文精神第一是“爱国”。我不知道古人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都还没有形成。中国历代只有“天下”（而且是“家天下”）的概念，而没有“国家”的概念。所谓“爱国”，其实也就是“爱皇帝、爱皇后、爱贵妃们乃至爱服侍皇帝的太监们”而已（如方孝儒的愚忠），这叫什么“人文精神”呢？

金开诚所谓的“知荣辱”、郭预衡所谓的“朴实”、叶朗所谓的“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话倒是不错，但在我看来，对季老而言显然是过誉了。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其衡量条件之一便是“知行合一”。然而，即便是季老本人恐怕也没有做到“知行合一”：近年来，季老堪称“电视明星”，时时在电视镜头前对自己并没有研究过的诸多领域发表“高见”。他本来是研究梵语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却对媒体张冠李戴地赋予他的“国学大师”的称号安之若素。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北大的校刊上还登过这样的一则消息：季老虽然不是党员，却不顾严寒，精神抖擞地去“列席”北大的党代会。对此，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季羡林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学热”的鼓吹者。对于这股腐尸般的思潮（它又与大言不愧的种种“后学”巧妙合龙），我个人是无比的厌恶。我们对传统文化不是批判得过头了，而是批判得很不够。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出现奈保尔式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萨伊德之流的戏子。

知识分子的“草根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近我在阅读晏阳初等先辈的文章，与李昌平等人也有接触（你在湖北念书，应当知道他的故事），深感农民问题的严重。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自身的虚妄，脚踏实地地对中国的进步发挥作用，我辈应当好好思考和实行。印度的特蕾萨修女提倡要“活出基督来”，深以为然。

我理解你对知识阶层“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以及你对自由主义未能在我国扎根的痛心。检讨二十世纪以来我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反思当下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困局，确实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迫切问题。我认为，如果想超越“五四”先贤，可以从两个方向开始：一是在“向上”的方向上，探求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问题，要认真梳理基督教信仰与自由主义的渊源关系；二是在“向下”的方向上，切实推进民主、宪政及联邦制度的研究乃至实践。我想，这两个方面也许能够丰富自由主义的空疏和弥补自由主义的缺陷。

匆匆写到这里吧，言不尽意，有机会好好长谈。

余杰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四）、自由主义·萨伊德与奈保尔·“三农”问题

余杰师兄：

你的信引发了我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进一步的思考，我愿意向你进一步阐述我的想法与思路，我本身也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是不合格的）。

按照伯林的理论，自由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从学理上说，一个人争取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也是在争取所有人的权利。这种一种“兼济天下”的行为，属于“积极自由”的范畴。但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代价则需要他单独承受。反过来说，如果别人如此，他则可能可以“搭便车”而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在面对强权压迫的时候，如果人们都各怀私心（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就无从冲破压迫而获得自由。而且进一步说，即使个人获得了自由，出于私心也不容他人来分享自由，因为他的“自由”已经不是公共产品。这样追求自由就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这也正是自由主义学理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困境之二是：自由主义的逻辑困境在于它们回避自由的概念本身。

这里需要对“自由”进行界定，作为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把自由定义为人的对必然的遵循。也就是说，按照必然法则思考和行动的人就是自由的人。这种定义的困难在于，“必然”只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概念，我们只可以信仰存在着必然，而不能断定哪个原则是必然的（是绝对的真理），任何原则都只能在经验中不断地验证其有效性。而且，遵循必然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不自由，因为这正好表明我们受到必然的制约而不能自由。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对自由的定义是：“可以照意志的决定来行为或不行为的一种能力。”休谟定义的自由同其他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很不同的。如果自由是一种能力，那么自由就不应该是权利性的，因为有某种能力并不能表明他具有该种权利。比如，很多人有杀人的能力，但是却不应该有杀人的权利。所以自由主义者不可能把自由理解为人的一种能力，而只能把它理解为人的一种状态——没有束缚的、自主的处境。这种理解仍然存在着问题：一个人在公共领域要完全达到他的自由，很可能会妨害他人的自由，所以他的自由就受到了他人的制约。当自由的状态被社会环境所改变时，作为自由状态的自由就不复存在了。而自由主义却把这种非自由状态看成是自由的。它的这种困境的心理根源就在于不愿意放弃“自由”这个词语的广告价值。其实，自由主义放弃“自由”概念而用“权利”概念，就会避免这种困境。

如果我说“我有出入黑洞的自由”，人们会嘲笑我，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孙悟空

这样说的时侯，就没有人反对了。这就表明，自由是一个与能力相联系的概念。另一方面，我却可以说：“我有出入黑洞的权利。”在政治层面说“公民有言论的权利”，比说“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更合理，因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言论的不受限制，这与社会的法律事实是不相符合的。自由主义者喜欢把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称为“自由社会”，这除了具有自我美化和广告效果外，并不具有实质的含义，其实质应是“契约社会”。

这些学理上的缺陷与漏洞，并不妨碍自由主义在中国所具备的重大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才能被证伪，才有一门具有生命力有价值的科学。但对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而言，尤其是标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如果对自由主义本身都缺乏耐心细致的梳理，就生硬的将自己贴标签式的贴上自由主义旗号，我将其称为“时髦自由主义者”。

很认同你对自己定位的表达：“在‘向上’的方向上，探求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问题，要认真梳理基督教信仰与自由主义的渊源关系；在‘向下’的方向上，切实推进民主、宪政及联邦制度的研究乃至实践。我想，这两个方面也许能够丰富自由主义的空疏和弥补自由主义的缺陷。”

换言之，正如秦晖所言：“‘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需要高调的人格来创立。”我理解你对信仰问题的关注，作为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导师的鲁迅先生，在晚年他为什么也被黑暗所灼伤？为什么会说“一个都不宽恕”的偏激之言？这和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缺陷有极大关系。鲁迅一生反抗黑暗但却始终没有走出来，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崭新的精神资源，我们需要重塑信仰价值，以支撑自我脆弱的灵魂，我对你的选择表示我深深的敬意与极大的尊重。这个过程也许极其艰难，信仰要内化在血液里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思索，体会，忏悔，而这在以“三纲五常”为标志的传统文化里是冰炭不容的。

我同样也在寻觅在挣扎，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信仰上的缺失曾经让我十分迷惘，路在何方？我常常扪心自问。很喜欢史铁生先生，大成若缺，在《病隙碎笔》中有许多对于信仰的思考，皆发人深省。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就是：“所谓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人的精神性自我有两种姿态。当它登高俯瞰尘世时，它看到限制的必然，产生达观的认识和超脱的心情，这是智慧。当它站在尘世仰望天空时，它因永恒的缺陷而向往完满，因肉身的限制而寻求超越，这便是信仰了。完满不可一日而达到，超越永无止境，彼岸永远存在，如此信仰才得以延续。所以，史铁生说：“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这是一条行走在路上的信仰，是一种对天国的敬畏，对于内心心灵的坚定，就是一种确定的信仰。

后来在《压伤的芦苇》中，我惊喜地看见你的转变，也让我深深的共鸣。当许多人诽谤你侮辱你的时侯，我都坚决地捍卫你的思想与人格。尽管我同样写过批评你的文章，而且也十分尖锐。一直到今天，我对你有些观点还持保留态度，看见你上封信对奈保尔的赞扬与对萨伊德的批评，你依然让我感觉还存在“二元思维”的影子，“昆德拉与哈维尔”式的二元对立的情结。作家韩东在读了《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后说：余杰的承担者身上弥漫着的自我感动、道德主义、圣战色彩倒是需要警惕的。特别是自我感动，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实践者，他的原始动力不可来源于此。自我感动是幻觉式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它的敌人和神圣都是虚假的，由于自己消耗了精力，用心良苦，就以为自己做出了贡献，完成了任务，这乃是欺人之谈。这样的批评对你是有利的，也是你需要警惕的。很多时候，追求自由却往往走向自由的反面，捍卫真理却成了打人的棍子，这也是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警惕的。

书归正传，谈到萨奈之争，不妨先回顾一下他们的历史：

萨伊德原是巴勒斯坦人，一九三五年生于耶路撒冷，幼年在开罗读书，一九五一年移居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一九六四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任教。他一生勤于著述，并以此介入政治，批判帝国主义对东方的歧视与宰制，积极投身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东方学》（一九七八）是萨伊德的奠基性著作，《巴勒斯坦问题》、《文化与帝国主义》等都可以看作是其中的批判理路的延伸。萨伊德从福柯的关于知识、权力与话语理论中获得灵感，在书

中重构国际政治的历史格局。他认为，东方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西方出于全面干预和控制目的的一种发明。萨伊德反抗霸权，反抗统治性，这在《知识分子论》中有着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界定，以独立、自由、批判精神为准则；他强调说，惟有这种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其实他和你的部分观点十分相似，尤其是在《知识分子论》中不乏真知灼见。他曾一度被美国官方视为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以致遭到抄家；但他一直以流亡知识分子自命，坚持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

而奈保尔的代表作有《一个黑暗的地方》、《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印度：数不清的反叛》等纪实三部曲，我也曾经看过，书中描述描其印度的贫困、愚昧、落后、欺骗、混乱、杀戮、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现象；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批判了作为印度种姓制度意识残余的排外观念，“自我中心感”，狭隘民族主义，和极权制度，导致印度知识界群起而攻之。奈保尔则针锋相对地反击说：“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里流通，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奈保尔和萨伊德都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认为文明是分层级的，其中有着原始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区别，从而高度评价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时，他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念，并明确指出：虽然西方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野蛮落后的理由。在这些后殖民国家里，其实情形更为黑暗。他进而认为，这种黑暗的形成，完全源于这些国家内部：政府的极权统治，缺乏教育的大众，扼杀人性的传统文化，以及众多屈从或支持极权政府的文化人。当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辩护的声音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时，特别不满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认为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国家的失败诿罪于西方，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希望的。这些观念与你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奈与萨就真的没有调和的可能吗？奈的观点就真的不容质疑吗？

如果说胡适先生在晚年将“全盘西化”修改为“全盘世界化”以避免无谓的争论的话，那我想奈将政治制度与民族文化一起完全否定有些矫枉过正了。我非常赞同奈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野蛮落后的理由的根源的深刻批判，然而，他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能够改变什么吗？什么叫做“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里流通，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我为奈保尔这句话感到可耻，这是一种丑陋的“精英情节”，和“中国可以说不”一族同样恶心。既然你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流通，你又何必跑到印度考察被征服者的历史、记录后殖民时代文化遽变的创伤呢？难道你的书只是为了满足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的“窥淫欲”？离开对民众苦难的深深同情，离开对黑暗生活的悲痛怜悯，这或许是萨伊德为什么批评奈保尔，说他“早已停止了思想，变得没头没脑，惟靠声誉过日子，写作只能是浪费才能”，更可怕的是沦为“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的原因之一。真正的文学，骨子里一定流动的是民众的血液；离开这个，扯什么“人文精神”、“后现代美学”、“结构文学”都是扯谈。

我上封信谈到的奈萨之争，只是想阐明一个原则：何为“左派”？何为“右派”？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都不能光看固有的标签，一切以当下的具体问题的态度为转移。批判精神不是惟一可靠的，只是引发问题的前提思考而已。我也严重不同意余杰师兄对萨伊德的全盘否定。如果说汪晖等“新左派”提倡吹捧萨，那自由主义学人就完全否定萨，岂不恰恰陷入毛式思维的怪圈——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坚决反对。你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思想的锋芒，但在散文形式上，却有陷入旧模式之嫌（如《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你的转变并不彻底，我期待你以后的作品能够摆脱“非此既彼”的模式——当然，这也是我身上残留的毒素。

最后我想谈一点，为什么说你的一些理论在中国曲高和寡，任不寐也是如此，就因为与中国现实语境相差太远。任不寐有将知识分子与牧师合二为一的倾向，但中国老百姓未必会理会他这样的话语方式。我举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给你听：我在农村做调查的时候，曾经

和一老大爷聊天。他对我说：“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灾难减少了。”和其他村民聊天感觉也差不多。从他们的言谈口气中，可以感受出来，毛泽东依然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的“好皇帝”。“温饱”依然是中国农民最重的要求，就如同过年时候春联上写的“年年有余”是中国农民最高的理想。

现在的“三农问题”成了热点，许多学者成篇累牍的长篇大论出炉，可哪一本农民会去看？又看得懂？你还有任不寐所坚持的启蒙立场我十分赞同，可你们的书有多少农民、工人、底层劳动者能够看懂？愿意去看？如果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看不懂或不去看，这启蒙就变得十分尴尬了，可能会成为一场关公战秦琼的闹剧，或者被误读为洪秀全式的传道。我们不能完全责怪农民愚昧，而应该反思自己的定位和局限，知识分子本身的局限性与自我膨胀的救世情节。我无法将希望建立在御用文人身上，更无法将希望建立在某位被感动的领导上，或者什么“拍案而起的李向南式的人物”身上。潘恩的《常识》为什么在美国可以人手一册？这和他的话语能够贴近本国语境，让广大群众能够读懂不无关系。同时由于与传统文化的亲和性，也使其主张能够传播开来。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难免辞不达意的地方，但我一直相信，余杰师兄你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如果你只是一个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伪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话（如王蒙），我不会和你说这么多。我一直相信，与智者的交流能够促进我的思考，你是值得我敬佩并关注的学者。尽管我的思想十分粗鄙，功力十分浅薄，然而，我依然有一颗对真理对自由热爱的心，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关系着自己与他人的生活，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那是我们平凡的生活，苦难的人民。

萧然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萧然兄：

你好。谢谢来信。克服“自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谢谢你直率的批评。

关于如何让启蒙进入民众阶层，我也一直在思考。最近与朋友杨茂东等人交流，也激发了我若干思索。杨提出自由主义与“三农”问题的结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实际上，长期以来关注、研究农民问题并帮助农民争取自身利益的，都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秦晖、卢跃刚、任不寐等人；而号称为底层人民“鼓与呼”的新左派诸君，却只会在文章中关心“抽象”的“人民”。卢跃刚曾经告诉我，一个著名学者曾经好心劝告他说，为一个藉藉无名的农村女子、一个西部落后地区村庄里的小事，耗费自己几年的时间 and 精力，是不是太不值得了？卢回答说，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他觉得值得，他也不认为那是一件“小事”。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应当脚踏实地地做类似的事情。

在中国这个教育仍不普及的农业大国，要想像潘恩那样成功地实现思想启蒙，依然“难于上青天”。我敬重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段时间也在阅读相关的史料。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些类似的事情呢？

关于新的精神资源问题，近年来我比较关注基督教文化，一是对国内刘小枫、何光沪等学者的相关著作进行重读；二是对特蕾莎修女、曼德拉、图图主教、哈维尔、瓦文萨、金大中等有宗教背景的伟大人物的生命状态和思想脉络进行研究。当然，我最后的着眼点还是在中国本土。你的信中谈及了史铁生，我也很欣赏这位作家，他是当代作家中罕见的能够思考终极问题的人，或者说有思想家气质的人。他的文字背后有灵魂。

我同意你对自由主义的厘定。最近我在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这是他在《正义论》之后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深入阐述了自由与正义、平等和权利之间的关系。你可以找来看读。我不喜欢从哲学和形而上的意义上讨论自由的问题，而倾向于在“政治自由主义”

的范畴内讨论。

我喜欢美国人理解自由的方式。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方纳所说，美国人不关心自由的抽象定义，而关心那些使自由获取了具体内容的辩论和斗争。他指出，自由有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政治自由，也就是公民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利，“自由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实践；它是一种价值合体，也是一种贯穿于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经验。”

第二个维度是公民自由或者说个人可以用来反抗权威的权利的演进，“今天，为权利法案保护的公民自由是美国人自由概念的中心内容。”（这与你对权利的强调相符）

第三个维度是自由包含道德或“基督教”的理想。在清教徒殖民者时代，自由是“一种在个人行动中遵循某种道德规范的能力”，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一个人是否获得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天生才能的机会”。在新教的宗教背景下，一个人的自由始终不得伤害别人的自由。

第四个维度是经济自由，即个人的经济自主能力。

我很认同这种概括，不知你对这此是如何看待的？

对于萨伊德与奈保尔之争，我跟你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不同意你对萨伊德的肯定。萨在西方学院环境中高声批判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这一状态本来就显得无比矫情。固然如你所说，美国官方也曾骚扰他（美国有关部门曾经对萨进行调查，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巴解的领导职务，而不是因为他言论和观点），但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无论萨伊德如何痛骂美国主流社会，他照样当上了著名学府的名教授，过着典型的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为什么不回到他赞美的伊斯兰世界去呢？比如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或者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并且在那种“感同身受”的环境下，对当权者提出同样激烈的批评呢？我想，他深知批评美国和批评塔利班（两者都有可批评之处）后果是天壤之别的：批评前者基本上会安然无恙，甚至还会受到左派知识分子群体的喝彩；而批评后者则可能会被宣布为叛徒、奸细，最后被送上绞刑架或者被乱石打死。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我讲过好多次的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辩论谁的国家更自由，美国人说：“我们国家很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在白宫外面游行，大声喊‘打倒罗斯福！’你们呢？”苏联人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我们比你们更加自由，我们可以直接走进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的面前大声喊‘打倒罗斯福！’”

萨伊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清楚地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说。他知道拉什迪的遭遇，因此在那些最为关键的问题上他保持了狡猾的沉默。我认为，他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一个号称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人，居然有板有眼地按照西方主流学术的话语方式来进行知识生产，并享受由此带来的一切现实利益，他的学术根基究竟何在呢？

更为严重的是，萨伊德玩弄的这套说法，表面上看是在为第三世界“正名”，其实并非第三世界的福音。从表面上看，他是第三世界的辩护者，实际上他起的却是一种麻醉剂的作用。他对一个患了重病的病人说：“你没病，你没病”，这究竟是爱这个病人呢，还是害这个病人？他的这种“好心”，阻挠了医生对病症进行有效的考察和治疗。

学者杨曾宪将萨伊德与鲁迅作了一番对比，他说：“当一位教会医生在一篇序言中，称中国人为‘土人’，意即‘野蛮人’时，鲁迅‘当初颇不舒服，仔细再想，现在也只好忍受了’因为‘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称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热风·四十二》）”杨认为，这就是鲁迅区别并远远高出萨伊德的地方：“鲁迅不考虑口舌之争，而是承认并励志改造落后的事实。萨伊德则停留于话语文本层面上，无视当然更不想改造事实。而深究下去，则鲁迅是彻底站在民族立场上为民族写作的思想家革命者，萨伊德只是处于西方话语中心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鲁迅是在用他的生命为抵押，来换取民族命运的更新，萨伊德则是用他的民族命运为筹码，换回他自己的学术声望。假如萨伊德有鲁迅般的觉悟，如果

他在《东方学》中能对自己民族文化进行价值分析，即便不如鲁迅那样对传统彻底决裂，只要能做出些许理性反思，那么，在《东方学》问世二十年后，阿拉伯世界可能会生出新局面的罢。”我非常赞同杨先生的观点。萨伊德之“东方主义”非常容易否定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陷入某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如一夫多妻制度亦应当作为伊斯兰的文化传统而得到尊重和保留。此思路移植入中国，则迅速被某些人当作为专制主义辩护的依据。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鲁迅这样似乎很“无情”的医生，而不需要萨伊德这样似乎很“多情”的看客。

相反，我非常欣赏奈保尔，他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理论——“自我殖民主义”，也就是说，今日同胞对同胞的专制统治比昔日西方的殖民主义更加残酷和可怕。这不是一种“卖国”的观点呢？有印度裔背景的奈保尔不怕被同胞骂为“卖国贼”，而是坚持说出了骇人听闻的真相。他的这一立场让我肃然起敬。在这一点上，奈保尔很像鲁迅，他说“不为印度人写作”，跟鲁迅所说的“不读中国书”一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你对他的这句话有很大的误解。你再仔细读读他的作品，你会感到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巨大的痛苦和忧郁，他并没有超然于第三世界的现实之外、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苦难和不幸都内在于他的心灵。你怎么会把这样一位有良知的作家与“说不”的那群流氓等而视之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作家茉莉曾经撰文介绍过奈保尔对伊斯兰文化的批评：“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的破坏力，其危害远远超过英国的殖民统治。他指责伊斯兰教曾经奴役、并试图消灭其他文化，说：‘肯定找不到任何一个帝国，像伊斯兰和阿拉伯……它对改奉信仰的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你必须摧毁你的过去，摧毁你的历史。’”伊斯兰文化需要像奈保尔这样的批评者，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其文化更新。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奈保尔严厉地谴责伊斯兰企图奴役其他文化：“一些原教旨主义国家既无理性，又无经济生活。”（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怎么没有“经济生活”呢？他们的酋长和独裁者们穷奢极欲，比西方的资本家还要资本家；他们也在瑞士的银行里存钱，他们也在美国的股市投资。）

总体而言，这些看法乃是震聋发聩的真知灼见。不仅奈保尔如是看，原来左倾的意大利著名新闻记者、作家法拉奇也是持同样的观点，甚至更加激烈。另外，许多来自于伊斯兰世界的、有良知的学者也开始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的人格比萨伊德之流更让人尊敬，思想也更为深邃。

你提到的“多元”的观念，我认为“多元”是时间上的，而非空间上的。在“多元”之上，存在着一些普世的价值，它们不仅仅是西方独有的价值，而应当是人类共享的价值，比如天赋人权等。同时，“多元”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比如我们不能赞同说，中非皇帝喜欢吃人是源于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为了保持世界的多元化，就应当保护这种吃人的习俗。我们不能以“多元”的幌子取消野蛮与文明的分野。

再以中东地区为例子，在那个地理区域内，除了小小的犹太国以色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主国家之外，其他数十个伊斯兰国家都是专制国家（有伊拉克、利比亚式的强人独裁，也有沙特、阿联酋式的君主专制等等），难道这是一种偶然的原因吗？难道他们现实中的政治制度与各自的文化传统完全没有关系吗？我就很喜欢以色列，而不喜欢它周围的伊斯兰国家——你让我怎能认同一种作为人口一半的妇女全都受奴役的文化呢？难道一夫多妻也应当是“多元”中宝贵的“一元”吗？然而，由于诸多因素，中国的大部分青年人一向都很支持巴勒斯坦等“第三世界的兄弟”，网上这群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称——“支巴愤青”。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似乎“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弱者”的反抗是“合理”的。我不想与他们辩论，那是对牛弹琴。前不久，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对哈马斯领袖扎哈尔的访谈，不妨抄两段给你看看——

记者：你们的所谓殉道行动却加害到无辜的以色列平民身上。

扎哈尔：以色列那边有无辜的平民百姓吗？没有，他们家中都有枪，他们十八岁便去服兵役来攻击我们，他们都是殖民者。

记者：你们最近也伤害到外国劳工，例如来自中国和菲律宾工人……

扎哈尔：谁叫他们到以色列去打工？谁叫他们协助以色列人兴建殖民区？

记者：今年年初有女性加入“殉道行动”，并有传闻指孩子也被征召。往后会否有更多女性和孩子成“殉道者”？

扎哈尔：请你说得清楚点，殉道者乃完全出于自愿，不是给征召入伍的。其实，哈马斯一直不主张女性和孩子加入殉道行动，我们有足够的男性成员去从事殉道使命。

记者：在道德上，我还是不明白及不认同这种手段。

扎哈尔：这是我们的文化，以牙还牙，不需要你的明白，就正如我不太明白你们的中国文化一样。

在这个恐怖分子看来，他们的恐怖活动居然成了高尚的“殉道行为”，被他们炸死炸伤的中国劳工则是“活该”。因为中国劳工为敌人服务，就要将他们划入“敌人”的行列，就是“死有余辜”，这是什么混账逻辑？在自杀性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将对事件中死伤的中国劳工进行赔偿，让中国劳工享有以色列公民的优抚待遇；而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的巴勒斯坦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对死伤者及其家属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和怜悯。两相对比，孰是孰非，难道不是黑白分明吗？对于扎哈尔之流的狂言，我不知道“支巴愤青”们读到之后会是什么感受：究竟应该继续爱“巴国弟兄”呢，还是应该爱回头来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国家？

其实，以上所谈，均是常识。可惜，连如此常识都没有得到普及，真是可悲之极。

余杰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五）、巴金·说真话·被妖魔化的美国

余杰师兄：

我同意杨曾宪对萨伊德的评价，其实这与我的观点并不矛盾，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拥有的是鲁迅，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萨伊德的价值。正如哈维尔的人格很光辉，但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捷克人的昆德拉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

我曾经在想：余杰成家以后，会不会变得世故一些呢？当年你是以锐气出现在文坛的，经过了这几年的道路，你能否保持这种锐气？佛罗斯特说过：我怕年轻时候是个激进派，因为这样在年老的时候会变成保守派。现在的余杰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说真话是艰难的。巴金的《随想录》我也看过，他提倡的“讲真话”的精神确实是真诚的，然而巴金本人就是一个懦弱的人，他那本书的“真话”实在少得可怜，这真是个历史的反讽。相比而言，李锐，王若水，李慎之的反思让我震撼。作为共产党的以前的高级干部，有勇气有胆量说出那样的话语，而且由于本身就是过来人，对极左的那一套看得更为清楚，我想听听余杰师兄的看法。

谈到美国，我一直十分推崇其民主制度的优越。在我看来，具有一种普适价值，能够不断修正与自我调节，这也保障了美国今天经济上的繁荣。在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麦卡锡时代，依然有正直的女国会议员的反抗批评，依然有民众的抵制，这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结出来优良的果实，一个民主的社会需要广大具有公民意识的国民的自觉维持。而这些，在中国是匮乏的，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国改革之路有多难，坚持启蒙意识，捍卫常识，是可贵而且稀缺的。

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是不够的，正面的立论与建设性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现在破除黑暗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光破不立，缺乏治病良方，则是远远不够的。我做实习记者的时候，和很多官员吃过饭，在饭桌上，他们的一些观点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更尖锐，他们也认为反腐败靠纪委靠党内监督是没用的，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展党外监督等。然而，在台面上，则是另外一幅官腔。这背后是深刻的利益格局，这一点有多少人去细致分析过呢？湖北有个“五毒书记”张二江，曾经有本书叫《下级学》，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厚黑学性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门学问呢？

另一方面，你在《拒绝谎言》里对美国的无限推崇让我担忧。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去美国，一定要好好了解再下结论。林达有本书《近距离看美国》，是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后的经验与反思，实乃其生命体验。同时，我也在想，能否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意义与美国的强权政治有所批判？如今的美国对外与对内截然不同，并非当初富兰克林时代的那个美国，我们在借鉴美国的民主制度的时候，有没有对其强权政治有所警惕呢？至于美国有没有存在霸权的一面？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可以直接攻打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在攻打南联盟的时候，我非常厌恶米氏，这是个该绞死的杀人魔王，国内的宣传媒体却标榜其为民族英雄，搞笑！但美国攻南未经安理会授权似乎不合乎程序？）这些确实我有些迷惑，也想听听余杰师兄的意见。

我一直有个看法，你的政治观念似乎并不够成熟与系统，作为在野的以批判职能为己任（你有“牛氓”一说）知识分子，你是合格且优秀的，但作为批判政治制度者而言，你似乎缺乏正面立论的能力，而且缺乏一套系统的建立自己政治价值观念的能力。苏力的“法律资源本土论”和“送法下乡”遭遇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全盘移植英美法系就一定能够行得通吗？我表示怀疑，制度的建立需要以文化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本来就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系统，统一起来很难很难！

我可能会毕业先去广州某报业集团先工作一段时间，我一直深信，真正的现实关注要身体力行。在这所压抑的大学待了四年，我更加想真正体验一下外面的世界，真实的生活，我以前曾经批评余杰师兄的一点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你的真实体验太少了，如同油浮在水面，而没有进入水里，所以有些文章给人感觉就书论书，坐而论道，精英意味太重，我一向厌恶韩毓海、旷新年这样的新左派，倒不是完全因为其观点（他们的观点也有可取的一面），而是其恶劣的文风，自我洋洋得意的精英化气质。

最近的《南风窗》有一期关于农村教育的，是我的两个朋友写的，和我一个学校。在我看来，他们已经具备了一个有良知的记者的潜质，扎入生活，这是我欣赏的文风。

萧然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

萧然兄：

你好。很高兴得到你的许多建议。

关于巴金，我跟你的看法差不多，他说的真话相当有限。我想，八九十年代以来，作为他个人，应当不会有什么害怕的了，以他的年龄和地位，说点官方不喜欢听的话，“有关方面”也不会对他怎么样。但他为什么说得少呢？这大概跟他的家人的“约束”有关，他们的家人可要像藤缠树一样依附于他，并分享他的名望，哪能让他自由说真话、得罪权贵？《收获》杂志就被他没有多少才华的子女霸占了数十年。而正如你所说，巴金在本质上是一个懦弱的人，因此在许多重要事件上他就沉默了。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年轻时候的巴金，迷恋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尽管后来他不太承认自己的这一阶段，在文集中也尽量将昔日的这类文字删去。那种青春的热情、朝气和单纯，本身就让人感动。可惜，这种气质逐渐消磨，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在险恶

的政治环境中，巴金更是成了一尊“泥菩萨”。就纯粹的文学才华而言，巴金是一个平庸的作家，《家》、《春》、《秋》三部曲的成功，只是适逢其时罢了。我认为，巴金最好的作品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的《寒夜》，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风格蕴藉而忧伤，比起早期过度宣泄的情感来，更让人回味和思索。另外，巴金翻译了不少好外国的作品，这个贡献颇大。

李慎之、李锐、王若水等人当然比巴金了不起。这几位老人我都有些来往，时常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两年前，欧盟的一个人权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由瑞典公使傅慕友先生出面邀请一些作家和学者座谈，我见到了久仰的王若水先生。那次，我与他有过一番简短的对话。不久之后，王老就去世了，真是后悔那次的谈话没有深入下去。

关于对美国的看法，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

首先，我不认为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对立”的。相反，我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其对内政策的延伸。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当今世界民主力量的代表，是世界文明秩序的维护者，很难想象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处于美国的地位会比美国做得更好。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为什么会热衷于“干涉他国内政”呢？我认为，除了国家利益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得从美国人的文化信仰中寻找。美国史学家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说：“自由是美国人判断和界定个人和民族的第一概念，自从十八世纪末获得民族独立之时起，美国人一直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人民，有责任把自由的恩赐带给全人类，为那些在美国之外逃离压迫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这种“上帝的子民”的自负，固然会让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抵触之感，但确乎是他们真实的感受。

其次，我们应当客观地分析美国的“霸权主义”。它对整个世界而言，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认为是“功大于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推测：没有美国，就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力量的胜利（包括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胜利，以及此后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民主化）；没有美国，就没有苏联、东欧专制制度的垮台；没有美国，就没有科威特从伊拉克魔掌下的解放；没有美国，就没有南联盟军队在科索沃屠杀的终结；没有美国，就没有阿富汗塔利班的垮台；没有中美之间的互动和对话，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种种进步也会大打折扣。总体上看，美国代表着人类进步和健康的力量。

第三，美国是不是可以批评的？美国当然有许多应该批评之处。美国不是上帝、不是神，美国政策的实施是“人”，而人是有罪的、有缺陷的；同时，民主制度也从来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它仅仅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而已。

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开国元勋所确立的“美国价值”与现实中美国的政治运作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即便是以上诸位伟人，他们的“理想王国”与现实生活也存在着差异。比如华盛顿等人一边在宣读《独立宣言》、畅谈自由思想，一边却无视奴隶制度的罪恶、每人家中有大量的奴隶。我们必须正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同时不要“完美主义”的尺度。

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中，美国也犯过诸多严重的错误。虽然有人把我看作“亲美派”，但我对美国的错误和罪行依然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度、西部开发中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以及越南战争等，都是不能回避的罪恶。无庸讳言，在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也出现过某些恶魔式的政客，如麦卡锡、胡佛、基辛格等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十一月二十八日，继受到智利法庭的传讯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再度受到阿根廷法庭的“青睐”，接到传讯要求他出庭作证。这一传讯是为了调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美军政府绑架和杀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案件。阿根廷检察官希望基辛格就其对此事的了解出庭作证，尤其是关于南美独裁者间合作炮制的血腥镇压行动——“秃鹫计划”。当时，阿根廷军政府发动了镇压左翼不同政见者及其同情者的“肮脏战争”，不少不同政见者及其同情者被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当时有三万人遇害和失踪，而官方的统计数字为一万五千人。美国公布的解密档案确证了时任国务卿基辛格曾和当时的阿根廷有过“亲密接触”，并建议阿政府在处理反对派时要“快刀斩乱麻”。阿

根廷军政府采用了基辛格的建议，展开了持续数年的镇压运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政客，又被布什任命为“九·一一”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对这样的坏家伙，我并不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宽恕之，而是坚持痛斥之。

但是，美国好就好在它有一套能够不断修正自己的民主制度。关于这一点，林达在她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本著作中都有过深入的阐述。正如你所说，林达的这些著作凝聚了她多年的生命体验，而且深入浅出，篇篇都是写美国，却字字都呼应着中国的现实。这样的书是最好的启蒙读物，真应当列入中学生课外读物之中。你的建议很好，明年我会去美国作短期访问，切身感受和研究美国的方方面面，有可能的话回来将写一本专题性的著作。

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北约的重要性远远重于联合国，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十余年间。北约与联合国的关系如何处理？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否必须获得联合国的“授权”？联合国自身的组织架构是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我的知识结构的限制，很难说得“头头是道”。不过，我认为北约出兵科索沃制止米洛舍维奇的种族屠杀显然是一种正义的行动。打个比方，一个父亲在家中虐待小孩，作为听见了孩子惨叫的邻居，有没有权利破门而入制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余杰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日

（六）、昆德拉与哈维尔·行动抉择·媚俗

余杰师兄：

你好。

曾经这一点我批评过你，你有些文章“救世情节”过于浓厚，带有很强烈的文化沙文主义的色彩。比如在你的《知、行、游——重读杨绛》一文中，对杨绛先生进行的分析解构之中，写道：“士可杀，不可辱。从屈原到王国维，一直到傅雷，这其实是一种被儒表道里的主流文化所遮蔽的侠的精神，像流星一样在中国的天幕上偶尔掠过几颗。惟其少更显得可贵。”而在另外一些篇什里，你的个人倾向表现在对茨威格、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海子、胡河清等作家诗人的由衷钦敬之情。但上述文人自杀动机与内因的有着不同，简单的二元对立比较似乎过于草率。按照此逻辑推演开去，在黑暗年代里忍辱负重而终于迎来些微曙色的知识分子（比如钱钟书、比如巴金等）都是躲避崇高的胆小鬼和苟活者，非一死不足以谢后人，而不管他们在各自的园地里做了怎样的耕耘和收获。这种逻辑实在让人不寒而栗。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髓并不是如此。随着时光的推移，你的文章越来越凝重。然而，这样的偏执依然存在着。不仅是你，也包括摩罗、林贤治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存在着。胡适曾经说过：“容忍比自由更可贵。”深以为然。

而这也是我为什么批评你在《昆德拉与哈维尔》的文章中隐含的思想专制倾向。是不是“昆德拉”就一定是“哈维尔”，有没有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智者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如何界限自由主义的内涵与外沿？伯林所言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外，是否就没有其他自由存在？消极导致政治冷漠，积极容易流于专制，我们又如何解决？我觉得这些在你文章中都是思考不够深入的地方。而我更认同的是：沟口雄三与孙歌两位关于“知识共同体”的对话相当深入。这应该得益于有共同语言，双方在“知识共同体”问题上都“于我心有戚戚焉”。沟口先生由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深入到学术层面，这种洞微察著是让我叹服的，而你的有些文章过于精英化意识形态，底层体验的生活似乎少了些。在修订版的《火与冰》中的“军训日记”那一章，就可以很生动地看见这一倾向。福柯的思想对你影响很深，但如果拿他理论

单纯解释中国现代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似乎有些单薄。

最近已经把您的《拒绝谎言——余杰海外政论集》读完了，并将部分文章与我的评论发给身边的朋友们看，也算普及一点自由主义的香火吧！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让启蒙的曙光照耀人心，青年一代的学子，最可贵的还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理解并喜欢你是因为你的思想，批评并指责你亦是因为你的思想，两者的共同基础都是源于对真理的爱对自由的渴望。

萧然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萧然兄：

谢谢你的批评。黑格尔的二元对立思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我前期的文章中，确实有这样的偏执之处，钱理群先生在给我的信中也有过批评。随着思考的深入和阅历的丰富，我将努力克服这些问题。

福柯的理论当然不能用来分析中国的所有问题，但用来分析我军训时代的那段经历却“游刃有余”。当然，你没有经历过八九十年代之交特别对北大、复旦新生进行的那种“军政训练”。跟你们一个月的军训不同，我们是在陆军学院进行长达一年的军政训练。其中诸多可笑可耻之事，你是难有“切肤之痛”的。我对福柯学说的接受，首先是从情感和直觉上来的，而非从理论到理论。当然，福柯的思想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最近几年我也有所思考。

关于对杨绛这类文化人的评价，我坚持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钱钟书、杨绛、昆德拉他们选择“消极自由”、选择“独善其身”，当然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我们可以不认同，但不能完全否定之；而林昭、张志新、哈维尔他们选择“积极自由”、选择“以身殉（或实践）道”，也是他们个人的权利，我们虽然不能达到，但是可以“心向往之”。对我来说，我愿意把更多的景仰和尊重给予后者。我并不是“号召”所有人都去充当烈士和英雄，但我难道没有权利向烈士和英雄表达更多的敬意吗？

你的信中多次对我的《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提出批评。有的看法切中要害，有的我却能同意。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论述我的观点，以供你参考。

流亡国外的昆德拉与坚守国内的哈维尔、克里玛等人之间确实有过分歧和论争，这种对立并不是我个人虚构出来、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论争在欧洲各派知识分子中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时我也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极具现实意义。一言以蔽之，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昆德拉式的知识分子，但更需要哈维尔式的知识分子。

我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中提及“签名还是不签”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主人公托马斯拒绝签名的情节。托马斯拒绝在抗议官方的文件上签名，并为自己寻找了堂皇的理由，这其实是昆德拉的“夫子自道”。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金雁的《火凤凰与猫头鹰》一书中发现了极其精彩的论述。

昆德拉一九七五年移居法国，从而脱离了国内异见运动。与此同时，以哈维尔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宁愿在国内坐牢也不出国，并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人权活动，其中包括发起像《七七宪章》那样的签名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昆德拉所写到的托马斯与要求签名的编辑的分歧，其实是他本人与哈维尔等人的分歧。在昆德拉笔下，托马斯对那位编辑怀有“崇拜”与“爱情般的怀念之情”，但极不满意那位编辑的“道德优势”。他甚至把那位编辑请他签字时他认为受到的道义和良知的压力与当局的警察迫他在亲当局的声明上签字的专制压力混为一谈，并认为这两种压力“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种陷人于“媚俗”状态的异化力量。对此观点，金雁评述说：“昆德拉在这里实际上是在以偷换命题的诡辩手法为自己的软弱寻求开脱（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作为一种个人性格的软弱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昆德拉的所谓‘迫害者与被迫害者都在瞪着眼睛威胁别人’的高论，不能同意他

把‘编辑’的道德感召力与警察的压力混为一谈，让两者共同为‘媚俗’负责。”

我同意金雁的看法。我对昆德拉的批评也是基于相似的理由：你选择流亡法国，自己过上优越的生活，这固然是你个人的自由，但你没有权利嘲讽和挑剔那些在国内选择坚守的同胞。我认为，哈维尔等人的“行动抉择”显然不是一种“媚俗”，有多少人愿意把坐监狱、上刑场以及被监视、被骚扰的命运作为某种“媚俗”的手段呢？这样“成本过高”的“媚俗”，“过于聪明”的人是不会实行的。如果说哈维尔的挺身反抗专制也是一种“媚俗”的话，那么躲在灯红酒绿的法国的昆德拉又在“媚”什么呢？

最近读到王怡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行动抉择——二零零二年的网络公开信与签名浪潮》，其中有这样几段话让我拍案叫绝：

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关乎个体哲学的思想体系，而是关乎公共生活的政治哲学。只有在“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才有自由主义可言。如同杜威所说，民主不仅是一种选举制度，民主“必须涉及人类一切交往关系”。涉及到共同体对于生存经验的分享。杜威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说（他称之为旧自由主义）“根本毛病在于把个人流放在社会关系之外”。杜威认为，只有在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群体生活中，个人才可能拥有自由、权利和尊严。所以具有民主权利的个体是同实行民主理念的群体制度同步构建的。没有公共生活，就没有个体性。

……海德格尔附逆纳粹的个人悲剧，是一个明证。是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不审视公共领域的后果。哲学必须是政治哲学，就因为政治和个体都不是自足的，都是对于彼此的制约。我曾对朋友说，嵇康也是可能变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海德格尔之后开始走向成熟，他的两位学生，一是汉娜阿伦特，出于对她老师兼情人的反思，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并区分了劳动、行为和行动的不同意义。将最高的价值寄托于真正的行动。部分的回归到古典共和主义对于公共政治生活的重视。另一位学生扬·巴托契卡（也是胡塞尔的学生），则成为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最主要的创始人。和哈维尔一样，在一个极权国家频繁参与着各种签名和公开信运动。而昆德拉则像一个庄子在一旁发笑。

王怡的思路与我在《知·行·游》中的思路颇有相似之处，即从中国道家文化的传统来分析自由主义在中国为何变质。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骨子里都是道家，近代以来依然如此，看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就明白了。记得在前面的信中，我曾经提及对陈鼓应的道家文化观的不同看法，可作为参照。我担心的是，如果道家的“游世主义”与“犬儒自由主义”完成了一种巧妙的对接。这两套“遁词”融合之后，将会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造成巨大戕害。事实上这种戕害已经形成，九十年代初以来，乾嘉学统在大陆高校的全面复活不就是明显的例证吗？有意思的是，海德格尔也是东方文化迷，这跟他的“落水”有没有关系呢？老实说，我并不感激这些把东方文化“审美化”的西哲，相反倒是对他们充满了警惕。

王怡谈到知识分子的“行动性”，谈到知识分子对公众生活的参与，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如果不参与公众生活，学问再大，也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非知识分子（如钱钟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没有念过大学的遇罗克倒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美国也是如此，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学院里、书斋里滔滔不绝的学者，而是像马丁·路德·金这样在法庭上和广场上慷慨陈辞乃至最后献出生命的人权斗士。这是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的一个认定，可能别人又要说我“偏激”了。

与朋友无拘无束地进行思想的交流，真是人生中的一大快事，用金圣叹的话来说就是“不亦乐乎！”

余杰

二零零三年一月五日